基希报告文学选



二十世纪外国文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基希报告文学选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基希报告文学选

Jixi Baogaowenxue Xu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51,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 5/16　插页5
1984年6月北京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书号 10208·185　定价 1.30 元

译本序

基希——报告文学的大师

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六年写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中有一篇《三月的租界》，批驳狄克（张春桥）之流对作家田军及其小说《八月的乡村》的攻击，里面提到："假使'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希特勒——引者）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这里的吉须，就是著名的报告文学家基希。抗战期间，周立波同志曾根据英文版把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1933）翻译介绍给我国读者。因此，基希的名字在我国文化界还是比较熟悉的。而实际上，基希在漫长的新闻生涯中，采访和旅行过世界许多地方，写下了大量的报告文学、通讯报道，《秘密的中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现在，我们通过这本选集想比较全面地介绍基希和他的颇有特色的报告文学。

埃贡·埃尔温·基希（Egon Erwin Kisch）于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病逝于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同一个布拉格，六十多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基希的部分描写布拉格和捷克的报告文学就是这种变化的真实记录。基希是捷克用德语写作的社会主义作家，世界著名的报告文学大师。他出生在一个布商家庭，十七岁中学毕业后便入工科大学学习采矿。他在

服了一年兵役后，从一九〇五年起就从事新闻工作，开始时在《布拉格日报》当见习记者，一九〇六至一九一四年他当《波希米亚》报的采访记者，其间还参加了《柏林日报》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又被征入伍，在塞尔维亚战线参加战斗。大战后期，他参加了一九一八年维也纳一月罢工，其后在地下士兵委员会工作，并成为维也纳赤卫队领导人之一。战后，他一面继续从事新闻工作，一面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

基希作为新闻采访记者，曾旅游过世界许多国家。早在一九一二年他就到过英国，一九二〇年去法国。一九二一年他迁居柏林，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曾两次访问苏联，并出席了一九三〇年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一九二六年他去非洲旅行；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去美国和一九三二年来中国都是秘密旅行。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台，二月二十七日发生国会纵火案的当夜，基希就在柏林被法西斯分子逮捕，只是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强烈抗议，他才获释，但是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遭到焚毁。基希离开德国后，继续从事反法西斯的斗争和新闻采访与编辑工作，并加入了一九三三年在巴黎成立的“德国作家保护协会”。他在一九三四年去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国旅行，同年秋天作为反对战争和反对法西斯世界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去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反战大会；一九三五年又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保卫文化大会。西班牙内战时期，基希又奔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的反法西斯战斗。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基希经法国、美国流亡墨西哥。在那里，他参加了反法西斯报纸《自由德国》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于一九四六年回到布拉格。回到祖国后，他心情非常激动，不顾年老体弱，在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多次

旅行，收集材料，准备写一本有关新捷克斯洛伐克的书。可是非常不幸，两年后他就去世了，有的作品只留下一些未完成稿。

基希的著作很多。他曾写过抒情诗和小说，但他毕生创作中最主要的是报告文学，这与他作为新闻记者和旅行家的一生是分不开的。早在一九〇八年他就发表过报告文学集《布拉格街头拾零》，一九一九年又出版了《布拉格冒险》，这些报告文学揭露了布拉格的黑社会，描述了贫困、犯罪、卖淫和它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但在那时，基希是站在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来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控诉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的。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了革命的工人运动，立场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以鲜明的党性描写革命的无产阶级，反映群众的革命斗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对劳动群众和被压迫人民寄予深厚的同情，对剥削阶级和上层统治人物进行无情的鞭笞。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战时日记《布拉格军团里的士兵》(1920，1952年新版改名《基希，写下来！》)、《怒吼的新闻记者》(1924)、《沙皇·东正教教士·布尔什维克》(1926)、《世界冒险》(1927)、《时间匆匆》(1928)、《天堂美国》(1929)、《亚洲剧变》(1932)、《秘密的中国》(1933)、《禁止入内》(1934)、《五洲探险》(1935)、《在澳大利亚登陆》(1937)等一系列报告文学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基希发表的重要报告文学集有《广场奇闻》(1942)、《墨西哥漫游》(1945)等。

从以上一长串报告文学集的书名中可以看出，基希的描述对象遍及五大洲，基希的文学视野深入到各个地区。在他所经历的时代里，他不仅描写了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欧洲，而且描写了落后、但充满希望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他不仅描写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且以批判的眼光描写了

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美国；他不仅以深沉的爱描绘了祖国故土——捷克和布拉格，而且以友好的感情描绘了当时说来还很神秘的中国；他不仅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匈帝国前线的狼狈情景，而且以崇敬的心情描述了西班牙内战时期来自各国的国际纵队战士的精神面貌；他不仅描述了他所到过的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制度、文化传统，而且也描述了许多国家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奇闻轶事。总之，在基希的报告文学集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广阔而又十分清晰的社会生活图景。基希不愧为报告文学的大师，是他创造了报告文学这个新时代的文学体裁。

我们从基希的一部分报告文学集中，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生动有趣的、给人以一定启迪的作品，编成这本《基希报告文学选》，以飨我国的读者。

《怒吼的新闻记者》是基希一九二四年所写的一部分报告文学的结集，汇编于一九二五年。这本报告文学集的书名很快成了作者的绰号；只要一提到基希，人们就说他是"怒吼的新闻记者"。《怒吼的新闻记者》成了一个经典性的标题。一九四九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博多·乌泽（1904—1963）重新编选了《怒吼的新闻记者》。该书除原有的一些篇目外，他又从《世界冒险》、《时间匆匆》、《禁止入内》等集子中，从西班牙内战期间的通讯报道中，从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基希回到故乡后创作的作品中，选了一部分，包括一些未完成稿，共二十八篇。我们从这本集子里选译了十篇。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在基希身上有着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他作为报告文学作家，具有严肃认真和深入细致的创作态度。报告文学必须遵循的创作原则是真实，只有真实才能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染力。他调查了有三千个疯子的

比利时小城，他漫游了伦敦的中国人居住区（《华人城》），他同怀特查佩尔的流浪汉一起过过夜，他研究了举世闻名的捷克拔佳鞋厂的发展史，从而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这样的真人真事便是他所撰写的报告文学的依据。另一个是他作为共产党员，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革命的激情。报告文学贵在及时反映生活，回答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基希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匆匆过客，而是一个伸张正义的怒吼者。他满怀热情为劳苦大众奔走呼号；他的有些报道几乎就是控诉："工业越发展，工厂越资本主义化，矿井就打得越深，发生事故的数字也就越高。"他以深厚的阶级同情，描述了一次次矿井事故、工人及其家属的不幸遭遇。他通过里昂的丝绸、蒙特卡罗的赌场、西班牙的破产农民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一面是普通工人和农民辛勤劳动，不得温饱；一面是封建贵族和百万富翁骄奢淫逸，挥金如土。党性和革命性不是通过空洞的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生动具体的事例，通过对社会深刻的观察和批判，对问题认真严肃的探讨表现出来的。他不仅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状，而且力求认识它的根源。他来到工厂和市场，他阅读各种调查报告，他研究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他走访交易所和贫民窟，他下到煤矿矿井和水银矿坑道。总之，他深入社会各阶层进行调查和采访，因而他的报告文学不仅材料丰富生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能抓住要害、切中时弊，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弱点和无法解决的矛盾。基希的报告文学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基希在发表了《怒吼的新闻记者》和论文集《经典性的新闻工作》(1922)之后，已经蜚声文坛。一九二五年冬他首次访问苏联。翌年，他写了《沙皇·东正教教士·布尔什维克》，热情地描绘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我们从《访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所》、《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狗》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是以党性和客观性报道苏联的巨大变化的第一批德语作家之一。基希以十分钦佩和崇敬的心情，访问了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对于苏联在收集这两位共产主义巨人的珍贵资料工作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不胜赞叹。在另一篇报道中记述了这样的事例，尽管巴甫洛夫一再攻击苏维埃政权，但是，人民政权对巴甫洛夫的态度是公正的，正如一位人民委员所说的："我们可不能反对巴甫洛夫，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按照科学理论建国的国家，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严肃认真的科学代表，……巴甫洛夫的毕生工作更明确地、在实验上更确切地证明了唯物史观的正确，证明了马克思主义。"

基希访问了美国这个金元帝国，写了一系列通讯报告，并汇集成册，取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标题："天堂美国"。这本嘲讽和揭露美国的书，自一九二九年出版到一九三三年五月"焚书之夜"，共发行了三十二版，在德国和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全书共四十篇，我们虽然仅选译了六篇，但已经可以对五光十色的美国社会获得初步的印象。美国的总统选举以及所谓的"两党制"，一向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典范。基希描写总统选举的报告文学，虽是五十多年前的作品，但非常生动具体地叙述了美国总统选举的情况，没有一句批判"假民主"之类的言词，却对总统选举的实质进行了十分形象化的揭露，语言幽默，讽刺尖刻，击中要害，今天读来仍然趣味盎然，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美国的社会是一个畸形的社会，在文明、繁荣和摩天大楼的背后，隐匿着残酷、罪恶和野蛮。基希通过对谋刺林肯总统事件的描述，联系到美国历史上谋刺总统的问题，使我们看到了美国社会的一个侧面。纽约的夜间法院一个晚上发落数百件案件，受审讯的

都是平民百姓；芝加哥的失业工人，“穷极无聊，无所事事，……车祸使他们得到满足”；垄断资本家和警察、法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以及酒类走私，行贿受贿；不同于欧洲的、粗野的、有生命危险的美国式的足球比赛，等等，——这一切都使我们看到美国社会的另一个侧面。世界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大师查理·卓别林，二十年代末正住在美国，基希通过对他的采访，同他一起拍摄《城市之光》，把这位艺术家的谦虚、朴实，认真、幽默，对艺术的热爱，对工作的一丝不苟，描绘得栩栩如生，这是《天堂美国》中的一个插曲。

《秘密的中国》这本报告文学集的遭遇，意味着基希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一九三二年他从中国访问回去后，一九三三年初希特勒上台，基希本人被捕，新出版的《秘密的中国》还散发着油墨味，就被放上了柴堆焚烧，或者被捣碎去作纸浆。当然，正义的呼声是烧毁不了的，也是无法捣碎的。《秘密的中国》还是流传了出去。基希关于中国的报告，向欧美读者介绍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闻，生动活泼，另辟蹊径，给他带来了很大声誉。《纱厂童工》描述了旧中国的苦难，尤其是童工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的悲惨生活，令人凄然泪下。《南京和红军》描写了十九路军路过南京要去进攻苏区的情景，这是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的事。但在半年前，这支军队还在上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基希不无感慨地引了孙中山曾经说过的话：谁反对共产党，也就是反对国民党。而现在中国资产阶级却把抗日前线的军队调去打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作者对这种反常的现象予以坚决的否定和无情的揭露。基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看待和分析这个问题，并指明了未来的发展和变化，预言中国人民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广场奇闻》是基希的自传性报告文学集，共二十四篇，一九四二年在墨西哥用德文出版；一九四七年又在欧洲出了新版本。正如许多优秀小说家喜欢重复自己的故事一样，这本书的不少篇目都是基希在过去创作过的，散见在早先出版的关于布拉格的几本集子中。四十年代，基希对它们进行了改写，使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更加精确真实，艺术技巧更加高超。这些“广场奇闻”，既是奇闻轶事，又确实是真人真事，并且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在这本报告文学集中，盲人梅托修斯的演唱贯串全书。基希写道：“他的演唱节目毫无例外地都是真人真事，这些真人真事或多或少都是历史，有的已经成为历史，有的将要成为历史。”（《盲人梅托修斯的叙事谣曲》）这段话也适用于基希自己的创作。他撰写报告文学的原则是：真实。但是，要写出真实并不容易。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真实。同一件真实的事，有的记者认为是“有趣的”、“意义深刻的”，有的却认为是“无聊的”、“没有意义的”；反之，一件不真实的事也是这样。基希在《初露锋芒》中回忆他年轻时当采访记者的一段经历。他撰写磨坊失火的通讯报道，虽然离开了真实，写了一篇“有趣的谎言”，但竟被别人相信了，并且受到了称赞。基希觉得非常遗憾，他说：“难道我该继续欺骗下去吗？绝对不能！正因为我第一次力求如实报道的时候，我却没有抓住真实，所以我要继续寻求真实。”后来，基希又提出这样的问题：描写真实可以不可以有幻想呢？他认为，那种使真实模糊不清的幻想应该摒弃，那种服务于真实的幻想应该容许。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他为了这个目的而作的努力。《凶手的母亲》、《科诺皮什杰的水灾》、《记者当兵》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奥匈帝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记叙了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的苦难生活，控诉了豪门贵族、纨袴子弟依仗权势欺

压百姓的罪行，揭露了奥匈帝国宫廷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军队的腐败、报纸新闻的虚伪。《玛格达勒妮教养院》则是一篇幽默的叙事作品，通过对一件剽窃事件的揭发，讽刺了纳粹德国的那帮领袖们不学无术、孤陋寡闻，以及纳粹文学的枯竭、没落。基希通过《广场奇闻》这部作品，以自己的创作实践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报告文学要建立在事实可信、生动活泼的写真实的基础上，同时又不排斥“但丁式的好奇心”；但这种好奇心必须有事实为依据，并服务于真实。

《墨西哥漫游》是基希流亡墨西哥期间参观访问的见闻录，共二十八篇，我们选译了五篇。无论是描写火山爆发还是拟人化的金字塔，无论是叙述银矿见闻还是乡间斗鸡，基希都从地理状况、时代沿革、历史掌故、风土人情各个方面绘形绘色地进行描述，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火山——这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在不停地活动着，变化多端，气象万千；战争是罪恶的渊薮，欧洲人从前给他们带来的罪孽此刻正在欧洲人自己那里重演（指二次大战正在欧洲进行）；银矿的艰苦劳动条件：“泥人在泥地上的泥机器旁工作”，一吨矿石中才能分离出半克银子，要花费多少劳动、经过多少道工序啊！《输油管》则描写墨西哥的石油工业如何为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而进行的斗争，歌颂了墨西哥工人阶级和民族主义领袖的勇敢精神和顽强斗志，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垄断资本家的丑恶面目。在这本报告文学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基希对他侨居了六年之久的墨西哥和墨西哥人民的深厚感情。

我们选编的这本集子，一共选译了基希的三十篇报告文学，从这些真实的富于艺术性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如下一些特色。

基希的报告文学总把当前同过去和将来联系在一起，这是

第一个特点。他的报告文学不是一般地反映劳动人民当前的贫困和苦难，而是联系到过去和将来，研究社会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并找出贫困和苦难的根源，完整地展现出一幅充满矛盾的社会图象，并使人们看到光明的出路和前途。

基希的报告文学总把旅行报告和通讯报道同科学地调查、普遍的经验与知识结合在一起，这是第二个特点。他的报告文学不是平淡的旅游报道，而是包含精确的调查材料、丰富的生活经验、广博的科学知识，旁征博引，逻辑严密，使我们读了能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得益匪浅。

基希的报告文学总把事实和印象同作者自己的思想溶化在一起，因此没有空洞的说教，而是充满感情，溢于言表，这是第三个特点。在他的报告文学中，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该揭露的地方，大胆泼辣，淋漓尽致；该肯定的地方，热情洋溢，无所顾忌。他既注重实事求是，又溶进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他的报告文学作品，绚丽多彩，千姿百态，绝无千篇一律的公式化之弊。

基希的报告文学，用形象化的语言把嘲讽同幽默结合在一起，因此读来妙趣横生，明白透彻，这是第四个特点。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报告文学反映生活迅速，时间性较强，但基希仍十分注重语言的锤炼。他常常字斟句酌，选用尽可能确切完美的语言叙述事件、描写人物。他较多地运用描写对象国家的语言，虽然给阅读带来一些不便，但确实可以生动深刻地记事和抒情。他的文字游戏不单是游戏，而且是细心观察和研究的心得，例如"人在水银中，水银在人体中"(Menschen im Quecksilber, Quecksilber im Menschen)，既是非常辩证的标题，又是水银矿工人的血泪控诉。他那兼有锐利的嘲讽和机智的幽默的文章，

珠联璧合，读来余味无穷。

基希在其一生的创作生涯中，主要运用报告文学这种艺术形式作为斗争武器，向旧世界开战，为新世界召唤。他无情地鞭挞封建贵族、反动统治集团和资产阶级，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爱国人士和普通劳动人民；他努力追求真善美，坚决摒弃假丑恶。他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他在高度的思想性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性相结合方面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基希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报告文学大师。

孙坤荣　赵登荣

一九八一年六月

目　次

博里纳日[①]，四种传统的胜地

（1934）

陌生人离开了充塞小火车铃声的中心大街，沿着巍峨的高墙和低矮的工人住宅走去，孩子们在泥泞里玩耍，一个店老板站在他那被烟火熏黑了的小酒店门前，一位妇女提着蔬菜回家。

走过一处又一处，看起来都一模一样，矿井的围墙，用烟熏的土坯盖的简陋房舍，没有铺好的道路，货品少得可怜的商店。一路上，陌生人一个人也没碰到。矿车沿着架空钢索，几乎紧贴他的头顶，嘎啦嘎啦地行驶过去，接着垂直上升，爬上山顶。

这些高山把郁郁葱葱、一马平川的黑诺省变成了陡峭阴森、起伏不平的地带，在每座山头上都蹲伏着一只卧龙般的怪物。它的前爪支撑着山峰，腹部紧贴在山坡上，扬着脖颈，伸着嘴。每天从清晨到下午两点钟，每隔两分钟它就喷吐一次瓦砾和泥土。

群山和卧龙般的怪物并非大自然的造物，而是人工的产物。这就是那沿着轨道或悬索从井下运送到地面上来的并从翻斗——山峰上的怪物倾泻出来的井下矸石。这里哪有大自然的事？这里是工业区。

在陌生人脚下一千三百公尺的地方，人们正在开采煤矿，把泥土和石头运送到离陌生人走路的地面高二百公尺的地方。

---

① 博里纳日，比利时南部介于蒙斯和法国边境的一带地方，当地有煤矿区和工业城镇。

凡是火车通过这个地区，交叉口的栏杆几乎总是往下落。这位陌生人沿着天桥向铁路网的另一端走去。在他的脚下是川流不息的宽轨火车，跟刚才在他头顶上驶过的小矿车一样，都没人驾驶。但是火车车皮运送的不是砾石也不是矿渣，而是煤，煤车上带着狡猾的人所算计的印记：在最上面一层煤上撒了一层石灰，万一运输途中有人爬上车为他的炉灶拿几块煤的话，就可以立刻被察觉出来。

这可以说是对煤矿所属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盗窃，这家股份有限公司受另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即一家银行控制。比利时总公司和布鲁塞尔银行的董事会和经理们对博里纳日煤矿进行遥控；设有霍努大公司、北方盖利煤碳公司、勒旺乌弗雷奴大公司、比利时煤碳公司以及洛依尼斯煤碳公司，所有这些公司连同井架，机房，洗煤场，矿井，坑道和三万多名井下工人是个客观存在，然而，在布鲁塞尔交易所的行情表里则仅仅是些天天变动着的数字而已。

博里纳日每年从一千三百公尺深处开采一千五百万吨煤，矿层仅仅四十公分厚（就是说，还不及鲁尔区① 矿层的一半厚），既不稳定也不均匀，巷道里的空气闷热，令人窒息，温度高达四十八度。而上面，矿井家属居住的地方，矿工下班后栖身的地方，也并不比下面舒服多少，甚至也不比下面安全多少。被凿得零乱不堪的地球的内脏不断地在膨胀变化，地球的表皮时不时地裂开，整个整个的村庄塌陷下去，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坑道里的积水通过裂口欢天喜地地涌出地面，淹没土地。

许多小煤块难免随着被开采出来的石头运上矸石堆。这些小煤块吸引着煤产区最贫困的人们到矸石堆去寻找燃料。在这

① 鲁尔区，德国的煤矿区，在莱茵河东岸。

些尖顶和圆顶的假山上立着警告牌，但这丝毫阻止不了人们去寻找燃料。牌上写着：

严禁攀登矸石堆，
违者受法律制裁。

拾煤渣的多半是年迈的老人和孩子们，他们每天上午都要攀登这座松散而危险的矸石山。他们就象戴着风帽似的头顶着破旧的口袋，背上披着破口袋，为的是他们向倾倒的料斗冲锋抢着挖掘倾泻物时用来遮挡尘土和碎石片。禁牌使煤矿管理局在由于山塌或车滑造成事故时避免赔偿。的确，矿山事故所造成的金钱赔偿是无法估量的，博里纳日是瓦斯爆炸的传统地区。

从前，在每班下井前，总要有一个所谓的“忏悔者”（实际上是一个囚犯）身穿用水浸湿的衣服，头戴湿面具先下矿井，手举一米多长的火把把全部巷道巡视一遍。等他从井下出来时，全体矿工才下井；万一这个“忏悔者”回不来，上面的人就知道，火把点着了瓦斯，把他烧死了。这时，矿工们就在上面等瓦斯烧尽，空气变纯再下井。

这种每天献出一个人去牺牲的做法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然而，它并不比那种信神信鬼的方法更能起防灾避难的保护作用。家家矿工在教堂的劝告下每年作一次为期九天的祈祷和斋戒，教堂说这样做会感动上帝和神灵。他们总是在衣袋里带着一个在月夜采摘下来的枫树果，乞求矿井的鬼神赐予吉祥。

陌生人在蒙斯省档案库里翻查博里纳日的矿史文献材料，他找到的几乎全是关于灾难的报告材料，也就是黑色矿区的黑色编年史——采矿大事纪和年利润表存放在知名或不知名的远

居在矿区以外的矿主们那里。

古代，当居住在黑诺省的尼伯龙根族人企图复仇和不守信义的时候，他们的农奴自力更生、冒着风险钻探这种石质燃料，因为人们禁止他们在森林里拾木柴。但是，没多久，黑诺省的伯爵们和圣渥德鲁的修道院院长们为了中饱私囊，便经管起这项工作，把煤碳出售给所有的炼铁厂。工业越发展，工厂越资本主义化，矿井就打得越深，发生事故的数字也就越高。目前，矿业股票牌价订得很低，但是，事故并未消除。有统计数字为证：

1821年——1850年：217次灾祸，

1851年——1880年：202次灾祸，

1900年——1929年：110次灾祸。

这是些怎样的灾难呀！陌生人翻阅着殉难者的案卷。这些材料多半是教堂的记录文献，因为在这里，自古以来，教士们一直从事着奇闻传说的编撰工作，在这些关于神奇的抢救的报道中，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许多矿工并没有得到这种神奇抢救的恩惠。圣吉斯兰修道院院长在一八一八年的耶稣升天节时向上级汇报说，他的一位传教士在布弗里的孟塞纽矿井坍塌坑道里进行抢救工作时诵念《约翰福音书》，这时开圣器室的房门钥匙猝然落地；这种事情被看作是天意的象征，因此他命令就在钥匙落地的地方开始挖掘，结果人们真的挖出了埋在里边尚未断气的矿工。

然而，圣器室的钥匙并不总象如意棒那样灵验，人们常常连一具尸首也找不到。一八三七年，斯特-维克多利亚矿坑涌水，连一个遇难者也未得救。过了整整一代人之后，才发现了这些死者，二十七个木乃伊排成整整齐齐的一行，使人毛骨悚然。同

年,“圣－卡塔琳娜”矿井一次瓦斯爆炸,十八名矿工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一八六五年在同一矿坑,又有五十七人下落不明,直到今天他们的遗骸也还没有找到。

“拉格拉帕”是最悲惨的一幕。一八七五年秋有一天,在五百六十米深的井下,一百一十二名矿工死于非命。“由于瓦斯自燃引起顶板塌陷”,得出这个结论,官方调查当局肯定感到满足了。调查报告写得异常详尽, 因为灾难发生的前一天在墙壁上用粉笔写着:“Deamain tout sautera——明天一切都将被炸毁。”这一行字使职工们胆战心惊,但是,他们仍然不得不下井。不久,就在这标明危险地方的附近,一百一十二名矿工被夺去了生命。①

这个矿井的另一次灾难发生在一八七九年四月十七日。在“埃维柯”竖井,六百一十公尺深处,清晨七点半钟瓦斯爆炸,威力大得连地表都被震裂, 在矿井旁和井架上工作的工人都被炸死。一瞬间, 巷道和坑道里烈焰熊熊, 火舌甚至从竖井穿出地面,好象要爬出来烧毁整个大地。六次爆炸,由深处涉及地面,每次所造成的地面震动波及很远。

聚集在遇难的竖井周围的人群,惊慌失措,呆若木鸡,凝视着那些爆炸后飘浮在天空中的幽灵:在矿区上空,在云际中间出

① 本书第一版刚印完,在博里纳日又发生一次可怕的事件: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在“费夫·德拉姆波莱西斯”矿发生瓦斯爆炸。四十四名矿工组成的作业班只有两人得救。抢救工作正在进行,过了将近一天半,抢救人员突遇瓦斯爆炸,结果十五人牺牲,六人受重伤。掘出三十二具尸体,二十五人至今仍埋在井下——是死了还是活着?煤矿当局为了扑灭火灾竟让人往井下放水。一项缩减工资百分之五的决定本应在五月二十日开始执行,基于这种状况,矿业工会声明,缩减工资的决定自六月三日起生效。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在灾区对一位抢救人员说:“你们的工作很艰难, 我的朋友。”——“不错,很艰难,”这位矿工回答说,“因此人们轻视我们,随便克扣我们的工资。”记者询问他的姓名,“无名氏,”他说。——原注

现了鬼怪，他们的胳臂在飘荡，大腿在摆动，忽上忽下，忽而扭做一团，忽而杂乱旋转，仿佛他们没有躯干……！

这个云际舞场终于消散了，幻影缓慢地飘落到地面。这时人们看到，原来都是些衣物。有一个工作班被堵塞在坍塌的坑道里，由于温度上升，他们拥向一条狭窄的通风道，脱掉了衣服。一次新的爆炸把这些衣物从竖井冲到地面，高高地抛上天空。

直到下午三点钟，熊熊烈火还带着四千二百公升的煤末，寻找它的牺牲者；火舌伸进迷宫的每一个角落，捕捉它遇到的每一个人。

救护队来了。他们来自矿区的村镇和矿坑。团结协力的战士从奎斯梅斯、库阿雷浓、弗拉莫里斯、帕图拉日、瓦斯梅斯、拉布维里、霍尔奴、蒙特勒尔、诺尔察因、奎夫来因、维赫里斯、图林和夸奎柯尼斯赶赴出事地点。他们挤过胆战心惊的妇女和儿童，径直向烈火熊熊燃烧、爆炸声噼啪鸣响的矿井冲去。井下烈火还在肆虐，工人们就用绳索系着身体下到六百米深的井下（升降机的绳索和升降盘被烧毁了），当天晚上抢救出八十九名还活着的伙伴。第二天，运出来的只是尸体，第三天仍然是尸体，总共一百二十一具。但是，四月二十日，人们碰上了五位还没断气的矿工；他们被运送到井上，苏醒过来后讲述了在逃避到处追赶着他们的烈火时的恐怖场景，讲了自杀和狂乱的情形。

在护理被救的人员当中有一位来自荷兰的年轻牧师。他是几个月前才来到博里纳日的，他的来意是想在这个天主教区为新教争取一些信徒。这位严肃认真、热情献身于自己事业的男子被感动了，他对周围世界的冷漠深感痛楚，他想按圣经的精神使自己成为一个福音传播者，不愿比博里纳日人生活得更好些，他把自己的衣服，甚至最后一件衬衫都施舍给贫困的人们，而自

己则住在一间斗室里挨冷受冻，跟患斑疹伤寒的传染病患者们一起度日，在罢工期间，他给矿工家里送饭吃，此刻，在遇灾遭难之时，他在"拉格拉波矿考尔区"援救这些受难的人们。

然而，驱使他做出这种援救举动，使他同博里纳日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因为他想使自己成为博里纳日人的一员，而仅仅是他对他们有一种恻隐之心。他认为应该强调指出，他们的贫困绝不是卑贱的证据。"我在他们这里差不多已经生活了两年，"他在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对他们的正直性格多少有所了解，至少对煤矿工人有了了解。我渐渐地感觉到在这些贫穷和下层工人的身上，在这些所谓最底层和最被人鄙视的人们身上，在这些人们常常也许由于丰富想象力的缘故极不公正地把他们看作罪犯和盗贼的人的身上具有某些令人感动，甚至震撼人心的东西。这里跟其他地方一样，也有流氓，酒鬼和盗贼，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典型……"

这位年轻的传教士爱博里纳日的风光，他在书信中描绘说，这里的风光独具特色，圣诞节前夕阴沉沉的天气令人想起中世纪的乡村景色，尤其令人想起布洛依格尔村的景色。

这有什么用呢，纵使本地居民并不全是流氓，纵使矿区令人想起布洛依格尔村，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两年以后，这位福音传播者在一片叫苦连天声中垮台了，他在这里装作有一次约会，他父亲把他接走了，至于此后这位年轻人的境况如何，连跟他有过往来，但对博里纳日几乎毫无了解的艺术史家们也不得而知。

他后来的生活和创作，无非是精神错乱地从恐怖中逃遁到艺术里去。从阴暗逃到颜色里去。从地下逃遁到地面上来。由煤屑里逃遁到花粉里去。从狭窄的矿工住宅逃遁到广阔的田野里去。从矿渣山跟前逃到金黄的平原上。

关于福音，已经一字不提，也不再谈论什么矿工。此刻，他神经错乱地画着，如同他当年神经错乱地传教一样，他成了花卉的天才画家，他痛饮着阳光、鲜花与万紫千红，痛饮着他在博里纳日渴望着的一切，几年后，樊尚·梵高① 由于画画超量过度而去世。

另一次矿坑灾难发生时(博勒·德·科尔矿井，有一百一十三人死亡)，又有一位画家来到这里。博里纳日同样地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他也同样地改变了自己的职业，一直干到老。但是，他并没逃遁。相反，这位如同梵高一样把库尔贝和德格罗克斯两位革命的画家看作是自己榜样的康斯坦丁·穆尼尔②，在博里纳日从一位普通的画家，笛温艺术学院的教师发展成为一位伟大的雕塑家。

他把他的全部新型艺术贡献给了博里纳日人和他们的同志们，首先由于他博里纳日才成为社会艺术的传统胜地。

穆尼尔塑造了博里纳日的矿工形象：他两颊凹陷，嘴巴半开半闭，汗水使麻布小褂紧贴在疲惫不堪的身躯上，褂子的皱褶象肋骨一样突了出来，两臂肌肉发达，对着漆黑的石壁抡了一辈子铁镐。穆尼尔看到一位青年矿工正踌躇地伸出一双手跟另一个矿工在巷道尽头争吵。穆尼尔路过时又看见一位穿着紧箍在身上的齐膝短裤的姑娘把斗车推近运煤小船，把两只胳臂叉在腰上以便对付那个撑船的小伙子的嘲弄。穆尼尔了解这片土地上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人们，同时也了解博里纳日的母亲。

一八八七年三月四日，博勒·德·科尔矿发生事故后，这位母亲就站在人们曾抬进去一百一十三具尸体的棚子里。她的喉

① 樊尚·梵高(1853—1890)，荷兰画家。

② 康斯坦丁·穆尼尔(1831—1905)，比利时雕塑家和画家。

咙没有发出喊叫，眼里没有泪水，她只是合拢双手，因为她不知道应该为了对付谁而把手攥成拳头。穆尼尔就按这个样子塑造了母亲的形象，躺在她脚边的是她的儿子，一个牺牲品。他是她唯一的一个儿子，还是她最后的一个儿子呢？也许，她早就料到有一天他会遭到不测，现在灾难终于临头了，于是这里站着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

当年，博里纳日以巨大的力量一下子赶走了梵高，后来又以同样的力量赢得了穆尼尔。正象文森特当年为了排除他那阴森可怕的印象，为了驱散所经历的恐怖之感而从事创作一样，康斯坦丁则充满着自觉献身的精神进行创作。他为艺术界开辟了新的领域——劳动世界，成为自然主义流派的先驱，凯绥·珂勒惠支和施泰因伦版画的先驱。

在一个人们从大自然那里掠取来却没有给自然文明的环境里，穆尼尔找到了模特儿，发现了他要为劳动树立纪念碑的模本。这座矿工纪念碑并不在矿区。就连尚武的英雄崇拜也不到这片荒漠的地方光顾——人们通常不在那些死了大人物的贫民住处和医院里树立纪念碑。

没有任何遗迹或者很少有什么遗迹能使人们想起，从前在这里士兵们曾经至为荣耀地互相厮杀过。

博里纳日是古代的战场。

大约一千年前的一次大会战的恐怖情景至今还残存在圣丹尼斯郊区田野的名字里，如“血盔谷”，“伤兵林”；黑诺省的拉希德和弗里斯兰德的罗伯特当时由于争夺弗朗德地区，他们让士兵们大动干戈，一直打到死伤士兵的躯体遍布丛林，血染的盔甲填满山谷才罢休。

路德维希十四世的部队于一六七八年和一七〇九年曾先后

两次在这个峡谷深处的这片森林周围损兵折将。人们编了许多歌谣来赞颂这些将军统帅们，如《高贵的骑士尤金尼厄斯王子》，《马尔巴勒出征记》——然而，胜利一方有二万三千名士兵葬身在马尔普拉柯特战场，被他们杀死的敌人有一万一千名，有谁知道这些普通士兵的名姓呢？

十八世纪初，在博里纳日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到了世纪末，一场不单纯是争夺王位和权力的战争又席卷博里纳日。不再是某个诸侯的农奴或雇佣军去打另一个诸侯的农奴和雇佣军。革命爆发了。被震惊的欧洲各君主国都派出自己的军队，去惩罚胆敢自治的巴黎"暴徒"。

热马普①战役。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六日，奥地利统帅萨克森－特申公爵从高高的赫里布斯山俯视敌兵，轻蔑地微笑了，他的部将克勒法特也随着开心地微笑。这些未穿军装、几乎手无寸铁的小伙子们天真幼稚地、毫不惧怕地穿过沼泽地，向哈布斯堡皇室久经战争考验的将军们统率的军队冲过来，向专门构筑的三道方形碉堡的防线冲过来，径直闯进新式火炮的火力网。

下午，这位皇军统帅萨克森－特申公爵和克勒法特将军不再微笑了。因为，一支溃不成军、闻风而逃的军队是微笑不出来的。在这次溃逃中，他们是否也怀有象当年魏玛公国大臣沃尔夫冈·歌德在部队左翼被击败时所持的那种相同的想法呢？他在瓦尔米惊呼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此时此地开始，你们可以说，你们亲自经历了这一转折。"

然而，旧的历史时期尚未过去，好战的统帅们还健在，帝国主义战争根本没有停止，一九一四年八月，博里纳日经历了一场

---

① 热马普，比利时城市。

大血战。二十五万德国人和英国人在蒙斯① 和莫伯日② 之间对垒僵持。炮弹摧毁了房屋、教堂、井架、烟囱和矿渣山，士兵和百姓同样死亡，几万人阵亡。瓦斯爆炸、矿井喷火、鼠疫等等，所有这些自然灾祸加在一起也没有人的破坏力大。人，甚至还有力量去预防自然灾害，可是，追逐红利的贪欲却不允许这样做。

在这个地区，既没为这次战争也没为占领者们建树纪念碑，陌生人只是在弗雷奴和热马普之间的一个仓库的侧墙上看到一块用石灰粉刷得十分笨拙的还愿牌：

在这里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被德国猪猡们恶毒枪杀的有：
孔德隆·蒂英泰，杜邦·阿尔方斯，
杜邦·让－巴蒂斯特，杜邦·米尔，菲内·埃马纽埃尔，
菲内·弗洛雷·佩尔，菲内·弗洛雷·菲斯，
埃英·埃米尔（爱米勒）。

在圣·吉斯兰——这是一个覆盖着褐色煤屑的产煤区，但它却以生产运煤船的造船厂、几家煤碳公司和运输保险公司而著称，陌生人几乎在各家门口都能看到当年德国驻军的标记：“××军官住房，××部队营房，××人员地下室，××部马厩。”在桥边的一幢房子的山墙上后来才刷写上这样的句子：“一九一八年被德国人毁坏，一九二三年重建。”在离几公里远的斯皮纳斯是烈士公墓，管理人员以装饰烈士公墓为借口来证明他们必须留在这里；世界大战的阵亡将士，不分敌友，都葬在博里纳日的地方公墓里。

---

① 蒙斯，比利时城市。

② 莫伯日，法国北部城市。

教堂执事的妻子正在院子里拧衣服，她惊奇地抬起头：有人竟然在工作时间里、而且在一个平常的日子，走进了铁栅门。他穿过深草丛。靠墙立着十三个已经腐烂了的木十字架，这是一个上尉、一个少尉和十一名“苏格兰忠义军”士兵的十字架。他们的邻居是第二十四步兵团的下士德国人埃利希·罗姆贝尔格，他至少还有一小块铁碑和有栅栏围着的花畦。在其余的坟丘上挂着带玻璃罩的念珠圈、装着石膏花瓶和纸花的玻璃箱，墓碑上镶着五光十色的烧瓷照片，在这些照片上已故的女人戴着大檐帽，妖媚地微笑着。

陌生人在一排十字架上看到八个埋葬在这里的死者同一天死亡，他们的年龄是九岁、十岁到十三岁，死因未加说明，然而不言自明。一次灾难的八位殉难者长眠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曾经呆过的地方，长眠在他们那些还活着的伙伴们此时此刻仍然呆着的地方，地底下。陌生人离开了公墓，站在洗衣槽旁的那位女人松了口气，他越过铁轨，经过烟雾缭绕、永远在燃烧着的矸石堆，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人。

陌生人登上一座废料堆，碎石从他的脚下滚进深谷。悬索斗车象一只虎视眈眈的怪龙伸展在山峰上，陌生人从这里眺望着整个矿区，越过矿区一直可看到毗邻的法国。大地在它的烟灰色的自然景色的外衣上系着一条暗银色的腰带，这就是桑布尔河和斯凯尔特河之间的那条运河，运河上的小船漂向贡德，船上运输的和火车装载的是同样的货物，火车喷出来的浓烟和矸石山冒出来的烟雾交融在一起。

在沙勒罗瓦那面是煤矿和钢铁工业，在齐波利是磷矿，在凯龙——基比克有一幢房子，战争曾经把埃米尔·韦拉朗从这幢房子里给赶了出来。陌生人看到了蒙斯监狱；保罗·韦莱纳曾

在那里被监禁过，因为他在酒醉后神志不清，无意地打了一枪，因而被判重刑，因为当局把他当成是逃亡中的巴黎公社社员。而实际上他并不是，这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的事。尽管如此，他早就在狱墙外面感受到了监狱里的苦难：

坑壁随时会坍塌剥落，
苦难就在我们身旁。
烟囱是红色的，
沙勒罗瓦——这就是你，
令人窒息的空气——
那里，永远劳动不息，
那里永远充满危险，
隆隆声永不停息，
砰砰声不绝于耳，
啊，你灰色的大地，
挖煤机在狂叫，
人们汗流浃背，
空气闷热难熬。
在黑色的土地上，
奴隶们在行走，
高天悲痛，
为人世哭泣。

陌生人从矿渣山顶峰眺望着矿区，山脚下是帕图拉日斯村。从那里比利时矿山研究所向所有的矿业化验室运送一种出口商品。这个矿山研究所垄断了这种产品，而且拥有取之不尽的货源。他们输出瓦斯罐。

这些村镇都彼此相似，它们是一座不存在的大都市的郊区，是没有农田和牧场的村庄。矿主们一向认为没有必要在博里纳日建造工人住宅、公园和厂房，而其他矿区的矿主们则恰恰就是用这些来引诱工人，阻止他们外流的。矿工们生在这里，死在这里。博里纳日人在一首用方言写的讽刺歌曲里对他们自己留恋乡土和地方主义进行了冷嘲热讽。人们如果把布鲁塞尔的宫殿、大教堂、大广场和梅纳肯·皮斯井指给博里纳日人看，他仍会唱道："这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跟弗拉默里一个样。"甚至在天堂，如果彼得把那里的名胜古迹都给他看了，他也还会坚持说："这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跟弗拉默里一个样。"

工人居住的房屋又矮又小，而与产煤有关的建筑则高高耸立。除了井塔这通向宽敞的、分支很多的、看不见的地下建筑的入口以外，只有矸石山、洗煤场的烟囱、炼焦炉的高大锥形体以及教堂耸立在荒凉的地平线上。在科瓦莱诺村正在建造一座新教堂，传教士将在这里讲道，要人们顺从上帝，安于命运，服服帖帖听从矿主们的安排；建造这座教堂要耗费八百万法郎。建筑用的砖瓦存放在把房客逐出后腾出来的工人住宅里。

男男女女的农民从遥远的地方跑到圣·吉斯兰来，在一个石雕母熊的基座上磨擦他们的下半身，据说这可以摆脱无儿无女的诅咒；矿工们可从来不在这块神奇的石座上磨擦，他们唯一感到过剩的东西恰恰就是孩子。

弗拉默里的矿工们还树立了另外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为怀念阿尔弗雷德·德富依赫斯而建造的。德富依赫斯在八十年代曾领导过争取普选权的伟大运动，在博里纳日这个欧洲大陆为增加工资而斗争的传统胜地，创建了第一批社会主义的组织。

当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阐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有些隐蔽的斗争，其结果将建立起正常的劳动合同时，他解剖了一个国家：

“比利时——大陆上自由主义的天堂，丝毫也没表现出这种运动的迹象。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工人甚至在比利时的煤矿和冶金矿里可以完全‘自由’地、持续地不受时间限制地被使用。平均每一千名就业职工中有七百三十三名男工，八十八名女工，年龄在十六岁以下的有一百三十五名男孩和四十四名女孩。此外，为对成年和未成年的劳动力进行大量剥削还采用了低工资制，男工日平均工资为二点八先令，女工为一点八先令，童工为一点二五先令。但是，一八六三年同一八五〇年相比，比利时还是把煤和铁等出口额和出口值翻了一番。”

正当工人利益的伟大捍卫者指出博里纳日矿工和沙勒罗瓦冶金工人受到残酷的剥削、毫无权利时，英国矿业资本的维护者却要人们注意比利时矿工的幸福状况：“他们除了为他们的企业主活着所需要的东西外，再没有更多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为了保持竞争力，应该把英国的工资降低到比利时矿工的工资水平”。

英国资本主义用这些话来“赞扬”博里纳日人的知足和忍耐性，把他们的虔诚特性说成是实行低工资的结果，赞美他们是英国效仿的榜样，不久，这个谎言就被揭穿了。当《资本论》开始印刷时，马克思仅以一桩事实，用一句话驳斥了威尔斯岛压低工资的矿主们的谰言：“一八六七年二月初，在马西内被枪弹镇压下去的比利时矿工大罢工作出了最好的回答。”

这是“受到教会、地主贵族、自由资产阶级和官僚而绝不是工会和工厂法所嘲弄的‘自由比利时工人’的第一次反抗，即便

'自由比利时工人'的妻子和他四个孩子中的两个一起挣钱，他的家庭开销也要比一个比利时囚犯的生活费用还要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大罢工接连不断地发生，几百年来一直滚动不止的升降机钢索一停就是几星期，几百年来回荡在黑暗的深渊里的劈砍声沉寂下去了，几百年来天天使用的矿灯吊在仓库里连动也没人动一下，而在外面几百年来一直苍凉荒芜的大地却为斗争所激动着。

一九三〇年，九十家股份有限公司不顾危机竟分掉了一亿零二百万法郎红利，把矿工们的年工资缩减了六亿五千万法郎；他们看到这次缩减工资取得成功，就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宣布撤销协议，要求每班再减五至七法郎。结果，博里纳日举行了大罢工。

罢工队伍从一个矿井游行到另一个矿井，动员工友们参加罢工，揭穿工贼的出卖行为，缺乏旗帜的游行队伍就举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游行集会和各种代表会产生了效果，使罢工发展到毗邻的"勒参特雷"矿，那里的矿主们曾经想等制服博里纳日再宣布撤销工资协议。冶金矿工也参加了罢工。罢工人数曾一度达到二十四万人。博里纳日坚持了十三个星期。

工会发给的救济金平均每天每户才七个比利时法郎。四个团和整整一个宪兵队对这次罢工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期间，从法国库里埃雷斯的彼特地方，威尔士和鲁尔区免收关税向比利时运送了煤碳。在弗朗德，人们用巧妙的方法煽动工人敌视本国瓦隆族① 阶级兄弟的民族情绪，工人们走入了歧路，那里又采煤了。这样，罢工终于失败，博里纳日人又复工了，他们饿得更

① 瓦隆族，比利时南部讲法语的民族。

厉害了，但却团结得更紧，而且更革命了。

陌生人沿着矿渣滚滑的小路下了山，下班的矿工们从他身边走过。他们脚穿木鞋沿着运河大踏步走着，有的回家，有的朝铁路走去，脖颈上围着一条毛围巾，遮挡着呼啸的寒风，腰里挂着咖啡瓶子，活象一把刺刀。

他们，生气勃勃的劳动塑像，井架作为背景，象一座浮雕巍然屹立，井架上的滑轮不停地转动着，井架基座是一块方圆几里大的黑色巨石，上面布满着无数纵横交错的浪线回纹。一个年迈的老人——矿工的老先辈——蹲在矿区铁路的候车室里，虽然有足够的位子可坐，但他还是蹲着；他那双习惯于观看黑暗的眼睛，就是在井上的光明里所看到的也只是一片黑暗。

一列列火车驶向四面八方，一队队矿工徒步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走向他们的村庄。孩子们，这些未来的矿工，跑上前去迎接他们，有一位少女不知在等待着什么人，还有些人在酒店里喝着啤酒。

这些矿工的生命系在升降机的悬索上，他们的肺在呼吸着煤屑，他们的视力因在暗淡的灯光下劳作正在衰弱下去，他们的身骨被炎热、穿堂风和井下沼气弄得患了风湿性关节炎，他们常常一连数日与外界隔绝，他们永远处于和瓦斯、矿井塌方、坑道涌水等大敌作战的前线，现在他们有一个夜晚的时间休假。

今天晚上，在"八小时工作日大厅"——在比利时人们这样称呼社会主义的集会场所——陌生人会再见到此刻从身边走过、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去的人们，他会发现他们是些为争取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令人感动的宣传家、演说家和勇士。

毕克明 译

孙风城 校

有三千个疯子的比利时小城

（1936）

一　车站上的告别

夜幕降临，荒野里风车的羽翼在微风中懒洋洋地转动着，小城象一座孤岛卧在荒野里，窗子把灯光投射到街道上。在通往车站的路上，我们——我和荷兰作家尼古·罗斯特——遇上一群回栏归圈的羊群：羊群在人行道上踟踟颠颠地掠过高楼大厦和路灯的华柱，随后挤进一座房子的狭窄的门洞，可能它们的栏圈就设在这座房子的庭院里。它们的牧铃声徐徐传向远方，最后的丁零声被晚祷的钟声所替代。

我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种钟、铃声交织成的声响似乎是我们白天看到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木偶戏和谐的尾声。完全错了。它并不是一个和谐的尾声，即将演奏出的是一个不协调的尾声。一个看守骑着自行车超过了我们，他停了一会儿，对我们讲，一个送家属上火车的患者企图乘同一列火车逃走。因此，这位长期被安插在车站上的看守急需援兵。

我们刚到车站不久，这个病人跟他的父母和姐姐也到了。父亲老态龙钟，佩戴着勋章绶带；母亲相比之下显得生气勃勃，口若悬河；女儿是一个下肢苗条的女运动员。年轻的患者跟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的步伐也好，他的面孔也好——这是一张

充满智慧的面孔——都流露出激动的神情。我是否能逃脱这令人恐怖的境遇，再过十分钟，再过八分钟就会见分晓。不能让任何人发觉我的企图……还有六分钟……

他未觉察到他的敌人就站在月台外面，他们的目光透过毛玻璃瞄着他。他不时地看看表。只有四分钟了，还有两分……父亲跟他握手告别，在母亲跟他吻别时——这表达了家庭的温暖之情——他觉得背后有人抓住了他；家里事先安排好的看守把他带走了。

这就是我们在这座小城访问的尾声。它那刺耳的余音强烈地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因为我们所见到的其他病人，对于他们的现实的或臆想的环境，都多多少少地表示听天由命了。这个年轻人想逃跑，急不可待，也许他不得不在那使他憎恶的地方呆上几年，甚至几十年。

二　没有疯人院的疯人护理

现代精神病学家利用几千年来的迷信和宗教传统，选择比利时小城盖尔对精神病人进行开门护理，把他们安置在家庭里，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没有疯人院的疯人护理。

今天(星期一)一大早整个市场就已是门庭若市，法兰德斯地区的农民们站在装着黄油和鸡蛋的筐篓后面忙于出售，这些东西是本地区唯一可以上市的土特产品。四头牛、四公顷土地、四个孩子和几只鸡便是肯彭地区草原上小农标准的生活水平。哪一家分到一个寄居者，财产就随着增加，因为房主可以收到护理费，而且寄居者常常成为抚养者家庭的一个帮手。但是寄居者不能上市场去，至少我们还没见到过一个病人，我们只看见脚

穿黄漆木头鞋的农民和乘小汽车的商人。

在莱茵大道这条通往慕尼黑、格拉德巴赫和杜塞尔多夫的老邮路上，我们走进一家门窗洞开的小客栈；正象客栈女老板讲述的那样（尼古·罗斯特是荷兰人，可以跟法兰德斯人①讲话），这里几百年来一直是那些满载科伦啤酒运往盖尔并把盖尔啤酒拉到科伦的车辆的终点站。我们每人喝了一杯盖尔啤酒，就到对面的教堂去。教堂的正门紧闭着，但是"更衣室"②有一条进入教堂的路。

三 教堂里的疯人病房

这个更衣室是一间坚实的小耳房，或者说得更清楚些，是教堂本身的增建部分，一间宽敞的大房间，两个门通向两间装有铁栅的斗室。（门从寄居者的房间通向一个大厅，即抚养家庭的卧室，这种建筑布局我们在现代的房屋中也常见到。）"更衣室"的铁床铺早已废而不用，但床上用具还留在室内，从床铺铁栅上拆卸下来的合页和榫槽在里边放着。

不需要很多的幻想力，就能从这些室内装饰勾画出一幅八十年代的流行壁画；一个被情人遗弃的新娘子失去了理性，蜷缩在这张装着铁栅围的床上，无精打采、披头散发、两眼发直，神父捧着一个耶稣遇难的十字架向她走去，她的父母亲战战兢兢，期望地向门里边窥视着。卡斯坦斯珍宝馆也许会把这幅风俗画复制成一组蜡人塑像，目录里边的说明词可以是："根据加布里尔·马克斯教授的世界著名油画复制"，这幅画说明词的结尾可

① 法兰德斯人，亦译佛拉芒人，为比利时北部居民。

② 更衣室，是神父出入教堂的耳房，也是神父在仪式前后更衣的地方，故名。

以说："她是否能康复呢？"

精神病人在这斗室里必须住上九天，家属跪在旁边的房间里，通过敞着的进教堂的侧门望弥撒。轻病号可以参加祈祷，倘若他们竟能从圣徒遗物箱柜下面钻过去，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康复得到了上天的保佑。

在这九天为一个疗程的治疗以后，仍未感到好转的人，要么同家属住在创造奇迹的教堂附近，要么把他委托给盖尔的某一家庭，对他进行监护，当然常常要戴上沉重的镣铐。据考证七百年前即有此种疗法，文献上记载说，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悠久历史。

四　神圣的迪姆芙娜在医病

哥特式的大教堂是为纪念迪姆芙娜而建造的，教堂的墙上贴满了"神圣迪姆芙娜的博爱能妙手回春"的收容条件，每年缴付一个法郎（比利时法郎），人们就可以在在世和死后获得各做一次庄严隆重的弥撒的权利，每缴付五十分可做一次普通的弥撒，凭五法郎的年金可在一月、四月、六月和十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以及圣迪姆芙娜纪念日（五月十五日）为外国人各念经一次。登记和付款均在教堂司事处办理。

神圣的迪姆芙娜和神圣的格雷贝尔奴斯的塑像和画像装饰着教堂的四壁和圣徒的遗物箱柜。如果说刚才对病房的访问在我们智慧的眼睛面前变幻出的是一组珍宝，那么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位乞丐歌手的画像，他在唱着一首讲述乱伦、逃走、发现、杀头和启迪道德的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歌曲。

五　异教徒国王的乱伦企图

诸位读者，请听下面这个凶杀案！公元六〇〇年，一个异教徒国王统治着爱尔兰这个异教徒之岛。国王的夫人亡故，这个鳏夫一心要续娶一位同死者容貌酷肖的姑娘为妻室。因此，他向各国派遣使者，然而他们都空手而归："没有任何人，噢，陛下，世上没有任何一位女子同你那故去的夫人一模一样，除非是你的女儿迪姆芙娜。"这样一来，这些异教的狡狯狐狸们把他们主子的注意力从他们的失败转移到他自己的女儿身上，国王的女儿确实窈窕美丽，酷似其亡母。国王被罪孽的色欲迷住了心窍，一心要娶自己的女儿为妻室，对于一个异教徒还能抱什么别的期望呢。迪姆芙娜是她母亲洗礼的，一向接受基督教教育，丝毫没有俄狄浦斯的变态心理①，愕然拒绝了这种求婚要求，她不能向她父亲（或她父亲向她）要求更长的思考时间。迪姆芙娜，烦恼万分，于是去找她的忏悔神父格雷贝尔奴斯，他不仅建议她逃走，而且还跟她一起出逃。

这位异教徒国王暴跳如雷，淫乱放荡，率领他的全班人马追踪他那大逆不道的女儿和她的奸夫。追到安特卫普，断了线索。他的捕役们搜遍了这个地区，在肯彭一家偏僻的酒店里停歇时，用家乡通行的硬币付了酒饭钱。没料到酒店女老板另外又拿来几个一模一样的硬币给他们看，并且对他们讲，住在附近森林里的一对善良的夫妇就是用这种硬币来支付他们的膳食费的。

于是，这位国王和他的仆从们向这对夫妇的避难所进发。虽

①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杀父娶母的王子。

然迪姆芙娜和格雷贝尔奴斯逃到了盖尔的圣马丁教堂，可是这位父亲终于在那里追上了他们。他不由分说就让他的仆役们斩下格雷贝尔奴斯的头，在行刑时他向姑娘表达了他那十足的父亲般的温柔之情，重申了他的求婚要求。由于迪姆芙娜坚决拒绝，他恼羞成怒，也下令要处死她。然而，这些异教徒仆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动刑，因此国王亲自行刑。随后，他逃离了这块地方。

当地的农民们从远处看到了这种凶杀和潜逃的情形；当他们赶到现场时，发现两具尸体已装进一种当地未曾见过的白色石制棺材里。他们为这种奇迹而震惊，于是跪地祈祷。祈祷者中的一个疯女人当即恢复了健康。

这就是盖尔城成为疯人疗养地的起源。

六　几点与史实不相符之处

这个传说包含着若干矛盾，这在编撰的过程中是在所难免的。犹如顽强反抗的女儿是一位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这位父亲必然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异教徒。故事里始终未提国王的姓名，由于爱尔兰远离大陆，所以故事的编者认为，完全不必担心流传过程中的某些更改，即使标明确切的日期也不必担心：

> 人们写道，公元六〇〇年五月三十日，
> 圣·迪姆芙娜在这里被其生身之父斩首。①

但是，当时爱尔兰诸王的摄政年代是一清二楚的，这里所述

① 原文为荷兰文。

说的历史片段安不到任何一位国王头上。早在公元五世纪，圣·帕特里克及其后裔就已把这个绿色的岛国完全皈依基督教，历代诸君王则是最虔诚的信徒。

教堂里的画像把出走的国王女儿的旅伴描绘成一个年轻的美男子，虽然康布雷地区主教皮特勒斯·卡马拉森西早在一二四七年就已把迪姆芙娜和格雷贝尔奴斯之间桃色事件的谣传缓和了下来，他记录道：除了一具女孩的遗骸外，在石棺里还有一块男人的下颚骨。从被磨损的牙齿和脱落的牙齿的缝隙可以看得出，这块下颚骨属于一位老年人。

在中世纪，桑顿城（尼伯龙根城）的居民们争先恐后地挤进前去盖尔朝圣者们的行列，企图盗走这两位圣人的遗骸。盖尔人从他们手里夺下了迪姆芙娜，格雷贝尔奴斯的部分遗骸到了桑顿城。他在那里只局限于癫痫病的治疗，而迪姆芙娜同格雷贝尔奴斯的残留遗骸则包括了精神病病理学和神经病学的整个领域。

每年五月十五日，朝圣者们带着他们被恶魔迷住了心窍的家属从偏僻的地区来到这里，让患病的人们从圣徒遗物的箱柜底下爬过去。

七 好名誉与抵押

自从比利时国家把盖尔城辟为疯人居住区以来，当地居民就收养疯人，以前是出于传统和经济的目的，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原因。病人只分配给那些列在检察长和市长拟订的名册上的市民们。惯犯、嫌疑犯和那些被指控对抚养对象进行残酷虐待和从中严重渔利的人则排斥在外。谁没有分到精神病人就感到

很不光彩。“他干了什么事?”正直的盖尔人就要竞相探听，私下议论纷纷。

倘若有人想卖掉房子，那么他首先要招待寄居者；因为，如果买主随着房子同时得到一注经济补助款，那么买主是很容易找到的。当然，房客是不会自动属于新房东的，但没有特殊原因人们也不会赶走他们。尽管这些寄居者都是些“穷累赘”，也就是乡村的穷人，但以后高级病人①取代他们搬进来住的机会总还是存在的。因此在盖尔，人们宁愿典押一间带病人的房子，也不愿典押一间没有病人的房子。

从未收养过疯人的家庭一开始不仅不会分到较轻的富裕的患者，在病人身上锻炼他们的耐心和将来接待重病号的能力，相反，疯人居住区当局的主张是：“抚养者”只有在接待复杂的寄居者的过程中经受住了考验，才能得到较为有利的，随和的病人。

八　疯人世界里的阶级差别

就连外国的村镇和家庭也常常出于物质利益，把他们的家属带到盖尔来，因为事实证明这里的疗养费要比隔离疗养所的便宜得多。在本国的疯人院每天要付两个半荷兰盾的荷兰人，在这里才花十二点五比利时法郎，也就是一个荷兰盾；比利时本国的村镇给在盖尔疗养的比利时的穷患者七点七五法郎。在盖尔市里的三千个精神病人中有一多半是乡村的穷人，其他病人的费用则由其家属负担。啊，在精神病人的世界里存在着何等的差异啊！一等灶每年八千到一万二千法郎(比利时法郎)，二

① 高级病人，系指精神病重患者，单独住隔离房间。

等灶起点六千，三等灶起点四千（百分之十六交给疯人区当局）。

要想把病人送到盖尔去的人，需事先通知疯人区当局，他想预付多少钱，哪些要求必须考虑满足。有的病人愿意家里有孩子，有的有男人在场就受不了，有的想弹钢琴，也有的要打弹子球，还有的喜欢玩动物，也有想做点什么事，借此活动活动的，做的事也可能本来就跟他过去的职业有关。

大多数具有支付能力的患者在他们的母亲去世后就直接到这里来，因为亲友们不愿把一个疯子留在自己家里。在一般情况下，环境的变化对一个精神病人说来是有裨益的，在陌生人中间，他不会随便发脾气，更不会再象往常那样与人过不去。每月医生（共有七位医生）检视一次患者，每隔十四天护理人来一次，并查看病历，"抚养者"在病历上登记着他们的寄食者的表现、体重、洗浴和内衣更换等等情况。

九 性欲、犯罪、厌世

最近，女性寄居者的检查簿里也记录了月经情况，免得使疯人区当局因为一个婴儿的出生而感到突然。情欲特别强烈的患者，原则上是不被家庭收养的，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常常不那么容易预料到。

世界大战前三年，一位十九岁的姑娘从一所轻度呆傻女患者疗养院来到盖尔的一户人家。

不久，这家家庭主妇去世，女病人为鳏夫和死者的两个兄弟料理了将近十五年家务。从她的举止态度来看，颇象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尚未成熟。可是，一九二七年她突然生了个孩子。邻居

的一个年轻男子在他看到自己跟这孩子的父子关系将被揭发出来时便畏罪自杀了。因为在盖尔没有任何事情比对寄居者的犯罪行为更被人唾骂的了。

本来早就该把这个女病号送进隔离疗养所，因为盖尔不支持下等人的繁衍。但在目前情况下，隔离已不必要，这位年轻的母亲被解除了家庭疗养，施行所谓的监督释放。她找到了一个工作，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和孩子。

悲观厌世者和刑事罪犯是不允许送到家庭疗养的，人们向我们保证说，自杀和犯罪是很罕见的事；有名的诉讼案①，一个"神经错乱的人"②对盖尔市长行刺案已是两代人以前的事情了。

如果病人突然发作，做出了暴力行为，他就被送进小小的隔离疗养院，那里能容二十五名男病号和二十名女病号。如果证明病人的烦躁和不道德行为是慢性的，他就被送进疯人院。在被送到盖尔的患者中，每十个人中最多有两个不适于家庭疗养，看来别的地方的精神病人中不适合家庭疗养的比例也不超过十分之二。至少布鲁日疯人院的迁移说明了这一点。

十　布鲁日疯人院的迁移

这个疗养所几年前由于建筑上的或其他原因被解散了，人们委托盖尔疯人区的领导人萨诺博士决定，他收养哪些人。萨诺博士说："把全体都交给我吧，看一看再说。"一列满载疯人的列车开到了盖尔，车站月台上站着许多未来的房东，很象某些大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荷兰文。

饭店的守门人一样。到了一百三十六名病号，经过一段时间，证明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病号不适合盖尔城的家庭疗养。

战争期间，营养不良、流行性感冒和骚动事件夺去了疯人区千百条生命，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当时，在比利时全部疯人院里，死亡人数高达住院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盖尔平时的死亡率为百分之三。在几年的过程中，有一百二十五名病人离开盖尔，他们不是被送进隔离疗养院，就是被遣散了；后者中每年大约有六十人，疯人区当局对他们实行遥控检查。

各家的被抚养者必须性别相同，每家收容不得超过二人（隔离疗养院的反对者们说“三个人就成了疯人院”①）。

从盖尔居民方面来说，他们要求抚养的人数总是远远超过所能提供的人数。目前有四百张空床位，就连这里也存在危机。

十一　在荷兰俱乐部里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街上只是碰到过个别的疯子，而在“荷兰”俱乐部的酒吧间里我们却被一个团体突然包围得水泄不通。侨胞协会的男女会员们在分别集会，门外面挂着的牌子上写着：

“荷兰”合唱团
今日对妇女开放，
男团员禁止入内。
停止借书。②

今天严禁男团员入内，甚至连借口换书也不行，但我们却进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原文为荷兰文。

去了，预先准备好的遁词是，我们虽然是男人，但不是贵团的团员。我们原以为在大厅里只能看到妇女们，当一个男人向我们走过来时，我们感到格外惊讶。他身肥体胖，脸上没有胡子，自我介绍说姓范·德·某某先生（一位有名的政府官员的兄弟）；从他讲话的口气我们听出来，他和她们是一起的，并不属于男人。

胆小怕生的妇女们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桌旁，做着手工，或读着小说，两个护士穿着沃伦达姆民族装，显得十分呆笨，范·德·某某先生（或女士）提议，为欢迎我们唱支歌，他在风琴前面坐下，开始用他那柔和的低音唱起来，围在他四周的妇女们合唱道："你的血管里流着荷兰血液。"

虽然这首歌以"谁"或"荷兰"和"血液"开头，但它跟家酿新酒① 毫不相干，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动员令："你的血管里流着荷兰血液，没有掺杂异族的污秽。"唱完这首充满民族自豪感的颂歌后，因为集会的人听出我是一位德国人，因此又合唱一支"大学生在旅途上，哟发依的，哟发依的，永远懂得优越地生活，哟发依的，嗨依嗒。"后来又唱一首"拿骚的威廉穆斯"的赞歌。

"这一切仿佛是一幅荷兰市侩生活的讽刺画，"当我们出来又走上街头时，我对罗斯特说。

"怎么象讽刺画呢？"

十二 大街上的邂逅

在卖雪茄烟的商店里，一位十分和善的老人接待我们，他问

---

① 原文为 Heuriger，意为最近酿的酒。

我们到盖尔来干什么，在攀谈过程中他对我讲，他是一八八四年作为一个病人到这里来的，觉得这里的生活很健康、很舒服。为此，我们祝愿他在盖尔再幸福地生活五十年，他微笑着回答说，可惜我不可能再活那么长时间了。

我们常常看到有的病人单独一个人无声无息地沿着大街蹒跚地行走着，他们多半是衣衫褴褛、邋邋遢遢、低垂着头、斜眼呆视，当然，有些人很惹人注目，他们自言自语、步履蹒跚、或痉挛地扭臂歪肩，有个病人象踩钢丝的杂技演员一样，在丁零丁零穿过城市的蒸汽小火车的轨道上滑行着。

尽管他们的举止显得那么异常，但却没人去注意他们，甚至连小学生们都静悄悄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但是，一旦有人突然跌倒，嘴里吐白沫，这时周围的人们就会不声不响地、十分镇静地跑过来，扶起这个癫痫病人，熟练地把他抬进临近的房子里去。

一个男人挽着一位妇女的胳臂，缓慢地走着路，她推着一辆儿童小车，但这绝不是安乐的一家，这个男人双目失明、全身瘫痪，这位妇女并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抚养人，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她的。

每天中午在市议会门前，总有几百人站长龙，等着发放失业救济金；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某工厂的职工，该厂加工从刚果进口的铜，现在已经倒闭了。这个简陋的市区大约有不下八百名失业工人。在市场的另一边，有四十个疯子刚走出浴池。同情的目光，犹如穿线一样，传来递去，健康人怜悯病人，病人怜悯失业的健康人。

在阿曼都斯凯克教堂门旁的两根柱子中间，一位来自夏威夷的姑娘靠墙站着，窈窕的倩影、棕色的皮肤，活象绘在教堂墙上的一幅古老的壁画。她是为了招人注意才站在这里的吗？无

论如何不是为了影响别人。因为在晚上，当她那模糊的身影和那双目光炯炯的眼睛依稀难辨的时候，她仍未从那由柱子和拱顶构成的石龛里离去。吃饭的时候，人们把她接回家去，饭后她又站在她那久已习惯了的老地方。

我们结识了一位来自卢森堡的书商，他个子高高的，一头金发。不久前，他从一家隔离疗养所转到盖尔，他父亲从四十岁起就作为一个病人在这里生活；祖父以六十岁高龄从卢森堡被送到盖尔，后来死在这里。"这种发病年龄愈来愈早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这位年轻的书商看出我们对他的家史感到惊奇时对我们说。

在一家门前，两个孩子在玩球。这是小脑袋畸形发育的两个孩子，身体上端长着小而圆的头，活象一根木棍上端刻着一个圆球一样。坐在凳子上补袜子的家庭主妇对我们说，这两个男孩子还有两个长着同样鸟头的妹妹。我们说，应该制止连续生育这种不幸的孩子，这位盖尔妇女感到十分惊讶。她是天主教徒，无法理解这种异教徒的言论，她说上帝的意志毕竟是上帝的意志，这四个鸟头孩子还有三个兄弟姊妹，一个比他们小，两个比他们大，他们都发育得很正常。

一个男人急匆匆地，然而又十分庄重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有人指着他告诉我们，他的抚养人在市议会里工作，给他在市议会里找到了一个官职。

"他很精明能干。如果他不是病人，早就当上市长了。"那个人很有把握地说。

在铁路路基后面的"博爱足球俱乐部"足球场售票处我们看到牌子上写着："国家疯人区抚养者免费自由入场。"今天只是练习，不管谁都可以免费入场。足球队员中有三个精神病人。一

个健康人悄悄地对我们说，正式比赛几乎从来不让疯人参加。他们具有某种适合于他们自己天性的速度，无论是锦标赛还是比赛的最后几分钟都要求无条件地鼓足一切干劲，但他们都无法摆脱他们那种固有的速度。

我们老足球队员都懂得：疯人不能再为争夺一个球而暴躁和疯狂了。

十三　人人都有自己的疯人院

每家病人的住所都各不相同，但想象中的差别远远超出现实的差别，——在我们走过一个住宅仅仅几秒钟之后，我们就已常常不是置身于箱柜和床铺之间，而是站在魔鬼众多的地狱里或立于宝石镶嵌的王座前。

在一处别墅里，我们拜访了一位妇女，她的确（完全不是妄想）出生于美洲一位总统的家庭。我们必须坐在一间客厅里等她更换完衣服接待我们。“您好，X 先生，您好，X 先生。”[1] 她大摇大摆地打着手势欢迎我们，命人斟茶，寒暄一番，询问我们一路之上是否一帆风顺，说她最喜欢在“奥林匹克”开车兜风。

“您喜欢盖尔吗？”我们问道。

“喜欢，”她回答，语调迟缓，同时斟酌着每一个用词，她又补充说：“我喜欢盖尔，真的，我喜欢。但我又不得不加上一句，这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2]

她的两只眼睛恐惧不安地转来转去，后来她说明了为什么盖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有一次，在她上楼梯的时候，一个男人骑着马跑过来，无缘无故的用剑在她的后脑勺上打了一下。

①② 原文为英文。

夜，是最恐怖的。她的小儿子博比经常从摇篮里掉出来，虽然晚上她把他捆得紧紧的(这位女士的儿子博比早就不睡摇篮了，现在是美国一位经济界领袖)，睡在床下的是喝得醉醺醺的士兵，唱着恐怖歌曲，推翻她的床铺。她早就期待着我们的访问，乞求我们帮助她的家最终康泰平安。

在一家房前的花园里，站着一个驼背侏儒，他不顾严寒，光脑袋没有戴帽子，模糊的眼睛流着泪水，他在犯啼泣痉挛症时总是摇晃着身子。我们跟他打招呼，他没听见。半年前他还是盖尔城的一位滑稽大师，他的身材很适合干这一行。现在他的周期性神经病又达到忧郁症的程度，经常复发。

我们刚要走进邻居的屋子，一位妇女比比划划地朝我们冲过来，说人家要把她禁闭起来，要我们救救她。她的养母追上来，说："您看，这两位先生不也被禁闭过么，看样子他们现在多健康。"

我们证实说，被禁闭是很舒服的事，很安闲，过一段时间离开禁闭室之后会精神百倍。她疑惑地听着，只是反驳说："在那儿根本见不到圣徒！"圣徒随时都会光临的。"神圣的玛格达雷娜① 也来吗？"我们告诉她说，神圣的玛格达雷娜照例会在礼拜日来临的，几乎从来不在午夜前离去。

寄居在手工业工人和农民家里的人帮着干点活。我们遇到一个在搅黄油的男人，他生着一副孩子般的面孔，一对浅蓝色的眼睛，一双很有力气的，发红的手。当年，他是个神志健康的青年，到这里跟屠夫学手艺，他在第一次屠宰一头小牛犊的时候失去了理智。

---

① 玛格达雷娜，即玛利亚·玛格达雷娜，圣女。

一个匈牙利籍的女患者，在房间里神经错乱地跑来跑去兜圈子，一再宣称她不想看见医生，医生们都是白痴，她在这里只准备呆六个星期。"好了，如果我丈夫认为我该在这里休养的话，好了，那我就还呆在这儿，但六个星期后我就走，多一天我也不在这里忍受，请您考虑考虑，在这样一间大房子里没有戏看，没有音乐听，没有伙伴陪住。"

这个房间倒是很漂亮。

"哈哈！漂亮？您说它漂亮？您去看一看我在布达佩斯的住宅！"

我们访问的另一位女患者的面庞使人忆起路易丝·米歇尔的面孔来。她，一个老太婆，蜷缩在厨灶旁，面孔毫无表情。三十二年前的一天夜里，当一个男人的面孔——一个盗贼或者是一种幻觉——出现在她住宅的窗户上时，她的病突然发作了。当时她是作为一个富裕的寄居者被送到这个盖尔人家里来的。当年女房东的孙女现在是养母；虽然多年来再没人为这位女病人付钱了，但她还是把她留了下来。

十四 外来的患者

一个中国人满脸堆笑，热情地接待我们。从前他是个打吗啡的，患精神分裂症。他从前也是高级患者，现在在这里一切费用由比利时国家负担。他转移过好几次。尽管他的看守人员采取了种种安全措施，他却一再中途脱逃，一次在敦刻尔克，一次在荷兰的赫克，一次在马赛；但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盖尔来。"Ik ben een geele"①，他用法兰德斯话讲，——"Geele"不

① 意为"我是盖尔人"。"盖尔"在法兰德斯语又有"黄"的意思。

仅是一个盖尔城男人的意思，而且也是一个黄种人的意思。

接着，我们访问了另一个有色人种，一位比利时刚果的富裕的农场主。客厅和旁边的一个房间装饰着彩色花带，宴会桌已摆好餐具。房主的女儿满面绯红地向我们解释说，她明天将举行婚礼。一位黑人先生走进屋子里来，他是道地的欧式装束，衣冠楚楚。不打招呼，一下就坐在沙发角落里，划着一根火柴点他的烟斗，没点着，也许烟斗里没装烟。他操着英国人的腔调喃喃地讲了几句，语无伦次，毫无内容，他一会儿用左袖筒，一会又用右袖筒轮换着擦他的脸。突然他转向我们，一双眼睛睁得溜圆，能看到的只是眼白。他跳了起来，作出向我们冲来的架势。由于农场主女儿讲了几句话，他这才又坐回到沙发的角落里，又划着一根火柴，又用袖筒擦脸，又喃喃说着话，又是黑脸上的白眼窝，跳起来，又安静下来。我们没有久留……

新娘子送我们出门。她对我们讲，她的寄食者明天将参加婚礼，但他们不给他酒喝。他是否把我们之中的一个当成了新郎呢？“这很可能。不过，他平时也总是企图咬生人的。”换了我们，是无论如何不会请他参加婚礼宴会的。

我们遇到一位从前的演员，他正好在家。他体态臃肿，胖得变了形。他的情绪同样很不好。今天他迁居，从前的女主人把洗得湿漉漉的还没烫的衣服赶送了来。他把卷舌音“R”这个字母打得很重，发誓说他要到布鲁塞尔去找国王控告。

十五　一个布拉格人

跟一个熟人重逢，我们颇为激动，不过，病人没有认出我们。

我们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在一家布拉格夜总会为全体客人付款。今天，人们向他介绍时说我们是从慕尼黑来的医生，他回忆起他妻子的一个亲戚住在慕尼黑，问我们是不是碰巧认识他，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位治痴的专家，又问我们是不是以色列人，他高兴见到信仰相同的人，他每年在重要节日里总要到安特卫普犹太教堂去一次。

在盖尔逗留期间，我们在街上经常碰到他。他总是找借口跟我们打招呼，一次他想给我们介绍一家最好的饭店(在这座城市里只有一家)，有一次他问我们在布拉格有没有熟人，也许他能给我们提供这些熟人的情况。他一直很关心"肯彭地方报"上报道的国会纵火案，小声告诉我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相信，这个范·德·卢贝是神经错乱……"①

在省建筑师别墅的花坛里，孔雀开屏、郁金花伸展腰肢。他抚养的一个病人是一个姿色动人的梳着一头光亮黑发的意大利妇女，人们可以把她当成是一个妙龄少女，这是由于当她从健康人的世界到这里来的时候穿了一条时髦一阵的短裙。她用优美的洋娃娃般的动作招待我们，在我们访问的时间里，她始终侧着身站立在屋子中间。为了让这位病人也能听懂我们的谈话，家庭主妇用法语对我们讲，这位妇女的儿子不久前从意大利来看望她，他是一个漂亮的美男子，这位妇女的女儿新近结了婚。

女病人倾听着我们的谈话，问道："我女儿结婚了吗?"——"是的，夫人。您的儿子不是已经告诉过您了吗。"——"是呀，是呀，我儿子说过。"这时，她十分做作地摇了摇头和胳膊，玩弄着手指，手指上一颗大绿宝石戒指闪闪发光，美中不足的是从短裙

---

① 范·德·卢贝，荷兰人，国会纵火案中希特勒匪徒安排的纵火者，借以陷害共产党人。

底下露出一段月经带。

十六 妄 想 狂

隔壁房间里坐着另一位女房客，她显得那么庄严而又怪诞，头上戴着一顶王冠，脖子上围着一条白鼬皮毛领，一眼就看得出来，王冠和鼬皮领是用纸板和灰色的麻布材料做成的，然后用肮脏的打着一层层花结的缘带把这些破烂缝合在一起。除了病人，室内还堆积着旧的衣服里子、撕成条条的口袋和一些别的破烂衣物；她就是对这些破烂东西感兴趣。身为一个阔绰的百货公司老板的夫人，她有的是钱，完全可以使用五光十色的绸缎和鲜艳的新缘带，即所谓较高级的料子。

她不停地用坚定的笔划书写那字迹难认的宣言，她用命令的或慈善的语气对我们说了几句话，也同样无法理解，我们只听懂了个别的词句，比如子爵啦，格兰德的科克兰呀，使节呀。她每天穿着她那身怪里怪气的国王朝服去寄信，把白天拟写的文件亲自投进信箱。走在街上没人理睬她，就是在邮局也没人感到奇怪。在盖尔，没有一个邮局职员在这种投递工作方面花力气，去表明邮电业的出名的机智性；在这个邮局里，很快就能断定足有五分之一的信件是无法投递的。

当我们离开别墅时，遇到了一位医生。他是一个周游列国的男子，曾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精神病院工作过。我们从他那里得知，患夸大狂的病人中几乎只有有钱的才住在盖尔。同病房的病友们不可能经常顾及体谅较穷的病友们的妄想狂，因此，这些较穷的病人就会烦躁，必须送进隔离疯人院，当然在那里人们也同样很少顾及体谅他们的狂妄症。

在疯人院里狂妄症越来越多，医生有一个统计数字，他曾治疗过多少仁慈的上帝，多少圣母，多少拿破仑，多少……

我们问，他的病人中是不是没有人把自己当成希特勒。

“还没有过。但我倒是治疗过一个戈林，是一个重病例。”

“是德国人吗？”

“不错，就是那个戈林。”

毕克明 译

孙凤城 校

在怀特查佩尔[1]的流浪汉中间

(1925)

透过东伦敦贫民窟的门窗所看到的衣衫龌龊褴褛的男人和青少年们，就足以令人怜悯。但是，他们至少还有个栖身之处，他们总算走运，还可以同其他难友们一道，在矮小的棚子里就地打铺眠歇，他们毕竟还算有个窝。比起那些在泥泞的市道里疲惫不堪地辗转着的无家可归的人们，他们算是富裕的了；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为避免露宿在泰晤士河堤上挨冷受冻，竟无望地期待着从别的穷人那里得到几个便士。

这些贫困人中间最贫困的人还分为若干社会阶层，在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中间也还存在着财产的差异。谁要是讨到了七个便士而且肯花费在住客店上，那么，谁就可以在罗顿勋爵五大旅店之一或者在伦敦郡营造的布鲁斯大厦中租赁一间既有床铺又有椅子的小客房；谁若是这一天只得到六个便士，那他只好住在国民宫宿舍，若是富于幻想还以为住进了一个大俱乐部呢。但是，谁若是到傍晚连这微不足道的几文钱也还凑不齐，也不想在次日用繁重的打石工来偿付"临时收容所"的微少的房费，谁就得到伦敦八大救世军避难所[2]找个住处，其中，收容最贫困的房

---

① 怀特查佩尔，伦敦东部城区名。

② 救世军——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由牧师威廉·布斯(William Booth，1829—1912)一八六五年创立于伦敦。该组织提倡用举办"慈善"事业和向劳动人民宣传宗教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这个组织于一八七八年起更仿照军队形式进行编制，布斯自封"大将"，并于一八八〇年正式定名为"救世军"。二十世纪初曾传入中国。

客的当推怀特查佩尔避难所。每逢傍晚总有一队人摇摇晃晃地走进米德尔塞克斯大街，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风尘满身，冻得浑身发抖，老态龙钟，佝偻着身子。每到星期天，这条街便成了一个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旧货市场。救世军避难所就坐落在这条街的一个街角处。我的衣著似乎有些过于破烂。但环顾四周，感到自己还是较好的。一位衣衫破旧的男人正站在门口执行着救世军管理员职务，他依然彬彬有礼地问我：

"要单人床还是长板凳？"

"要三个便士的。"

"那么是长板凳了，请到楼下去。"于是，我下楼梯到地下室去，而那些有五个便士财产的富裕的人们则可以在楼上的大寝室里惬意地安歇。在安装着很密的铁栅的窗口，我的姓名被登在旅客登记簿上，我在那里付了房费，给我开了一张收据，上面写着 308 号铺位。随后，我走进大会议厅；这是一间三角形的大地窖，里面摆满了一排排制作粗糙的长条凳。靠墙放着一个讲台和一架用油布罩着的风琴，——看来已作过晚祷。地窖的天花板由六根钢梁支撑着，沿墙四周，装着暖气管道。

在这座城市的万丈深渊里再也无法维持下去的东西，甚至连怀特查佩尔这个来自世界各地亡命之徒的避难所也不敢收容的家伙，那些再也不适宜乞讨和犯罪的渣滓，似乎在这里都被沉积下来了。他们坐在这里，污染着温暖的空气。有的人正在解开他的木头假腿，把它倚放在凳旁。有的在盘点财产，在身旁把几百支香烟蒂和雪茄烟头摊了满地。一个人把他从阴沟里随便拣来的东西从背囊里掏出来：几块陈面包，一个破布娃娃，一些被揉成团的废报纸（他正耐心地把报纸摊开铺平），一副残缺不全的破眼镜，一支铅笔头。有一个人正在褛缠疝气带，另一个人在

打开裹脚布，这一个显然吃得过饱而在打嗜——这一切惨不忍睹，令人见了痛楚万端。

大多数的房客都是年迈的老人，头发花白、胡须蓬乱、目光呆滞。他们漠然地无动于衷地凝视着，不知看什么。只有当一个正在吃东西的人或者一些可食之物映入他们的眼帘时，在这些暗淡无光的瞳孔里才闪耀出一线生机，它们贪婪地、妒忌地、馋涎欲滴地盯着这些佳肴盛馔。

食堂的窗口挂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开饭时间，但纸条上爬满了潮虫，看不清字迹。食堂管理员是个独眼龙。——正象大多数的救世军管理员一样，从前他自己也许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一次浴血奋战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这种浴血搏斗现在仍然在从前的杰戈王朝的区域里不时地进行着。此刻，这位洗心革面的波利非马斯①正把饮食递给饥饿的人们。一块面包卖四分之一个旧便士——这种辅币在英国其他地区早已不流通，在这里却还保存着它的货币价值。其他的食品花上半个便士就可以买到。在碗里摆着的是一层层的熏鱼和咸鱼，从锅里盛出来的是一盆盆的热汤，用小盆供应给顾客的是一份份燕麦粥，从墙边铜壶里，打开龙头，流淌出来的是煮好了的茶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避难所的服务员走过一排排的长凳，收拾用过的空碗。

我真希望能和衣在自己的长凳上安歇。然而，这样却更糟。晚上八点半整，响起一声刺耳的哨音，有人宣布说："到寝室去。"于是，大家赤着脚，手里拎着破靴子，离开了地窖。那个跛子并没有动手再把木头脚绑上；他用一条腿吃力地跳出地窖。在

① 波利非马斯，根据古罗马诗人荷马的传说，他是额上生独眼的巨人族的领袖。

楼梯旁，我们必须向一位检查员出示我们的纸条。在一扇门上写着“床号 211—321”。我们总算到家了。我们走进一间大厅，这间大厅正好在我们方才停留过的地窖的上面，跟地窖的形状大小一模一样。然而，此时此刻那种身临地狱之感已不复存在了；我们现在是在一座坟墓中。在墓的穹顶上垂吊着两三盏小灯，那幽幽惨淡、阴森可怖的暗光投射到放在灵床上的一排排漆黑的棺材上面。用门上所书写的娓娓动听的话来说，这就是“床铺”吧（站在门口的那个人对我讲的是长板凳）。我心里计算着：321－211＝110。一百一十个狭窄的木箱，上面都罩着一条用黑色油布做成的罩单，下面铺着一层麻布料子的床单和垫子，垫子有一种令人感到不祥的灰色，恐怕是因为洗涤太勤的缘故吧。

死神之舞开场了。同寝室的伙伴们脱去褴褛的衣裳，此时，这许多骨瘦如柴的人，有的赤条条，有的穿着尸衣，站在棺材旁，整理着自己的棺罩。然后，他们钻进自己的安息之所。

有些人先是举着一根点燃的火柴查看着他们的卧榻。这些在昔日较优越的岁月里久已被生活的利爪毒牙撕得支离破碎的躯壳，是否还残留着对害虫的厌恶之感呢？或许他们只是佯装如此敏感吧？看来只不过是“骗局”罢了。因为，所有这些查看者最终都躺进分配给他们的箱子里安息了，即便他们的查看大有收获，他们也别无他途。

我多么期望，等熄灯后好神不知鬼不觉地和衣蹬靴爬上床去。可惜的是，我左边的两位邻居，一个大约二十岁左右的无赖和一个年龄稍大点的伙伴，在我的床边聊起天来了。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吧？”那个年龄大点的问道，“我记不起来了。”

“在庞顿维勒。”年轻的高声炫耀地说。显然，他想让别人知

道，他曾坐过班房。

“你已经放出来很长时间了吧？”

“噢，后来我又进了警察署。”

“那么你是怎么出来的呢？”

“丹尼·罗利特把我保释出来的。”

“他为什么保你呀？”

“他需要我呗。”讲话的语气很自傲，但这个年轻人再没有透露更多的情况。

丹尼·罗利特仅仅是出于需要这个年轻的刑事罪犯，就运用他的伦敦缴税市民的特权为他担保，那个年龄大点儿的对于这种答复压根儿不满意。连我对这种回答都感到不满意，我虽然没有结识丹尼·罗利特先生的那份荣幸，但他那亲昵的教名足以表明，他在庞顿维勒人们中间深孚众望。他究竟为什么如此急切地需要我的这位邻居呢？我永远也不会得悉其中的奥秘。大概一起坐过班房的人会听说事情的底细。我的邻居高傲地打量了他很长时间，随后，他们又开始耳语起来。此刻我才意识到，他们再继续谈下去，我也就无法和衣而眠了。我不好再等下去了，因为看样子旁边床上的谈话还将延续很久。很显然，丹尼·罗利特之所以把这个年轻人从警察署监狱里保释出来，绝不是为的让他在怀特查佩尔难民营这里白白地过夜。慷慨大方的保人完全可以给他租一间比较高级的旅馆。至于这个小伙子为什么到救世军来作客，多半是想在这里办件什么事吧。他正在寻找我某个伙伴。

我不得不和颜悦色地向那个年龄大点儿的建议，调换一下我们的床铺，一则他可以更方便地跟他的同伴进行交易，二则也不会再继续打扰我。

那个人并未酬答我的善意就欣然接受了我的提议，——毫无疑问，他把这种善意视为对他——庞顿维勒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应该表示的一种敬佩的举动。他打了个简单的手势，指了指他那张从此刻起归我所有的床铺。

我的新邻居们久已投入鼾声的大合唱，大厅里呈现出一片百家争鸣的局面。有的拉起黑色的蜡布被单蒙着头，有的从灰色的粗麻布单子里恐怖地探出乱蓬蓬的脑袋。

所有的灯火都熄灭了，只是这成百具棺材的沉闷的吱吱嘎嘎声响告诉我，我已经是这一伙的了。有时，一阵绝望挣扎的咳嗽声传到我颇想在里面枕臂酣睡的箱子这边来。

清晨六点钟，一声哨响。所有的棺材里都在颤动着，随后露出一颗颗头颅来，一副副骨架凸现出来，在晨曦照耀下显得很惨白。这些死尸，犹如活人一样，用手揉着眼睛，伸展着腰肢。接着，他们起身了，穿起晚上放在椅子上的褴褛的衣服。现在的口号是"到盥洗室去"。只有寥寥数人响应了这个号召。他们已经不再是讲究的人，在生存的搏斗中他们已经学会摆脱了人类的浮华。在盥洗室里，站在褐色瓷盆旁边的多半是比较年轻的伙伴，他们在这种充当自己情人的情人职业中，梳洗打扮是必不可少的。在圆杆上挂着供大家使用的浅灰色的长毛巾。现在，我们又回到昨天晚上离开的那个地窖。救世军中的一名成员正在祈祷，随着背诵一小段虔诚的经文，接着又是一次祷告。现在，可以花上半个便士买杯茶喝，四分之一旧便士弄块面包吃。门开了。我想，终于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了。然而，别的人却在严寒的袭击下缩起了脖子。

毕克明 译

孙凤城 校

里昂的丝绸

(1934)

“我为世界吐丝,”蚕蛹这样讲。说到做到。它在为世界吐丝,用吐出来的丝慢慢地建造起一间小房子,这是一种封闭式的、卵圆形的、光滑的建筑。因为蚕自知它是卵生的。它这个为世界所嫌恶的东西,要由卵化为蛾,来庆贺自己的新生。

但,谋事在蛹,成事在人。人只是等着蛹把它的隐居之所建造完毕,然后,就宣称它是上好的战利品。

人把蚕茧收集起来,放进烘茧机里,从而杀死蚕茧的建设者和内居者,人做这件事情总是非常泰然。谋杀洗劫之后,便对“砂石粒”,也就是丝制小圆房的泥浆进行软化处理,拆除建筑材料——一根由八厘米长的蚕蛹所吐的和纺成的八百米长的丝线。要是蚕蛹的耐性大于它的吐丝,吐的丝有时就断了,不得不借助它的耐心把断丝重新衔接起来,这样,人在缫丝时就得不到八百米长的完整的丝,而把许多唾液线的短头捻接起来。

有些蚕茧没有被杀死,因为成熟的蛾要产卵,新蛹要出生,要为里昂的大丝房再建筑它们的小丝房子。

蚕蛹吐了丝,由人缫成黄灰色的生丝,从中国或意大利源源运到里昂,在那里织成绸缎,随后染色、印花、整理,然后,世界各地的太太们如饥似渴地抚摩着蚕蛹吐的丝,紧贴着她们的嫩皮肤穿上,好让她们的先生们同样地抚摩她们。

为全世界和半个世界加工这种性欲的只是里昂的一个市区，人们一谈到里昂，那么指的就是这个市区，即棕色十字架区，真可谓整体代表局部。

当然，工厂主们的商函并非来自棕色十字架区，而是来自市区，即大剧院周围狭小胡同组成的迷宫。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小丝织厂主们的大商号牌匾，大丝织厂主们的小商号牌匾。办公楼走廊的墙壁上全是些信箱，许多没有工厂的工厂主聚集在一个楼内。信箱就是办公室，办公室就是工厂。外面来的订单（或退货单）投入信箱，设计方案在办公室里挑选，生丝拨给棕色十字架区的家庭作坊工人们，然后把制成品发出去。里昂的丝织厂厂主也象图书出版商一样，出版商也没有印刷厂，没有造纸厂。里昂丝织厂的厂主们却照样生产，用他们的产品充斥全国，但他们只是在式样对他们有利，产品光泽无疵、花样新颖，质地柔滑时，他们才做交易。

里昂的工厂主们多半没有工厂。里昂的纺织工人们却又不是厂主，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有工厂。真是离奇古怪的工厂。从街上看不见工厂的影子，只听得见工厂的声响。棕色十字架区的全部庭院都被改建成厂房了。到处响着一片木头机器的和声：喀哩—喀啦喀啦—喀哩。

从两座小山头上可以俯瞰里昂市，看到罗讷河和索恩河上的桥梁，码头前的四条长带子和一大片房屋形成的海洋。一座山叫福维埃尔山，上面有一座用黄金和大理石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大教堂，山头仿佛在说：祈祷吧！另一座山高三百级石阶，我们正往上攀登，山上没有任何黄金和大理石的装潢，这就是棕色十字架区，它仿佛在说：工作吧！

我们在“工作吧”山头。先前，人们给我们提了几家作坊。我

们走进一家家庭供货人的住宅打听，老太太正坐在一张大圆桌旁，这张桌子就是一台机器，推动机器的动力非常可怜：这位老太太的双腿。

这部机器虽然已不是那在松明火把照耀下转动着的轮子，但它也还不是电动的整经机。它介乎两者之间；这种机器，按照“物种规律”被保存了下来，按照这个规律电力比人力便宜，这对二者都付得起钱的人是这样，对那些除去自身的劳动力一无所有的人却不是这样。

从她的精力看，这位老太太已是没有什么力气了，老太太的双腿推动着滚筒转动，带动着平装着的筒子旋转，把绞纱卷绕在筒子上。这是整经的准备工序，即纵向直穿织物的线网（另一组线，即纬线，沿着横的方向穿行，这两组线后来在织机上经过交织组合成一体）。

筒子的卷绕工序，我们是在邻居，即临时女主人的女婿那里看到的。他虽然不在家，但机器却在家里摆着，那是一架手摇式绕线机，它把筒子上的纱卷绕下来，再把这千百条线平行地排列在整经轴上。

我们还进了好几家作坊，“为了询问地址”。到处是喀哩—喀啦喀啦—喀哩的声响，到处是丝织工人——在里昂叫“bistanclague”——在劳动。他将在这台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为了把它保存下来而付出了心血的织机旁度过自己的一生。

当他纺纱时，有儿子、女儿和孙子们帮忙，正象当年他从孩提时代起就协助他的父亲和爷爷一样。他爷爷也纺过纱，而且参加过一八三一年里昂的反饥饿大起义，卡齐米尔·佩雷尔①把这次起义说成是“非政治性的”，是穷人和富人，即那些赤贫如

① 卡齐米·佩雷尔(1777—1832)，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

洗的人和那些有些财产的人之间的一次争斗。“这种可怕的真理,”路德维希·伯尔纳①惊呼道,“本该抛到无底深渊中去,而佩雷尔这个疯狂的家伙却把它捧上了天,并向全世界宣扬。”现在,这条存在阶级对立的可怕真理已经不再是个秘密了，它那时曾经启发了不少人，但里昂的丝织工人们从一八三一年十一月被镇压下去后一直再未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们依然是一无所有,他们带着孩子和孩子们的孩子蜷缩在棕色十字架区里,在单调的生活里生产着单调的纺织品,设计着单调的图案。

一位住在棕色十字架区上坡的里昂纺丝工人发明了机动纺织机。他一八〇八年发明的机器（现在存放在加达格纳博物馆里）跟刚才老板怀着占有者的自豪感把它的艺术作品喀哩一喀啦喀啦一喀哩地给我们表演的那部没什么两样。经轴和纡子交替抬高，一部分用织工的脚踏力，一部分利用马达的动力。这些纱线轻飘飘地挂在钩上，向着一个厚纸板作成的打着许多孔眼的经停片移动。犹如自动音乐箱上的气囊只通过安装在上面的厚纸板圆筒的气孔出气一样，这些线穿过上述的孔眼。这样,就制作出了一部音乐作品,即一件丝织品。

在大工厂里，一个车间就有十六台马达推的织机在叽嗒嘎嗒地运转着,车间是一片喀哩一喀啦喀啦一喀哩的声响。检修工们端着小油壶并提着工具在织机中间转来转去，纺织女工们则检视着从滚筒之间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的织物，十六条传动皮带和上万根头发丝般的细纱上上下下把空间对角分割开来。

当蚕蛹下定为世界吐丝的决心后，它就用四至八条唾液线实现这个心愿。丝织业并非向世界吐丝,相反,只是为了满足那

① 路德维希·伯尔纳(1786—1837),德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

种贪得无厌的需求(这是丝织业自己说服世界接受的需求)。对丝织业来说，昆虫吐的八根唾液线还不够粗。人们有时把三股蚕丝，有时则把八股拈成一条线，从而有“三股纱线”、“八股纱线”等等的区别。经过不同的加工处理，就有了各种不同的名目：绉纱、麻布、玻璃纱、薄纱……

为了整经，需把纱卷绕在一只签子上，然后再平行地卷绕在织机上；这道工序由整经机进行，它工作得十分准确。手工纺织工人必须百倍地细心整经，而且要谆谆教诲全家：“敢做又敢为，事情成一半，经要整得好，一半织成了”，——这是德国麻纺织工人的一句谚语，里昂的丝织工人也知道这句谚语，尽管他们讲起来没有韵律。

经纱从筒管到经轴的过程中要穿过两道梳：一道传经纱保持与丝绸的准确宽度，另一道是使一条纱经常地穿过织物滑动着，一旦织物出现织疵，它立即补上去，防止整个织物撕裂。

在工业生产中也有短路：每部织机由一个独立的动力推动工作，只要有一根纱撕断就会造成机器的暂时停工。这时怎么办？因此：每根纱穿过一个不固定的金属小环，它只是在运行着的纱线上滑动。只要有一根纱撕断，那么这个环便脱落下来，造成断流。如果织物出现织疵，纺织女工就要忙碌，要是机器发生故障，忙的就是技术员。

梭子无声无息地在经纱的上边和下边从一边穿到另一边。女工们不停地续纱，用完的经纱筒管自动更换。

大厂房的一块黑板上写着禁止吐痰，虽然厂主的全部经营需归功于蚕蛹的这种恶习。如果在中国蚕农培植的桑树上都挂着“禁止吐痰”的牌子，而且为可怜的蚕蛹们所遵循，那末你们将怎样呢？

喀哩—喀啦喀啦—喀哩和嘎达嘎达的声响，从所有的平房里传出来，从所有楼房的所有楼层里传出来，从棕色十字架区的山坡上的所有楼房的所有楼层的所有房间里传出来，从埃里奥先生的选区里传出来。起初，这些织机的这种合唱还只是一种单调的喀哩喀啦声，但用不了多久，人们便能分辨出，织绸缎和波纹绢，织塔府绸和薄纱，织绉纱，织天鹅绒和长毛绒的不同声音。

我们也耳闻目睹了其他品种，如伞面、纱巾、罗底绢、气球胎、流苏和帷幔的生产情况。声音各不相同，我们可识别不出来了，种类愈多，我们懂的就愈少。

祭台帷幔和法衣要用五十种不同颜色的纬纱织成。生产一米需要许多个工时，工资高达四百法郎一米。家具上的旧幔罩可用同样的价格重新织造。

做领带的料子，经纱是真丝，而纬纱则是人造丝，是一次染成两种颜色，因为人造丝对颜色的吸收能力不同于天然丝。织前染的纱丝为"染纱"，其余的丝一直库存到时髦的颜色和式样出现为止。平纹织物（素织）的传统品种有：薄纱，德文的名称奇怪地叫"chiffon"，透明的乔其纱，不透明的中国绉和光彩夺目的乔其绒。

炮弹里的炸药包是用特殊的不易浸渗的丝织物做成的，这种丝织物具有很强的拉力，燃烧时不留灰烬。因此，里昂的丝还为亿万颗炮弹的爆炸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致力于——这是世界性的把戏——橡皮膏的制造，借以减轻所造成的伤痛。

企图提高纱线重量的人，被严厉的里昂工厂主当成"分文不值的马前卒"搞得名声扫地，这是一个辱骂的名称，它比内萨斯

的衬衣还刻毒①，比丝绸衬衣还耐久。相反，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加重丝织物的重量，而没人为此鸣不平；许多妇女只是按丝的重量来评价丝织物。因此，人们在卖给德国的丝织物中附加到百分之六十九的肉眼看不出的重量，——那时，在祖父给祖母买黑纱的时代②，这种黑纱里面往往含有不少于百分之四百铅的成分，妇女就是不愿意穿得太轻便。今天，人们穿的只是这个重量的六分之一，作裤子和衬衫以及连衣裤的丝绸根本不加重。

我们离开棕色十字架区，走下三百级石阶，来到艾纳依城区，访问那些富有的厂主们，虽然他们没有工厂，或者说正因为他们没有工厂，他们才富有。他们正在汇集整理向国外出口的样品，有输往中国的，在那里每块料子幅宽必须是七十五公分，才适合做长袍；给印度的样品，丝绸幅宽为一百一十公分，在那里做一件波浪起伏的绸衣需要六头牦牛钱；有输往德国的，那里做一件衣服需要三米六十公分丝绸，双幅宽为五十五公分。

为旅行者准备的样品是一个鱼饵，这种鱼饵每年要耗费掉里昂一家大公司高达二百万瑞士法郎。因为要让人设计图案、纺织、印染和整理，还不知买主对这种高级产品是否上钩。各种颜色的产品吊在一个裤架子上，显然在这里已不是裤架子，而是样品架子。

虽然跟巴黎时装公司共同制订新式样的是里昂丝织厂主们自己，但非主要的潮流常常能够毁掉权贵们的最能牟取暴利的

① 内萨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之怪物，因欲诱拐赫库利斯之妻，被赫库利斯以毒箭射死，赫库利斯之妻听从内萨斯之遗言，浸其夫之衬衣于此怪物血中，赫库利斯因此中毒，苦恼不堪，以致自杀。内萨斯衬衣意味着足以致人死命的恶毒象征。

② “在祖父给祖母买黑纱的时代”——在祖父母生活的时代里，妇女们的时髦衣著是用黑纱制成的。

决议。如同看电影一样，也应该听一听人民的意见，当然这时候“人民”这个词就没有可恶的意思了。事实上，这里指的并不是人民，而只是观众，而且还是被筛选过的观众。

在奥图尔举行的飞越障碍赛马大会，即赛车节，里昂的丝织厂主们展示了他们的最新杰作。他们有自己的参谋部，派出了间谍、密探和巡逻队。他们出现在备马场的观礼台上，从那里可以最清楚地观看马匹的奔跑，最清楚地观看身穿新颖时装的太太们的奔驰。

巴黎的时装和社交节具有自己的名称，叫赛车节，即四乘彩车。从前，巴黎的封建主和其他百万富翁们在每年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那天互相之间进行竞赛，比谁的四轮马车最富丽堂皇、谁的马匹马种最佳、谁的随从的号衣最美、谁的马具最贵重。同时，他们向人民炫耀他们的无可匹敌、无与伦比和高不可攀。他们头戴灰色的大礼帽，身穿深色短上衣，珍珠灰的裤子，腿上套着白色绑腿套，驾驶着马车，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们陪伴着，身著猩红色镶金边制服的猎手们吹着喇叭护送着，大摇大摆地从协和广场驶向赛马场。在观礼台前，马被勒住，他们下了车。威尔斯的王子和萨冈的公爵检阅了这个由四乘马车组成的仪仗车队，两位王侯向他们点头致意，他们受宠若惊，简直象一次封侯晋爵大典……

今天，人们久已不用四匹马力，而是用八十匹马力驱车穿过爱丽皇宫广场，越过无名的士兵们，驶向赛场。努力保持传统和表明保守主义妙处的比赛委员会，几乎连三部老彩车也筹备不齐。为了不缺少粗俗的游戏——这是对非贵族的人们的挖苦——每年有一辆“自由蒙特玛特雷公社”的橄榄绿色的驿车（在车门上绘着一个风车图案作为纹章）用载重马匹拉着慢慢前

来，博得看热闹的人一阵喝彩。

对巴黎的妇女们来说，也就是说对来自全世界的“巴黎妇女们”来说，赛车节除赛马外，还有另外一种意义。那就是对那些在穿著里看到自己命运的人们的命运的裁决。所有巴黎的摩登女人都自动来了，外国夫人们派来了她们的代理人、使者、手拿笔记本和绘图册的密使。

观礼台上层的包厢一直是相当的空。而下边则不然，甚至连剧场的阶梯上也坐无虚席，参加交际会的妇女代表们带着女儿，手里拿着长柄单眼镜，拥挤着坐在冰冷的方石上；而另外一些人则把椅子搬到草坪上去，背对着跑道坐着。因为在观礼台与跑道之间是一条时装展览的沥青坡路。专家们检阅着这条沥青的长带，在他的脑海里这条带变成一架织机，织物象从经轴上越过滚筒在他的面前流淌而过，经纱和纬纱相互交织在一起，一切都完完全全地交溶结合为一体：虚线与实线、虚荣与诱惑、斗争与背叛、金钱与权势、赌博与投机、牟利与恋爱。

戏剧女演员和女电影名星们穿时装是为公司和她们自己做广告。时装模特儿们则只是为她们的公司招揽生意。摄影师们在为今天晚上就要把作品公之于众的电影公司紧张地拍摄影片。照相机今天使这些马匹成了真正的马匹，而且只照盛装的。比较小型的时装公司的狡猾的绘图师偷偷地把衣料的图案、帽子和服装样式都画了下来。

一位女设计师恭恭敬敬地走近一位穿着惹人注目的长袍的模特儿，出示了她的记者证；这位身著惹人注目长袍的模特儿摆出一副十足的官架子检查着她的合法证件，确认这位女设计师的确为一家时装杂志社而不是为一家时装公司工作，她故作姿态地旋转着，观众们聚拢在她的周围，对这个成为具有双重意义

的模特儿的时髦产品评头评足。观众们肆无忌惮地拥向每个照像镜头，如果一个摄影师拍摄一群时装模特儿，或跟她们合影，那么一个不相干的女人总是企图大模大样地挤进镜头。

和平街的时装大王们和里昂的丝织大王们都在睥睨、倾听。竞争结果如何，手持长柄眼镜品头评足的夫人们说些什么？这些哈伦·拉希德①和他们的密探们把睨视和窃听来的全部情报喀哩—喀啦喀啦—喀哩地用电报拍到里昂报告给他们的丝织厂主们，然后火速赶回去按电文的内容亲自汇报。开会商讨，化学师们按照电报发来的时兴颜色重新调色备料。绘图员们重新设计所有那些从前经过详细审查后参加奥图尔举行的竞赛的样品。纺织工人们必须改装织机，换上新的图案模板，以双倍的速度紧张工作，得到的是原样的报酬，昨天还被当成最理想的，今天则从样品集中剔出，抛进粪坑。

可是蚕蛹怎么讲？“我为世界吐丝②。”

毕克明 译

孙风城 校

---

① 哈伦·拉希德，为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主人公。

② 此语双关，意为“我蔑视这个世界，唾弃这个世界”。

公牛和它的对手们

(1934)

石柱上的圣母像依然站立在石柱上，这座神像是两千年前十月十二日神圣的雅各·桑蒂亚哥置在石柱上的。当然，久已不在露天，在神像的上面修建了一个华丽的小礼拜堂，在小礼拜堂的基础上，又加盖了一座华丽的大教堂。就是圣母也早不象当年跟桑蒂亚哥到埃布罗比岸来时那样衣著寒酸了。她身披一件银制法衣，装饰着无数颗珍珠，比原来形体约大二十倍。她的头部和她的摩尔人棕色皮肤男孩的头部都环绕着一道光轮，这个光轮是用一千二百颗钻石组成的一道光芒四射的光环，因此可以说这个光环自身是发光的，它是由黄金和红宝石组成的神圣光照的灵光。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男女祈祷者和男女忏悔者来参加西班牙基督教成立纪念日，此外还有一批公牛到亚拉图省的萨拉哥撒城参加皮拉尔交易会。这些公牛犹如圣像的珠宝环一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至少象信徒一样，它们也是主要的参加者。

我们从公牛群中选出一头，把它叫作N先生吧。海报上登着它的出生和受训的地址："古老闻名的和信誉远扬的牧场，即孔查和锡耶拉的多纳·康塞普西翁牧场与塞维利亚省沙拉苏阿的丰特弗雷达牧场。"①

① 原文为西班牙文。

当一群虔诚的信徒们在大教堂里你拥我挤之际，N先生正站在预备室里，它本身就是一种粗野的样本，现在它怒不可遏，因为人们把它从肥沃的牧场上，从时髦的母牛群里和塞维利亚乡村的舒适而安逸的生活中拖出来，让它饱尝旅途的劳顿和其他的劳苦。

钻石的光环和它的红宝石般的反射光在一千支蜡烛的光芒中闪耀着。朝圣者们跪在教堂的大理石地板上，祈祷、发誓、忏悔着，被香火的烟雾熏得头昏眼花。男人们，头上裹着帽子般的头巾；女人们，头上斜插着几把龟甲骨制的梳子，镶花边的面纱垂挂在梳背上；女学生们，头上则顶着一块手帕，因为头部没有遮盖的妇女一个也不准进入教堂。教堂里有脚穿凉鞋的男人，戴着大耳环的妇女，有老人和儿童，还有步兵第七团的士兵们，这个兵团扎营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阿里亚费里城堡里（中世纪行吟诗人的监牢）。

转眼已是下午，公牛的情绪越来越坏。突然房门开了，它跑到明亮处，想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当然，我立即就想到这点！这里没有牧场。只有一个圆形的沙场。没有青草，没有美丽的母牛，——什么也没有。四周，坐席一排压一排的，坐满了人。"

N先生是一个吃得肥头大耳的家伙，提到它，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确有着典型的公牛脖颈。它的双腿比较匀细而坚硬，它摆动着尾巴，在平正的额顶上矗立着坚硬的应付危机用的武器。"人们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这些平民百姓们都盯着看我。难道他们没有看见过公牛？"

它惊呆了。那里不是有一块红的东西在闪耀吗？

红色，它不能容忍。"红色，这些不让我们过好日子的家伙

们举着一块红的东西过来了。他们最喜欢逼迫我们套轭拉车。我们可不是那种任人驱使干苦役的牛，也不是那种让人吞噬的肉用牛。肉用的是别的牛，我们是高级动物，是优良种族……那里有一块红色的破布①在哗拉拉地飘动着。嘿，你马上就要完蛋了。”

N先生跑过去，冲上去，扑了个空。那块朱红色的布此刻在它的右边闪耀着，于是它转向右边，但是红布却又出现在左边。

N先生发现，那块布并非自己在飘动，有人在挥动它。啊哈，原来是一个人！好，向这个人杀将过去。可是这人紧贴着斗牛场的边缘，越过障墙②逃了。至少那块布没有了。N先生快步跑开了，这时又有另一块布在舞动。它愤怒地冲过去。斗牛士③急急忙忙钻进障墙的狭缝里去，肥健的雄牛无法追进去。

又有一位斗牛士，举着旗子，投入战斗。这边这个斗牛士满怀必胜信心，那边那个胸中充满自豪，他们一个个耀武扬威，但是只要牛一接近他们，就都逃之夭夭。“倒真象一伙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N先生气呼呼地说，“起先，他们拿着红破布，不可一世，后来他们就吓得缩了回去。”

哎哟，那儿又怎么了？四个男子，手执长枪，跃马登台。“笨伯们，你们想跟我较量较量吗？你们逃不出我的手心，瞧这四位骑着驽马的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你们逃不出我的手心，不错，马越不过障墙，钻不进‘安全岛’。”

---

① 红布，指缚在一根木杆上的红绸，在将要刺杀公牛的时候，挥舞起来，刺激公牛，引逗它攻击。

② 障墙，斗牛场四周的木板围墙。

③ 斗牛士，原文西班牙文 Torero，斗牛队的成员：由两个短枪手、两个马上刺枪手、三个步行逗剑手、一个剑刺手组成，他们统称为斗牛士。

不过，这四位马上斗牛士① 倒也懂得这点，所以，他们把身体的各个部分用绷带缠起来②，保护着自己。他们之中的一个——只是缺少了一幅单片眼镜——颇为引人注目，模样真象那些整天在海纳尔区的格拉涅咖啡馆里鬼混的骑士，这种人在咖啡桌下面让人擦马靴，在咖啡桌上面则侈谈着政治。在海纳尔区的格拉涅咖啡馆的常客，一部分是新闻记者，一部分是议员，一部分是政客，有的人常常是三位一体，这些人中一部分是君主立宪分子，一部分是“罗伯斯庇尔分子”，一部分是法西斯分子，有的常常是三位一体，异口同声地谴责共和国的资本主义，谴责共和国的警察统治，谴责共和国的腐败。他们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点上他们倒是跟这四位骑士志同道合，骑士们认为摇旗呐喊是无济于事的，想向观众表明，人们用他们的理论的冲力完全可以与公牛匹敌。

而他们的马匹可绝不是这种主张。它们睁着眼睛是无论如何不能向公牛发起冲锋的，因此，人们象对待它们的身躯一样，把它们的右眼也用绷带缠了起来。为了在一枪远的距离上向N先生进攻，骑士不仅要克服自己的恐惧，而且还要战胜驽马的天性；它嗅到了灾难，凄声嘶鸣，仿佛牙齿在打颤。马夫们帮助骑士策马。他们牵着缰绳拉着马，踢它的护腿，让它好上阵。一匹浅黄色的老马怎么也驱赶不动，我们在海纳尔区的格拉涅咖啡馆里认识的那位熟人恰好骑的就是这匹马。

另外三个马上斗牛士，骑在马鞍上犹如坐在大学讲台上，嘴上好象喊着这样的口号：“公牛们，给我们思想自由，”他们向敌

---

① 马上斗牛士，原文西班牙文 Picador，亦称马上枪刺手，斗牛时骑在马上用长枪攻击公牛的人。

② 斗牛时，斗牛士和马匹身体的主要部位用绷带裹起来，以防被牛角击伤。

人提出民主的要求。接着，他们畏惧地紧握手中标枪，以便抵御敌人的反击。在这一来一往之后，有一位骑士从鞍上落下地来，其他的同伴冲了过来，胸怀豪情，满怀必胜信心，把N先生引向红布，然后往后逃遁。这一手真有效。

这样斗下去，直到N先生开始困倦，再也不能追逐骑士和马，再也不能追逐红布和挥动红布的先锋①，只能追逐其中的一个马夫，用双角穿进他的小腹。五脏六腑涌了出来，极为可怖。

斗牛士们一齐冲将过来，把他们的红布投向N先生的公牛眼睛，警察与服务员们把受伤的人扶起抬走。观众们看到，他的痉挛越来越弱，终于完全停息，面色变成死灰。（翌日的报刊在斗牛消息栏里对死者的报道只有四个字：先锋受伤。）

厮杀继续进行，连一秒钟也没间歇。一个活人在大庭广众中被撕得粉碎，这事却丝毫打动不了那些在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柱像前面沉痛祷告的人们的心，打动不了善男信女们的心。

他们坚持要求那位来自海纳尔区侈谈政治的格拉涅咖啡馆的马上斗牛士也象刚才那三位台上的骑士所表演的那样给N先生来一剑。最后，这匹浅黄色的老马终于也被说服了。它冲向前去。不出所料，这匹马挨了一刺，就翻倒在地。N先生把两只角埋进了马肚子，撕开绷带，把黄马的内脏搅得稀烂。

N先生一边搅着马肚子，一边气愤地想到观众。"他们坐满了观众席，有的坐在阳光下，有的坐在荫凉处；这些人！上午他们还发誓要忏悔，要发慈悲，而此刻他们却兴高采烈地看着人们如此摧残我！我们要教堂干什么？当然，教堂保护着我们不让

① 挥动红布的先锋，指舞动披风或红布的人，斗牛时协助斗牛大师，使公牛头昏眼花，便于大师把公牛刺死。

那些得不到肉吃的农民闯进我们的圈栏，屠杀我良种公牛。但是，现在它却让人在它的节日里虐待和击刺我。它以为不会这样严重，人们不会杀死我。把这种虐待动物的行径施加于我，难道这还不恶劣吗？”

我们的公牛思考着，把黄马的身躯高高地举起，马摔下来时成了一具死尸，钉着蹄铁的四蹄朝天。

N先生摇摆着屁股，沿着斗牛场疾驰。“我杀了你一人一马，现在我该休息了，”它这样想。可它还远不能休息。上午，这些朝圣者们沉默不语，静止不动，此刻他们大嚷大叫，手舞足蹈。他们曾经在玛丽亚教堂的金刚法衣前跪下祈祷，然后排成一条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蛇阵，一步步地向着一个目标走去：向着一块镶在墙上的据说圣母的脚曾踩过的石头走去。走到圣物面前，每个人都跪下，把脸贴近石头，满怀深情地吻它，据说这样确实有助于生儿育女。

轮到这一吻，几乎要等上两个小时；这条长蛇阵路过许多南美洲的共和国的旗帜；这些旗帜是远涉重洋被庄严地带到这里来的，为的是尽可能近地在圣母像柱旁得到一块永久的阵地，使他们的国土获得慈悲的温暖光照。

胡安先生的心脏灰盒也停放在这条路上。人们都知道，他曾有一颗大慈大悲的心。妇女们，迈着几乎是原地踏步走的小碎步走过，渴念着天赐子女，画着十字，也许她们在一个有良心的男人的这颗心脏面前谴责自己的罪孽念头吧。她们挤进前面的人群里，想尽早地把嘴唇贴到这位圣灵妊娠的贞女的足迹上，她们强使自己相信，除了吻石足，再没有任何其他灵丹妙药能够帮助她们怀有身孕。人群在石窟形的圆顶下，在戈雅唯一的一幅壁画下面，转弯抹角地绕过隆起的石柱和贵族绅士们的墓碑

林，穿过大教堂。

在大理石上索尔德维拉名字的上边雕琢着一顶主教的帽子。大主教索尔德维拉于一九二三年被无政府主义者杀害，其结果是另一位大主教取代了他的职务。从红衣主教的坟墓到神圣的足迹之间没几步路远，所以朝圣者们很快就到了斗牛场。

N先生走过斗牛场的正中央，它的牺牲者的血正从它的角上往下滴着。——它看到一个人手持两只缠着彩带的短枪① 向它冲来。这个凶手作了个急跃动作，躲过了N先生的有角的头顶，就在这时，两支短枪刺进了它的两侧，一左一右。N先生抖动着身子，企图把插在身上的短枪抖掉。

这时，第二个短枪手跑上前来，又一次进行正面攻击。"流氓，"N先生勃然大怒，当然应该承认，它已被嘲弄刺激得够可以的了，被伤害击刺得够受的了，"我并不惧怕你，可你一定十分害怕落在我的犄角上。"

N先生可谓攥紧拳头，奋身向敌人冲去，而短枪手凶猛地从N 先生的身边跃过去，把第二对短枪插进公牛的肥大的脖颈上。第三个和第四个短枪手也登场了，他们奔跑，跳跃，击刺得又稳、又准。只是斜插着的木棍中有一根插得不牢，摇摇欲坠，最后落在地上，为此，这个笨拙的短枪手被无情地喝了一顿倒彩。

观众对这个短枪手普遍表现出来的不悦之感，并未使N先生感到满意。它愤怒地驰过斗牛场，背上的钉棍发出相互撞击的声响。

新的对手靠近了。他不象刚才马上的枪刺手那样骑着马，

① 短枪，在斗牛的前半场成对使用的枪，亦称五彩棍子，或钉棍，装饰着纸作的皱边带子，头是铁作的，一插进肉里就不会落下来。短枪应一对对插得均匀对称，适当的数目是三对。使用短枪的人称为短枪手。

也不象刚才奔跑的短枪手那样奔跑，他只是从容不迫地、坚定不移地跨步而来，他手上也举着一块红布，但它不是那些一再逃遁的斗牛士们曾举着四处挥舞的那种朱红色，而是一种深暗、庄严的红色。

公牛全身发抖。"那儿的那个人，他是我不共戴天的死敌，是我生死攸关的仇敌。他径直地向我冲过来。"

这位剑刺手①在距N先生几乎还不到半米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他把手放在公牛的额角上。他把手放在……N先生尽力把身躯向后缩，以便凶猛地进行冲击，用头上还在淌着鲜血的那双曲剑把这个卤莽家伙刺开。

剑刺手敏捷地闪到一旁，猛冲过来的犄角从他身边擦过，观众们以为他已被撕裂，但连他的斗牛短上衣的金丝边也没被刮掉。他仍然围着公牛脖子，围着公牛头部挥舞着那块红布，一忽儿从右到左，一忽儿从左到右，一忽儿从上往下，一忽儿又从下往上。

整个椭圆形斗牛场活跃万分，随着每个惊险的动作呼喊着，挥动着手绢要求斗牛场长把被杀死的公牛的耳朵赏给这位屠牛手②。因为观众确信N先生马上就要完蛋。

真是这样，剑刺手右手执着剑，左手拿着斗牛披风——那面深红色的旗，他的目光与公牛的充满仇恨的咄咄逼人的目光相遇。N先生回避着这次决定性的攻击。就在这时，剑刺手把剑刺进牛颈部，再也拔不出来了。

---

① 剑刺手，原文西班牙文 Espada，亦称屠牛手，是斗牛队里的主要斗牛士，因此尊称为"大师"，他是唯一可以用剑刺杀公牛的人。

② 当屠牛手敏捷地把公牛刺死时，由斗牛场场长把割下来的公牛耳朵奖给屠牛手，借以表彰他的勇敢精神。

观众们屏住气息，站在座位上，斗牛士手无寸铁，站立在公牛前面。他在等待，观众们也在等待。这是致命的一刺吗？如果是，那么N先生一定会立即打转，躺倒。

N先生既没打转也没躺倒。

它受了重伤，但并未伤元气。现在，它自己的鲜血把它浸湿了；在它黑色的皮肤上有一宽条在闪着光。那些斗牛士又围着公牛哗啦哗啦挥舞红布。公牛毫不气馁地向他们冲去。

剑刺手未能在第一个回合就结果公牛，所以他不得不让人递给他第二把剑，就在公牛颤抖着身体打算用犄角猛烈冲过来的刹那间，他又刺了一剑。在第一把剑旁边，第二把剑的剑刃嚓地一声插进肉里，一直刺到剑柄。可是你看，就是此刻，这头公牛仍然蹒跚着没有死。

刺耳的冷嘲热讽的声音从大厅里小资产阶级集聚的坐席上向剑刺手扑下来，他们左右开弓地把坐垫和香蕉皮掷向他。

当初作为他的热情追随者而手舞足蹈的人，此刻口哨打得最凶，硬说在一开始就看透了他是一个永远也对付不了这样一个劲敌的令人失望的蠢货。

剑刺手以一种严肃而又十分伤心的眼光许久地凝视着那些在他上面的由朋辈居然摇身一变而成为仇敌的人们，看来面对着这样一种众叛亲离的局面，他不想再继续战斗下去了。

但是，N先生怀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怒，雷鸣般地咆哮着，嘴上喷溅着狂乱的白沫，大地在它的脚下震撼着，径直地向剑刺手猛冲过去，最后他终于把它刺死了。

毕克明 译

孙凤城 校

三 头 牛

(1937)

"我?"他反问道,窘迫得满脸通红。他对我的发问会有这样的反应,这是我预先就料到的,因此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虽然还有许多别的人急切地想把他们到西班牙来的旅途经历告诉我。可是他不声不响地躲在人群的后面,瞪着一双大眼睛,凝神地听着"2·12"奥地利营的同志们讲述他们从奥地利到西班牙阿尔瓦塞特途中的冒险经历。

就是在他不听别人讲话时,他那双眼睛也仍然瞪得很大。高高的额角上垂着一缕金褐色的头发,后脑勺向外凸得厉害,在接近脖颈的地方深深地凹进去,他那张嘴在颤动时活象一张女孩子的嘴,与其说他是内战中的一名战士,倒不如说更象一位健美的妙龄女郎。

"你是怎样到这儿来的?"我问他。

"我?"他反问道。

"不错,问的就是你。"

"我坐火车到巴黎,从那儿就到这里来了,象他们大家一样。"

"你当过工人吗?"

"我原来是农民。"

"农民?你指的大概是长工吧。"

"不，我在蒂罗尔[1]原来有一个小庄户。"

"那么你一定很有钱了?"

"钱我一文都没有，我把牛全卖了，坐车到这儿来。"

周围的战友们笑了起来。在这些战友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拿银行存折买火车票到西班牙来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变卖了些东西，有的人把祖传的手推活动靠背椅卖了，有的人把搜集的蝴蝶标本卖了，第三个人把化装舞会穿的服装(用厚纸板制作的骑士盔甲)卖了，第四个人把前面男座后面女座的双人自行车卖了，第五个人，第六个人，等等，也都卖掉了些珍贵的东西。可是——牛！有人为了到西班牙来参加反对法西斯的斗争竟把自己的牛都卖了，这在他们看来似乎是无比的滑稽可笑。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曾经使他感到狼狈，然而战友们的嘻笑却丝毫没有使他感到窘迫，他随着大家一起笑起来，坦然大方、毫无顾虑地讲述着他在蒂罗尔的那座小庄户，又谈到他自己虽说是个有土地有牲口的农民，可又为什么没有钱的情形。他也兴奋地讲到他怎样产生了到西班牙来的念头，他讲述这些事情时讲得很恰如其分，不多不少，实事求是，有头有尾，毫不夸张，一旦发觉人们兴趣不大时，他便马上刹车，免得使发问和听讲的人感到困乏。在他的回答没形成一篇报道之前，我不得不一再地追问他，怎样实现自己决心的，怎样卖的牛，怎样旅行的，在战争中他的命运又怎样，然后再使它们各自成为完整的一章。这就成了一篇农民故事，但却是一篇性质截然不同的农民故事，它不同于我们所读的彼得·罗斯格尔、或是阿道夫·皮希勒，或是那位贝特霍尔德·奥尔巴赫所写的农民故事，关于后者，《骈文

---

① 蒂罗尔，奥地利州名。

诗论》写道："农民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啊——并非象贝特霍尔德·奥尔巴赫笔下所描写的那样。"

这位在战友们中间给我们讲述农民故事的农民，名字叫马克斯·拜尔，是蒂罗尔人，今年整整二十岁，出生于世界大战期间。他的父亲是个农民，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一座宅院，他后来又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这宅院就坐落在施塔茨和萨尔房两个小村子之间。人们称这个地方为维坡山谷，如果人们非把两座山之间的空地叫作山谷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自然也可以称之为山谷了。公路恰好在狭谷里穿过，铁路就不得不在较高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山坡上为自己寻找路基。连农舍也都建筑在这个山坡上，房基象农田一样，都是歪斜的。没有路能走马车，农夫们背着肥料，农妇们背着稀肥料，送到山上的农田里，再把干草捆用头顶着送到山下的厩舍里。只在山坡最下面的地方才有点田地，上面就是松树林，田地少得可怜。

并不是年年都有好收成。要是夏天不热，那么田间的全部劳作便前功尽弃，麦子不秀穗。如果冬季雪下得太少，土地冻冰，那么也是颗粒不收。贫穷啊，维坡山谷的农民们，一百个人当中，最多有三个人家里不欠债。被迫拍卖，屡见不鲜；最初被变卖的是家具、什物。农民和哭哭啼啼的农妇们气冲冲地眼看着自己的家当被压低了价格，一件接一件地被人抬走；其次就该轮到带地产的空房子了，一般情况下是找不到买主的。

下面的公路不是一条寻常的公路。这条路叫布莱纳尔公路，两千多年来一直是通往意大利的干道。小汽车，漂亮的、闪闪发光的小汽车，络驿不绝地疾驰而过，可从来还没有人想到过，在施塔茨或萨尔房停留一下，至于说在地处两村之间的科尔家门前停一停，那就更不用提了。

拜尔父亲的前妻，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为了养活他们，她经管田产料理家务，一直劳苦到三十二岁那年死去。

这样下去怎么行，拜尔父亲自言自语地说，一定得把田庄扩大，好多打些粮食。于是他买了一块田地，因为他没钱，所以只好从农贷会借了三千六百先令①，这三千六百先令作为土地的抵押价被登记了下来。此外，他又第二次结了婚。

拜尔家的三个孩子都到马特莱去上学。小马克斯学习最好，不仅在兄弟姊妹当中，而且在所有同学中间也是学得最好的。老师希望拜尔－马克斯能到因斯布鲁克师范学院去学习。可是没有钱支付这样的费用。于是老师同神甫商量，神甫又跟拜尔父亲商量，他作为神甫可以介绍这孩子到神学院免费学习。就是这样，这位作父亲的也还是不能同意，因为他需要孩子干活。（那些以为只要给穷人的孩子们发助学金或减免学费，他们就能象富人一样上大学的读者们须知：穷人的孩子是永远需要在家里干活的。）

小马克斯从四岁起就开始干活，搬木头、挤牛奶，“但从六岁起，”马克斯说，“我就干起十二岁的孩子才干的活儿，锯木头，烧饭，洗衣服，搅黄油。”当然，父亲是不能缺少他的。“我没有按照老师的希望到因斯布鲁克去，我心里很不是味，我多么想上大学呀。可是父亲没有把我交给神甫，这对我倒没有什么影响，我的确不想成为一个神甫，因为我不相信那一套。”

一九三四年，父亲去世了，他的遗孀维持着家务，但几个星期后，不但没有什么起色，反倒借了四百先令的债。这样，拜尔的弟弟，一个领取月金二百先令的退休扳道工，就成了这个宅院

① 先令，奥地利货币单位，一先令等于一百格罗申。

的保护人，他要到马克斯长大成人时，就象他接管这个宅院那样，再把它交给马克斯。拜尔叔叔声称，只要大家按他的意思管理，那么待到宅院大大好转以后，他就把它交出来。就这样，马克斯被雇到马特莱山谷，当伐木学徒工，还不满十五岁的妹妹到莱因河上游山谷去谋生，继母到施图伯山谷去干“女用人”的活。拜尔叔叔独霸了宅院，他对经济一窍不通，爱喝葡萄烧酒，更喜欢喝克拉纳维奇牌杜松子烧酒，为了购买农田用的牛车，他借了五百先令的债，最后，把储存的几袋面粉、农具和其他凡是能动的物品，包括被褥在内都卖个精光。

一九三七年一月，马克斯已长大成人，于是，他把这座空房子连同继母和叔叔所背的债务一总接了过来。真可说是，一搬进门就有债主登门，他们逼债一天比一天紧。马克斯现在已是一个独立的农民，他不得不借新债来还旧债，还得添置一头牛，这样他就借了九百先令。

他曾经有过三约赫半地①，几乎全是草地。恰好够喂三头牛，也就是说，只能满足它们对青饲料的需要。

他必须购买粮食，人要面粉，牛也要饲料。他收获一点土豆，三头牛用它们的白色的液体货币为他支付食油和盐钱。在离他家几公里远的施塔茨，有一家纺织厂，工厂职工家属每天买他八公升鲜奶，每公升三十格罗申。

农民卖黄油不如干脆卖鲜奶更合算些，而商人则只想在黄油上面而不想在人造黄油上面多捞几个钱。搅一公斤黄油需要二十五公升鲜奶，按照上述价格，二十五公升鲜奶可值七先令五十格罗申，但是一公斤黄油只能卖三先令，不及原料价值的一

---

① 约赫，德、奥古代田亩单位，一约赫约两头牛每日可耕之地。

半。那么加工费由谁来担负呢？马克斯一般只为那些跟他有契约关系的买奶的常客搅两公斤黄油，再搅一公斤给自己用。但他自己并不吃黄油，而是用来换两公斤人造黄油。正象日本的稻农穷得吃不起大米一样，蒂罗尔的牧民们只好吃人造黄油。要通过做工来偿还债务，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弟弟、妹妹和继母要不是给人家去干活，即使自己有个宅院，也一定早就都饿死了。

"我把牛干脆一下子都给卖了，就象这儿的其他人一样，坐上火车经过巴黎，到西班牙来了。这就是全部情况。"

好啊，马克斯，可是你怎么想到偏偏到西班牙来参加战争呢？

这得追溯到马克斯还完全是个少年的时期，那是一九二八年。那时在格施尼茨附近的山谷里，下了一场使人胆战心惊的暴雨，你们没听说过吗？喏，这没关系，反正当时下了一场暴雨，洪水从山上猛冲下来，所有的桥啊、堤呀、坝呀统统都给冲垮了，地崩把房屋也摧毁了。一切都需要重建，还得给格尼茨河修砌一条辅助河床。九年来，他们一直在那里劳碌着，至今始终还没完工，但随时都有一部分工人被解雇。在一九三七年被最后解雇的一批人当中，有一个名字叫约翰·克诺策尔的人，他是个石匠，又当过矿工，他用方条石给这些溪流筑起了堤岸，他在采石场是干爆破工作的。

最初，当他们把他裁减下来时，约翰·克诺策尔每天可领到两先令十格罗申的失业救济金；五个月后，当被裁减下来的人都已各奔他乡再也不能同心协力对付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救济金就被缩减为一先令六十格罗申了。约翰仍然留在这个地方，因为人们告诉他说，不久还会再雇用他的，他在年轻的拜尔家里包伙，每两周付给马克斯二十先令。

对于政治，马克斯一直不是很关心的。当施泰因纳赫的希特勒地下青年组织偶然约请他参加一次晚会时，他就回答他们说，他觉得干这种事情占用晚上时间太可惜了。他已经听过纳粹分子们的游说，不过他发现，他们汗流浃背、声嘶力竭地叫喊的那些东西，跟他毫无关系。也许，他们若是讲些关于给穷苦农民分配土地，或者是不必继承债务啦，或者是穷人也该上大学呀，那么这些事情早就会使他感到兴趣了。可是，他用地道的蒂罗尔话想道，他们拿那套"严阵以待"，"屈辱退让"之类的词句，只能舐他的屁股而已。

至于说到报纸，马克斯读过《农民报》和《因斯布鲁克人民信使报》，在他看来，只有报上登的牛马市场的广告、牲畜和牛奶的价格才是重要的，除此之外，里边没有多少有意思的内容。

但约翰·克诺策尔却不然，他是林茨人，又当过工人，他知道一些世界上的事情，他给马克斯介绍了苏俄的情况，讲到了库夫施泰因的那位神甫和许多报纸为什么对苏俄如此地咒骂，之后，他又谈到了社会主义。于是想更多地听到和读到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成了马克斯的最强烈的愿望。在采石场有一个人，他就有这方面的资料，约翰·克诺策尔认识他，不久，他们就跟这第三者，即姓斯蒂芬的人在马克斯的宅院里聚会，接着又来了第四个人，这个人姓路德维希，他是施塔茨纺织厂的工人，他们一起阅读《道路与目的》、《红旗》和其他一些奥地利地下报刊，议论着苏联和西班牙的一些情况。

到西班牙去！到西班牙去，协力同心，帮助西班牙。

"去我国际纵队，"突然发出一个很轻，很缓慢的声音。

随后，谁也不吭一声。他们围着桌子坐着，沉思着，"国际纵队"这个词在他们心中引起了无限的向往。

他们想，这真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向往啊。直接到售票处去，买上一张从马特莱到瓜达拉哈拉去的三等车票，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有钱也不行。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晚上他们又凑在一起坐着，胳膊摊在桌子上，沉默无言。他们在为一桩共同的心事沉默着："国际纵队"。

星期天，当他们四个人在申博尔格遛弯儿的时候，碰到了胡戈，他是个木匠，从前曾跟约翰和斯蒂芬在同一个工地上干过活。现在他在布莱纳关口参加建筑一项新税务所的工程，正好在边境线上，他所讲述许多关于南边的情况。今天夜里，又过来两个意大利青年，要到西班牙去投奔共和国军。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已经过来十个人了，其中有三个现役士兵，一个预备兵，其他的人全是应征入伍的人。他们都在咒骂墨索里尼把全体意大利青年运到西班牙去了。"如果我们非去西班牙不可，那么我们宁愿在那里支持人民反对那些将军，决不支持将军去反对人民。"南边奥地利的工人们正在全力以赴地支援着他们。据说确实已有志愿军从因斯布鲁克开到西班牙去了。

"从因斯布鲁克？"马克斯、约翰、路德维希和斯蒂芬异口同声地问，"到底从因斯布鲁克的什么地方呢？"

这个胡戈可不知道，详细地址他是不知道的。"那么，"斯蒂芬说，"如果我们要去，我倒是有个地址。一家报纸上登着编辑部的地址。这个编辑部在巴黎。我们也许可以从那儿再打听去西班牙的路。"

"行，这也许能行，"马克斯点头说，"就这么办吧。"

"我们要是有点钱就好了。"约翰叹息道。

后来，马克斯对他们说，他要把自己的牛都卖掉。"我真的

把牛都卖了，”马克斯对我们说道，然后他结束他的谈话说，“后来我们四个人坐火车，经过巴黎来到西班牙。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他到底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把牛都卖了呢？

噢，不错，这是非常容易的。他曾养过三头牛，一头叫“大灰”，一头叫“小孟特”，一头叫“黑子”。大灰是其中最好的一头，它有时一天产十四公升奶，年年下犊，下犊后四周，马克斯就仍然可以用它拉车。

就这样，马克斯在星期一马上就把大灰卖给了米伦的一个富农，他早就看中了这头牛；那还是在一个月前，他就想出六百四十先令买下它，但是这期间产犊的牝牛跌价一百先令，这个富农从中又扣下三十先令，因为他看出，马克斯想尽快脱手。

因此，马克斯牵着大灰上米伦，卖了五百一十先令，他非常泰然自若，因为一个农民把自己养的牛卖掉一头，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在卖第二头牛“小孟特”时必须更加小心才是，免得邻居们惊讶，从而怀疑年轻的拜尔农民到底为什么要把牛都卖掉。说到小孟特，马克斯早想卖了它，压根儿就是一件比较合情合理的事情。是呀，它每天吃十二公斤多干草，半公斤料粉和四分之一公斤的黑麦，因此它吃的比每天多产四公升奶的大灰还要多的多。

马克斯要以四百先令把小孟特卖给一个牲口贩子，就是说卖给那些倒卖牲口的富农。牲口贩子说，最多值三百先令。结果以三百二十先令成交；马克斯讲定的条件，是在他买到新牛之前，允许他把牛保留到下一个集日，为的不中断继续给人家送奶。牲口贩子立即交付四十先令的“定钱”，击掌成交，现金支

付，这在每次牲畜的交易中都是司空见惯的，不过通常只交付十到十五先令罢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在施泰纳赫有牛马集市。马克斯把小孟特交给了新主人之后，就牵着他的第三头牛，也是最后一头牛来到了牛马市场。他妹妹陪着他，她满以为马克斯今天要买三头新牛，万万没料到，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就在今天他就要离家远行。他的三位朋友已经先出发到因斯布鲁克去了。

第三头牛是“黑子”，它是三头牛当中最次的一头。当天晚上即将坐火车去西班牙当兵的马克斯想，不知我是否能卖掉这头牛。

距牛市足足还有十分钟的路程，他就碰上了四个月前以四百二十先令把黑子卖给他的那个牛贩子。“嗽，拜尔农民，”牛贩子喊着，“你又要卖牛了，这不是黑子吗？”

“我正想再把它卖了，”马克斯应答说，“它产奶太少了，每天只产九公升，可你却说过，能产十一公升。”为了说明他为什么卖牛，同时责备牛贩子，马克斯还可以补充说，虽然四个月以来黑子跟公牛交配过三次，可是它从来没生过牛犊。但这话马克斯没对牛贩子讲，免得牛贩子借此再压价，万一他想买黑子的话。

“你说什么？”牛贩子问，“它只产九公升奶？大概你没喂它正经的饲料吧。”

“你想要，你去喂它象样的饲料好了。”接着他们就讨价还价，最后黑子以二百八十先令，又回到牛贩子的手里，四个月前他刚把黑子以四百二十先令卖了，很可能当时卖的时候就已经大大地捞了一把——这么多的钱，就是拜尔农民和他的邻居们干四个月的活也不可能赚回来的。

现在三头牛全卖完了，大灰、小孟特、还有黑子，口袋里的车

钱是到——嘘，小马克斯，千万别作声。

马克斯对妹妹说："你今天甭回家去做饭了。我还要去买牛，随后坐车到因斯布鲁克去。牛到晚上才能牵回来。给你，这是一百七十先令，要不我就都乱花掉了。"

随后，马克斯回到家里，给妹妹写了封告别信，又给保护人写了一封，他在信中建议把房子卖了，把钱给继母、妹妹和弟弟平分。

再见，拜尔宅院！启程向因斯布鲁克进发。三位朋友正在凯旋门前等着呢，他们已经到旅行社去过了，一切都弄清楚了：跟胡戈说的不一样，到巴黎的车票不是六十先令（六十先令大概是慢车票吧？），可惜贵了些，虽然给世界博览会参观者优待减免，但一张票还卖六十八先令五十格罗申，四点半钟开车。三点半他们四个人就到了车站，四点半，维也纳——巴黎的特别快车开出了因斯布鲁克车站大厦。再见，我的故乡蒂—罗—尔，再见了，我的故乡蒂罗尔！

"后来，我们到了巴黎，又从那儿来到西班牙。情况就是这样，现在你们对我们旅途中的一切情形都一清二楚了吧！"

那么，马克斯，在旅途中以及在巴黎就什么意外的事情也没发生过吗？

任何意外的事情也没发生。一切都很顺利。四个人坐在车里时倒是有点担心，他们都不懂法语，不知能否混得过去。

"我们哪里还会遇到什么意外呢！"约翰故作镇静地说，"巴黎的地址我们已经有了，后面的路他们会给我们指引的。地址可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啊。"

斯蒂芬心神不安地把两只手伸进上衣口袋、裤子口袋、大衣口袋里，后来又伸到箱子里不停地找着。斯蒂芬脸色煞白。"我

把地址给忘了。”

真糟糕！不过，在巴黎，那个往西班牙国际纵队输送援兵的机关总能找到。不是已经有成千成万的志愿军开到西班牙了吗。

早晨七点钟，他们——约翰、斯蒂芬、路德维希和马克斯到达了巴黎，而昨天这个时候，马克斯正在把小盂特送给牛贩子，后来又把黑子牵到施泰纳赫牛马集市去呢。

巴黎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压根儿没法比。他们不敢离开车站走到广场的对面去，那里有那么多的小汽车在来回奔驰。

车站对面是一家饭店，名字叫北方大饭店，看门的人会讲德语。这可太好了。这四位房客想共同租一间房子，可是看门人讲，他只有两张床一间的，只好每张床上睡两个人。这也可以。他说，每天每间房子一百法郎。这可不行。于是四个人又问，有没有便宜一点儿的房间。没有，他回答说，便宜点儿的他没有。

他们问，是否可以便宜些把那间房子租给他们。他说，也可以，但他们得租一个月，每月只付两千五百法郎。见鬼，真见鬼，四个人都惊呆了。看门人笑了，他夸耀说，这压根儿算不了什么，他最贵的房间每月六千法郎呢，可不是嘛，他拿出帐簿给他们看，里面真是记着这个数目。

他们四个人怎么办呢？总不能拎着手提箱在巴黎大街上东奔西跑地寻找国际纵队的住址吧。因此，他们把那间一百法郎的房间租了下来。

当他们乘电梯上楼时，马克斯回忆着种种情景。他父亲的一生，是操劳的一生，母亲也辛苦一辈子，积劳致死，他们给从小就跟他们共患难的子女们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一笔三千六百先令的债务。

电梯越爬越高，马克斯想到从继母那里接过来的四百先令的债。马克斯想到那位退休的扳道工拜尔叔叔，他一点不会经营，爱喝克拉纳维奇牌的葡萄烧酒，两年内就欠下五百先令的债。

电梯停了。一个服务员领着他们在一条地毯上走着，经过无数的房门。他们走进一个房间，啊，这是什么房间啊，他们都呆了。橱柜本身占一间，洗脸池又占一间，橱柜上面镶着镜子。怪不得值一百法郎。他们要是在这儿住上一星期，那么开销可比大灰、小孟特、黑子三头牛加在一起的钱还要多。

这就是说，要尽可能快点离开巴黎。他们上街去了。后来呢？后来他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两个人往右，两个人向左，去寻找工人住宅区。也许那儿会有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办的。他们约好中午再在饭店前面碰头。

中午，他们在旅馆前碰头了。他们既没找到工人住宅区，也没找着一个能建议他们到西班牙去走哪条路的人。

他们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实际上是坐在路边一张桌子旁，那些桌子都是这家咖啡馆的。四个人饿着肚子。他们不知道，订一份夹蒜肠的黄油面包用法语该怎么讲，因此只好喝咖啡，心里十分不痛快。他们万万没料到，到西班牙去竟是如此艰难。

一个街头小贩走过来，他卖的是杏仁和糖块，他们买些杏仁和糖块，原来那个小贩是阿尔萨斯人，懂德语。他们四个人互相使眼色：要不要问问他？

当他走开的时候，斯蒂芬跟上去，边走边问他。那个卖糖的买了一份报纸：请看，这就是人民阵线党的机关报，这是地址。请您乘地铁去，一定要在夏特莱站换车。他甚至把换车的车站和终点站都写了下来。

总算有点收获了，地铁票没费多大力气就买到了。不用说，这四个刚从蒂罗尔来的小伙子在地下迷宫里是够晕头转向的了。幸好一位妇女发现了这四个正在张皇失措打转转的小伙子，而且只会讲德语。于是她同他们一起乘车去找报社，可是她没时间跟他们一块到上面去。

报社的人有些疑虑，只是答复，让他们四个人过半小时后等翻译到了再来。

他们在报社门前等着，这时一个人向他们走来，他也会讲些德语，悄悄地问，他们是否要继续乘车走。"不错，我们正是这样想的，"他得到了这样的答复，他们是不是到西班牙去？"那还用问！"他们中的一个人说道。那么，他可以帮助他们，也许今天夜里他们就可以坐车走，预先发给每人一百法郎的军饷。火车直接开往米兰，然后搭船去西班牙。

"去米兰，"四个人感到惊讶，为什么要到米兰，为什么要到意大利去呢？他们要找的是共和国军，可不是投靠佛朗哥呀。

但陌生人解释说，这可是大错特错了。在军事上佛朗哥处于绝对优势，再说那里挣钱也多……

我们这四位青年谁也没有答复一句，没有相互商量一下，甚至也没有互相看一眼，就急急忙忙地又走进报社，在楼上等着翻译。

翻译终于来了，他向他们盘根问底，随后同他们一道乘上一辆出租车到另一个办事处去。在那儿，又有一个人打破砂锅问到底地盘问他们，可是谈话结束时他却用"同志"这个字眼称呼他们。"同志们，你们星期一走吧。"他给这四位同志安排了住处，七点钟他们又回到北方大饭店，他们必须为那间租而未住的房间付七十五法郎房费。他们拎着箱子搬到其他同志们那里

去。

这一天如此丰收，如此幸福地结束了，第二天就更加丰收，更加幸福了。他们起得很早，赶去参观世界博览会。真去参观世界博览会吗？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看苏联馆，在从博览会入口处到苏联馆的这一段路上，他们几乎都没顾得上环视一眼。他们想亲眼看看那些他们曾经读过、听过和议论过的东西。整整三天，从清晨到夜晚，他们一直逗留在苏联馆里，他们什么都想摸摸，什么都想了解。马克斯最感兴趣的是苏联的畜牧业，他聚精会神地观看着各种图表、文献、照片、统计数字、报刊等。不，那里不会有这样的牛贩子，在出卖象小孟特这样一条又蠢又笨的牛时赚许多钱，远远超过了它的价值。不，那里的年轻农民不会在继承家业时如此债台高筑，甚至一辈子不得翻身。那里也不可能有强迫拍卖的勾当。那里有牛奶集体合作社、牛奶和黄油集体农庄、电动分离器、兽医站、动物药品供应站、农民大学、图书馆、俱乐部，那里有……

停一下，停一下，马克斯！我们相信，关于苏联的事情，你一定能给我们讲上几个钟头，如果你不是马上出发去西班牙，说不定你今天还站在那里发愣呢！请你再谈谈后来的旅行情况吧！

再没有什么更多好讲的了。从巴黎出发到了N……，马克斯在那儿把剩余的钱寄给了他妹妹，而且给她写了封信，要她回信谈谈家里的近况。回信地址：西班牙 国际纵队。他们后来开过了国境线。在X……已有一百五十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兵，在等候着运送到国际纵队去。不久就开始了运送，向前线开拔，人人都兴高采烈。但是没有火车，到Y……是徒步行军去的，在那儿他们共受训十三天，之后马克斯和斯蒂芬被编到第十一纵队第四营，约翰和路德维希仍留在Y……参加报务员训练班。

第十一纵队是一支国际纵队，第四营是奥地利营，为了纪念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被命名为“2·12”营，因为奥地利工人阶级曾在这一天奋起抗击反动派。

六月中旬的某一周，“2·12”营奉命向基约尔纳和布鲁奈特发起冲锋，进攻奏捷，马克斯和斯蒂芬也参加了战斗。战斗结束后马克斯被提升为下士，可是对我们提出的为什么会提升他的问题，他回答说，他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后来队伍开到比利亚尔瓦，这是部队的整休和训练的营地，但时间并不长。路德维希和约翰也到那里去了，于是四个人又重逢了。就在八月二十四日那天，他们参加了在金托附近打响的战斗，马克斯在那儿挂了花。

“这样我的故事讲完了，”马克斯说，“这个故事真他妈长。”他揩着脸上的汗。

再给我们讲讲金托的战斗情况吧，马克斯。

坐在这儿的人都了解金托的战斗情况。上午十点钟命令冲锋，冲锋的时候我们没有坦克，敌人用火力封锁了一个横在我们之间的高峰，共和国军伤亡惨重，他们的进攻停止了。在向金托挺进的中途，奥地利人停止前进半天，在那里挖战壕；在那儿指挥官通知马克斯说，他被任命为中士，但对我们提出的当时为什么会晋升他的问题，他又回答说，他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晚上六点钟，他们又发起冲锋，夺下了金托的东郊，他们就在那里构筑隐蔽工事。在他们面前还有一座教堂，一个军官和四名战士想去侦察敌情。他们相继穿过两条街道，都没遭到敌人袭击，当他们又转过一个角落时，便遭遇了敌人的火力袭击，敌人可能是从窗口射击的，也可能是从教堂的顶楼，军官和其中

的三名战士阵亡了，侦察队的第四个战士的屁股被一颗开花弹打中，这颗子弹射穿了战士的手榴弹木柄，把木屑带进皮肉里，然后把他的屁股炸得血肉模糊。这个在四位阵亡的战友们中间疼得蜷缩着身子的战士就是马克斯。这时所有的窗口都在射击，没人能上去把他救下来，就连卫生员也没赶到连队的前面来，这四个阵亡的官兵和挂彩的战士远离了连队，连队看不到他们的踪影。他们之间相隔三个街角。天渐渐地黑了。你，没希望了，马克斯……

你，没希望了，马克斯，幸亏突然有人爬过来，这个人是斯蒂芬，他说："睁开眼睛看看，你还活着吗，小马克斯。"

"我还活着，"马克斯说，"可是我挨了一枪。"

"是的，我看见了，"斯蒂芬说，"你等一会儿，我们来接你。"

马克斯等了一会儿，后来爬过来三个人。他们把一条毯子平摊到他的身子底下，斯蒂芬、路德维希和同一连队的一个维也纳人把他抬走了；半路上，约翰也赶上来了，这时四个人把他抬到一堵墙后面，他们在那儿用自己备用的绷带给他简单地包扎了一下，然后抬出村子，穿过金托前面的田野，绕到他们上午曾停留过的一座小山的背后，来到了救护所。

救护所又给马克斯重新进行了包扎，他的朋友们跟他告了别，回到前沿阵地，他被送进一辆救护车。车在公路上行驶了整整一夜，这些公路本来就已经够惨的了，现在加上车压弹击，破坏得更不成样子。这一夜是马克斯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夜。他在希贾尔动了手术，住了几天院，后来他来到贝尼卡西木，在那儿他已经能看看书，站起来到海滩上散散步了。在看过的书中他最喜欢的是恩格斯写的那本《农民战争》，关于这本书，不管是谁，读过之后可以久久地玩味。现在他又回到战友们中间了。

“就是这些吗，马克斯？”

“我想，就是这些了。对了，还有一点：我接到妹妹寄来的信。虽然我建议他们把房子卖了，可是他们并没卖。乡政府把房子给租出去了，但这个新租户是分文不会给的，这，我早就料到了。直到现在，他只得到六百先令的押金。用这点钱他能买到什么呢？顶多够买两头破牛。也许只够买黑子和小孟特。”

毕克明译

孙风城校

鞋　厂

(1947)

一声尖叫把我从梦中惊醒，它继续在刺耳地鸣响着，这时我坐起身来，思索着我究竟在什么地方，然后走向窗前。下面是美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既不是纽约，也不是芝加哥，多半是加利福尼亚，或者是佛罗里达，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吧。因为我望见了摩天大楼，而且我自己房间的窗子显然也属于一座摩天大楼，但平面空间的缺少和地皮价格的高昂似乎并不那么严重；在宏伟的百货公司和十五层办公大楼之间，仍有好几平方公里的空地可供建筑。就连电影院也浪费了它的建筑面积，比我所熟悉的中欧的全部电影院都大（只是巴黎的高特蒙影院稍大些罢了）；这是一座平房，上面未加盖任何建筑，更谈不上是类似洛克菲勒中心那样的建筑。

但是，最浪费的是周围的大面积的草坪——这正是证明我离曼哈顿如此遥远的真凭实据。我心中不禁升起疑团，但它又消失了，因为我看到花坛中用鲜花组成的两个年代数字：1397和1947。看来，这是大庆日，五百五十年大庆。这么说，我又觉得自己不是在美国，因为公元一三九七年，那里根本就不曾存在任何年代数字。

我从摩天大楼往下俯瞰，犹如从悬崖往深涧俯视，楼前停放着许许多多不同大小、不同类型、不同颜色、不同年代生产的汽

车，当然它们有的来自远处，也有的来自近处。到站的乘客们从车踏板跳到宽阔的纵横交叉的花园甬道上去，加入一个向着唯一的目标移动的行列里。

这个行列最初还是从容不迫地行进着，但接着逐渐地由缓慢转为稍快，最后由疾驰变得狂奔起来，这是由于第二次响起震耳欲聋的汽笛声的催促所造成的。

从第一次信号把我唤到我的观礼台起，到现在已经半小时过去了。那时，也就是半个钟头以前，那里只是数百人在行进着。这些纵队逐渐扩大到数千人，现在，因为已是七点正，汽笛开始第二次鸣响起来，并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人流增加到万人之多。支流不复存在了，一条大河向河口奔腾而去。

这河口是通向一个工厂的入口。然而，既不是一座堂皇的大门，也不是一个工厂厂房的高大入口。倒很使人想起某一博览会或展览馆的入口：九扇开着的大门，从空地通向空场，排成一排。人人都得向这九位守门人出示他的所谓的出入证，然后才可以通行，犹如通过转栅门那样。

从我的窗子望去，在这些入口前面和后面的人群看样子颇象一个沙漏：所有的人渐渐地拥挤在一起，流向出入口，通过出入口后，又都分散开来。

汽笛的鸣叫嘶哑下来。当汽笛发出呜噜呜噜声时，草坪又露了出来，广场连同作为它背景的九座门空无一人，显得懒洋洋的，道貌岸然地向里头窥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不是一分钟以前还有几万人在你拥我挤、推推搡搡吗？您没患幻觉症吧，尊敬的先生？

我身居何处，当然早已一清二楚。我在兹林[1]，在拔佳附近。

---

① 兹林，即现在的哥特瓦尔德夫市，拔佳鞋厂就在该市。

但此刻我知道的东西比昨天夜里知道的还少。因为那时我刚到达，还没有看到我现在所看到的一切。

"请您告诉我，"我向一位走进我的房间的服务员问道，"那些人为什么急急忙忙往工厂里跑？"

"您说什么？"她用反问的口吻回答我，因为她根本不懂我问的是什么。"在开工前每个人都必须到厂……"

"可是这些人简直象发疯似的在追赶哪！"

"他们必须及时赶到流水作业线，否则别人就没法开工。"

"迟到的人要受处罚的，是不是？"

"谁经常迟到，因而耽误了流水线上的工作，损害了别人的利益，他就要受到惩罚。但是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了。从前，不管是谁，只要迟到一分钟，就要被克扣工资的。"

拔佳王朝的奠基人

四分之一世纪多的时间，托马斯·拔佳和他的经济奇迹一直是全世界谈论的话题。一则传闻说，一个摩拉维亚拖鞋鞋匠托马斯·拔佳——枢密院顾问克斯尔的女婿——为了向奥匈帝国军队提供军鞋，用前所未闻的方式扩建他的制鞋厂。枢密院顾问克斯尔博士当时是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的私人医生，他是一个从不抛头露面的人物。甚至在人们议论他的唯一的一则轶闻里，他也只不过被描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物。照这则轶闻讲，一天夜里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突患重病，这位枢密顾问克斯尔博士穿着睡衣就闯到他的床跟前去。可是弗兰茨·约瑟夫把他赶了出去，他喘息着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请您先穿上礼服。"

实际上，枢密顾问克斯尔博士是一个经常围着皇帝的身边转来转去的人物；连接见和觐见的次数和时间都是他决定的。他在奥地利皇宫所扮演的角色大约等于一百年前施特吕恩泽医生在丹麦宫廷里所扮演的角色。但枢密顾问克斯尔博士比施特吕恩泽更狡猾些，只不过他不公开演这个角色罢了。

倘若枢密顾问克斯尔博士真的是那位年轻鞋匠的岳父的话，那么，这位年轻的鞋匠将会成为皇家和国王军队的军需商人，成为一位双料的百万富翁，高踞于所有穿军装的步兵和平民小百姓头上的皇帝。

一九一八年以后，对于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公民来说，不能再以跟奥地利皇室的关系来夸耀了，于是拔佳公然断绝了同枢密顾问克斯尔博士的所谓的裙带关系，宣称他的夫人姓门西克，是已退休的政府顾问亚历山大·门西克博士的女儿。如果说门西克和克斯尔两家的联姻关系不是谣传的话，那么关于拔佳可能飞黄腾达的说法也就站不住脚了。

不管怎么说，拔佳的口袋里是装着军需品供应单的，上面全是巨额利润，当他此时在继承先业，登上鞋匠的宝座时，他的道路是畅通无阻的。他的政府(1915—1932)是一个暴君的政府①，但不是一个普通暴君的政府。托马斯·拔佳原是摩拉维亚人。我在这里顺便提及一个只为少数人所注意到的事实，即相对说来摩拉维亚给世界贡献了一大批伟大的人物。不必描述这些伟人的共同特点，也无须详细地去说明这片土地所提供的精神养料，这里我举几个名字：哲学家科门缪斯和托马斯·格·马萨利克；格雷戈·门德尔，遗传规律的发现人，这些规律曾被吕森考

① 意指他在管理工厂方面非常独断专行，对待工人下属非常苛刻暴虐。

斯的新发现所批驳；历史学家帕拉基；经验批判主义者恩斯特·马赫，他与欧根·杜林先生齐名；作曲家雅纳斯克。还有无数的诗人、作家、画家、雕刻家和演员都出生在摩拉维亚。

从精神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托马斯·拔佳绝不属于这个范畴。他是个商人和工厂主，他具有为瓦尔特·拉特瑙所划分的那种不把赚钱视为其活动的根本目的的本性。他要获得什么，都是出于权欲，驱使他的是他那种近于业余体育爱好者的雄心，因而他最终发展到做出类似策姆加诺斯企图战胜自身重力的胡闹行为。托马斯·拔佳俨然以超人自居，把身边所有的人看成是低人；他肆无忌惮地欺骗他们，盘剥他们，对他的职员拳打脚踢，毫无顾忌地把他的工人赶出住宅，赶出工厂，甚至把他们逼死。

拔佳甚至在他的工厂以外也进行践踏，拔佳鞋的鞋跟是无情的。他在波希米亚的每个乡村都设立拔佳分厂，因此，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几乎找不到另外一个开鞋厂的人。按尺码订做鞋久已成为历史了。想干鞋业的鞋匠只好去修鞋。接着，由于拔佳建立起了一整套的修理网，几乎跟步行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鞋匠阶层，就迅速彻底地以自己的灭亡而告终了。

拔佳很少介意这一点！在兹林的鞋履纪念馆里，可以看到展出许多古老的制鞋工具。纪念馆上面写着“托马斯·拔佳最早的工场”字样，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顾客怀着景仰羡慕的心情观看着这份如此珍贵的货品。该厂一位年老的职工把我拉到一旁，说：“这份遗产从前属于一位俄斯特拉发人。他的曾祖父原先就是那里的一位鞋匠。当他被拔佳搞得倾家荡产的时候，他索性把全部家当打成两只箱子，托运到拔佳工厂去，交给老

板。然后，他领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投伏尔塔瓦河了。托马斯·拔佳在听到这个死讯的同时收到了这份遗产，他指示说：'把这些东西封存起来，上面写上张条子标明：这是我初期办厂的工具'——这人真是厚颜无耻，你说呢？"

托马斯·拔佳的命令一向是正确的，只有他本人才不受这些命令的约束。就这样，他给自己下了一道命令，并因此而丧了命：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二日他坚持在浓雾和暴风雨的天气里要飞机起飞，尽管驾驶员全身发抖，哭喊着乞求说不能飞行。三分钟后，飞机坠落地面，拔佳和司机摔得粉身碎骨……

继承人扬·安·拔佳

后来，比托马斯·拔佳年轻二十二岁的异母兄弟扬·安东·拔佳成了他的继承人。他始终是一个大笨蛋，托马斯一再在全体职工面前这样地辱骂他，并且象虐待其他职工一样，常常对他拳打脚踢。但是，托马斯却把一向为他蔑视的弟弟立为宝座继承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朝之主，堂堂男子汉，不能把他的王国让一个女人或孩子继承，即便是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孩子也不行。

当人们从机场把遇难的消息通知给扬·安·拔佳时，他在电话里说："我是总经理。"他毫不踌躇地用他哥哥的头衔讲话，而他的哥哥本身就是工厂的化身，这在全厂职工看来简直是对神明的一种亵渎行为。

扬·拔佳听到他哥哥坠毁和自己掌了权的消息时，接受了神明的启示，成为宇宙间顶天立地的伟大人物。他在纳粹和他的知己戈林的帮助之下背叛了自己的民族（他企图把捷克斯洛伐

克全部迁徙到帕塔哥尼亚去即为其中一例），这完全出于他的商人本性，在他看来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认为，把自己神圣的大印永远盖在他哥哥的工厂上面这一想法，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为了同样的目的，他让人装设了一部常备电梯，诚然，这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

我走进对面的办公大楼，为的是欣赏一下这座世界闻名的宏伟建筑。我还不能在楼下立即登上会客的、政府的和接见用的电梯。开行的是并排装设在这里的其他电梯，好似一个垂直形的车站。特别快厢只在唯一的一层楼停留，直达快厢每五层停一次，慢厢每层都停，环行厢根本不停。与这些垂直电梯垂直运行的还有另一部梯子——也就是说一部水平运行的电梯。当我在户外看到它沿着大楼正面墙壁运行时，还在楼下我就已经头晕眼花了。我下了决心："坐一次窗车。"不过在我执行这项计划之前，我想还是先解释一下"窗车"这个概念。这种车并没有什么窗子之类的装设，只不过是一只敞开着的铁笼子罢了，用电力推动，里面有两个男人终年日复一日地沿着一万五千个窗子运行着，一则维修窗架，二则擦玻璃。

活动的宝座大厅装修得异常舒适，但它绝不是朝着我开下来的，而是向着那位大人物开去，我现在去采访他只能乘一部蹩脚电梯爬上十六层楼。这在我看来，真可谓是绝妙的民主！我在上面走出电梯，又进了另一部电梯。

我登上了活动的经理办公室。看起来它确实是经理办公室，却看不出它是可以活动的。天晓得到这里该怎么办？我们假设，拔佳工厂的总经理和所有能接任他职位的人马都因飞机失事而丧生。于是，我不得不把这个工厂接管过来。然后，我就

会在电话里说:“我是总经理……”可是,往下我该讲什么好呢?这里根据色彩学的规律安装着许多五颜十色的揿钮，每一个都等着我去按它，我究竟应该先揿它们当中的哪一个好呢?假设我按那个深红色的:“这里是伦敦白金汉宫,”对方立即回答我说。“我可以跟陛下谈谈吗?”我没话找话的说。“我就是,”乔治国王殷勤地回答,可我——我把听筒挂上了,首先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么急地该向英国国王要求些什么，其次因为我不是扬·巴塔本人，因此深知英国国王只是在我的想象中来接电话。只有原来就狂妄自大的人,才可能变得这样的目空一切。

让我们来试验一下黄钮,我这样决定;我真的揿了一下,等着看谁来答话。是教皇，还是小洛克菲勒……?当我在等人的时候,墙壁上突然闪耀出光亮。原来电梯已经开动,掠过什么东西,向地底下开去。也许,我在驶向地心,到那里出售鞋子,有防火的、防沥青的、防硫磺的以及防地狱的靴鞋，这对拔佳公司的大王再适宜不过了。但是,真算幸运,宝座一直是在地面上,一个悄悄地坐在角落里的宝座卫士陪着我进行我的地狱之行。

“您想下去吗?”他问我。

“不,我还想稍许参观一下。”

“那么请吧。”

笔迹鉴定

我问道，书架上放着的这些装得鼓鼓囊囊的袋子是干什么的。“这是我们公司全体职员的笔迹鉴定表格。这些鉴定表都是托马斯·拔佳当时在伦敦从笔迹鉴定学家罗伯特·索德克那里订购来的。”

我是不是可以看一下呢？

“如果您想看，那么请吧！从前总经理把这些鉴定表封存得非常严密，特别提防这些鉴定表涉及到的那些重要职员。不过今天再没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了。”

我倒对这些资料很感兴趣。虽然拔佳职员中我所熟悉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先生早就不在了，但这些资料却使我很感兴趣。

我始终弄不明白的是这一份份鉴定表究竟涉及的是些什么人物；每一页都标记着一个代号，但没有姓名。我通篇翻阅了一遍，因为这些表格是一部尚未付印的书，而且根本没有考虑要付印。为获得巨额稿酬而写这部书的作者，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根据笔迹的某些线索来说明这些没有想到别人在算计自己的书写者的性格特征。

被鉴定的信件既不是职业申请书，也不是招聘报表——这会是怎样的一个上司呀，他竟然需要那些跟他在偏僻地区长期共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的性格特征材料！

其中的一页，即第十页，语气坚决，警告强烈，颇引人注意。原来这是一个被鉴定者的通缉①，直截了当地要求把这个人赶出机关。

我问道，是否可以判断出来，这个判决书指的是什么人。这位职员把封存在另外一只柜子里的索引找了出来。“您想了解几号？”——“十号。”他寻找了一会儿。“十号是扬·拔佳，托马斯的异母兄弟和他的继承人。”

哼！

现在，我把这份笔迹又重读一遍，比初次读时更加激动。

① 通缉令，借用法律方面的词，意指对一个人性格特征的描述，类似通缉令中对被通缉者外貌特征的描述。

"每一句话，"这位对我颇为藐视的职员解释说，"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好象是托马斯·拔佳亲自口授的一样。他恰恰就是用这些话常常表示他对扬的一贯的蔑视态度。尽管如此，可他还是安排了扬作为继承人。全体职员都知道这份遗嘱，人人对此都感到十分恼火。据说，齐佩拉经理曾向托马斯·拔佳询问过这种安排的原由，托马斯·拔佳则答复说：'家里最坏的无赖也总比最诚实的陌生人偷盗的少些。'"

甚至连这份笔迹鉴定也没能使托马斯·拔佳改变他最终的意志。鉴定说：

手　　书　Nr.10

1.诚实性：很不可靠。如果他是您的职员，我不想根据这份材料对他加以怀疑；但必须说，如果您在任用他之前把这份手书给我看一下的话，我绝不会推荐他。

2.彻底性：貌似彻底。他喜欢虐待那些在他管辖范围之内的人，以此发泄他的不满情绪。

3.果断性：非常易于激动，顽固。为达到个人的目的，他挖空心思地耍阴谋。

4.功名心：追求名利的人。

5.积极性：追求偶然的好处，具有进取性的积极性。不是诈骗犯，但有这种天性。

6.组织能力：不是有才能的工人，在掌握事态时机方面，他没有远见，而是墨守眼前利益。

7.技术能力：不排除他有好主意，但是他不能把这些好主意运用到技术中去。

8.在待人接物方面的光明磊落性：貌似坦率，因为他跟绝大多数人陷入纠葛之中。同时，他是个伪君子。

9. 恰当的评语：非常不实事求是。

10. 发展前途：完全依赖于客观气候和您给予他的独立性的程度。如果您给他自由，听之任之，他很可能变坏。

*　　　　*　　　　*

这就是这份笔迹学鉴定书中扬·拔佳的面貌（跟他的哥哥、前任经理的看法完全一致）。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个评语。

如果说拔佳工厂今天还存在的话，那不是扬·拔佳的功劳，而是顶着他干的结果。这个工厂现在建立在与扬·拔佳和他哥哥托马斯的原则截然不同的原则之上。当然这一点指的不是企业的工艺。从根本上说，工艺还是原来的老一套，而且还扩大、发展了。

如果人们在工厂多转上几个钟头，参观了仓库、推销部门、设备和样品的话，那么脑子里就会装满了那些脚上穿的东西，按照一则谚语所讲的，脑子记不住，就得多跑路。

有些东西我曾记在脑海里，但又总是那么模模糊糊的，犹如一则从未被相信过、并久已被埋没了的童话一样。现在它又浮现在眼前：穿长靴雄猫的七里靴；失落在楼梯上的玻璃拖鞋，王子按它的小尺码重新找到和认出了那个烧火丫头；这儿是王子和神话世界里的其他漂亮的公子们穿的翻口靴，还有那些美丽的、纤足公主们穿的嵌有珍珠宝石的舞蹈鞋。

我也看到了现代许多较大而又现实的靴鞋。比如希姆莱冲锋队员们穿的装有六十个孔眼的系带靴子，冲锋队员们可以脚登这种靴子舒舒服服地踏着尸体前进，当然，他们也可以放心大胆地把活人践踏成粉身碎骨的死人，而被踩死者溅出来的鲜血不至于染污践踏者的袜子。适合于沼泽地区狩猎用的靴子，统

腰齐膝高，同样很结实，而且不渗水。

请不要以为女性的鞋子跟男性的鞋子有很大不同。恰恰就在冲锋队员的靴子队伍里我见到了象柏林选帝侯大街的夜间妇女公司①的那些女专家们穿的红色高筒靴，穿这种靴子的目的是把自己扮成精悍的女伴荐给那些万一有兴趣的人。她们的鞋子跟男性冲锋队员穿的一模一样，只不过后者的颜色不是红的罢了，因为他们想尽量避免由于这种红色而勾起对女同事们的心思来。

我也看到了某些曾一度听说过然而或许未曾亲眼见过的东西。比如高底半腰靴，我们当学生时演戏，为了扮演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就曾试图复制过的这种靴子。但我们无法穿上这种高贵的靴子迈步，穿着这种希腊鞋甚至连诗的韵律也忘掉了，那具有世界意义的舞台的木板在我们的脚底下呻吟。而拔佳却成功地把这种地道的靴子制造了出来，倘若我们当时能在他那里订购到这种靴子，那么我们一定能够使希腊的戏剧重获新生。可是，我们却未曾料到，这位竟能使古代五韵脚律诗穿上鞋的人就住在摩拉维亚。

几双女鞋勾起了我无限痛楚的回忆，这是透明鞋，我们上舞蹈课时，只有埃莉一个人穿过这种透明鞋，从那时起这种“透明鞋”就时髦起来，过了一阵又不时兴了；装饰在蓝白色鞋带上的小巧玲珑的贝壳，我曾一度在舞台演出时见过，但现在在兹林的拔佳样品博物馆里展出的这双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在石子铺成的大街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双了。啊，花结鞋呀，花结鞋，你消失在何方……

---

① 选帝侯大街，柏林闹市区一街道名；夜间妇女公司，指妓院。

我在足球鞋展览馆前面逗留的时间要比在女鞋馆久些。因为我有好多年就是穿着这种或者类似这样的足球鞋带球、传球，射中对方大门，或者射偏的。在布拉格，这种靴子叫做“践踏者”，这个词是我个人的独创，我曾一度期望，跟这个独创一起载入国际足球协会的史册。但无奈维也纳人拒不接受这种称呼，“因为它来自外省”；他们坚持用那个既不能说明什么又是错误的“布莱特恩”的称呼，于是我只好穿着我的伟大的“践踏者”退场了。

拔佳把足球运动视为对双脚敬重的一种举动，他一生的事业——制鞋业都为保护双足作了贡献。他在兹林的足球俱乐部招聘的是高价的“职业运动员”，托马斯·拔佳一直怀着为球队的十一名队员每人设计一双特制的足球鞋的宿愿。因此，今天我看到了一双不寻常的鞋，是为中前卫队员特制的鞋。为守门员做的手套，与其说是手套倒不如说是鞋更恰当些，因为这种手套要用纯粹的鞋带来系，同时，我在拔佳生产的司惠特绒衣上寻找防火的鞋底。

拔佳的体育爱好不仅仅限于足球，也表现在他在自行车上所下的功夫，同时还有——钢琴方面。把两个截然不同的器具在拔佳的爱好中撮合在一起的东西，是因为二者都有踏板！

托马斯·拔佳很早就在摩天大楼里施政了，然而他的世界观却还一直是那位老鞋匠的世界观。他那地下室的厂房仍然装在他头脑里，地下室的窗子比他的头还高，他以前就是通过这些窗子观察世界。而他的世界只是由匆匆来去的鞋和长筒袜子组成的。在他看来，人的一切无非都活跃在脚上。步行者毕竟是步行者，绝不是骑士，这一点是他从鞋的观点出发老早以来就洞察到了的，谁要是赞同其他方面的进步并为之尽力，那么不管他是

工会会员还是社会主义者，拔佳都把他当成人类的公敌，千方百计地迫害他，尤其爱把鞋楦掷向他的脑袋或者用脚踢。

如果说托马斯·拔佳虔诚地皈依基督教的话，那么同样他是出于一种外在原因。但是，假如这个学说的第一批布道者是步行进行传教的，那么无疑仅仅是借助于传教士的出名的双脚!

早期的巡回传教士所穿的鞋就是拔佳厂的产品，这是一个可以用来作宣传广告的最好证明，为此，拔佳毫无疑问愿意为所有到罗马去吻那几乎早已被吻掉了的圣彼得脚的朝圣者免费制做鞋了。

扬·拔佳为同时代名流的脚树立了纪念碑，在样品部展出。他的梦想是搞到一双墨索里尼穿过的圆筒靴，但碰巧他象他哥哥一样很不走运，他哥哥很想得到一双戈林真正穿过的靴子而没有成功。

那里还陈列着其他各种尺码的鞋，永远纪念那些使用者。听那位常给这些使用者量鞋的老鞋匠讲述关于给托马斯·格·马萨利克做靴子的传说，真令人感动。按这位鞋匠的说法，做靴子的大师竭尽其全部创造力，来制造他的杰作：把最高贵的双脚赐给最高贵的人。为了当人民的父亲、儿子和圣贤，托马斯·格·马萨利克长了这种高贵的脚，而且让它们带着他走动。

在工厂里展览着巨人和侏儒们的鞋或脚模，还有一些知名人士的鞋，第一任女经理娘家姓门西克的拔佳夫人的鞋就是这些知名人士鞋子中的一双。这里的许多东西使人忆起那早已过时的时髦、老式的工具和教具、图表、修脚和矫形、畸足和鸡眼，而避免、预防和根除上述的毛病就成了鞋匠的主要工作——墙上挂着一系列讨伐条例，也就是所谓的“十诫”。

在每一台机器旁，在跟工人们的每次交谈中，人们都可以听

到对双足臆想不到的东西。甚至理论方面的、最科学的学说……①

毕克明 译

孙风城 校

① 手稿至此中断。可惜，埃贡·埃尔温·基希的最后一篇作品未完成。——原注

华　人　城

(1927)

在堆积如山的铁桶、箱子、包捆之间，在一辆辆手推车、车皮、载重汽车之间，在林立的船桅、吊车、绳索之间，在整垛的筐子、袋子和一排排简易仓库之间，办事员们手里拿着记录簿在同船长接洽，商人们在同大副商谈，而工人们却扛着、拎着沉重的东西，或者拉着满载的车子，爬上埠头，走下栈桥。

西印度群岛码头比最东边的怀特查佩尔区①还要靠东，它们是几个巨大的内海，四边用围墙四四方方的围了起来。许多商船好象一支庞大的无敌舰队，塞满了整个港口——哪里是甲板的尽头，哪里是小道的路端？哪里是跳板，哪里是埠头？哪个是货仓，哪个是货棚？谁是海员，谁是码头工？实在令人难以分辨。在这里，泰晤士——伦敦之间的交通联络是多种多样，应有尽有的。

太阳早已落山，夜幕徐徐降临，数款、记账和点货已经看不清了。这时，弯腰驼背、浑身是汗的码头工人才迟迟收工。

他们一离开身着警服的税务官把守着的大门口，就点着自己的短烟斗，急急忙忙地奔向住处，去喝威士忌和荷兰酒，去呷茶和抽鸦片。

---

① 怀特查佩尔区为伦敦东部区名。

西印度群岛码头街是个奇异的世界。当你看到马拉着车沿着道轨奔跑的时候，往日的景象就会浮现在你的眼前，你会以为自己走进了一座小城——一座牧歌式的小城。面对这几乎是太古时代的交通工具，谁敢想象他是在这最大的交通城市里呢？还有那条把“帕波勒”区和“莱姆豪斯”区分开来的街道并不就是伦敦，而是一条码头街，同世界上所有的码头街一样，它是海陆间的跳板。上面飘扬着各国不同颜色的旗帜，宛若各种文字的旅店招牌。

这里的大门（门洞里陡立的木楼梯直通楼上）上方写着："Chinese and Japanese Seamen licensed Boarding house."（中日海员特设旅馆）旁边写着大概是同样内容的文字。它们好象由一把蘸了墨汁的弯刀砍上去似的，也好象是谁一怒之下，用一把蘸了墨汁的匕首把它们刺了上去。在这里，我们碰见许多中国人，也遇到不少黑人、马来亚人和印度人。

我们拐进科什汇路或彭尼菲尔德街，国际性就消失了——这里是中国。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中国人在消遣。他们有的以欧洲人很不习惯的姿势深深地曲着腿蹲在人行道上，有的望着窗外，和屋前的同胞聊着天。人人都是蜡黄的面庞，颧骨高高突起，使眼角向上翘起。他们头上没有辫子。这里的中国人已经同化了。他们脑后的头发按照美国人的式样剪得短短的，脸刮得精光，或者只留着英国式的小胡子。

在经营茶叶、炸鱼和其他食品商店的招牌上，写着白人根本无法辨认的蜘蛛腿似的古老文字。站在柜台后面经营生意的却是中国人。

甚至贴着英文标签的雪茄烟铺，也无不受环境的影响。橱窗里，在各种嘴嚼烟、旱烟、纸烟以及其他烟之间，散放着被留下

作为抵押品或交换品的各种各样的异国特产，如琥珀神像、青铜小立像、竹伞、玫瑰绸、漆盒、上面画着精细花鸟的道地的日本木桶、纸扇、镶着滑石雕柄的宝剑，以及瓷佛像和玉菩萨，有点头的，也有鼓眼的。

大部分中国人只在伦敦作短暂的逗留。

他们几乎都是司炉，船在码头停多久，他们就在这里待多久。在英国船上做锅炉工和帮工的中国人、爪哇人和马来亚人不下五万八千名。而这个数目——根据英国船工组织为了防止煽动所作的统计——每年要递增七千人。

有目共睹的是，这些小青年、成年人和老年人干着十分枯燥的工作，得到的报酬却少得可怜。难道他们那黄种人的脸色，在锅炉房里那永远灼热、煤灰飞扬的空气的熏蒸下还不够苍白吗？难道他们那蒙古型的方脸由于缺乏营养还不够消瘦吗？难道他们那蹲曲了的腿还没有象患英国病即佝偻病的小孩的腿那么细吗？

他们这些被折磨成骷髅的挣钱奴隶，几乎毫无所求的苦力，是多么想在陆地上、在大城市里快乐一番啊。然而，连续几个月的疲劳单调的航行与新的一次启航之间的间歇又是那么的短暂！

那些肆意梳妆打扮的姑娘们并没有去追逐时尚，大概是因为不敢违抗嫖客们久试不厌的嗜好。她们耳朵上戴着纯金的大耳环，眼睛下画着渐黑的眼圈，好象是出自施泰勒①之手。她们同中国人逐情斗艳。她们认识很多人，并叫得出他们的名字，用中文同他们交谈，不时地向他们要求这些可怜的生物称之为幸

① 施泰勒（1850—1923），瑞士画家。

福的东西。

她们如何从那些熟悉更温柔更纯粹的嫖妓生活的中国人身上获得幸福呢？或者说，为什么吉原①的樱花只为那些比烧锅炉的苦力更有钱的人开放呢？

大概是因为，狡猾的同化者张秃头在他那间经常有欧洲人出入的屋子里，只把那些随时被运到这里来的真正的妓女介绍给有钱的白相人。这些人既有令人骇闻的性欲，又有不让人在警察那里给他找麻烦的权势。

尽管有数百名当码头工、商人、摊贩、茶馆老板和店主人的中国人在伦敦购置了固定的房产，娶了家乡的姑娘，人们还是根本看不见中国女人的面。

这间屋子好象是一家茶馆，男人们不断地出出进进。在木楼梯上我们碰见了一个中国人，他惊诧得目瞪口呆。我们问他："That's a teahouse?"(这里是茶馆吗?)他只是点点头。然后他转过身来，跟在我们后面。

门敞开着，我们好象置身于云雾之中；整个屋子充满了烟雾。从一间用席子半隔开的卧室里冲出一股柔软物质的气味，香味扑鼻，沁人心脾。三个客人直挺挺地躺在草袋子上，把这种东西揉成小丸，放在灯上烤一烤，然后塞进很大的烟枪锅里。地板上到处蹲着人，有的靠着墙，有的就在屋子中央。很多人在玩一种多米诺——骨牌。一张矮沙发面对壁炉放着，上面挤挤插插的坐着十几个人。

他们一下子全转过头来，面对着我们这些不期而来的白人，好象一种圣诞节游戏中的人物，所有的头拴在一根轴上同时活

---

① 吉原，日本地名，在东京。

动似的。他们以一种不可抑制的紧张神情望着我们。他们的脸几乎碰到了我们的鼻子。但他们的表情决不是威胁，而是害怕。甚至在我们背后，他们那探求的目光也在看我们。

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大概是店老板，也许是店老板的儿子——搬来了凳子和小桌，深深地鞠了一躬，询问我们的来意。我们订了一壶茶，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来访合情合理了。店老板在桌边为我们沏茶时，很多人伸过手来要点茶叶，塞进他们的烟锅，似乎这里从来就没有过烟叶。

突然有一个人跳了起来，好象是受了孔夫子思想的启示，急忙奔到我们面前，从嘴里迸出他讲了上百遍的一句英语，他必须会讲的唯一的一句英语："You want firemen?"（您需要司炉吗?）这是一个信号。所有的客人都朝我们奔来："You want firemen?"

面对这黄色人种的一群，听着这些失业者不约而同的充满希望的喊声，我们心中十分沉闷。我们拒绝了他们。不，我们不找司炉。

他们失望了，又溜回原来的位置。

除了我们，再没人喝茶。为什么沙发放得离壁炉那么近?难道沙发上的客人习惯于面火而坐吗?此时的伦敦，灯熄了，茶馆门关了，壁炉里的木炭和大烟枪也点着了，这里把屋子隔开两边的席子也抽掉了，你可以望着噼噼啪啪燃烧着的炉火发呆，而他们占据着这些位置就是为了消磨时光吗?夜渐渐深了，炉箅子似乎变成了一切梦幻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一切幻想和希望都可以实现了。幸福以柔和的颜色从烟雾中出现，徐徐上升，反复变幻，一旦他从陶醉中苏醒过来，这幸福也就消失了，这些无可享受的生者的快乐，这些黄种奴隶的美好自由，一概随之消

逝了。

当作糕点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些小薄片儿是什么味道呢？殷勤观察的店老板发觉我们想尝一尝，就赶忙说："这是椰子做的。"

我们付了三个便士的茶钱，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了茶馆。一个中国人尾随我们到门口，在后面窥视。他们怀疑到处都有侦探，因为他们四面受敌。

这里的街头巷尾张贴着许多威胁恐吓中国人的大幅标语。"Get ready!"（准备好！）标语号召英国海员、司炉、挑夫、码头工和搬运工，"准备战斗，坚决反对蒙古雇工挤上英国船！武装起来，抵制黄祸！不同他们斗争就会失去面包！我们在中国征服了中国人，为什么在我们家里反而不行呢？"

标语下边画着一幅画：欧洲人垂头丧气地离开一只轮船，越过栈桥，蹒跚着步子向救济院走去；而中国人则排着长长的单行队伍，面带喜悦、讽刺、甚至胜利的表情走上甲板，接替了他们的位置。

不，那些我们在街上碰到的、或者在茶馆里如此强烈地向我们要求工作机会的中国人决不是这样；不，他们决不是要压倒白种工人。要说他们有一点点根本的要求，那就是他们不想比白种工人生活得更糟。他们可能是孙逸仙的信徒，希望社会的解放，但是讽刺和胜利感——象标语上画得那样——是绝对不会有的。要不是迫不得已，他们这些面黄肌瘦、衰弱不堪的人们哪里会背井离乡，流落异国；要不是困境所逼，他们哪里会从亚洲东部流落到伦敦的东郊！

全保民 译

蒙特卡罗赌场

(1934)

我年轻时听过这样一首歌谣：

我的男人在蒙特，
我的男人赌轮盘，
我在柏林他不管……

下面的词我已忘记，但这几句也就够了。寥寥数语，已将那俗气、轻浮和罪恶的气氛和盘托出：一个女人，她丈夫在蒙特轮盘赌场厮混！"蒙特"，这个简称听起来很亲昵。难道人们不会觉出这个守活寡的女人同她的蒙特卡罗之间的关系简直有些超出一般吗？

当然，"蒙特"是荒唐的，并没有什么"蒙特"。任何知道蒙特卡罗的人都不知道什么"蒙特"。难道人们想说奥伯霍夫时，会说"奥伯"吗？如果一位歌星唱道：

我的男人在圣，
我的男人在那里滑雪……

你能猜出这是指圣·莫里茨吗？

当我信步穿行那座名叫蒙特卡罗的既老式又时髦的建筑时，那首似乎已经被遗忘的歌谣一直萦回在我的耳际。它现在

的外貌，也许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歌谣听众所设想的那样吧。

谁要是发了财，也要等他去了里维埃拉[1]回来，能向别人大谈“蒙特”，才感到自己高人一等。特别是俄国商人和地主，只有把别墅迁到里维埃拉之后，才真正觉得自己是欧洲人了。到处都有这些商人和地主的足迹。甚至在十月革命后，尼扎[2]还出了一种叫《里维埃拉报》的俄文报纸，主要登载社会新闻。许多商号的招牌上写着俄文和波兰文。珠宝店的牌子上，加上了俄文字母拼成的“当”字，而在古玩店的橱窗里，尽是双十字架[3]、圣像、安德列亚斯勋章[4]和西里尔圣人[5]像章。

原来的火车站，也想时髦一番，这就是那座游乐场。房顶上张灯结彩，四周装饰着守护神，宛如寓意深长地向观众伸出金色的花束。

对面的旅店大门口，站着一个膀阔腰圆、身穿浅色号衣的黑人门房，奖章从胸前一直排到腹部以下。在“巴黎咖啡馆”里，人们坐在橙红色的阳伞下，游乐场前的圆形花坛(所谓的“卡芒贝尔”[6])正中，站着一个交通警察，头戴雪白的热带头盔，腰系金黄色皮带，戴着白色羔皮手套，穿着白色裤子，佩带着螺钿柄指挥刀和肩章，天蓝色的军衣甚至镶着金边。

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一个时代的情趣。在这个时代，绅士称女郎为“可爱的娅”，女郎不慌不忙地回敬一声“您这浪荡公子！”然后，讽刺小报用“绝妙！”或“败兴而去”报道这一对话。

---

① 里维埃拉，法国东南、意大利西北濒地中海地区，为摩纳哥公国所在地。

② 尼扎，意大利城市。

③ 双十字架，一些斯拉夫民族使用的十字架。

④ 安德列亚斯勋章，帝俄时代的最高勋章。

⑤ 西里尔圣人，西里尔(826—869)为古斯拉夫字母的创始人。

⑥ 卡芒贝尔，法语，一种质地柔软的高级乳酪，因产地而得名。

"蒙特"一直很热闹，不管多少次濒于倒闭，仍然游人如织，赌客不绝。到这里来的有富翁，有装门面的"富翁"，也有做着富翁梦的人们。

摩纳哥公国的全部国家开支，连同王室的家用，都由这家不起眼地叫做"海滨浴客之家"的赌场负担。摩纳哥这个国家，面积一又二分之一平方公里，由摩纳哥市组成，摩纳哥城又包括摩纳哥和孔达米纳两个区。叫做蒙特卡罗的，仅是斜对着孔达米纳港一侧的那座小山丘。这里，豪华的列车正好停在游乐场下面，缆车把旅客从车厢里径直送到轮盘赌台前。

赌室外面，左右两边，就是严禁轮盘赌和三十、四十点①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天下了。然而边界并不严，可以乘小汽车、小艇、公共汽车和火车自由来往而免受盘问护照的打扰。

在摩纳哥国摩纳哥市摩纳哥区，生活着禁止进入赌场的摩纳哥百姓。高踞于百姓之上的，是可以得到赌场赢利的君主、两个多世纪前已经绝嗣的格里玛尔第②王室后裔路易二世。当然，格里玛尔第家最后一个国王曾颁布一项法令，将他的女婿德·马蒂尼翁定为王位继承人。德·马蒂尼翁的头几代子孙很少到自己统治下的这个国家来。一来就是掠夺民财，所以，摩纳哥辖下的三个城市有两个——芒托纳和罗克布伦——造了反，宣布独立了。

后来的一个统治者查理三世，于一八六三年发给霍姆堡赌场老板布朗先生许可证，准许他今后五十年在公国剩下的这个城市里经营同样的行当。这样就大大弥补了领土方面的损失。

---

① 三十、四十点，一种纸牌赌戏。

② 格里玛尔第，意大利贵族世家，在意、法均有产业。一四五四年占有摩纳哥，一七三一年安东尼奥·格里玛尔第死后，由其女婿继位。

自此以后，君主们不再终生在国外度过了。他们那座直到六十年代还是衰落破败的古老的吉贝利内①宫邸，现在修葺一新，俨然是一座富丽的皇宫，矗立在一群政府大楼的环抱之中。两名禁卫军卫兵，有如活的像柱②，肩挎上着长刺刀的步枪，昂首挺胸，在大门前迅速走来走去，夜以继日、年复一年地走着，君主外出时也不例外。

前任国王经常在外旅行。阿尔伯特侯爷对深海研究颇感兴趣。在他的珍藏四周，他盖起了一座高大的楼房，在摆满了珍珠贝壳的橱窗里，可以看到拥有著名的珍珠首饰的人的肖像：伊朗国王、英国公主、国际闻名的舞蹈明星。在这里，既未标明他们怎样得到这些珍宝，也未注出他们怎样失去它们。阿尔伯特的第二个夫人玛丽·爱丽丝，是汉堡海涅家的女儿，海因里希·海涅的侄女。海涅本人没有见到结这门亲就去世了。

阿尔伯特的儿子、现在的国王一直未婚，却有一个合法的女儿。这位女儿的母亲，即法定的王位继承人、公主夏绿蒂的母亲，秘密地住在其非丈夫的宫中。她可以做一个女君主的母亲，却永远不能做一个男君主的夫人。因为她不但是个土生土长的非洲妇女，而且在路易二世还是王子和驻阿尔及尔的外籍军团军官时，她还是个洗衣妇。路易二世的父亲强令他认养了这个非洲女人生的女儿。阿尔伯特侯爷这一强硬态度，弄得摩纳哥人莫名其妙，搞不清促使侯爷这样做的究竟是父爱呢，是祖父之爱呢，还是普通的爱。

夏绿蒂公主有两个孩子，却没有丈夫。她同她的丈夫、法国伯爵彼得·冯·瓦朗蒂努瓦·埃·波利尼亚离了婚，又不得不

① 吉贝利内，中古时意大利的保皇党人。

② 像柱，西方古代建筑中，用雕塑的人像做的柱子。

按法国的愿望同她自己选择的第二个丈夫——意大利医生德尔马塞分开了。在武装到牙齿以对付意大利的法国行省阿尔珀斯——马里蒂默斯，让一个意大利人作驸马来执政或当夏绿蒂的未成年儿子雷米埃的保护人，这简直不可思议。

看来，就是最富有的王朝也有自己的烦恼。连布朗王朝也尝到了这种滋味。弗朗索瓦·布朗，摩纳哥诸侯的合作人和养父，原先是一家法国小饭馆的伙计，因为算账时出错(为自己捞油水)太多而被解雇，后来在交易所做买卖，又在巴黎坐了七个月班房。然后他到了霍姆堡，在那里他这个善于算计的人当上了赌场老板。

上世纪五十年代，霍姆堡和巴登—巴登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赌棍们的聚会之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人们知道，那里各种财富以至人的生命被用来孤注一掷，为赌场的发迹作垫脚石。霍姆堡流传着一首民谣，暗含赌场老板的名字："这盘红的赢钱，那盘黑的赢钱，盘盘布朗① 的钱袋都装得满满。"

布朗成了众矢之的。人们说他是多起自杀案和家庭悲剧的罪魁，骂他是陶努斯山区的吸血鬼。人民的愤慨愈演愈烈，渐渐危及他的生存了。在这种情势下，当一个名叫绿蒂·亨瑟尔的侍女(他在楼道里一时起意，使她怀了孕)扬言要把她被诱骗这桩丑事一五一十张扬出去时，布朗立即同她结婚了。

但是他觉得在这个地方呆下去凶多吉少。这里他处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稍不留神一步踩空，就会从昏暗的楼梯上摔下去落个粉身碎骨的下场。因此，当他四处寻觅新的地区，发现了摩纳哥时，就打定主意，只赚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的钱，而决不

---

① "布朗"法语为 Blanc，与blanc(白色的)是同一个词。

让本地人搀和进去。自然，从本地人身上捞油水，诱惑力也并不大，摩纳哥究竟没有多少人啊。

他把赌场建在叫做“斯佩卢加”的一座断崖上。因为这总让人联想到“赌窟”①，使他不快，就易名为“蒙特卡罗”，以表示他对他的保护人查理三世侯爷的敬意②。

一八七七年弗朗索瓦·布朗去世，留下现款两亿金法郎的遗产。他的未亡人野心勃勃，想把两个女儿嫁到比摩纳哥的统治者更高的贵族之家。大女儿露意丝嫁给了康斯坦丁·拉济维尔，二女儿小玛丽下嫁罗兰·波拿巴亲王。布朗太太（亨瑟尔氏）把一尊拿破仑一世的巨大胸像摆在他已故的丈夫的像旁，自豪地说：“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人都是我家的！”

罗兰·波拿巴只得答应她尽快在法国恢复帝制，宣布她为摩纳哥国王。罗兰亲王觊觎王位，不便让人说自己靠当赌场掮客过日子，于是同连襟拉济维尔和舅爷埃德蒙德·布朗商定，把游乐场改成了合股公司。每张票面额二十万法郎的八百张股票中，一百张让给了摩纳哥侯爵。不久之后，罗兰·波拿巴就将他的大宗股票迅速脱手，净得现款数千万，真是痛快之至。

游乐场的主管人是卡米埃·布朗——弗朗索瓦·布朗的私生子。他所操劳的事，就是让那些为他感到不光彩的亲戚，能从那个他们感到同样不光彩的来源捞到尽可能多的钱。理事会和股东们从不干涉他的事务。

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才算是干涉了他的事务了。那时，所有欧洲国家的边境线上几乎同蒙特卡罗赌桌旁一样熙熙攘攘，那时，几乎人人被迫为大人老爷们取乐而将自己的

---

① “赌窟”Spelunke与斯佩卢加Speluga音近。

② 卡罗，卡尔，查理，均为同一名字在欧美不同国家的不同形式。

性命当作赌注，在那样的时刻，卡米埃忧心忡忡地在唯一尚未关闭的、宾客稀少的游乐室——施密特厅缓缓踱步。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营业年度结算，赢利为三千万法郎，而第二年却不到一千二百万。

当世界大战对摩纳哥公国来说胜利结束时，情形也并没有好转。需要大量的投资，必须寻找一位财主。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里维埃拉阳光下正襟危坐的，不就是那位"神秘人物"吗？就是他，在世界战争中操纵各国为自己谋利，就是他，利用和平之机更加放手地做大宗军火生意。巴西尔·查哈洛夫眯起左眼——这是他著名的表情动作。他算计着：坦克和大炮所以是稳定的价值，是因为它们是建筑在人类的愚蠢这个基础上的。难道赌场不也建筑在同一个地基上面吗？

巴西尔爵士以一百万英镑入股，并提出了一些改良方案。卡米埃·布朗——赤褐色断崖上最后一个布朗家族的老板——不得不于一九二二年让位，不久就死去了。他的继任叫勒内·莱翁，关于此人的国籍和经历，就连他最精明的敌手也搞不清楚。

从科尼什即里维埃拉大路出发，有三条狭长的地段伸向海中。勒内·莱翁就在其中的一条——蒙特卡罗断崖上坐镇。路易二世在第二条上建起了他的官邸，而在叫做"翼角"的第三条地段上，悄然住着巴西尔·查哈洛夫爵士。这里常年是夏天，有着十分开阔的眼界。

也许，这三位老爷的思想在无穷远处是不谋而合的。他们可能都在想着：要是能把地中海这张绿色的桌子划成盘格，使太阳也绕着一个轴心转动，把太阳的光束都按部位标上号码……在这张桌子四周，沿着法兰西那碧蓝的海边，意大利那重峦叠嶂

的海岸，北非那蜿蜒错落的海湾，都坐满了客人……这时，用一张硕大无朋的耙子，把各人的赌注都搂到自己身边……那该有多美啊！

即便这样的宇宙之梦未能实现，巴西尔·查哈洛夫靠赌场仍然在短期内大发其财。他看准了时机，把股票全数转让给巴黎的达尼尔·德雷菲斯银行，捞到了最大的好处。“摩纳哥海滨浴场及外国人俱乐部合股公司”拥有四千七百五十万法郎的巨额资本，合票面额五百法郎的股票九千五百张。目前，每张股票的红利高达七百二十五法郎。

一八六三年弗朗索瓦·布朗先生同摩纳哥统治者缔结的协议，于一九一三年宣布延期五十年。一个封建的寄生家族，加上几个交易所投机商，希望一直到二十世纪末都能继续从到蒙特卡罗来朝圣的大群大群的蠢货身上捞取数千万利润。

靠山坡的公墓有六层台地，专门埋葬自杀者的一层最近取消了，现在只按死者的宗教信仰来加以区分。在公墓上方，山崖的顶端，赫然立着法国的“狗头”要塞。斜坡上可以看见一些围有灌木篱、圆亭点缀其间、歌舞升平的别墅；而那一边，王爷宫邸上方，飘扬着摩纳哥的国旗。

孔达米纳的一部分是卡梅利特贫民区。啊，贫民区！豪富的王爷那些免交赋税的臣民，这些在赌场附近生活的人们，不管怎样向外人掩饰，也难免让人看出是过着穷困的日子。就连资产阶级政党，也在重选“选举委员会”（它同市议会一样已宣布辞职）的宣传广告中忧虑地指出：“改变目前这种每况愈下的局面，消除骇人听闻的贫困，实为刻不容缓之举。”《拉弗尼尔》报甚至大胆向赌场老板开炮了：“勒内·莱翁先生执意不肯改变‘海滨浴场’（应该作：赌场）的开支账，他反对财务改革，他发的工资喂

不饱肚子，他还把本地人从摩纳哥赶走。这个异乡人，已成为摩纳哥的独裁者了。”

游乐场有职员三千二百八十八名，包括办公室人员、赌室人员、剧场工人、乐师、仆人、门卫和园丁。其中大部分人月薪不到六百法郎。只有赌台人员多得一些实惠，因为“头钱”归他们了：如果赢多了，赌客会把几枚筹码塞给管钱人，管钱人大声道谢之后，将筹码扔进桌边的窄缝里。汽车厂主西特罗恩则用另一种方式付小账：他所在的赌台的每个管钱人都得一张支票，凭票可以贱价购买一辆轻型小汽车。

为游乐场服务的有：经理、三位副经理、七名总监、三个秘书、十五个庄家、三十九个“桌长”、四十个副桌长，以及四百三十九个管钱人。

职员们被安插到这群眉飞色舞、闹闹嚷嚷的赌徒中间，在监赌的睽睽目光下，在令人窒息的乌烟瘴气中聚精会神地连续工作四个小时，休息四小时后，又被拴到这连轴转的轮盘上。星期日赌场照样开门，从早十点开始，中午不休息，一直到午夜或清晨两点钟。职员每星期休假一天。

赌台人员远非整个赌厅人员。穿着镶边的齐膝短裤和白色长袜的侍者不断地收拾烟灰缸，另外一批穿未镶边长裤的侍者则清扫一再撒满纸屑的地板。晚六点，壁龛和回廊里便点起煤油灯，以防停电时出现混乱，发生杀人、抢钱的事。

监察（这些人被叫做“croque-morts”，意即抬死人的）和其他便衣，有男有女，混杂在赌客中窥伺着。医疗室也做好了一切准备。

两个“相士”站在赌厅入口处，任务是熟记赌客的相貌，检查赌客的门票是否过期，防止任何人持其他票证混入，阻止已被

禁止入场者更名易姓再次入场，比如，不能让一个由于输光了家产而又已领取了离境费的人再度溜进来。

听，圆球在呼呼作响，这圆球对于那些即将进入自杀者坟墓的赌客，是最后一个球了，它还在那里呼呼响着。瞧，轮盘在转动，就要截获圆球了。赌场人员正在将赌客的赌本收归己有，筹码在各个数码、各种颜色和盘格上飞速地或者缓慢地转动着。嘴角叼着的香烟熄灭了，多少只手急忙把定局的数码匆匆写在一张研究赌法的表格上，多少双眼睛死死盯住绿色桌子的刻度、盯住那闪着暗红色微光的、呼啸的转盘。赌客面前摞着的筹码有的在增高，有的在缩小。谁的筹码光了，就唤过一个侍者来，给他一张一百马克、五英镑或一千法郎的钞票。侍者敏捷地到了出纳处，转瞬间就又回来了；他已经把钞票兑换成蒙特卡罗的通货——赌博筹码了。

轮盘赌的最低赌注是十法郎，最高额是两万四千法郎。三十、四十点的赌注，可以从四十法郎起直至六万法郎。有时二十五个轮盘和七处三十、四十点同时进行。每张赌台前坐着三十来人，在他们身后，密密麻麻地站着两到三排约一百多人参加轮盘赌。每年发出门票五十万张，其中包括季票和年票，持有这两种票的两万名赌客，只要他们的积蓄还够，是每天都来的。“游乐场规则”（在楼下大厅里十分醒目地张贴着）第三条规定：

衣冠整齐方能入场——

工人、不能自立者禁止入内。

如果球落在“零”字上，那么，押头十二个数码（一至十二）、中间十二个数码（十三至二十四）、最后十二个数码（二十五至三十六）或者“sur deux”，即押黑色和双数（或是相反）的赌注，就

都是赌场的了。此外，横跨六个数码（transversale de six numéros)、四个数码(carré)、三个数码（transversale de tros)或两个数码(à cheval),还有押在任何一个数码(en plein)上的赌注，也完全属赌场所有了。

如果定局是"零"，管钱人就不发给张三双份、李四六份、王五十八份赌注数额，而是整个赌台上的数千法郎，全部属于赌场。只有那些"押单"的赌注（黑、红、偶、奇、后半、前半）仍留在台上("en prison"),至下一局再作定夺。可是，如果押"零"，也不会比押中其他数码时赢钱多一些。

能赢三十七倍的钱吗？不能。三十六倍吗？也不是。把十法郎放在三十七个数码中的任何一个上，如果赢了，固然可以得到三百六十法郎，但其中包括赌注。所以只能赢三十五倍的钱。

早晨赌厅开门之前，赌本就发出来了。每张以十法郎为起码赌注的轮盘赌台得到八万法郎，以二十法郎为最低额的赌台得十五万法郎，那些"一百法郎台"则是四十万法郎。如果某张赌台上这笔钱输光，赌局便戏剧性地中断了，赌场可以再次向公众大声宣告："场方血本输光！"赌庄是唯一从公布其损失得利的钱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招徕新的纨绔子弟。

相反，象尼扎警察局局长那样的自杀，对赌场业务是有害的。这位局长将自己下属的薪金都输光了。在赌厅当众开枪自杀的那些亡命徒，他们的行为对赌场也是很不利的。

"海滨浴场"经理处想到古尔德事件时，至今仍心有余悸。爱尔兰准男爵维勒·古尔德和他的夫人在输光了财产之后，一九〇七年七月一天下午邀请富有的丹麦寡妇莱维到他们的别墅默西尼去。古尔德太太用斧子砍死了莱维太太，夫妻两人把死者装在一只皮箱里，在"体育俱乐部"赌钱到半夜，第二天带着尸体

逃走了。古尔德夫妇在马赛被捕，解回摩纳哥，被判无期徒刑。

一年后发生的另一起谋杀案，成为令人极为难堪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在通往芒托纳的路上，发现英国人乔治·阿伦德被杀害了。阿伦德先生几个星期以来确实财运亨通，但谁都知道他的钱每晚都存放在游乐场出纳处。另外，人们在死者的衣袋里又找到了他的钱包，里面还装着不少一英镑钞票，这一情况也说明不是谋财害命。于是，乔治·阿伦德是由于他的运气或赌法使游乐场受损才被杀死这一传言便不胫而走了。这案子至今仍是悬案。

每一次出事后，教堂里神甫们便厉声痛斥嗜赌成性的危害，报纸也把久已被人遗忘的牺牲者重又抬出来，但是，赌窟的营生却并未停顿下来。

在邻近的一个叫做博索莱伊的消夏村庄里，战前曾建起了一家竞争企业。虽然在这块法国领土上只准许滚球、巴卡拉和铁路① 这几种娱乐，但是侯爷的臣民、旅店职员和外地人的仆役也可以参加赌博，赌注数额比老游乐场低一些。卡米埃·布朗觉得自己的生意受到妨害，所以立即将新赌庄买下来，由代理人经营，直到他体会到他父亲那条不让本地人参加赌博的原则是多么正确。

"博索莱伊镇游乐场"自此改成了"加底脱"影院。在几间大厅里办起了培训管钱人的大学。这里讲授如何洗牌、旋转轮盘、弹出象牙球、把赌客赢的钱扔给他们，最重要的是，怎样把赌客输的钱收拢来。听课人必须表现出长于敏捷的心算能力。十月中旬学期结束，然后严峻的生活——赌场生涯便来临了。

---

① 滚球，巴卡拉，铁路，均为赌博名。

在游乐场里，他们把有价值的金钱收到身边，同时也招来了许多钦羡的目光。因为不少人认为管钱人能左右圆球的动向。但是，圆球一旦从他手里抛出，便风驰电掣般飞转三十到五十圈，气喘吁吁，渐渐减缓速度，最后，晕乎乎地在光滑的微凸的盘面上蹒跚，迟疑地寻求栖身之所。而当它终于眼看就要滚进某一个格子里去的时刻，却偏偏掉到另一个格子里去了，因为在球运转的同时，轮盘也在朝着相反的方向旋转。

伙同管钱人作弊对赌客毫无益处。有一次，一个玩三十、四十点的女客似乎是无意地把几枚钱币掉在地上。她的同伙趁这时全桌人的注意力分散之机，把一副预先准备好的纸牌悄悄塞到坐在他旁边的与他们同伙的管钱人手里。这伙人干得颇为仔细，并且四个星期内只耍了三次这样的花招。然而第三次就被当场抓住。此后，"阿迪松事件"便尽人皆知。如果钱掉在地上，所有侦探的目光就马上对准了管钱人。

一旦大声宣布"定局!"任何客人的手就不得在绿色的桌上做小动作了。当球滚到盘上一个凹槽里，管钱人的耙子开始在桌面上移动时，任何人就不许再下赌注了。

作弊的赌客发明了一种"弹弓领带"(索波特[1]刑事犯罪陈列馆有这种领带的别致的样品)，他们从这样的领带里向赢钱的格子弹出一枚筹码，桌对面站着同伙，宣称那筹码是他的赌注，于是得到新赢的钱。

纸牌大王科尔夫衣服里面藏着的橡皮管，在柏林警察局展览会公开展出，从而使更多的人起而仿效之前，是他的专利和秘密。科尔夫只要两腿一夹，便能把藏在衣袖里的一张牌吹到他

---

① 索波特，在波兰。

手里。这套装置是否也被人改装用来发送钱币，是否有人用这种办法在蒙特卡罗干过定局后又偷下赌注的勾当，以及抓获了几个人，就不得而知了。蒙特卡罗既无索波特那样的刑事犯罪陈列馆，也没有柏林那样的警察局展览会。

有些人跃跃欲试地想把伪造的筹码带进游乐场。真筹码（德国人称之为“齐普”[1]，英国人称为“计数牌”）的制造，同国家铸造货币一样，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然而这些筹码毕竟不过是印上一个数码的乳石薄片，仿造并不困难。即使被抓住，也不会有吃伪造货币官司的危险，也许根本就不会被告发，而只是被立即逐出摩纳哥。而整个摩纳哥又有多大呢？

虽然如此，干这种欺骗勾当还是不划算的。弄来真筹码，制造假筹码，然后秘密运到蒙特卡罗，这些费用都不是一天之内所能够解决的，更不用说当天还能得到相当的赢利了。如果拖到第二天，事情就有败露的危险。因为每天夜晚都要清点筹码数（不是一枚枚地数，而是按种类分别倒入各种竹筒计量器中），与早上发出的数目核对。一般平均会少百分之一，这是赌客带回家去，准备明天再来赌博时使用的筹码。然而要是筹码多于发出的数字，而且多得多，这就是一个警告了，于是对筹码进行逐一检查，直至将伪筹码找出来。

第二天上午，施密特大厅里一如往日。有人来到出纳处，想用一串假筹码兑换现钞，就被悄悄地带走了……

游乐场防范舞弊，并向人炫耀它的防范措施。纸牌是为蒙特卡罗特制的，由政府监制。三十、四十点用的六副纸牌，仅使用两次就送到煤气厂销毁。

---

① “齐普”(Chip)，原意为碎片，转义为筹码。

闭馆后，轮盘全部加盖锁好，以防有人锉轮子。每天清晨有一位工程师用水平仪测量来检验赌台和盘面是否完全吻合，防止向某一边倾斜。

总之，请放心，游乐场是不弄虚作假的。你输钱，都是堂堂正正地输的。你的一套赌法越是十拿九稳，你就十拿九稳要输。

你还没有一套赌法吗？那你完全可以花钱买来。在那许多成人娱乐用品商店里，可以买到各种分门别类编好的算式、图表，以及各种文字的这方面的著述。《轮盘和三十、四十点秘诀》；《轮盘戏最新大全》；《牌戏数学原理》；《成功之诀窍》；《达朗贝尔①级数》；《东方阿略特教授秘稿》；《清令吾大人的方法》。这些书，部分是封死的，只能买后打开；另一部分是装潢考究的学术著作，如马里尼·德·格里洛的大部头著作《运用赌博规律在轮盘和三十、四十点中获胜的科学方法》。

大多数赌客有一套自以为是新发明的赌法，其实都早有别人用过了。那种所谓"马丁旋风式"赌法是相当吸引人的：根据一个单纯的级数来下赌注，就是说，每次将赌注增加一倍，直到赌赢为止。然后再从押十法郎开始。最后一次赢得的钱总是比各次所下赌注的总和多几块钱。比如我押十法郎，输了，又押二十法郎，又输了，再押四十法郎。这次赢了，得八十法郎。而我下的本钱只有七十法郎。

赌注增加的速度真是快得惊人！输到第九次已经是五百一十一枚筹码了（1 + 2 + 4 + 8 +16+32+64+128+256），这相当于五千一百一十法郎。第十次，我得下二百五十六枚的两

① 达朗贝尔（1717—1783），法国数学家、哲学家。

番，即五千一百二十法郎。如果我铤而走险，押下这个数目而且赢了，那么赢得的钱数是一万零二百四十法郎，到这时为止一共投入赌注一万零二百三十法郎。经过这样漫长的、高价的赌博，最后赢十个法郎！

幸而（或者说不幸）我并没有这一万零二百三十法郎。资本家不必因为缺少现款而停止赌钱，不过，他也不能老象这样成番增加赌注，因为赌场规定了赌注的上限。

有一天，夜已深了，我坐在摩纳哥“兵器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里。我的邻桌坐着一位蓄灰色山羊胡子的男人。如果要让我说，我会说他可能比我大二十岁。然而我既未估计他的年龄，也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直到他同我说话。他说："Vous êtes Monsieur Kisch, n'est-ce pas?"①——"Oui,"②我泰然答道，虽然这种半夜三更在孔达米纳认出老相识的场面使我一惊。

“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你的中学同学呵。”——“哦，当然记得。”我立即回答，一边回忆着，“你是霍拉切克·文策尔！”——“绰号‘螃蟹’的贝内迪克，”他纠正我，接下去说，“今天我在游乐场看见你，当时就认出你来了。”——“你为什么不同我打招呼呢？”

他没有回答。我们把椅子挪近一些，谈起了布拉格的往事和蒙特卡罗的现实。他说他是战前到此地来的，他的妻子也来了。在这里，他赌钱，赢过一阵子，后来一输再输。一九一五年他加入摩纳哥军队，当时这支军队战时增员，达半营人。他的右腿不是真腿，是装上的假肢。他又说，现在已经不赌了。

“你刚才不是说今天在游乐场看到过我吗？”——“是呵，不

① 法语：您是基希先生吗？

② 法语：是。

过我已经不赌钱了。你今天玩了几盘吗？”——“玩了一会儿。”——“哪一套玩法？”——“随便玩玩罢了，没有什么套数。”——“其实也不存在什么套数，这一切全是胡闹。真要有这类路子，上头这家铺子①早就关张了。以前谁都以为加尔西亚的一套玩法是对路的。他不到四星期就赢了两百万。可是，到下一次游乐场的旺季就把几百万家产全输光了。如果他的那一套真是对头的，游乐场就会给他几百万，而不是发给那么点路费了。韦尔斯的情况也差不多。”——我点点头，说道：“最好是胡乱扔一枚筹码到盘上，不管哪个格子，走运就进财，倒霉就赔本。”

“不，不，”他急忙说，“这是胡来。那些游客才这么想。他们连寄存衣物的牌子都可以押进去。输钱时，他们会把剩余的筹码全部抛出，输他个精光。真可惜那么些钱啊！玩时还是应该长点心眼。”

长心眼？我提醒他，五分钟前他还说没有什么套数呢。“当然没有，”他大声说，“否则赌场就垮了不知多少次了。不过，赌钱是有要领的。如果照着做，就不会丢钱，甚至会不断赢，哪怕赢的不多。”——“唔，唔！”——“你不信吗？事情非常简单。连你这个当时姆拉泽克班上最差的学生都能懂得。——姆拉泽克是我们的数学老师，这你大概没有忘记吧。”——“你当时好象是姆拉泽克的得意门生吧？”——“对，我的成绩一直是优秀。可惜我别的功课不怎么样。我懂数学，所以我只相信概率计算。必须遵循概率的计算法则。”——“你是怎样做的？”——“我现在压根儿不干这个了。可是我知道那些法则。”

他拿起铅笔说道：“注意！你先押三十法郎看‘少’，就是三

① 指赌场。

十六个数字中头十八个。如果最后出来的数字是一至十八中的一个，你就赢三十法郎，对吗?”——“如果出来的数字是十九到三十六中的一个，那我不就输掉三十法郎吗?”

“不错。可是，你在押‘少’的同时，又押二十法郎看‘末打’，就是从二十五到三十六这十二个数字。押每一‘打’，赢钱都是双份。就是说，如果‘末打’出现了，押二十法郎出去可以收回六十法郎。”——“但要是另外两打中的数字出现，那我这二十法郎就输掉了。”——“但是，因为你从押在‘少’上的三十法郎那边赢得三十法郎，所以一文不输，反而赢十法郎。所以说，你下五十法郎赌注，总能收回六十法郎，不管出现的是头十八个数字中的数，还是‘末打’中的。事情就是这样简单。”——“然而如果出现的既非‘头半’，又不是‘末打’，我就净输五十法郎了。”——“非常正确。”“螃蟹”贝内迪克冷笑道，“看来你完全不象姆拉泽克所想的那样，对数学一窍不通。非常正确。如果既不是‘头半’，又不是‘末打’，那你就输五十法郎了。但是，”这时他学着姆拉泽克的腔调说，“必须出哪些数字才会输，你能不能给我背出来呢?”——“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这几个数!”

“瞧!基希·埃贡居然也意外地学会了一点东西。好，六个数。这样说来，输的机会只有六分之一。”——“除了这六个数，还可能出现零。”——“零不能考虑了。这是赌场的后手。人家得靠这个生活。另外也还靠那些胡乱赌钱的人。要是总想到‘零’，那就根本不能赌钱了。”

我于是放弃了“零”，但仍然没有被说服。我说：“照你说的方法，可能在六局中每次赢十法郎，但依概率，六次中会有一次出现那空着的六分之一，即十九到二十四中的一个数，这样一来五十法郎就输了。”——“可是由于有五次都赢十法郎，这一次的

损失等于零。每六次中一定要输到两次，赌注才算完了。你说得对，依概率每六局中第四个六分之一中的数只出现一次。但根据我们的经验，实际上出现这些数的情况要少得多。”

“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赌了呢？”

在我们这次谈话开始时，我这个同学给我一种谨小慎微的印象，谈着谈着他就活跃起来，露出一种优越的神态。现在，他又变成一个如果要我估计，我会说他比我大二十岁的人了。“为什么我现在不赌了呢？我现在不能了啊。”——“谁不许你赌？”——“我是游乐场职员。”——“你是管钱的？”——“不是……是职员……你是做什么事呢？是工程师吗？”

他就这样把话题岔开了。这时我才想起来，他是在游乐场的什么地方看见我的：是在厕所里。所以他不好意思和我打招呼。他，我这位中学同学中的数学尖子，这个掌握了最稳当可靠的赌博规律的赌客，竟是蒙特卡罗游乐场中地位最卑微的人。“不，我不是工程师，”我回答道，“我是作家，说句老实话，这是个倒霉透顶的职业。”

在那通向港口的斜坡上一所华贵的楼房里，“体育俱乐部”正在聚会。这个“体育俱乐部”同体育的关系，正象海滨浴客之家同海滨浴场的关系一样。另外，这也不是什么俱乐部，而是和游乐场一样的营业单位。

过去，出身高贵的客人们在深夜两点不得不离开游乐场之后，就到尼扎的“地中海俱乐部”继续玩乐。为了免除这群嗜赌成性的人深夜前往尼扎的旅途劳累，游乐场从拉济维尔侯爵夫人（布朗氏）手里买下了“蒙特卡罗”旅社，将它改为贵族和百万富翁专用的游乐厅。当人们不用再担心失去这部分顾客时，就放宽了严格的入场条件。

"体育俱乐部"昼夜营业，赌注数额不限，每张轮盘赌台营业资本都不下五十万法郎。三十、四十点赌台，起码赌注五百法郎，每天营业资本甚至达到六十万法郎，不需筹码，现金、支票均可作赌注，有时甚至说一句话就行了。俱乐部里设有巴黎一家大银行的支行，日夜办理发放贷款。电报局就在俱乐部对面，谁要是"巴卡拉"赌输了，就可以给家里拍电报："停止与工会谈判说明因南美订货取消本厂经济情况一筹莫展。"或是："不能继续亏损关闭水泥车间至迟周末解雇工人。"

夜晚，游乐场洁白的门面灯火通明，华彩辉映。远远看去，这浓妆艳抹的车站宛如一座仙宫。它就这样诱惑着海滨游人和海外旅客。

游乐厅里，景象与白天不同。女宾们穿着晚礼服，戴着各种首饰，指甲染得血红；男宾们身穿燕尾服，游乐场的副管事们也衣冠楚楚，坐在厅内一个平台上监视。(在掘金时代的加利福尼亚州，这把交椅叫做"Gambler's look out"①，监赌人手里拿着两支大手枪。)

环形烛台四周，烟雾缭绕，人们赌兴正浓，狂热地期待着那决定命运的偶然一瞬。人们手里没有牌，不洗牌、不分牌，甚至没有人想到如何使自己赢钱的机会多一些。在玩三十、四十点的客人那边，管钱人要向四、五个人提出要求，才有一个人摊牌。谁也不愿动手，谁也不想干涉命运的安排。

迷信和数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每星期五②，游乐场客人比平时少一半，就连那些严格按达朗贝尔级数原理赌博的人，这一天也不相信科学了。相反的情况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十

① 英语：赌客监视台。

② 耶稣受难日是星期五。

三”是不吉利的数；有许多人相信这个数是吉祥的，旅店也就专为这些人保留三间带这个号的房间：十三 A、十三B、十三C。游乐场橱窗里陈列着一种“treize”① 牌香水，还有呈“十三”字形的金光闪闪的领针和胸针。每月换一块比较粗糙的宝石，配以一种黄道带动物，作为游乐场的通灵玉。

然而，关于那个站在大门口给游乐场带来吉祥如意的驼背乞丐的故事，则完全是虚构的。谁也不曾见过那个驼子，也没有见过他的儿子——据说，乞丐死后，假驼背传给了他的儿子。游乐场里里外外都没有乞丐。谁如果就要变成乞丐，他就必须离开此地了。

施密特大厅里，一个长着蒜头鼻子、穿着高统皮靴、膀大腰圆的老头，看样子是个小农场主，瘫倒在角落里的长沙发上，他拚命揪头发，把它们一绺绺扯下来，接着又在衣袋里、在一个口上系着带子的小布袋里乱翻，不住地发出呻吟。过了一会，他踉踉跄跄地走出去了。——他东倒西歪，象一部低级趣味小说里的人物。我们从窗户里目送着这个绝望的人，他吃力地走走停停，向着公园方向蹒跚而去。

船上有人跳水了。船队坚定不移地继续扬帆航行。舵手们坚定不移地操纵着舵轮。船长们坚定不移地在驾驶台上瞭望。旅客们目光呆滞地倚栏俯身。他们要从这个“好望角”，远航到天涯海角。晕船的旅客在甲板上趔趄，一个绝望的人扶着软梯向下走去，他不得不这样“下船”了。

前厅里，一块一米多高的黑板上，不停地公布着四面八方拍来的电报。

---

① 法语：十三。

游乐厅里，有人正押“黑”和“反”，而外边却抄录着：开罗港区有四百人死于淋巴腺鼠疫。厅里有人输掉了押在轮盘中间一列数字上的一千法郎，外边，弗里乔夫·南森① 昨夜死去了；“二十三”第四次出现，十四万威尔斯矿工昨起罢工；华沙近郊火车出事，六十人丧生，司机在押，“红色、彩色赢了”；华尔街银行破产，第聂伯罗斯特洛伊郊区水闸开工，轮盘在旋转，圆球在滚动，海绵在擦拭，管钱人在发钱，电报来到，纸牌放下，一个世界在挨饿，一个世界在赌博，一个世界在死亡，一个新世界在建设中。先生们，请玩个痛快吧！

巴黎饭店的门灯，照亮了黑人身上的浅紫色号衣，照明喷泉的泉水，忽而逐渐幻化、忽而骤变色彩，水珠晶莹闪烁，时而象通红的火花，时而象钻石碎片。

公园里，玫瑰和黄大豆花吐着芬芳，龙舌兰和棕榈的枝条，傲然腾空飞起，又轻柔地缓缓垂下头来。在藤蔓和花朵组成的天蓬荫蔽下，绝望的人在长凳上用枪弹了结自己的一生。

赵蓉恒 译

---

① 弗里乔夫·南森(1861—1930)，瑞典极地探险家和科学家，192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金。

人在水银中，水银在人体中

(1934)

一

罐笼辘辘而下。上面一块木板，下面一块木板。中间是乘员和一辆小运输车。我们正在穿越的岩石成了罐笼的侧壁。蓦地，井筒裂开一个穹窿，我们猜度到左右可能是通路了。

在这个层段，这个罐笼（大概是这同一个罐笼）一天停靠一百次，已达一百年之久，所有的乘员、所有的材料从这个罐笼装进、卸下。整整一百年这里都是终点站。一支奴隶大军夜以继日地采掘着，但是有一天，这条平巷废弃了，提升井筒便继续向深处延伸。

过了五十米，一个黑黝黝的拱形支架跃入我们的电石灯的光焰。通往这条通路的入口非常低矮，直着身子就走不进去。这里没有人进出。谁在这个水平坑道里干过活，活儿干完后，他自己是不乘升降机升至地面的，而只是将他所采掘的矿石用升降机提升到地面。这个区域的矿工步行穿过一条他们不得已从他们在地面上的住地斜着向岩石里开凿出来的隧道下矿，下班以后又步行穿过他们的隧道回家。回到他们的营房里，即西班牙皇家劳改营里。

送到阿尔马登西班牙皇家劳改营里来的都是那些被判处终

身强劳的人。他们的终身并不长。在上一个世纪里，已经有许多、许多代人交相更替，矿山里含水银的空气缩短了监禁的时间。

那座旧监狱大楼至今还巍然屹立在阿尔马登的这块小小的方块形居住区之中。现在，这幢房子正在修缮，改建为工人住宅。从监狱通往矿山的那条斜岩石道现在不用了。

我们从囚犯干活的层段和另外的水平坑道旁边驶过去。每逢穿过一层废弃的坑道，罐笼便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它不愿继续往下行驶，想在它停留过成千上万次的地方再停一停，再接触一下那个工作平台，长期来，它一直是个活动延伸平台。可是牵引索不停。永远不会有人再踏上这蜿蜒数公里的迷宫了，它们早就被废弃了。

我们在石头之间，在板岩和石英岩之间向下潜去，几乎有五分钟之久。在圣·阿基诺矿的第十二层段，我们走出罐笼，这儿是提升井筒的尽头，虽然矿层还继续向下延伸着。

我们顺着一架笨重、摇摆不定的梯子向下爬，爬完这架又向下爬了一架笨重、摇摆不定的梯子，最后又爬了一架，——手里拿着矿灯这样往下爬，真累人，对一个不习惯这样爬梯子的人来说，就更难了。爬完三道梯子，我们到了十三号水平巷道，离地面三百七十米。

二

我们弯腰弓背摸索着道路。现在得留心坑顶，别让戴着一种钢盔似的帽子的脑袋撞到立柱上去。

矿山的条条血管在流血，凝血覆盖着矿山。血就是辰砂，而

那泪水，那在殷红、创伤的岩石上闪闪发光的泪水则是纯水银。有的地方水银拥塞形成小溪，一个水潭闪着银白色的光，隔断了我们的去路，这是童话里的泪水湖。

近处有采矿者在工作面采矿，我们听见金属打击石块的声音，听见钻孔机低沉的嘎嘎声。从主平巷向外，每隔四十米就有横坑道通向矿体。横坑道尾端悬挂着灯，四周灯影憧憧。

哪里岩石易破碎，哪里便能用十字镐开采。别的地方得钻矿槽。那个操作钻机的人背对着我们，在石头层上钻孔，炸得火星四迸。右边那个排气口越发使我们产生一种幻觉，仿佛我们就站在前方受到很好掩护的机枪阵地附近的散兵线上。

宽大的输送铁管——半路上我们曾在那上面绊了一下——并不连接在风动凿岩机上，否则，爆破时铁管便会炸毁。在离工作面五十步远的地方，管内物被导入一个橡皮管，爆破前很容易就能将它清理掉。

爆炸在交接班间的休息时间进行。炸药塞进钻孔，随后放进雷管及雷酸盐。雷酸盐就是$(CNO)_2Hg$，是一种水银化合物。水银炸水银，就跟人射击人一样。

三

在这下面工作的矿工几乎都是年轻人。一个个脸色苍白、身体瘦削，与别处的矿工毫无二致。他们一嘴完好无损的牙齿闪闪发光，隐瞒这点就是说谎。他们的手熟练地挥动十字镐，自如地操作钻孔机，谁不说这个，那便是骗人。

但是，如果不附加说明，人们在井上，在阿尔马登大街上见到了些什么，那便是更大的欺骗。如果不提历史和统计数字提

供的情况，那便是更大的谎言。

阿尔马登，这要比伊比利亚①的金矿还尊贵，尊贵得多；尊贵就尊贵在它的水银矿，它的水银供应全世界。

罗马贵妇浓妆艳抹，需要朱砂，这朱砂就是硫化汞。阿普杜拉曼三世，科尔多瓦②的哈里发③，给他那位住在梅迪纳特·阿茨·察拉别墅里的情妇建造了著名的月光喷泉，那月光就是水银做的。十五、十六世纪的德国雇佣步兵们用水银驱除身上的毛虱，军官们则用它驱除梅毒。炼金术士的主要万应灵药是水银，它既是金属又是流体，压根儿就具有魔术般的魅力。

不仅江湖医生用水银来治疗所有内科疾病，科班医生也如法炮制。一小丸药，从头部前方吞进去，不变形状、不减份量又从底部后方排出来，它会沿路荡涤所有的杂质，看来，这种想法颇合乎逻辑。

任何流体都适宜测量温度，但是用比重最大的流体，则所需的流体量最少。所以，几百年来，任何一种温度计管体内装的都是水银，气压计和液压计以及整流器也是这样。

自古以来，兔皮做毡帽之前都要用硝酸汞硝皮。许多颜料，尤其是船体水下部分的油漆，如果不含水银，那就毫无用处。

而所有这些水银都来自那座伊比利亚的矿山，它没有名字，就是那么座矿（阿拉伯语：阿米·马登）。只有奥地利的伊德里阿和意大利的蒙塔米塔才有竞争者；然而，那儿的储藏量与西班牙的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阿尔马登的矿层厚达八米至十四米，矿石平均含量达百分之十三，而在国外的那几个矿里，矿

---

① 即伊比利亚半岛，也就是比利牛斯半岛。

② 西班牙地名。

③ 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的称号。

石含量几乎还不到百分之零点八。

在蒙塔米塔和伊德里阿，在地面进行蒸馏作业会吸入水银蒸汽的工人，过一些时候便会被派去作井下作业，以便使他们在井下休养生息。阿尔马登的情形则正好相反，那儿，地下岩石散发出的有毒气体比冷凝后的水银散发出的有毒气体更强烈。阿尔马登是地球上最丰富的水银矿。

拥有划船奴隶①、即无偿矿工的阿拉贡宁王室、卡斯蒂林王室、哈布斯堡以及波旁王室的信奉天主教的国王们，他们不如他们的腓尼基、希腊、罗马、西哥德族以及阿拉伯前辈国王们幸运，他们债台高筑，只能用水银、用还未开采出来的水银来支付债权人。早先，阿尔马登被当作领地封给了协助宫廷作战的圣殿骑士。后来，恰好是在开采西班牙殖民地新发现的银矿离不了水银的时候，这座矿便典给了奥格斯堡的福格尔家族，作为福格尔家族向卡尔五世提供一笔借款的抵押品。

为开发南美，有一个半世纪之久，西班牙一直向福格尔家族购买他们用西班牙奴隶从西班牙土地上掠夺去的东西。合同终于到期了，西班牙试图自己来经营管理这座矿，他们让杀人犯和政治犯作为无偿劳动力去采矿。然而，一八七〇年，西班牙向英国罗思柴尔德家族借了一笔四千二百万比塞大② 的国债，阿尔马登便作为抵押品典给了罗思柴尔德家族，而且必须每年偿付三万二千瓶水银。

为了达到这样高的产量，矿山经理何塞·德·莫纳斯特里奥到中欧去考察了最现代化的矿山设施，买了一台瓦特式蒸汽机和别的器械。生产指标完成了，却带来了副产品：矿工们简直

---

① 中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强迫奴隶在战船上划船。

② 西班牙货币名。

是成批成批地被毒气撂倒了。

工人们成群结队聚集在炉前抗议这种集体屠杀。莫纳斯特里奥经理带着他的工程师塞瓦斯蒂安·布塞和他们发生了对抗，两个人都被杀死了。这是一八七〇年左右的事情，当时正值西班牙第一共和国时期。即便君主专制王国也不会有比这更严酷的报复了：共和国用十个绞刑架绞死了十个阿尔马登工人。

被绞杀者的名字不得而知，准确的日期不得而知。关于阿尔马登的这次叛乱，阿尔马登史上只字未提，矿山博物馆里没有一张图片，没有一件纪念品。西班牙大百科词典，有关社会运动的各种专著都丝毫不提这次起义。然而，它却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捣毁机器运动。这场运动的斗争矛头并不是指向挤掉了工人饭碗的机器，而是指向大量制造放毒谋杀事件的机器。这场捣毁机器运动的牺牲品不是那些机器，而是引进那些机器的两个人，以及对此进行了反抗的那些人中的十个人。

关于这件事，书本上没有记载，阿尔马登工人也毫无所知。这场骚乱以及那些被处决者的同时代人没有一个活着的了，也许同时代人的下一代中也没有一个活着的了。

阿尔马登没有高龄老人。

四

我的陪同用手指着晚间在卡纳莱哈斯街上行乞的一位老人，说道："这是我青年时代一位朋友的兄弟。"

我没有马上明白过来。"你是说他的祖父吧？"

"不对，他才三十岁。"

我问他，向那位三十岁的老人打量了一眼。他站在那儿，向傍晚行进在卡纳莱哈斯街上的装饰车队伸出双手，嘴里没有牙齿，脸上没有血色。确实是一双乞求怜恤、令人怜恤的手！这双手迅速地来回摆动着，仿佛不属于那个疲惫不堪、无精打采地靠在一堵墙上的躯体似的。

这种瑟瑟缩缩、颤颤抖抖的人——他们不是战争的牺牲品，而是水银的牺牲品——在简易平房区的宅旁路边比比皆是。贫血、没有牙齿的老人们哪，他们也许也只有三十岁。

一周岁或五周岁的小孩——这儿谁说得清楚一个人的年龄——由哥哥、姐姐们用有小轮子的木板箱推着散步。两颊那样凹陷，一张张小脸那样少年老成、令人绝望！

倘若我的陪同对我说，这些小孩已经在矿下干过几年，我不会觉得奇怪的。其实，他们下矿的年头还在前头呢。

五

我们凭借着我们的矿灯的黯淡灯光，看见矿工们正在凿或钻辰砂，在这些矿工们之前，在别的时期，在这儿干过活的有：腓尼基人划船奴隶，希腊奴隶；被阿拉伯人抓住的脚上脚链和锁球丁当作响的异教徒；受鞭子驱赶的农奴。现在的矿工们只有一个出口可以离开矿井：进入监狱的入口，只有一个出口可以离开监狱：进入矿井的入口。

奴隶劳动和囚犯劳动终于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雇佣劳动。西班牙共和国的一些西班牙人开入矿井，有一天，人们将其中的十名绑上绞架，以儆效尤。

不多几年前，阿尔马登的职工还是免服兵役的。没有这个

特权，就不会有多少人到这儿来找工作，就不可能保护矿山，防止劳动力流失。这条法令今天已经废除。“西班牙共和国义务兵役制不容许有例外。”当失业现象到处可见的时候，尤其如此。那时候，什么工作都会有人干。水银矿里的工作也有人干。

阿尔马登没有幸免于危机的侵袭。危机潜伏了几个世纪，渐渐地、不知不觉地临近了。罗马的上等妓女只用靛蓝和泰尔红紫[①]涂红嘴唇和面颊勾引男人，她们上哪儿去啦？热恋着的哈里发们用喷涌的月光欢娱他们的宠姬的心，他们上哪儿去啦？谦逊的江湖医生对付便秘、痛风以及妇科疾病一概都用小水银球，他们上哪儿去啦？宫廷炼金术士们用干水，即“狄安娜雨”[②]以及别的水银魔术向负债累累的君主们灌输希望，他们上哪儿去啦？

消失不见了，这一切，还有别的东西，都消失不见了。洒尔佛散[③]取代了油膏治疗法。有了不用水银的气压计和温度计，也有了涂锡的镜子。直至最近还一直从它们以往的母国购买水银用以开采它们的金矿和银矿的中、南美洲诸共和国，如今已经自给自足，并且独立自主开采着他们那含矿量低的辰砂。

用作防腐剂和用来作补牙的填料所需的水银，机械学上旋转泵以及自动关断电流所需的水银，这方面所需的水银在世界消费量中所占的份额是无足轻重的。有人计划在大型企业，尤其是在船舶上不汽化水而汽化水银，然后再使其冷凝，因为水银占的空间少。迄今为止，这个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

---

① 从海螺中浸出的紫色染料。

② 狄安娜为古罗马狩猎女神。在古代，狄安娜又是水银的别名，所以，狄安娜雨即水银雨，本文第七节对此有所描述。

③ 即六〇六。

尽管如此，阿尔马登却并没有破产。有一种工业需要水银，这种工业没有破产这一说，作为水银的用户，这门工业足以抵得上所有其他工业。猜中了，军火工业！我们在这里看到人们用以爆炸水银岩石的那种水银化合物，即雷酸盐，枪弹、炮弹、炸药筒的雷管就需要用这种水银化合物，这方面的用量是大的。

阿尔马登的统计数字一直可以追溯到一四一九年。从中世纪的某一年起至一九二五年止，每年开采了多少，这在经理处大楼里的一个图表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这五百年里，共生产了 5527899 瓶（奇怪，只差一瓶便是个整数了），每瓶 34.5 公斤，这相当于 2847163 吨辰砂的开采量。在七十年代不得不作为年贡交付给罗恩柴尔德并成为安置新机器和十个绞架的诱因的那 32000 瓶创造了最高纪录，在这以前，产量从来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到了一九二八年，这个纪录才被打破，产量比这翻了一番还多：70 000 瓶。

这已是过去的事啦，今天，世界的需求量就这么多，阿尔马登满足世界需求量的一半。在卓有成效地更新机器设备、实行企业合理化管理之后把产量减少百分之五十，这意味着要大量裁减人员。

当然，被赶走的工人数不止只是人们想要裁减的职工数，人们解雇所有那些不再是最年轻、最健康的人，而招收年轻、健康的新生力量取代他们。

有充分选择的余地，应招的人数远远超过矿山需要的二千五百人，超过一百倍，一千倍，几乎超过一万倍。全世界有几百万失业工人，他们全都毫无保留地同意以任何工资在任何条件下去从事任何一项工作。绝望的情绪攫住了那些被解雇的和枉自寻找工作的人。

如果说早先是用镣铐把人束缚在喷吐着腐败毒液的岩窝里，如果说后来人们之所以被拴在这里是因为监狱墙和毒液墙之间只有一条路，但没有出路，那么，此后人们受雇于水银矿则是为了可以不到南美或北非的征战中去送死，人们最终下决心干阿尔马登的活，因为没有别的就业机会(饥饿威胁着全家人的性命，而矿山的毒物只杀害一个人)。在二十世纪，经济颠狂到了顶点，得用强制的方式才能将人赶走，不让他去干囚犯强劳干的活，大批人怀着渴念奔向死亡的深渊，可是他们却欲死不能。

谁能想象得出这样一幅情景来呢：一间宗教裁判所的刑讯室，受拷问的人战战兢兢，生怕人家松开那夹拇指的刑具，剥下他们的铁钉甲胄①，把他们从伸展床上②赶下来。黑压压一大群人拥了上来，怀着妒忌的心情望着那些正在受刑车辗压、受铁钉刺扎、被戳在尖木桩上的人，苦苦哀求，也让他们去尝尝那个滋味。

"每个人都会轮到的，"拷问的人对那些提出申请的人吼道，"你们都滚到地狱里去吧！"

到地狱去？进门后放弃一切希望，那儿的这个老规矩肯定早已荡然无存了。

今天，那儿一定只挂着这样的牌子：

客满。

六

水平坑道里的矿工们大多是新雇来的。看他们的模样，似

① 一种刑具，形状象甲胄，内有铁钉。

② 将受刑者绑在床上，用强力从不同方向拉紧其四肢的一种刑具。

乎小时候不曾在木板箱里被人推着在阿尔马登串街走巷。但是不用多久，他们看起来大概就会象那些傍晚在卡纳莱哈斯街上向装饰车队战战兢兢伸出双手、被误认为是老人的人了。

现有的矿工中，有 36.2%患有慢性疾病，其中 29.9%患汞中毒。已经发现，蒸汽通过粘膜、呼吸器官和伤口侵入身体；可能消化器官也传染疾病。

后果就是牙齿脱落、贫血、心力衰竭、早衰、神经系统紊乱（四肢一动起来就会产生痉挛状的颤栗）、口腔发炎不断流口涎、结肠病变。

这方面有统计数字。对五百三十五个经常下矿的工人进行了体格检查，他们年龄在三十岁以上，已经在矿上干过好几年。经检查，其中只有二百五十一人被认为身体健康，他们的健康状况是这样的：七十五人完全健康，六十九人患过汞中毒现已痊愈，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一百零七人则留有后遗症。

不少于二百八十四个受检查的人显示出中毒的症状，其中十六人为轻度中毒（脸色出奇的苍白，牙齿脱落，身体虚弱，心脏病以及早衰），其余二百六十八人有严重的四肢颤抖、发炎的汞中毒现象以及内科疾病。

一列统计数字，够令人吃惊的了。然而，当受检查的人在水银矿下工作的年月，还有许多别的人跟他们在一起采矿，有的时间短一些，有的时间长一些。这些人未能一同受到检查。他们再也不下矿了。

七

开采下来的矿石块被提升到地面。那上面是个运输平台，

矿工下班后就打那儿走出罐笼，这个运输平台只不过是矿石的一个中转站，有一条架空索道将矿石继续输送到矿山的冶金区段。

倘若你想伴随着这材料，看看它所经历的每个阶段，那么，要实现这个奇思妙想，你就得委屈着点了。坐在一辆悬空的运输车里可不是一件开心的事。

方才还在创伤殷红、泪水晶莹、幽暗而喧嚣的地下迷宫里游来荡去，现在却已经悬浮在天空和草地之间飘移起来了。山脊呈塔尖状锯齿形的灰绿色群山蜿蜒伸展框在平原的四周。这是一块瘦瘠而宁静的土地，羊在吃草。

地下深处埋藏着水银，其年代比人类的历史还要久远，它象一条吐着毒焰呼噜怒吼的龙抵抗着侵入者。双方都是胜利者，又都是失败者。随同我一起行驶着的是一块块矿石龙体，流着血、哭泣着的块块矿石，在我的下面，人们中了它的毒，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空中索道从一座文艺复兴门上空越过，这是蒸馏段的大门。中间那个拱门的上方凿有西班牙的国徽，四周镶着羊毛链。

停下！一辆辆小车蹒跚地停住了，我的那辆停在紧挨着废石场顶端的地方。矿车倾斜，矿石掉进料场，乘客沿着废石场的斜坡往下走。

工人们将辰砂石块按其含矿量的丰富程度分类整理，并将其装上吊车，由吊车将其堆叠成堆。含矿量约为百分之二的矿石称作贫矿石，富矿石常常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含矿量。有一座小山丘全是碎砖烂瓦、旧建筑用石、灰浆——拆毁的冷凝室的瓦砾；那些冷凝室在它们进行工作的过程中将许多水银原子吸进了它们的墙壁，现在，它们必须将吸进的水银重新交出来。水

银是一种昂贵的物质，也许有那么一天，如果消费要求这样，连埋葬死人的墓地都会有人去开采的……

在这里一座西班牙阿拉伯时期①的立式焙烧炉，还留下了陶土做的大腹蒸馏器，这些容器用长长的绳索拴住，一溜儿放在流槽里。这些古希腊罗马式的生产资料使现代的生产资料越发显得气势宏伟。

八座连续煅烧炉巍然耸立，象一队远洋巨轮。全部巨轮都是一个型号（茨采尔马克－斯皮尔克体系），可是每艘巨轮都各自在船首刻有自己的名字，即一位董事或经理的名字。每座炉子吞进含矿量比率不同的矿块，其最后产品被导入专用的水银仓库贮池。

一条八十米长的传送带源源不断地送来岩石和煤，550度高温的锅炉里辰砂在熔化，水银在气化并从那里逸出——表面看来似乎完全逸出了。

这地区耸立着岩石般灰色、岩石般高的波状管道装置。水银在管道里垂直上升，它这么长时期的受到束缚，如今欣然成了气体聚集体；随后，它便沿着最近的那堵岩石墙降下，又上升，又降下。四周气温越来越低，这个挥发性元素心情越来越沉重，它丧失了飘浮和振荡的能力，末了——在冷凝管里正好走完了二百米——它疲惫地流进一个贮池。

是的，是流进。它已经变成了它现在的状态：一种液体。所有液体中最重的液体。那珠母般闪闪发光的湖，湖畔的看守想向来访者证明这一点。他将一个五公斤重的铁秤砣放到水银的表面。然后，他骄傲地望着你；瞧，那秤砣象纸一样漂浮在上面。

---

① 公元七一一年，西班牙曾被阿拉伯人占领。

他用一块干白布汲入这种液体，将那块圆鼓鼓的布在那人工湖上空挥舞，刹那间，升起了一圈闪闪发亮的光束，犹如一个祭器。它刚出现随即便又消失，因为这阵狄安娜雨一会儿功夫便下完了。

我得使劲压才能把手插进贮池里去，就好象是一个水平面安装在一个弹簧上了，我把胳臂连同衣袖也伸了进去，一切都依旧是干的。工人担心地问，我袖口上的钮扣是否是金质的。如果是金质的，或者哪怕只是镀金的，那钮扣也会溶化的。

“您也可以把脸浸到里面，”他怂恿道。

这不会损害健康吗？

他笑了笑，就象人们在战壕里对新兵的问题和举止惯于发笑的那样。

“啊，不会的，浸那么一回，这没有什么危险。”

八

在阿尔马登，人们把那幢大楼叫作经理大楼，因为跟周围的工人住宅相比，它确实是一幢摩天大厦。经理就在那幢大楼里办公。马达里亚加先生是属于水银矿的矿山学校的正式校长，国际应用心理学联合会名誉主席。

我们谈论到矿山。井下有些事儿引起了我的注意，那简陋的矿灯没有保护罩，没有安全设施，提升井筒没有扩建。

“喔，这些都够用的啦，”经理说，“一百年来我们没出过什么灾祸，爆炸性气体辰砂矿石里是没有的，严重事故极为罕见。要是没有水银蒸汽就好啦！”

水平坑道里的通风机调到了600个立方米，输送的空气是

否太少了？

"通风机每分钟可以输送1250立方米新鲜空气，但是将通风机调到最大功率，这不好，这会挥发出更多的水银气来的。"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中毒呢？

"没有办法。只能用限止每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来减轻对工人的影响。矿工们每隔三天上一个六小时的班，一个月只在矿下干八次。他们一年干两个月的农活，矿上有一个占地一万公顷的农庄。蒸馏段上的职工分成七个班，谁今天上了第一班，明天就上倒数第二班。日夜都开工，四班倒，每班六个小时。"

职工们上班期间能喝到牛奶吗？

经理从一旁打量了我一眼："您是说象在俄国那样？"

嗯。去年我去过苏联，那儿化工厂的工人每隔两个小时就可以喝到一杯牛奶。这应该说是最好的解毒剂。

"西班牙工人不会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

那么防毒面具呢？

"西班牙人不会戴着防毒面具去干活的。况且，您也知道，有毒的蒸汽并不是经过呼吸器官侵入人体的。那样的话，工人还得戴手套、穿密闭的衣服罗。这在俄国也许能行得通，西班牙人个性太强了。"

唔，就这样我们友好地分手了。

在里院，在大楼的这个漂亮的院子里挂着劳动保护标语牌，这类标语牌一般工厂里到处都有。醒目的图画配以这样的文字："工作时抽烟有损健康。"——"谨防酒精中毒。"——等等。

阿尔马登的矿工不得不在那条无形的、地下的、吃人的蝮蛇① 的洞穴里干活，这条毒蛇神不知鬼不觉地咬着矿工的身体，

① 一种毒蛇。

毒害着他的骨头、血管和肌肉。它无处不在，可是标语牌，善意、体贴入微的标语牌，却警告生命受到威胁的人当心其他的危险。怎么，你吸烟？怎么，你喝酒？

张荣昌 译

访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

前不久参观战后重建的工厂企业，我深受感动；现在看到这些古老熟悉的笔迹，更是惊叹不已。看到他们亲笔起草的底稿上的删改补充，我知道了那些早已熟读的、一字难易的经典著作是怎样反复修改而成的。在我面前陈放着流传很广的文章，我看着这些匆匆刊登在报纸上的最初形状，觉得是直接感受了它们的革命号召力。他们撰写这些文章所利用的材料可以堆积如山，而文章激起的反驳、抗议又简直能汗牛充栋；我看着看着感到头昏目眩……

我走下楼去，坐在莫斯科河畔，细细想象这条灾难深重的河流跟那恬静安谧的伊尔姆河①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照。我在参观了伊尔姆河旁的歌德—席勒档案馆之后，曾在德国旧精神财富的自然保护区——魏玛小憩。

我刚离开的那所大厦，也是为纪念两位德国思想家的业绩而建立的，——但是从来没有王公贵族赐恩于他们，也没有戏剧观众向他们欢呼喝采；他们从来没有威风凛凛地步出妇女广场上的私邸；他们从未能沉浸在甜蜜热烈的爱情之中；没有人把他们尊为文艺之神为他们建立纪念碑；他们的著作不能算作德意志民族的家传遗产和财富；高级教师说到他们的名字时没有赞

① 伊尔姆河，德国中部河流，起源于图林根的山林区，流经魏玛。

叹的神情；小学生不必怀着崇敬的心理背诵他们的生平。

在警察追捕和恶意中伤之下，他们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他们以科学为大炮，以当前的事件为小口径枪枝。同世界列强的国际阵线作战，最后死于流亡之中。

我坐在莫斯科河畔码头的斜坡上，参观所得的印象还十分深刻。两位社会主义者受尽迫害、敌视、诬蔑、贫困，他们却又坚韧不拔，始终不渝，这种精神还在激动着我的心。莫斯科河水在我脚下流逝；伊尔姆河又是另一番景象。我怎么会想起魏玛来了呢？一定有什么可以两相比较的事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吧？世界上有什么希奇古怪的圣地和纪念名人的奇特庙堂我还没有见过呢。不是买一张门票就能参观某个皇帝在其中束手就擒的农舍。我不是看到过国家陈列的汽车，某个王储在其中被人暗杀。我不是在残废人旅馆展览厅看到人们在观赏一辆普普通通的火车车厢，它只有一点与众不同：在里面递交过求和照会。我不是看到过家族墓地、祖先遗像陈列室、各种各样华丽的床（这是某个王公夫人同她的面首或是某个王公同他的情妇关怀臣仆命运的所在）、摆满古老制服和收集来的勋章的高楼大厦。在某个显赫人士脱难之地（那灾祸原来就是并非不可避免），建起了耗资巨大的奉献教堂；某个狡猾政治家的诞生地，至少是某个诗人的诞生地就象庞贝城的古迹被人精心保管。时装、舞台布置、芭蕾舞、首饰都有专门博物馆……可惜从未建立一个巨大的研究所，用以纪念并学习这样的伟人：他们看到社会形式极不合理，说出了对此深感痛苦的心情，并且在书房里、在街垒旁显示了为改变人类苦难而奋斗的决心，因此受尽折磨。不会的，绝不会有人想要使这类伟人的丰功伟绩永垂青史，帝王、政治家、官吏都一心

要人忘却他们。从未建立过这种研究所。否则我不会直到今天在莫斯科的马恩研究所才能看到我用脑用心所没有整理成的东西，以致心情激动、精疲力尽地坐在莫斯科河畔。否则不会在五年之内专门收集十多万册书籍文献，其中包括许多曾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小册子、绝版书籍、孤本珍本书籍、十六世纪的原版大开本书籍以及四百篇手书的文件。如果世界上早就有一个公开的研究所对这一工作表示兴趣，那么即使新俄国为了研究他们国体的科学基础花费了大量经费，即使马克思研究者梁赞诺夫花了不计其数的钱财表现了无与伦比的热情，他们还会取得什么成果呢。

我离开德国已有好几个月了，现在来到莫斯科河弯道旁这幢大楼，它原是贵族多尔戈鲁科夫的府邸。在书柜前我看到里面放着一排德文书，全是有关莱茵问题、有关摩泽尔河和科隆城历史的著作，因为那里正是《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殊死斗争的地方。有关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汇编集、小册子、传单都按编年史排列着；从那次革命到社会党各大事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到在维也纳建立赤卫军的材料这儿都能看到；这使我，一个退伍的奥地利军人，感到十分惊讶。一期不缺的《前进报》乃至它的前身《柏林人民报》以及关于普鲁士革命战斗年代的全套回忆录都陈列在这里供人使用。这些资料我在柏林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见到。我的朋友韦特斯泰因教授在瑞士的大学里举办记者学习班，不到一年前我曾在他那里查阅过流亡到瑞士的革命者办的报纸，但是莫斯科居然能远比出版这些报纸的所在国收集得更为齐全，这使我不胜赞叹。今天我，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人，在这里翻阅自己故乡文献的稀世珍宝：保存完整的《波希米亚人民报》(C.W.梅道出版，爱德华·布赖埃尔编辑)，由“立宪协会”(伯

恩哈特·古特，弗兰茨·克利尔博士）主编的《波希米亚德文报》，克鲁查克的《波希米亚报》；这里还能找到寻找已久的文献，看到深得读者信任而久无音讯的报纸，如《立宪生活明镜报》（勃兰特胡同的日萨贝出版），在这家报纸上刊登过一个名叫约瑟夫·温蒂尔的布拉格刑事法庭书记官所写的文章，他主张让被告人有权进行口头辩护。

在展览大厅这一部分里，某些晚年放弃了革命的作家，如约瑟夫·格雷斯或理查德·瓦格纳①，都得到革命的敬意。瓦格纳曾在奥古斯特·勒克尔主办的德累斯顿《人民报》上以无畏的英雄气概鼓动人们仇恨、蔑视社会。不愿背弃自己信念的古典作家被革出德国文坛，格奥尔格·福尔斯特或弗兰茨·梅林②都有这种遭遇。是俄国把他们团结在国际文坛里。

"查究煽动者"③在这里为千夫所指。大厅里展示了杀害韦迪希神父、监禁居尔韦斯特·朱尔丹④的真相，虽然有关主要告密人维特·冯·德林的书收藏不多。对于研究这种由政治殉道学转化而成的犯罪社会学，马恩研究所显然不大重视，书架上连这方面最基本的著作都没有。在科隆、维也纳、莱比锡、柏林（瓦尔特埃克）各个共产党人审判案中和其他叛国审判案中，政府使

---

① 约瑟夫·格雷斯（1776—1848），德国出版家。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诗人、作家。

② 格奥尔格·福尔斯特（1754—1794），德国作家、学者。弗兰茨·梅林（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之一，政论家、历史学家。

③ 指一八一九年九月二十日德意志各君主国同盟议会批准的卡尔巴德决议规定的各项反动措施。主要内容是把各大学置于警察监视之下，免除有民主思想的大学教员的职务，解散大学生协会，严格检查一切印刷品。

④ 韦迪希（1791—1837），德国自由民主主义者。居尔韦斯特·朱尔丹（1792—1861），德国国家法教授，曾领导修改一八三一年宪法。

用的侦探、挑衅、拘捕、判决策略总是如出一辙，应该加以比较和揭露。马恩研究所的法律研究室并没有弥补这一缺陷，只是在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专题里涉及几起政治案件，它们从另一方面讲明了事实，批判了法庭。

但是我不能用较长的时间来提意见（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又对我的意见提出意见）和批评，因为还有许多展览室要看，他们刚耗资三十多万美金加建了一幢侧楼。同样由于时间不够，我不能以书籍收藏家的专注去仔细观看每一件陈列品：这里陈放着尚未出版就被没收的书籍和仅有手抄本的书籍（如布鲁诺·鲍威尔①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献给马拉② 的全套《人民之友》报，和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克鲁茨和巴贝夫③ 所撰写的或关于他们的珍本书籍，我都只得忍痛割爱，不及细看。全所藏书十五万册，其中有露易丝·米歇尔、布朗基、饶勒斯④ 的手稿。所藏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档案内有照片和报纸合订本。来自英国的材料则有葛德文、李嘉图、亚当·斯密、莫尔和穆勒⑤ 的初版书、经济起义时期和建立组织时期的政治性小册子和传单。

研究所想方设法收集马克思引用过的版本和对他有影响的

---

①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主要代表。

② 马拉（1743—1793），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人民之友》报创办人。

③ 丹东（1759—1794），罗伯斯比尔（1758—1794），圣茹斯特（1764—1794），都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巴贝夫（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克鲁茨（1755—1794），法国革命家，外号"无政府主义者C"。

④ 露易丝·米歇尔（1830—1905），法国巴黎公社女革命家、作家。布朗基（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之一。

全部作品。在展览厅的哲学部分里陈放着关于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论战文章，其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战资料尤为丰富。费希特的全部藏书和由他转到温德尔班[⑥]手中的藏书也都存放在这里。马克思本人替政治经济学展览室分好了专题；展品只需按照《资本论》的每章标题分类排列就可以了，如价值，剩余价值，利润，价格、货币和信贷的流通等等。然而藏书中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前的作品，一部分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写成的，许多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以改革社会为宗旨的各种各样思想体系的著作，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都由展览厅的社会主义部分设法加以统一安排，如乌托邦、圣西门主义、"法伦斯泰尔"[⑦]、普鲁东和欧文的著作及报纸。乡间神父梅叶[⑧]（他的名字在克里姆林宫旁亚历山大公园的石碑上处于共产主义之父的行列中）的一份于十八世纪中叶手书的遗嘱也在此陈列。无政府主义者能在这里找到他们的先哲：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埃利塞·雷克吕、贝尔加里克及其著作《无政府现象——秩序日志》、莫斯特及其杂志《自由》[⑨]以及别的人，他们

⑤ 葛德文(1756—1836)，英国作家，社会思想家。李嘉图(1772—1823)，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古典哲学家，经济学家。莫尔(1478—1535)，英国人道主义者，《乌托邦》一书的作者。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自然经济学家，乌托邦主义者。

⑥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温德尔班（1848—1915)，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创始人。

⑦ "法伦斯泰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幻想建立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

⑧ 梅叶(1664—1729)，法国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空想社会主义者。

⑨ 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埃利塞·雷克吕(1830—1905)，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曾参加巴黎公社起义。莫斯特(1846—1906)，德国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是他主办的周刊，主张以暴力反对社会。

都是小人物的尊神。

在这所社会学的圣地之中，最神圣的殿堂要数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了。这两位亲如手足的战友留下的一切这里都收罗无遗：他们著作的最初版本，在美国和瑞士出版的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的各种版本，一本有拉萨尔在书旁空白处注上争论性评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八四二年到一八四三年出版的《莱茵报》，在巴黎出版的《前进报》，《德文布鲁塞尔报》，一八四七年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和完整无缺的《新莱茵报》——缺页都在收藏原件的地方影印后补齐。这里没有原件的马恩手稿以及他们与别人来往的信件也都一一影印收藏。研究所请人复制的书页、文件照片有五万五千多张，它们的原件大多数收藏在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科隆市历史档案馆，恩格斯故乡教堂的恩格斯家族档案馆，柏林国家秘密档案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中。因此，在莫斯科河旁的这座大楼里，人们可以研究这两位德国学者的全部著作，也能研究他们在哲学、政治、文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朋友和敌人的著作，还可以着手准备出版卷帙浩繁的马恩全集。以前出版的马恩著作或因材料不完整，或因编者个人力量有限不可能从头到尾科学地加以整理，或因篇幅有限和当时政治形势等原因曾加删节，所以总有缺陷。现在人们用哲学家的一丝不苟精神把手书原稿和已经出版的著作逐行比较，查对每一处引文和统计数字，给著作、来往信件和各种文件加以注解。在这里我看到了何等珍奇的东西：中学生马克思的作文《论青年人如何选择职业》（他的教师在文章评语里责备说，“不当之论充塞文中”），各种各样的信件和信件草稿（我们从中了解到，一八四八年九月马克思在维也纳想要使社会民主党内部和睦谅解，想要劝说布拉格的出版商博罗施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

没有成功)。另有几封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信件很是可笑，例如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从布尔诺寄来的一封信，写信人J.A.费特勒请流亡在英国的马克思替他解决一件家务事：务请马克思博士帮忙打听一个亲戚的下落，她在伦敦沦为娼妓……

这里陈放着一封恩格斯给他母亲的回信（她要自己的弗里茨断绝同马克思交往），信中恩格斯对于一件事极表愤慨：巴黎公社因为枪毙了几个人质受尽愤怒谩骂，但是凡尔赛军队杀害掠夺四万人的罪行却无人稍加谴责。几个世纪以来，各种文献之中对于任何改革世界的企图总是极尽诬蔑、造谣、仇恨之能事，所谓马拉是杀人魔王而拿破仑则是救世主，由有教养的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组成的巴黎公社政府是“血腥统治”，而那些迫害狂贵族和淫虐狂士官进行的大屠杀则叫做：恢复秩序。恩格斯信中的这一番话，应当作为警句张贴在莫斯科研究所的墙上，人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揭露那永恒的谎言，保卫那永恒的真理。

在研究室里，在阅览室里，在挂满图片的展览厅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正在利用他们的祖国所没有的文件进行工作。我呆在楼下码头的斜坡上，阅读记着笔记和书名的纸条。我心想，这所大楼就是活的书目，用书排列而成的书目；世上有许多专门图书馆，例如医学图书馆，但是有一种不治个人疾病而专治普天下痼疾的医学，为这种科学而设的图书馆仅此一所。

我翻着我的笔记；我回到德国之后，将到国立图书馆查找这一本或那一本书。现在找起来会很容易。只要它收藏了这本书。也许那里并没有收藏。否则那些在阅览室和研究室工作的人可以在柏林进行研究了。他们大多数是德国人。

一种受尽诬蔑和迫害的科学，一种为诊治社会弊端而建立的科学，它的家就在它的创始人生活过并且葬身的地方：遥遥异国。这是一所流亡国外的档案馆。

倪诚恩 译

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狗

“先生们,”巴甫洛夫教授叫喊起来,用手敲着桌子,连讲台都震动了,“先生们,”巴甫洛夫教授激动地叫喊着,因为他对苏维埃政府的某次攻击引起了一些听众的抗议,“先生们,”巴甫洛夫教授以一个执拗老人的十分年轻的气质叫喊着——但即使在心平气和地讲演的时候,他也只惯于称“先生们”,从不称“同志们”——“先生们,科学有权利哪怕发表违抗政府的话。”

科学当然有权利这样做。但是,自从世界上设立大学以来,还没有一个开讲座的人在进步的意义上利用过这个权利,因为反动政府善于保护自己,谁要是不赞成宪法,它就不让他当教授,谁暴露出敌人的面目,它就会拿漂亮的借口剥夺他的教席。当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公认的俄国最伟大的学者和最伟大的生物学家,再次漫无节制地攻击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一位人民委员在报纸上著文回答说:“我们可不能反对伊凡·彼得罗维奇,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按照科学理论建国的国家,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严肃认真的科学代表,即使他们对我们心怀敌意。真的,我们决不能反对伊凡·彼得罗维奇,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执政的不是出身贵族或者恩荫文武‘功勋’的人们,而是科学与劳动的代表,而且我们必须把伊凡·彼得罗维奇尊为科学与劳动的可敬的代表。但是,如果我们无能到这种程度,简直是莫名其妙地歪曲他的研究成果,并说这样于我们

有利，而事实并非如此，那就是陈旧而毫无体面的诡计了。然而，谁要是曾经研究过反射学说，无论如何，他一定会说，从来没有什么论证比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的毕生工作更明确地、在实验上更确切地证明了唯物史观的正确，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学者是个政治上的儿童，他不知道他所做的一切，正在给我们的磨盘添水。”

先生们，我敲打着写字台，咱们离开政治领域，到巴甫洛夫教授的实验室里去吧。他的实验室不再在科学院大楼里。它当年在他的朋友领导时曾经在那里有过六间阴暗的小房间，它现在在瓦西里耶夫岛①上巨大的建筑物里，有十八间工作室、实验室和操作室，以及德国的新仪器；所有同事都安置得很好，更不用说狗了；这里共有五十只狗，在院子里有一所设备齐全的房子。

这个研究所只是为了从生理上研究大脑、特别是大脑皮质、中枢神经系统的最上部分（我们的一切心理现象都取决于此）而设立的。一九〇〇年以前，巴甫洛夫教授致力于研究消食管的生理学，从本世纪起从事研究条件反射，这是一个在医学、自然科学的许多部门、甚至在认识论方面都引起一场革命的方法。由于有了这个方法，精神病学、心理学、教育学才获得确切的基础，不再是纯粹的边缘科学了。反射学说排除了任何主观性，而只依据客观的实证。巴甫洛夫也许在研究消食管时，就已经认识到所谓“心理”的可测性，因为他证实了“垂涎欲滴”这个成语，正如弗洛伊德无意识地通过“他想不起他的名字”这句俗话建立了他的“失误功能系统”②一样。巴甫洛夫发现，在期待食物（食

---

① 瓦西里耶夫岛，在列宁格勒附近。

② 原文为 das System der Fehlleistungen，心理分析学术语，指遗忘、误读、想说甲事而说出乙事等失误行为。

欲，不是饥饿）时嘴里汇聚的唾液在量上是各不相同的，正如由于恐惧或性爱而产生激动时，同样会产生那种人所共知的生理效果。根据这个论断，马上就可以做到，通过测量生理变化来表明想象的强度。

为了区别天然的反射，如挨打时肌肉抽搐，身体困倦时打呵欠，受伤时叫喊等，他把那些从思想引起的效果称作条件反射。它们不是我们一生下来就有的，它们反映了我们经验的总和，并且是在大脑皮质的参预下发生的；据巴甫洛夫说，大脑皮层并不是一种神秘心理的体现者，而是一种反射器官，即食物反射、性反射和保护反射的器官。由此还可以说，他认为在人的行为的因果锁链中，意识过程并不是插进来的，充其量是作为伴随现象随着完全在生理方面发生的过程而产生的。事实上，很难设想有比狂热的反唯物主义者巴甫洛夫的学说更其反唯心主义，更其反个人主义的了。

为了测量从经验产生的效果，巴甫洛夫制作了刺激仪器，并用它们在狗身上进行所谓周期试验。这些狗为他服务了十二到十五年了，都是看门狗，各种狗随意杂交的狗——一种生物越不复杂，它的差别就越容易测定。在每条狗的左耳下面插一根细管，于是左耳唾液腺便分泌出来。它们装在四十八个大木箱里，木箱放在有很好的卫生设备、通风良好的小屋里，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使研究所的老同事感到方便，另方面则因为狗的生活对于反射学说很重要，它们的经验的上层结构必须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工作时间一到，就穿过院子和楼梯间把狗带到试验室来，拴在一个房间里，它们在那里不耐烦地等待着实验的开始；常常是先来一个职员，跟它们一起玩，对卷毛狗伏特加说："人怎么笑？"

伏特加立刻咧开嘴笑起来。等小房间里摆上了试验桌，饲盆里盛满了食物，所有天平和文具准备好了，便把狗放开，狗便从那里冲出来，各自奔向自己的小房间，跳上试验桌，自动把头和身子投进拴它的绳子里，热切地等待把自己拴得更紧些；然后，一个小玻璃球瓶密封着塞进了它脸颊上的瘘管，门给关上了。现在，小房间里只有雌狗艾尔达。门外试验者的面前，平放着一支装红色液体的小管，他手里拿着皮球，用来晃动测时钟和饲盆。

他通过一道小口观察着静静地站在桌上的艾尔达。他让小钟响了一次，两次，三次，十五次，红色水柱很快沿着刻度管流动起来，艾尔达知道：钟响是快要进食的标志，她于是通过瘘管向小玻璃球瓶分泌唾液，唾液又从玻璃瓶流到管子，被压缩的空气又从管子里压迫液体。突然间，一个装稀粥的盆子送到狗嘴边，于是艾尔达急切地扑向食物，这是一种无条件反射，对我们来说不说明什么问题。然后，将饲盆用机械搬开，艾尔达接受到新的信号：它嘴里的唾液又流出来，钟又响了十五下，但是它没有得到什么。暂停片刻。第二种嘀哒又重新开始，艾尔达现在不再傻到再受骗了，她知道这是虚惊，它根本不想分泌唾液来对此作出反应。但是，第十六下信号还没来，艾尔达又有了食欲，会带来饲盆的第十五下信号越临近，红色水注就升得越高；狗能敏锐地区分噪音，还能区分颤音，它们具有人类罕见的特殊听觉。它们的嗅觉和味觉也是这样，它们体验细微的物理现象比人精确得多，但是它们没有一点综合的能力，它们掌握个别现象，但掌握不住印象的总体，这是通过试验知道的——如果把光的刺激同时和色与声的刺激联系起来，动物决不会注意到特殊的区别。刺激越强，反应也越强，这在动物和人身上都是如此。只有在变

态者身上，在神经衰弱者身上，在去势者身上，在病人身上，才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一点小刺激会比真正的痛楚引起更大的激动。

如果用人来进行同样的试验，可以肯定，每个字都可用另一种可测反射来表达。但是，没有用人来试验，同样没有用性反射来试验。为了试验保护反射，动物在一系列信号之后接受了一次电击，它恐怖地嚎叫，想挣脱羁绊，用脚向前扑。在同样的信号之后，再来一次电击，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第三次来同样的信号，狗仍会哀号，仍想挣脱自己，仍然用脚向前扑——虽然这一次根本没有接着来电击。这就是想象的力量，是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准确计算的。为了使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不受干扰，生理学家在一个隔音的房子前面工作，狗就在那间房子里。

五十条狗中间，有几条的消化道的瘘管被剪断了，试验开始时再给安上一个小管子，可以测量消化过程的障碍，并按照这个方式研究神经官能症的发生状况。甚至在鱼身上，也可以进行周期试验，生理学家还特别用一个小钟来招呼下食，以便观察反应，中国人几百年前就这样做过了。

巴甫洛夫教授的狗，那些常用的狗，情况良好。瘘管并不痛苦，试验是愉快的，因为它带来食物，我们知道，狗是自己冲进房间，把自己缚在带子上的，我们甚至看到伏特加在笑。这只是说的常用的看门狗。还有一些别人家的看门狗，在它们身上却不能作周期试验，而只能做特殊试验，即活体解剖。在一个试验桌上——这对可怜的狗又有什么用呢？——摆上一切精巧的卫生和防腐设备，动物经过成功的麻醉，被割去睾丸或卵巢或其他内分泌器官或一定的脑部位，那么就可以测定，切除什么之后对视觉现象无反应，切除什么之后对听觉现象无反应，还可以测定它

在饥渴中的激动状况。虽然这些科学实验在许多方面同那些自古以来在人身上、在整个人群身上(不仅是在太监、合唱童子、吞剑者、和六日自行车比赛者身上,也不仅是在建筑金字塔的小工身上、大桡战舰上的奴隶和战士身上)进行过的非科学的实验相似,虽然在个别动物身上的精确实验的效果同在整个人群身上的实验效果相似,巴甫洛夫教授断然拒绝这样的类比,他不愿意有人在这些事情上从动物扯到人,我们却不得不作如是观。

刘半九 译

总统选举的前夕 选举日和选举夜[1]

吉米·沃尔克，纽约市长，穿着非常讲究（衣冠楚楚，在一个平等的国家里所能发挥的作用，就象在一个德国大学生团体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一样）。吉米·沃尔克站在纽约时报广场上，以非常洪亮的声音、十分动人的手势和修饰得很漂亮的措辞，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尔·史密斯发表演说。

骑马的警察维持着秩序，成千的人为了要看清演说的人、听清楚他讲的话，拥来挤去；他们边听边喊，有的是为了使演说更加有声有色，有的则是存心捣乱。

吉米·沃尔克对于抗议和鼓掌都无所表示，他只管演讲。当他演说完了时，他又重新开始，洪亮的声音丝毫未减，动人的手势和修饰得很漂亮的措辞完全同上回一样。

他演说了整整一夜，没有倦意，因为并不是他自己站在纽约时报广场上。站在纽约时报广场上的只是他的图像。他发表演讲的镜头，已被摄制成电影，他的图像只是通过放映机投映在银幕上，他的声音只是通过扩音机传遍夜间的广场。

中午时分，民主党候选人乘车穿越城市，举行了一次"阅兵式"。首先是一队坐着摩托车的警察，然后是骑着马的警察；接

---

① 这篇报告文学描述的是一九二九年上任的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选举的情况。

着是两辆空着的汽车，车顶上有乐队在演奏；新闻摄影记者和电影采访员带着他们的摄影机站在尾随的汽车车顶上。

再后面是：一辆敞篷汽车，候选人庄严地坐在加高了的后座上。他戴着淡褐色的德尔比帽①，这种帽子使他深孚众望，同样他也使这种帽子为大众所喜爱，以致在帽子商店的陈列橱窗里摆满了这种直边帽檐的淡褐色的坚实的帽子。艾尔·史密斯缓缓而过。人群中有人向他欢呼，有人吹口哨嘘他，他都一概不论，交替着挥动右手和左手向人群致意。在他后面是一批收买来的和没有收买的由选举人组成的随从，他们坐在贴着大幅宣传画的汽车上。

这是一次伟大的"阅兵式"。在此之前报刊上已经刊载了通栏文章，进行大肆渲染，到了晚上它们将要通栏地报道这个消息。什么事情如此轰动？一个候选人由乐队伴随通过纽约的街道。

"……通过纽约的街道。"这件事情轰动了。五十层楼高的、有着三千扇玻璃窗的摩天大楼，连同它们的平平的屋顶和高高的尖塔，连同它们的高得使人昏眩的没有什么保护的飞檐上都挤满了人群，他们高兴能有几分钟离开柜台、离开计数机、离开办公桌。他们往下观看，狂呼乱叫，把真正美国式的长纸条、真正美国式的五彩纸屑抛向街道。

这些长纸条都是每个办公室为了收听交易所行情和经济消息而安装的两台收报机上的无穷无尽的狭长纸片。五彩纸屑则是用纽约城、布鲁克林区和纽约郊区去年的电话簿做的；这些电话簿因为不合规范化的要求，已经不再由电话公司采用了，人们

① 一种英国帽子，得名于德尔比伯爵。

就可以把它们剪碎，向横渡运河的女游泳运动员、飞越大洋的飞行员或者至少是总统候选人，满把满把地抛掷这些碎纸屑。这些用印刷纸剪成的金银丝条，从高耸的房屋正面向峡谷似的街道悬挂、飘荡、飞扬下来，掉入喧哗嘈杂的人群中。顷刻之间，这些去年已经过时了的交易所行情单和电话簿把峡谷似的街道盖了足足一英尺厚。——候选人以为正在通向权力与荣誉的道路上向前行驶呢。

街上横挂着锦旗，旗上写着候选人的名字；有些山墙上升起了彩旗，画着某个候选人的像。五彩缤纷的灯泡构成激动人心的标语，装饰着各个俱乐部。在所有的街口分发着用英语、意大利语、法语、俄语、德语、意第绪语、波兰语和希腊语写成的传单（原来的顺序如此）。宣传广告只是用一种语言书写，当然，每个区所用的语言各不相同。

晚上在哈莱姆区举行了支持“亚伯拉罕·林肯的本党同志”胡佛的“阅兵式”（这是一个很好的口号，因为奴隶解放者林肯在黑人区是非常神圣的）。一队由鸣叫着的装饰起来的汽车组成的行列，沿着伦诺克斯大街两边的成百家电影院、歌剧院、地下酒店（人们在这里可以不顾禁令地开怀畅饮），音乐厅和当铺缓缓而行，在这些汽车的后座上坐着穿戴美观的黑人男子和穿戴美观的黑人女士，在汽车踏板上穷苦的黑人挥动着旗帜，呼喊着“投胡佛的票”、“投胡佛的票”。在载客汽车之间有一辆载有乐队的卡车。这是一个没有铜管乐器、没有六弦琴、没有一件爵士乐队的乐器，只有小提琴、中提琴、号角和打击乐器的乐队，为黑人所“聘用”的音乐师全是白人！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还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在百老汇街口的一家大商店的玻璃橱窗上挂着一幅广告：

"如果你们怀疑，这是三K党在煽动反对史密斯，那么就请进来看看证据。"我们走进去了，并且见到了证据：有嘲笑史密斯信奉天主教的报刊；有漫画，画着教皇骑在史密斯的肩上来到美国，画着史密斯从白宫窗户里呼唤耶稣教团①教士的长长的队伍。墙上却写着反驳的大标语，谁也不应该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攻击。

他们两个候选人竞相放映电影。在放映电影的间隙，在大众音乐会各场之间，人们看到他们象里格利的橡皮口香糖一样：这里、那里、到处出现，在家庭里、在大街上、在舞台上，无处不有。

他们还竭尽全力，通过无线电广播，在美国的各个家庭进行访问。无线电收听者听到赫伯特·胡佛在麦迪逊广场上播送的长达一小时的演讲节目；之后，又听到同样长时间的艾尔·史密斯在布鲁克林的演说节目。每一次叫好、每一阵掌声和每一声口哨，在每个有收音机的房屋里都听得清清楚楚。每当一句精彩的句子引起了长时间的喧哗，总统候选人就表示：

"朋友们！我们不要象集会游行那样浪费无线电播音时间！"

他说得对。无线电播音时间很昂贵，一小时三万美金。每天晚上不仅候选人要讲话，而且本党同志也要为他们讲话。

今天可是选举日了，神圣的选举日，整整一天笼罩着一场现代战役的沉寂。所有的人都迈步走向投票箱——但是纽约人并不走向投票箱，代替投票箱的是选举机，每个选举区域有三、四台。一个紧挨一个的选民所组成的长蛇般的队伍纵横交错鱼贯

---

① 耶稣教团是天主教的一支教派，于一五四三年由罗耀拉创立；作为反宗教改革的重要工具，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天主教统治。

蠕行。两党的心腹，戴着可以识别的标记，拿着投票机的模型来回走动，向每个人解释，他该怎么做，怎样选举他的候选人们。(他的候选人们。还是复数呢！因为不仅仅是选举总统，而且还有副总统、州长、一位参议员、首席法官、首席检察官和一位众议员。)

轮到哪个选民，就检查他的选票，然后他走进小房间，推动一个开关，一块幕布就拉上了。他现在同外界完全隔绝，可以履行为自由的美国公民用书面所确认的权利了：每隔几年就按六下电钮，然后就回家。

到了晚上，只有到了晚上才开始热闹起来。即使在平常的夜晚，纽约时报广场和百老汇的象河港一样弯弯曲曲的街道，也是地球上最热闹的娱乐和游艺场所，今天更是拥挤着成千上万的人，想知道选举的结果。纽约的警察已经召集起来，还调了布鲁克林区、布朗克斯区和斯塔腾岛①的警察，来维持第七街以及从第四十街到第五十九街的交通。仿佛成千上万意见相同的人的喉咙不够用似的，每个人还随身带着一根管笛、或一个喇叭、或一件发出劈拍声的工具，孩子们敲着锡制的盆碟和洗脸盆的盆底。汽车司机出租他们的车顶。每间办公室的窗户都挤满了人，这些办公大楼里在节假日，当然没人办公，即使不是节日在这个时候也早就停止工作了。屋顶花园胸墙上也没有什么空隙。

在《时报》大厦的八层楼上，通告牌光彩耀人。每一项通告都会引起一阵呼喊，并借助有线喇叭绕过街口，一直传到那些什么也没有看到的人们中间去。

---

① 纽约市赫德森河口的小岛。

午夜十二点零一分，这一切才终止。因为墙上用发光的文字闪现了从俄克拉何马州阿德莫尔城发来的电报：

“胡佛在密苏里州得到了多数，这样他在选举人中已获得二百六十六票。”

因为间接选举的选举人机构由五百三十一人组成，从俄克拉何马州老家来的通报意味着胡佛获得多数，胜负已成定局。

人们逐渐散开，慢慢地离去，有的大喊大叫，吹着口哨，有的欢呼喝彩，吹起喇叭，有的则沉默不语，异常失望。第二天，在各种各样的报刊上，登的只是有关胡佛和他的家庭，有关选举结果和选举的报道，二千二百万人投了胡佛的票，一千七百万人投了史密斯的票。美国国旗上有四十八颗星①，其中四十颗星占多数是拥护胡佛的，只有其余的八颗星是拥护史密斯的。为竞选付出的代价已经清算，而且看出了效果，有的人在竞选中得到了财富，有的人在竞选中失去了财富，华尔街上五百万份股票也已经倒手了。

发生了什么事呢？

共和党候选人战胜了民主党候选人。当然，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模一样，而共和党也决不甘心被看作没有民主党那么民主。共和党人曾经一度反对过高额保护关税，民主党人曾经代表南方各州种植园主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建党时的区别和政治历史上的区别，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从个人来说，这两位谋求高位的人都是带着特别的政治诱饵登场的。然而，以三个“P”（Prosperity, Protestantism und Prohibition＝繁荣工商业、新教和禁酒）进行竞选的胡佛非常聪明，并不强调新教。他的对手同样主张福利。史密斯也支持禁

① 美国国旗现在有五十颗星，当时有四十八个州，因此旗上有四十八颗星。

酒，他只是希望把"烈性饮料"的酒精含量的界限提高一点；但是他又说明，这意味着修改宪法，而总统并没有权力这样做。他有条件地支持不让私人趁机利用水力资源，而胡佛却从最大可能繁荣经济的意义上，愿意看到利用这种资源。

在纲领上没有什么区别，在竞选口号上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什么人事问题，因为没有人在这样的选举时能够决定，因为没有人在这样的选举时能够预言，总统候选人在当了总统以后，对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持何种态度。带着固定的纲领登场的唯一候选人是民主党人威尔逊①："没有一个美国政治家可以这样寡廉鲜耻和意志薄弱，在任何一种借口之下把美国投入世界大战。"尽管协约国舆论哗然，他还是在"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他使我们置身于战争之外"）这样的口号下又一次当选，接着——他就宣战了。

真是没有什么人事问题！纯粹是党派的权力问题。它们的两个联邦领导机构为了宣传目的花去了八百五十万美金，这还没有把各州的机构消耗的数百万美金计算在内。这是一个为了营业目的的权力问题。

四千万选民并没有因为这种情况而感到惊愕。

"情况会有什么变化，"贝克尔博士在选举的当晚在纽约时报广场上问一个异常兴奋的邻居，"史密斯当选还是胡佛当选，这会带来什么变化？"

"噢，他们带来的变化，正如滕尼还是登普西，谁成为世界拳击冠军都一样。"

孙坤荣 译

---

① 伍德罗·威尔逊，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一年任美国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以美国不卷入战争为竞选口号；但再次当选后，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国宣战。

夜间法院

“我看，您现在还醉着呢。”

“我是从来也不喝酒的，先生。”

“您说说看：君士坦丁堡。”

“科尔斯坦第帕—君士塔尔丁堡。”

“您以前受过惩罚吗？”

“没有，先生。”

“我判您有罪。”

* * *

“我站在列克星敦大街上，警察带着这位妇女走过来，就把我抓起来了。”

“对不起，他追踪我们商店里的一个姑娘，并向她求爱。他整天在店门前游来荡去，我们店卖妇女服装，请原谅，他偷偷地向陈列橱窗窥望。我们的顾客对此非常讨厌。”

“如果您再在商店前露面，要判您三十天监禁。”

* * *

“把这个人拘留起来了，因为他常常在麦迪逊广场上冲撞行人。”

“您以前受过惩罚吗？”

“没有，尊敬的先生。”

“我判您有罪。”

* * *

“我在沃尔克大街上开一爿面包铺。今天下午五点钟飞来两块石子，打在我的两扇店窗上，把玻璃打碎了。我冲向门外，看到几个青年跑掉了。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站住脚，镇定地朝我走来。我就把他逮住了，我的妻子找来了警察。”

“你多大年纪？”

“十六岁。”

“你为什么打碎玻璃窗？”

“我跟这件事毫无关系，我根本不认识这帮从我面前跑过去的青年。我要替我父亲买烟丝去。”

“你愿意具结吗？”

“愿意，先生。”

“站到台上去，举起手来跟我宣誓。”

“……上帝助我。”

“你的父亲在这里吗？”

“我是，尊敬的先生，就是这么回事，我儿子说的一点不错。”

“您听着，如果这青年下一次只要有打碎玻璃窗的嫌疑，他就要被教养三年。（对被告：）我宣告你无罪。”

* * *

“他在宏伟的中央车站出售玩具。向他要营业执照，他说，圣诞节期间不需要营业执照。”

"我判您有罪。"

* * *

"一小时前他醉醺醺地回到家里，把白铁壶向我掷来。我就让我女儿去叫警察。"

"不，先生。我刚从工作地点回家……"

"从工作地点?! 你撒谎!"

"您别说话!"

"……我的老婆对我说，我是狗娘养的，还有一些其他下流的话。我就向她扔了东西。"

"我判您有罪。"

* * *

"这个人（一个瞎眼黑人）每天在弹子场和南渡口之间的地下铁道行乞。"

市参议会代表："他已经受过四十一次惩罚了。"

"再监禁三十天。"

* * *

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判处有罪，判处无罪，整个晚上，可以发落五十件到三百件，在星期六处理得还要多，最高纪录：一夜宣判四百九十五件，一年三万三千件。谁被宣判有罪，就必须到指纹室去，在那里，卡片上都登记着在这以前他是否被惩罚过，受过几次惩罚。然后人们又把他带到法官面前，此刻法官就判他多少刑期。

被拘捕的人在外面一个巨大的囚牢中等候着，因为刚作案

还很激动，因为审讯和判刑而加倍激动，而证人们则带着神经过敏的脸色坐在观众室里。

巡警不停地送来新的囚犯，在房屋前面停放着“绿色的囚车”，在这个国家叫做“Black Maria”（押送囚犯的车辆）。囚车把被告带来，把已经判罪的人带走。判处五天以下的人被送往第五十三街西半部的第七区监狱。还没有确定判处多长时间或判处六个月或五个月零二十九天的人（判处五个月零二十九天比判处六个月的“最高限度”还要长，因为后者如果表现好，每个月可以减刑五天，一共可减刑三十天），被送到幸福的魔鬼岛上去，未成年的人被送到哈特岛上的感化监狱。

在布鲁克林区有一个主要是审判妇女的夜间法院，这座大城市当天下午四点钟后因轻微的犯罪而受到嫌疑的妇女和男人，在这里被审判。夜间那一班叫做午夜法院，而且一向生意兴隆，门庭若市：这里审讯的有酒徒和娼妓；有因使用童工而犯罪的手工业工人；有剧场经理，他们的演出迫使一位观众——他因伦理的原因而对演出感到愤怒——由观众大厅奔向警察局去控告（女经理梅·韦斯特因剧本中的“性欲”问题在一夜之间象一声霹雳一样被判处十天徒刑）；有因娼妓使用了房间的房东；有参加了斗殴事件的青年；有由于进行不正当的竞争的商人；有没有把孩子送进学校的双亲；有违犯了交通规则的人；有在高架铁路上随意吐痰的人；有偷窃一百美金以下的人；有没有许可证要饭的人或没有营业执照的街头摊贩；有轻微的伤害他人身体的人，或做了其他不轨事情的平民百姓，这种人没有能力维持生活，因此就得被审判定罪。

每个被告都能接受证人的宣誓，如果证人的供词对他不利，他也有权拒绝接受。一个市参议会的官员，作为“中间人”（“搭

桥人")来到这里，絮絮叨叨地给予被告一些法律上的训示：他们有权提出证人，并且叫人立即把证人找来，他们可以聘请律师或者要求延期开庭。

谁被宣告无罪，由于迅速的夜间审讯他就不会失去工作日，也不会在雇主面前造成不愉快；谁被宣判有罪，由于夜间审讯他可能失去他的清白，他一生中的某一年、也许是整个一生的前程都丧失了。（半夜里急匆匆进行的司法工作只能是宣告无罪、处以罚款和训诫一番，其他较重大的案件必须移交给正常的法院——否则夜间法院也能处理较重大的案件，它就有了社会目的。）

法院大厦的底层、旁边和对面都是灯火通明的事务所：律师们的营业所。这些营业所的霓虹灯广告告诉人们，他们事先向每个人预支保释金。他们的职员——往往是律师的夫人——走近那些要上法院的人们。其目的是为了招徕顾客，在他们波兰原籍，人们把这叫做"拉生意"。

"谁有什么烦恼？"她们问，这样就可以开始交谈。

记者都在大厅里面。但是，即使能在司法机构的运转过程中，猎取到一桩特别的新闻，这类报道到了报社，就被那些坐在编辑部办公室里的"出版人"扔进字纸篓里。因为在这些"出版人"眼里，夜间法院的奇闻还远远谈不上是纽约的奇闻。

在这里出入的是平民百姓、律师、记者和被告，以及万能的法官。

孙坤荣 译

芝加哥下层社会剪影

一　人市

一辆汽车同另一辆汽车相撞，挡泥板和车号牌被撞烂了，这类事几乎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尽管这样，在联盟车站和西北车站之间出了事时，马上就围了几百人，他们察看损坏的情况，在两方司机的争吵中，各自支持一方。一个巡警骑着马来到出事地点，弄清了全部情况。他的那匹马的尾巴结着一个结，非常好看。

聚集在小汽车出事现场的人们，把他的到来看作是他们活动中一个受人欢迎的插曲。他们穷极无聊，无所事事，发生了什么事故就挤在一起看热闹。车祸使他们得到满足，但并不是“满足”这个字的原来意义，也就是说，并不是他们原来希望的填饱肚子的满足。

他们蹲在停放着的汽车的踏板上，他们站在人行道上，或者拥挤在过道内。他们在卖纪念品的商店的玻璃橱窗前盘算，是否要把剩下的最后二十美分买一只饰有五彩缤纷的芝加哥摩天大楼的珠母盘子，寄到欧洲老家去，这样，那边的人更会认为，他们在美国都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了。

他们等待着，在风雨饥寒中打发日子。这个城市有不少职业介绍所、代办所等，几乎每一个营业所都设置了接待室，备有

足够的座位，但是人们并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只有需要劳动力时，才让街上的人进来，以便挑选出最年轻的和最强壮的人。只有这些挑中的人才能坐到凳子上，等着给他们摘证件。

其余的人又踯躅在芝加哥河畔漫无边际的“露天接待厅”里，他们生活的唯一调剂就是撞车事件。

这个区被半官方地称为“奴隶市场”。这里每一个街道拐弯处都有巡警守护着，每个住宅区都在骑警的保护下，他们的马尾巴都结着非常好看的花结。

二 弗洛帕镇

相邻的街道全是贫民窟，房屋正面的墙壁残破不堪，屋架已经腐朽；从窗户里伸出消防铁梯，通到街道上。这些斗室都是集体住房，人们在这里可以“倒下”睡觉。

弗洛帕镇的人行道上也挤满了乱糟糟的男子汉。这些人不再到运河大街上去，也不再到奴隶市场去了，他们已经失去寻找工作的希望。

另一方面，只有那些还有一件衬衫、五个美分就要摆架子让别人洗衬衫的人，才从运河大街来到弗洛帕镇。他们走进价格便宜的洗衣店，光着上身坐在那里，等着洗衣店的中国人把他的衬衫浸在水里、用肥皂洗净、拧出来、烘干、熨平。

以后，他们在大街上冻得牙齿直打架。至少还有一件大衣的人那才美呢！尽管看得出来，大衣也象它的主人一样，时常在变换职业：大衣既是被子、枕头，又是口袋和包装纸。

教堂、救世军和流动工人学院（本诺·赖特曼博士开办的流动工人大学）设在他们的主顾居住区的中心地带。

三 奥莱丽太太的母牛

德科文大街上的第五百五十八号住宅，耸立在这个地区颇有历史意义的土地上。一八七一年十月十八日是个星期天，晚上九点钟左右，当时这所住宅的女主人奥莱丽太太走进牛栏，因为她的房客那里聚集了一群人庆祝生日，需要牛奶。夜里睡觉的时候还来挤奶，母牛大概非常生气，就一脚把放在旁边的煤油灯踢倒了，顷刻之间牛栏着起火来。

奥莱丽太太喊叫着跑到街上。救火的人还没有到，风已经把火焰引向邻居的屋顶，从那里又引向另外一些邻居的房屋。火势逐渐蔓延，以致整个芝加哥一片火光。直到星期二风停了大火才熄灭。一万七千幢木制和砖砌的房屋被烧毁或倒塌了；向各家保险公司要求赔偿的损失达一亿九千万美元，保险公司因而很快破产；九万八千人无家可归，二百余人在烈火中丧生，大约有一千人受伤。官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之后确认，其罪责毫无疑问地就是奥莱丽太太的那头母牛。从此，禁止在芝加哥市区内饲养牲畜。

四 炸弹

高高的台阶通向德斯普兰斯大街上的警察局，这是一座古老的用石块砌成的坚实的建筑物，它代表了社会下层人住的这一地区的高级行政机关。高高的台阶也通向这个警察机关的许多小房间和审讯大厅。辖区里的每一个老百姓，不管是谁偷窃了五十美分的钱或者酗酒违法，都要受到引人注目的严惩和一

视同仁的判决。

在守卫室里，悬挂着一组编排好的纸张已经发黄的照片：这些照片照的是这个警察局指挥的第一中队的警察，他们于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在海马克特的一次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上因炸弹爆炸而伤亡。整个情况是这样的：炸弹是由一个被收买的家伙引爆的，后来他们又在所有不受欢迎的工人领袖住所内异常迅速地查出了炸药和爆发机，首先是在德国《工人日报》编辑部里。

几天以前，警察把八名工人枪杀了，因为他们在赛勒斯·麦考密克工厂，即今天的国际收割机公司，煽动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但是工人们继续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赛勒斯·麦考密克就决定永远消灭整个工人运动；他是当时芝加哥最富有的人，他从自己的腰包里公开地拿出钱来收买这个地区的警察和法院。为此，需要找一个借口；而反对大规模屠杀的抗议集会正是理想的场所。难道一个赛勒斯会没有能力买到炸弹，并收买人把炸弹投到人群之中去吗……？

因与投掷炸弹事件有关而受到控告的德国工人领袖在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被处绞刑，有几个人是在监狱中自杀或由于审讯的方法而导致死亡（林格在处绞刑前一天死亡）。

海马克特，即现在的划艇协会，是蔬菜市场。市场助理员——很少出于政治原因，主要是出于一种自然的需要——把这座塑有伸开手臂突袭进攻的警察的纪念碑，用来作为厕所；这样一来，按照联邦法规，纪念碑必须迁移。它迁到了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这个地方和纪念碑毫不相干。

附近的第二个纪念碑是为当时的芝加哥市长、政治家卡特·H·哈里逊建立的，他于一八九三年世界博览会期间去世，

他被人枪杀了。对于芝加哥来说，这是一种自然的死亡。

这些已经发黄的照片还有一套装饰在市政厅的警察局长的接待室里，照片旁边大约放着五十个银质奖杯，这些奖杯是他的球队在垒球和足球比赛中获得的，是芝加哥警察的战利品。（大约在一个月前有七个私自贩卖烈性酒的人，在一间汽车房里遭到另一伙人袭击，就在大街上把这些人靠在墙上，用机枪一一射得稀巴烂。肇事和犯罪者中间也有身穿制服的警察，但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的图片没有挂在市政厅的接待室里。）

五　凶杀复仇的十字路口

泰勒大街和霍尔斯特德大街的十字路口，是一个死亡之隅。凶杀复仇在移居入境的外侨区潜伏着，就象它在这些居民的故乡曾经潜伏过的那样。然而，在这里并不是以血报血，而是以血报酒。如果有谁干了截获贩运烧酒的事情，那么，他自己连同他的整个家族、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都要被斩尽杀绝。在美国土地上，意大利的家庭荣誉和商业利益是一致的，这方面的竞争是用子弹进行的血战。

这里，双方分属两个强大的走私酒品的康采恩集团，一边是卡波内，一边是摩兰。他们阵营分明，势不两立，比起以前意大利的凯普莱蒂和蒙泰奇①两家世仇有过之无不及。

这个私贩酒品的地区今天还叫做秦纳区，虽然秦纳三兄弟早已幸福地长眠天堂，每个人都是被手枪打死的；他们的部下恩

---

① 凯普莱蒂和蒙泰奇，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描写的意大利两个封建世仇家族。莎士比亚的这个戏剧取材于意大利作家彭代罗（Bandello，1485—1562）的小说。

利科·斯庇诺拉和奥拉丘·特罗佩耶都是在死亡之隅倒下的。

绰号叫做威士忌－墨索里尼的秦纳兄弟的住所，是一座三层楼的砖瓦建筑物，耸立在米勒大街上，雄伟地高于邻居的住房。（美国绝对不是全由摩天大楼组成！）秦纳的这座有五条通道的漂亮住所，在芝加哥警察局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象德斯普兰斯大街上的全权代表机构①所起的作用一样。

酒品走私贩斯卡利西和安塞尔米枪杀了"非走私"的秘密警察。在审讯过程中发现秦纳兄弟有权指挥这个地区的警察部队，马克斯威尔大街上的守卫室的成百名公务员每个星期到这里来，领取提供合作的报酬。斯卡利西和安塞尔米最后被宣告无罪，因为芝加哥的意大利人是很有影响的选民。

但是对于证据确凿的受贿的公务员，是要进行德累科②式的严肃处理的，对揭露出来的警察的违法行为当局是十分严厉的：犯错误的人被全部安置到另一个地区。

六　旧货市场

马克斯威尔大街上的警察机构现在由谁付给报酬，公众不知道。不过，不管怎样，门前的芝加哥旧货市场每天上午总是熙来攘往，星期天更是人山人海。

买主都是波兰人和墨西哥人，由于他们的缘故，犹太商人（毫无例外都是犹太商人）的货摊上摆满了名目众多的天主教的供物——圣像、祈祷书、十字架上耶稣受难像、念珠和纪念章。

他们唯一的竞争者印第安人在街口敲击战鼓。这块土地上

① 指德斯普兰斯大街上的警察局，参见第四节"炸弹"。

② 德累科，古希腊严酷的立法者，约生在公元前六二〇年。

的红棕色的原始居民装饰着漂亮的羽毛，随着鼓声跳着他们种族的神圣舞蹈，吸引顾客来买他们的药材。

马克斯威尔大街是一条没有铺路面的街道，交通经常阻塞。人们很快地证实了这一点。只要在哪一段的地面上出现一条裂缝，就可以看到里面有沥青。而沥青已被几十年来人们踩来踩去形成的一英寸厚的街道尘土盖没了。行驶的车辆把狭窄的街道纵分为三条，住房里的商店组成第四和第五条街道，阿谀逢迎的人和招徕顾客的人在商店前面忙忙碌碌地工作着。

最大最引人注目的货摊是那些兜售酒精厂的全部财产货品的摊子，簇新的铜锅、蒸馏器、曲颈瓶、温度计、各种试管以及在每个美国家庭里制造威士忌酒所要用的一切东西，这里应有尽有。在附近的摊子上能买到当地酿酒厂用的小口袋装忽布实①和做啤酒用的酵母。

用过的硬高领每个值五美分，旧衬衫要三十美分，但是旧货商人不是一点不通融，还可以讨价还价。

留声机唱片数不胜数，每张五美分，买一打（十二张）五十美分。人们怀疑——这样低廉的价格能买到好的唱片吗？卖主热心地把顾客选好的每张唱片放到留声机上试音，唱片倒是完好无损。人们购买了好几十张唱片，但拿回家去才发现，唱片不出声了：因为这类唱片只适用于爱迪生留声机，而这种留声机二十年来已经不再生产了。

旧书摊有着统一的价格，从五美分到十美分不等。有旧年历、过期杂志、西班牙的低级趣味的小说、波兰的圣经和一些已经破损了的古典作家的作品，例如有一本意第绪语的歌德的小

---

① 忽布实，酿造啤酒用的一种配料，也叫啤酒花。

说《少年维特的烦恼》。

七 谁认识这些民族

越往西，越穷困，房屋越来越破旧，到囚禁罪犯的村庄西塞罗，映入眼帘的尽是低矮的茅屋和肮脏的垃圾。芝加哥的西部和所有其他大城市的东部相同，这里是贫民区；城市的东部靠着密执安湖，沿岸一带房屋十分奢华。

单独划分出来的几个区里，住着三十二万波兰人，十三万意大利人，十一万六千捷克斯洛伐克人，十一万黑人，六万一千匈牙利人，二万七千希腊人，他们生活在兰岛大街的"三角地带"，其中一部分人是企业老板，一部分人是咖啡馆的常客。中国人总共不到三千，但分为许多家族和团体，彼此不和。这些以什么堂什么堂为名义的集团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发生在协胜堂和安良堂（音译）之间，这次战斗波及整个美国的所有华人，特别是在芝加哥牺牲了好些人。

八 德国人的革命

无论从社会地位看还是从地理分布情况看，德国人都没有抱成一团。他们中间的工厂主住在"黄金海岸"① 的奢华的宅邸里，中产阶级住在林肯公园附近，北区一千六百号至二千号的地段，无家可归的临时工则住在船上栖身。这样，拿意大利人来说，他们在政治上所显示出来的力量远远超过两倍于他们的德

① 这里指有钱人的住宅区。

国人所显示的力量。此外，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由于违犯美国的禁酒法而被判刑的外国人中占的百分率最低，这一点颇引注意，因为反对限制买卖酒精的第一次反抗首先是在德国人中掀起的。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时至今日，人们还在回忆一八五五年的“德国陈啤酒骚动事件”。当年，一群人喊着“向巴士底冲啊”的口号，从城市北部——德国人移民区出发，冲向这个城市的法庭。一些饭店老板因在星期天出售啤酒而被关在这里。北克拉克大街上的警察哨兵线企图阻挡游行队伍，但是这些平时很温和的德国人，这一次却一反常态，他们一边喊着：“这些就是星期天封闭啤酒店的家伙”，一边向警戒线冲去，枪声响了，许多人被打死，也有不少人受伤。

究竟有多少人牺牲，无法确定，因为对于这一意外事件在警察局长的办公室里没有保存什么战利品，甚至对于这次冲突连一个纪念碑都没有竖立。可是这次冲突是以啤酒店老板的胜利而告终的。由于德国人的革命斗争，由于他们与爱尔兰人建立的陈啤酒－威士忌酒联盟，当局有些畏缩了，它们撤消了星期天不准零售酒类的禁令。这真是黄金般的时代！

孙坤荣 译

在遭到枪击的剧院里

华盛顿市第十号大街，一座四层的灰色楼房没有电铃。

我敲敲门，没有什么动静。

我第二次敲门。有一个人为我开门。

“我想参观一下这座楼房。”——“这没有什么好看的。”——“没有什么好看的，我也要看一下。”——“好吧，进来！”

房子里确实没有什么可看的。一个空空荡荡的仓库，墙壁的三面是剧院的楼座。一架货物起重机搁在屋子的中央。旁边是一个设有洗手池的小房间（在战争年间这里曾驻过军事机关）。

这位老门房招呼我说：“您站的那个地方过去是舞台，右上方是包厢。”

* * *

今天，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准备演出的剧目是汤姆·泰勒①的怪诞的喜剧《我们从美国来的堂兄弟》。

在街道拐弯处的福特剧院的狭长的广告牌上写着，为慈善事业而举行的最后一场义演，由卓越的女经理、女戏剧家和女演员劳拉·基恩登台演出。她将扮演弗洛伦斯·特伦查德这一角色。

---

① 汤姆·泰勒(1817—1880)，英国戏剧家、文学教授。

进行义演的女演员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和他的夫人出现在包厢里(右上方)。

就在今天，可怕的南北战争结束了，奴隶贩卖者的败局已定。他第一次能松口气，进剧院消遣娱乐。

一个星期前，南部同盟的军队已经向格兰特①将军投降，今天，最后的意外事件——萨姆特要塞上的旗子之争，也已解决。不再有主张分离的人了，将来也决不会再有那样的人。

不再有买卖黑人的交易了，将来也决不会再有。奴隶贩卖者在报刊上登载的广告、价目表和注明年龄、手艺与价格的营业栏目都已成为历史了。再不会有包运"黑色象牙"的船只开往美洲，输送从非洲抢来的、并且捆绑和上镣的男人、女人与儿童。为追捕逃跑的奴隶巴普蒂斯特·恩而愿意出价上百美元的广告不再张贴了。再不会有农场主肯花费这上百美元，偿付印刷费用，去重新获得一个逃跑的奴隶并在另一些心惊胆战的奴隶面前把他遍体涂上柏油沾上羽毛施加酷刑。

这是亚伯拉罕·林肯的功绩。现在他坐在舞台右上方的包厢里；包厢的栏杆上挂着一面星条旗。

演出开始了，非常有趣，也令人浮想联翩。

在演第二幕时，十点二十分，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只见一个人跃上总统包厢的栏杆，要往下跳到舞台上去，他的带有踢马刺的靴子被星条旗绊住了，这个人狂叫一声跌落在布景前面，就在这里，现在我站的这个地方。他的脚摔坏了。

观众中有人试图攀登到舞台上去，逮住这个罪犯，但是后者

① 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1822—1885)，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时期北军总司令。

站起来了，举起一把匕首——令人惊奇的是，手里拿的不是手枪——没有人再有勇气靠近他了。他毫无阻挡地一瘸一拐通过已经变得空无一人的舞台，从右边下去。在后台的门外有一匹马停在那里，他跨上马背扬鞭向黑夜中奔驰而去。

亚伯拉罕·林肯流着血躺在他夫人的怀里。他的后脑勺上中了一颗子弹。罪犯刚才——在舞台的右上方——打开包厢的门，在总统旁边向他开了一枪。人们把总统抬起来，想把他送往白宫。

舞台上的帷幕降下来了。有一个人受到嫌疑被拘留起来，说那匹乘马是他布置的。另外一些人，象行刺的罪犯一样，坐在离总统包厢很近的楼座席上，也被拘留了。这些人在警察局里受到了询问，人们盘问他们的住址、出身和交往情况。

总统的担架尚未离开剧院，他就失去了知觉。医生说，如果把林肯送往白宫，他就会死在路上。因此，人们把他抬到对面彼德逊太太的家中，放在那里底层的一张床上。

调查工作开始了，被怀疑同情南部同盟的人都受到追查。暗杀总统的同时，也有人试图谋害林肯的国务卿西沃德，他当时卧病在床。

人们获悉，刺杀总统的罪犯曾经住在什么地方——一些邻居在舞台的灯光下认出了玛丽·萨拉特夫人的陌生的房客。她和她的一些朋友都被捕了。

罪犯名叫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是一个话剧演员。他的父亲名叫"朱尼厄斯·布鲁图斯"——刺杀暴君的人——这个名字在大革命时期用得很普遍，但是事实证明，布鲁图斯没有参与这次行刺事件。

医生整夜守着林肯的卧床。早晨七点过后，他去世了。

华盛顿市的卫戍部队努力追捕行刺的罪犯。有人发现，布思曾经让塞缪尔·伍特医生治疗他的摔坏了的脚，并乘一只渡船渡过波托马克河。

四天以后，人们在一片小丛林中包围了这个逃亡者隐藏的地方。他开枪抗拒士兵的追捕，他们予以还击。当他们愈来愈靠近他时，他已因伤重而丧命。

如果行刺是在几天之前发生，那么此举可能使战局逐渐有利于南部同盟。但是有谁知道，行刺的罪犯的意图是否就在于此，也许他是信奉关于战争的仇恨宣传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这些人不甘心昨天的死敌被宣布为今天的盟友。

一八六五年七月七日，布思的同案犯玛丽·萨拉特夫人、刘易斯·佩恩、戴维·赫罗尔德和乔·阿采罗特在华盛顿被处绞刑。医生伍特由于他帮助罪犯被判处无期徒刑；摆渡的人，他并不知道渡谁过河，死于狱中。四年以后，伍特被安德鲁·约翰逊赦免了，在林肯时代他是副总统。（谣传说，约翰逊为了要当合众国总统，收买了凶手。后来有人控告了他，倒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而是由于业经证实的欺骗行为。）

那面星条旗（挂在这里右上方）曾经绊住了逃跑的凶杀犯，并使他受伤，现在作为胜利的纪念物保存在国库里。林肯去世的那座房屋成了一个小型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这次事件和判处绞刑的图片和剪报。后来这里成了刺杀总统事件的专门陈列场所，詹姆斯·亚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的图片也陈列在这里，他于一八八一年七月二日被纽约律师查尔斯·吉托枪杀，因为加菲尔德对任命他为驻法国马赛领事一职不予批准；威廉·麦金莱总统的图片也陈列在这里，他于一九〇一年在布法罗[1]举行

[1] 布法罗，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城市名，也是著名商港。

的泛美博览会上被无政府主义者利奥·乔尔戈什刺死。林肯去世时那张床的上方挂着他的肖像，并保存着死者的石膏面型、纪念货币和林肯的遗物，以及迫使奴隶进行无偿劳动的那个时代的纪念品。

约翰·威尔克斯·布思的尸体在几年以后根据他的亲属的愿望被挖掘出来，重新埋葬在巴尔的摩绿色小山岗上的家族墓地里。

*　　　　*　　　　*

这里，一颗子弹结束了一个剧院的生命，真是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右上方是包厢，左下方是舞台。

孙坤荣 译

基希 [illegible]

同卓别林一起工作

“卓别林?!我们有幸到他那里去，您愿意同去吗?”

我当然愿意。

汽车停在隆普雷大街和拉布雷亚大街转弯处的一排红屋顶的小房子前面。很难设想，这排房子后面会有什么东西，尤其不会想到还有一个摄影棚；因为在好莱坞许多摄影棚构成了一片庞大无比的有围墙的建筑群，这些建筑物有着铁栅栏门和看门人，每一面围墙上都张贴着电影广告。这里，在一块很小的金属牌上镌刻着“卓别林工作室”。我们走进办公室，有一位小姐在那里，她正忙着，一会儿接通电话，一会儿处理来往信件。我们从她身旁走进内院。这确实是一个内院，放着摄制电影所需的布景、道具，假如在别的地方，这里就很难被称为一个内院，如果把这里看作是一个能够拍摄电影的内院的话，那么也一定要挂上“第三十五号舞台”的招牌，写上“禁止入内”，还得有一个看守人庄严地把住入口处。

有两个人向我们问候致意，其中一个说：“经理① 从那边来了!”

经理！老年人！领导人！我们转向经理，转向查理·卓别林。他哪怕穿一身和经理、领导人、老年人的身分相称的普通西服

① 原文Buss，可译为经理、领班、领袖、企业领导人等，卓别林从一九一九年开始，已是独立的制片人，故本文中译为经理。

也好，他尽可以在其他时间——当他不是经理、领导人和老年人的时候——去当那个我们十分喜爱的、深切悲伤的、滑稽机敏的流浪汉。但是，即使现在，他仍然穿着没有样子的、带补丁的裤子，一件破破烂烂的上衣，脚上是一双缝补过的大皮鞋，领带歪系着。他渐渐走近我们。他刚从工作的地方过来，他是一个经理，可是照常干活。

“哈罗！”他从老远就打招呼。然后，有人把我介绍给他。“好极了！”这位真正的、独特的、具有极明显个性的查理·卓别林回答。我们握了握手。他抱怨说，他的工作进展得不很顺利，他正在拍摄一部名叫《城市之光》的新影片，可是“现在又碰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真是倒霉透了，我们根本搞不下去了——年轻人，你们愿意帮助我吗？”

我们这些年轻人当然愿意帮助查理·卓别林。

我们面前的查理·卓别林和电影中的查理·卓别林并不完全一样。他虽然在工作，但没有在演戏。他没有戴那顶平顶瓜形小帽，没有拿竹制小手杖，鼻子下面那撮黑色小胡子也没有。此外，他脚上穿的皮鞋一点也不象在电影中出现的那样肥大、那样可笑；他穿的是一双已经穿旧了的、打着补丁、早就破了的鞋，也许有点大，但无论如何是一双普普通通的鞋。它们的经理的艺术才华使它们显得其大无比。现在，卓别林和我们这些要“帮助”他的人一起很快走向排演室；这位经理完全不是平足，皮鞋一点也不引人注意。他戴着一副角质眼镜。没有这副眼镜，他几乎无法写下他的名字，因为他的视力高度远视。

两绺银发在额前闪动。后边的头发却是灰白色的。“您应该把头发修剪一下，查理，”过了一些日子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但是他对于他的染色的头发毫不掩饰。“您看，我不再关心这件

事情了。现在变白的头发就不再染它。染发的事就到此为止。等到了四十岁，我的头发会完全变白的，就象是我三十五岁时曾经经历的那样。”“您的夫人现在干什么？”“我不知道，”他以一种漫不经心的表情说，“我有两个孩子，都在她那里。”

现在我们都在排演室里，在安装摄影胶带的时候，查理·卓别林就在风琴上演奏歌曲《紫罗兰》，并且唱着西班牙文的歌词，这首曲子并没有这样的歌词。他邀请我到他住所去，在那里，他将为我演奏管风琴，直到我听腻了为止。“怎么样，朋友们？”

他的那些助手证实了经理的话，的确，他的住所有一架巨大的管风琴，在这架管风琴上他随心所欲地演奏着，琴声很洪亮，不管他的客人听起来是否合适。

“我演奏得非常优美，”卓别林笑着说，“但是你们一点也听不懂。”

用“查理”来称呼、同经理说话的两个助手，一个叫哈利·克罗克，另一个叫亨利·克莱夫。哈利·克罗克是一个穿着厚绒线衫、非常诙谐的年轻的美国人，他在《马戏团》这一影片里，扮演穿着大礼服走绳索的人，也就是扮演卓别林的对手；此外，他还扮演受到查理欺诈的小丑以及其他一些角色。亨利·克莱夫的年纪比较大了，已经四十八岁，作为美国州一级杂技团里的魔术师，他有一段严酷的不平凡的经历。第三个助手象那两位一样也叫亨利，宽肩膀，大肚子。今天他正好不在，不过，这是个例外；后来，我们每次到卓别林工作室采访，亨利·伯格曼先生总是坐在与他相称的椅子上。但是，晚上老伯格曼（我们更愿意这样称呼他而不叫他“先生”，因为他是一个原始的马扎尔人）自己也是一个经理，他是一家好莱坞林荫大道饭店的老板，这家饭店

是专为那些名人和想要看一下名人的人开设的。卓别林培育了饭店主人亨利，好象给他嫁妆似的每天晚上到他这里来光顾，老伯格曼为了报答对他的光临，每天要到卓别林这里作客。

排演室里的家具除了风琴以外，还有一把黑皮靠椅和四把木椅子。卓别林要请我坐在皮椅上，但是我谢绝了，他似乎很满意，因为他交叉着腿坐在这把皮椅上非常合适，这恐怕是他经常坐的地方。

坐下以后，我们请他们放映电影。电影当时只完成了四分之一，大约四百呎，就是这些胶片，有的还要进行整理，有的还要剪接。电影开始了。

当我看到放表链的地方（请注意下面）就大笑起来。但是有人把手放在我的膝上，向我示意，要我别作声。究竟是谁，在我观看查理·卓别林的异想天开的想象时不让我发笑？原来就是查理·卓别林自己，他坐在我的旁边。电影还没有完成，我们应该予以“帮助”，我笑得不是地方，就好象可怜的卓别林在电影《马戏团》里学习小丑的滑稽时，也不应该笑一样。

这个片断放完以后，排演室明亮起来，我们耳语说：“好极了。”

经理婉言阻止说：“你们是不是愿意告诉我，你们看到了什么？”

确实非常愿意。一个姑娘在街道转弯处卖花，卓别林走过来了……

“噢，还没有。”

在这以前走来了一个男人同他的太太，买了一朵鲜花。

“一个男人？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一个男人，看上去有些象阿道夫·梅亚①。

“是的，一个服装时髦的先生带着一个女士。这一段很重要。接着呢？”

然后，卓别林在街口拐弯。他看到墙边有一口水井，他脱下手套喝水。不过，他脱的不是整副手套，而是一个一个的手指套。手指套少了一个，查理忙着寻找，但是没有找到。

“您看，查理！”哈利·克罗克胜利地高喊起来。

“不对，这里拍得不清楚。这场戏我们还要重排一遍。”（他向我解释，先脱手上没有的手指套，到地上到处寻找，然后才取下其余的手指套，这是个错误。）

现在查理从墙上取下饮水杯子……

“我表演的什么，您看出来了没有？”

“您表演什么？”

“我这一次是不是与以往有些不同？”

是的，您系着一条小小的蝴蝶领结，戴着手套。这一次，您想表演一个有些呆头呆脑的流浪汉，是不是？这样就忽然想到要取饮水杯子。

“请您也讲一下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挂在一条链子上，卓别林取下杯子，把链子缠到他的肚子上，卓别林注意到，这可是一条绝妙的表链；在喝水的时候，他想把它从墙上解下来（请看上面）。他解不开链条，听天由命地蹒跚着走向卖花姑娘。这位姑娘拿出……

“停一下，停一下。这中间还有些别的事情。”

卓别林异常严肃地看着我，充满忧虑，几乎恳求似的说：“这中间还有些别的。”

---

① 阿道夫·梅亚（1890—1963），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这中间还有些别的什么。

“来了一辆小汽车！”

对，是来了一辆小汽车，从车上下来一位先生，在卓别林面前走过。卓别林象以往一样向他问好。

“那么，小汽车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小汽车大概开走了吧。”

“见鬼，见鬼！”卓别林喃喃地说，“一切都搞坏了。”他的合作者也都很沮丧。

我接着讲下面发生的事情。姑娘递给卓别林一朵鲜花，鲜花落在地上，两人都俯身去拣，卓别林拾起鲜花，但卖花姑娘还在寻找；尽管他把鲜花递给她，可是她还在寻找。这时他明白了，原来这个姑娘是个盲人。他买下了这朵鲜花，离开这里。

为了证实一下，他有没有搞错，他又悄悄地溜回来了……

“不，不，他不是溜回来的。”

他第二次回来走得很快，仿佛只是匆匆经过这里，但是他站住了，逐渐放轻脚步，在原地走动。然后，他踮着脚尖轻轻走回来，坐在姑娘身旁。她刚用水洒过鲜花，把桶里的水倒干净——正好把水泼到卓别林的脸上。他悄悄溜走，又踅回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他又买了一朵鲜花。小姑娘要替他把花戴上，在这个时候，她在他的纽扣孔上感触到早先卖给他的那朵鲜花。卓别林告诉她，他是为她的缘故回来的。他还说，另外一个纽扣孔空着，但是她回答说，不能两个纽扣孔都戴上鲜花。于是他请她把鲜花收下，她就把这朵鲜花插在自己的胸前……

“……还有……”

……她恋爱了！

“爱谁？”

爱卓别林！

“见鬼，见鬼！”

？？

“是不是还有人走过？”

我可不知道，还有人走过。

“见鬼，见鬼！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又开来了一辆小汽车，又来了一位先生？”

没有，什么也没有注意到。

卓别林失望地把他的脸掩藏在两手中，靠在黑皮椅背上，做出一副悲哀的样子。他的那些合作者也很伤心。发生了什么事呢？当我，一个外来的客人，不理解一种插科打诨、一种突然的想法的时候，不幸究竟在哪里呢？！

噢，这比插科打诨重要得多，这是电影的根本思想。可是，这个根本思想非常不清楚，完全被忽视了——我讲的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事情。第一个买主和他的夫人的出现形象地说明了这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街道。卖花姑娘把从汽车里下来的先生认作是买了鲜花，并且为了她的缘故又回来了的那一位。这辆小汽车——我们对它一点也没有注意——在整个这一场戏里一直停在街口。

正当卖花的盲女郎依照卓别林的愿望把第二朵鲜花戴在自己身上时，那位先生又转回来，上了汽车。产生的爱情是对着他①——那位有汽车的富人的。现在卓别林应当注意到这一误解，他在整部电影中扮演了富裕的追求者的角色；他偷窃金钱，因为她需要金钱动手术医疗失明的眼睛，并把钱偿还给医生；他

① 着重号是原有的，下同。

被逮捕了，在监禁以后又和姑娘见面。双目复明的盲女郎将第一次看到他，并且——嘲笑他，因为她并不知道，他是谁，他看起来是这样的可笑，就象卓别林可笑的样子那样……

但是假如观众不能迅速地领悟悲剧性的误会，卓别林的震惊，他的显而易见的犹如乞丐一样的贫穷，对于巨骗和偷窃顷刻之间的决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这场误会，都是为了他的爱情，都是为了她的爱情——假如观众对所有这一切没有起码的理解，那么所有这些镜头就都失败了。

“我们必须把这场戏重拍一遍，”卓别林说。

这些细节该如何导演、如何表演，现在开始了严肃的、艰巨的、极痛苦的探讨，这项工作几乎延续了八天。甚至在夜晚很高兴的时候，查理也会突然打断这种气氛谈起工作说：“假如我们这样来处理卖花姑娘的话，你们看怎么样……”

关于演员、丑角、导演、民间戏剧艺术的书已经写得不少了；为什么还没有人着手尝试写查理·卓别林这个传奇式的人物？为什么没有人通过速记或录音把他的工作情况记录下来呢？这个查理·卓别林现在正在创作、演出和表演，他在戏剧史上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

这场戏整整排演了八天，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无数次地试演了卖花姑娘（试演最少的是弗吉尼亚·谢莉尔，因为她扮演这个角色），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试演了从汽车里下来的先生，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试演了打开车门的司机。但是，查理·卓别林① 每次都由查理·卓别林扮演，每次试验他都全力以赴，有时充满着希望——但有时又毫无希望。

---

① 这里指电影中的流浪汉夏尔洛。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假如……”事情总是这样开始。有人跳起来，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并且部署其他人怎么做。

不久大家都认为，开始时的情景，在戏剧上不可能处理好：小姑娘把卓别林当作刚从汽车里下来的先生这一事实，观众是绝不可能理解的，因为观众这时还不知道，她是个盲女郎。所以必须在事先说明她是个盲人。卓别林拒绝了这个意见，他必须和观众一起同时发现这个悲剧。

能不能深入、透彻地塑造好汽车这场戏，使广大观众至少在以后回忆得起来呢？这样处理怎么样……那位先生从汽车里下来，说：“司机，您等在这里。”卓别林有礼貌地关上了陌生人的车门，卖花姑娘向汽车走了几步……

或者这样：那位先生以同样的步伐走在卓别林的后面，然后停下来，点燃一支烟，这样卓别林就以为递给陌生人的那朵鲜花是给他的。

或者让那个拥有汽车的人是个十分漂亮的年轻人，神气十足地从汽车上跳下来，不要显得太无所谓的样子，你们看这样好不好？虽然卖花姑娘看不见他，但观众是看得见他的，会注意到：他对于这个姑娘来说必定是十分重要的！人们会想象到盲女郎在幻想些什么。

这样处理怎么样，让那位已经被人认出了是盲人的姑娘，拿着第二朵鲜花对卓别林说：“请您把它给您的司机。”

或者这样安排好不好，让卓别林帮助这位先生上车，而卖花姑娘试着通过窗子把第二朵鲜花递给那位先生，但是她撞在玻璃上，而且这根本不是什么窗子，而是打开着的汽车门，门的后面站着卓别林。

“妙极了，妙极了，”卓别林高喊起来，并且进行试演。他演

得非常好，但突然间他跳到他的靠背椅上，并且一下子软瘫下来："这不行。一分钟以前，卖花小姑娘双目失明使我动心，我爱上了她，一分钟以后我怎么就去充当一个趋炎附势的走卒了呢。"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那个人说："司机，回家。"或者说："去里茨-查尔顿饭店，"卖花姑娘站在他的身旁，似乎看到了华丽的宫殿或饭店的大厅……"噢，扯到那里去了，别胡说八道！"

这样做如何，让这个卖花的盲女郎仿佛透过卓别林、透过空气目送汽车……而卓别林突然注意到，她把他当作那个富人了。汽车也要有人点一下，它怎样在下一个街口转弯，接着又转了第二个弯，第三个弯。卖花姑娘呆呆地目送汽车远去。虽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得见汽车连转几个弯，但是这个小姑娘是个盲人，只有她能看到……

就这样排演了好几天。有时在建造的街口进行，在这个街口可以乘汽车做转弯试验；有时在举行军事会议的避暑别墅里；有时在衣帽间里，或者在三个富于寓意的人物的巨大的纪念碑前，它的目的卓别林要求我们长期保守秘密，直至这个纪念碑和这个秘密在世界各洲的所有居民前公布出来为止。

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讲一段插曲。例如衣帽间，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衣帽间，而是整个工作室中最富于社交应酬的场所。左边是一间备有镜子和化妆桌的小房间，另一边是一间浴室。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喝茶，一个很有名望的女士、卓别林的最好的女朋友来访。他去迎接她，我走进旁边的房间去梳头。

镜子前面放着一把白色的梳子，梳子不很干净，上面还留着一些梳下来的黑头发。我把头发弄出来，丢到地上，就梳起头来。这时我突然想到，人们可能在清洁光亮的镶木地板上看到

细小的头发，知道有谁擅自使用了经理的化妆室。难道这些短发是有意留在上面的？于是我又把头发拣起来，重新放到梳子上。

哈利·克罗克从外面进来，也要修饰打扮一下。"您看，"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白色梳子上的黑色东西，"这是嘴唇上面的小胡子，他已经用了十五年，总是这副胡子。这胡子是一位纽约的剧院理发师给经理粘上的。在各种气候条件下排演，别的胡子没有一种能连续使用几个月而不坏的。这位纽约理发师后来我们再也找不到了。如果胡子一旦坏了，查理说，他将剃光了胡子进行表演。"我的脸一下子变白了。好家伙，你们想想，卓别林没有小胡子而罪魁祸首是我。

同卓别林的谈话总是一再围绕着美学目的和社会目的的统一问题。在他的作品里是体现了这种统一的，社会上把他斥之为"激进派"和"布尔什维克"。而在谈话中他对这种统一却一再表示怀疑，其原因也许是为了引起讨论，也许想从来访者那里得到新的论证，也可能是受好莱坞的气氛渲染所致。

我们时常谈论电影。他也讲了不少他的电影中的片断。《马戏团》这一影片中的猴子，把他抓得伤痕累累，有六个星期之久他得待在医院里治疗，至今还有两处非常明显的伤痕。

拍摄《马戏团》时，猴子的主人喊叫起来。这四只猴子是分别属于四个主人的，而每一个主人都认为他的猴子应扮演主要角色。"把摄影机转向下面，"有人向电影摄影师喊叫起来，"你看到没有，乔尼① 在地上。"另外一个说："现在，现在开拍！獴狳转过脸来了。"查理表演这样一场戏：四只猴子，四个驯养猴子的人，他自己和摄影师。

《一个美丽妇女的夜晚》没有获得成功。他问我——基希先

① "乔尼"以及下面的"獴狳"都是猴子的名字。

生——对《枪上肩》估计如何？我并不知道这部影片，因为它在德国可能没有上映过。

“现在这部影片在美国马上就要禁演了。您得去看一看这部电影，您必须立刻就去。”

他扔下手杖和帽子，跑到排演室。我坐在那里，这个地方是几天前在拍摄《城市之光》片断时我坐的地方，当时旁边还坐着一个人，他禁止我鼓掌。今天有一个人坐在我身旁，他时常攫住我的膝盖或拍拍我的肩膀，说：“您现在要特别注意——现在将要出现一个精彩的场面。”哎，你这个家伙，不要碰我，在看“卓别林电影”的时候，需要谁来给我忠告，叫我特别注意呢！

“您看，人们还把这件事归罪于我呢，说我把臭乳酪作为美国的爱情的礼物，而对这件事情的背景情况则完全被掩盖起来了……”（战士卓别林躺到水里，拿住一只喇叭口放在嘴上，免遭溺死。一清早他从水中拖出麻木的双脚，进行按摩，后来他才注意到，这两只脚原来是躺在他身旁的两个人的。）

“有一场戏”（卓别林化妆为一棵树躲在德军战线的后面）“我们是在郊外摄制的。拍这场戏的时候，没有一个预备演员能够来代替我，天气热得要命，我们必须来回奔跑，我疲惫不堪，终于累垮了。您看到这个胖子吗？您认识他吗？”当然，我认出来了，他是老伯格曼，他安静地坐在我的前面，正回忆着在热得要命的天气里跟在一棵逃跑的树后面追逐的情景。

“您看……？您看……”

活见鬼？好，我看着呢。我都看到了，请您别打扰我！

但是底下一个场面使人想起高尔基的一个中篇，小说写一个老年妇女，她请人给她臆想出来的情人写信。

战地邮政没有给战士卓别林带来任何东西，这自然使他感

到失望，连个明信片也没有。他只好在人背后越过肩膀看同伴从家乡来的信。卓别林满意地点着头，因为信里说，在家乡所有的人都很好。卓别林对两个孩子说的话笑了起来。那头棕褐色的花母牛在八天前病死了。卓别林为这头棕褐色的花母牛哭了起来，他的眼泪落在正在阅读信件的人的脖子上。

这个人愤怒地转过身来，卓别林遗憾地以卓别林特有的方式耸耸双肩；他只得内疚地蹒跚着离开，因为他没有权利看信，去分享欢乐和痛苦……

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把手放在坐在旁边的人的膝盖上。

孙坤荣 译

这就是所谓的足球比赛！

一　观看比赛的路上

“这种美国式的足球比赛，是一种危险的运动！”

贝克尔博士是这样认为的。当他——星期六下午一点半钟——站在地下铁道车站大厅里，准备乘车去观看纽约大学对密苏里大学的足球比赛时，他就有这样的看法。

他还从来没有观看过美国的足球比赛。

正象上面说的那样，星期六下午两点正，贝克尔博士坚定地认为：“这种美国式的足球比赛”是一种粗野的、有生命危险的运动。但贝克尔博士自己却没有那样坚如磐石，站着不动。开始时，他象楔子一样嵌入候车的密集的人群，渐渐地被挤到了月台的边缘；站在前面几排的人为了在地下铁道的列车上得到座位，他们不顾下车人采取的各种自卫手段——咒骂、践踏、拳击，还是把下车人挤回到车厢里，而自己也就跟着硬挤了进去。现在是星期六下午两点半钟，贝克尔博士抓住旁边的人，斜挂在地下铁道线上。

这样挂着实在太危险了。可是，当他于星期六下午两点三刻被后面的人挤进车厢里时，他宁可待在外面。这节车厢把一群爱好娱乐的人运往北美运动场。贝克尔博士决不能再想别的了，他只得顺着“美国式的足球比赛”是极其粗野、一定有生命危

险这种想法继续想下去。当然他对这个问题只愿——他确实还没有观看过别的比赛——这样说，这项运动有伤观众的风化，并且对观众有生命的危险。现在贝克尔博士开始设想，运动员同观众相比是多么舒服、多么……贝克尔想错了。

二　运动场周围

人们组成一定的队形涌向运动场，坐汽车的人驾驶着汽车成群结队，走路的人也是成群结队，这种情况用不着多说，因为和我国差不多。和我国特别不同的是，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不怕牺牲，突然跑到汽车行驶的路上，挡住汽车。自从阿诺尔德·温克尔利德[1]以后，只有美国从业人员才能干出这种不要命的事来。他们用洪亮的声音命令驾驶汽车的人把车停在他们的停车场上；当命令不起作用时，他们就以祈求的手势进行恳求。他们租用了场地，星期六是唯一可以搞投机的一个日子，因此，他们为了挣钱，连生命都不要了。但那些汽车，轮胎的气鼓鼓的，从这些阻碍交通的人身上驶过去。

三　惊呆在运动场上

贝克尔博士进了运动场，惊呆了。我们不能把事情归罪于他。他同成千的人一起挤在地下铁道里，又挤进车厢；他同成千上万步行的人和成千坐汽车的人一起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而运动场上的观众席多空啊！！

---

① 阿诺尔德·温克尔利德，瑞士民族英雄，生年不详。1386年在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曾帕赫战役中英勇献身。

在运动场里至少有四万个座位空着，为此，在形容这个场子时，必须用“空着”这个词。

当然，这丝毫也改变不了在四万五千个座位上有人这一事实。北美运动场可以容纳八万五千人，现在差不多正好空着一半位子。

四 比赛的前奏

开始时运动场上有一个开道的军乐队进行演奏，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军乐队，而是由穿着制服的大学生组成的乐队；乐队的鼓手戴着饰有羽毛的白色高帽子，面部表情非常严肃，他是纽约大学的旁听生。他们缓步而行，大家鼓掌。

密苏里大学的运动员跑步入场，大家鼓掌欢迎。他们有三十个队员。虽然出场比赛的只有十一个人，但是不断需要预备队员入场替换补充，这一切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

纽约大学足球队连同他们的预备队员进场了。场上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纽约大学队员穿着紫色上衣、橄榄绿色裤子，客队密苏里队穿着红—黑相间的运动衣。所有的队员都戴着头盔，主队是白色的，客队是金色的；圆形的、结实的防耳罩保护着耳朵——在文明的比赛中人们已经不再互相抓耳垂。

此外，运动员身上也全部裹着棉絮，这一点贝克尔博士很不满意，因为一场缠着绷带进行的足球比赛在他（一个欧洲人）看来是不合逻辑的。

裁判员入场了，先进场的是低级裁判员，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主裁判入场了，这是一种高级裁判员，欢迎他的是暴风雨般的掌声。

五　狂喜的拉拉队员

本文中一再出现“掌声”、“热烈的掌声”和“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些字眼。现在也许该谈谈这些概念的沿革和样式。

现在，边线外侧有许多热心的年轻人来回奔走，他们的正式头衔是“拉拉队长”。这些拉拉队的组织者在比赛中间拿着扩音机，走到运动场的各个区段前面，大声地指挥着：现在该向哪一个球队或哪一个运动员欢呼。命令发布完毕，他们就放下喇叭筒，指挥大家欢呼喝采，——他们在做关节操：双膝弯曲，两臂高举，又向两侧平伸。这种礼仪和节奏来源于古印第安人，贝克尔博士听得最多的是为密苏里队的后卫罗森海姆加油的呼喊，或者是为纽约队的左前锋杰里·内梅切克加油的呼喊。

啦、啦、啦，
西斯、蓬、啪，
纽约大学、纽约大学，
内梅切克、内梅切克、内梅切克。①

（我不能保证拼写是否正确。）

六　球

美国的球完全不象欧洲正常的球那样圆。它的形状象一只

① 原文是：Rah, rah, rah,
Sis, bum bah,
N. Y. U.,N. Y. U.
Nemecek,Nemecek, Nemecek.

李子，象一只很大的但还没有成熟的李子；李子还不圆，两头是尖的。球的外形就是这样。这种球的形状，很适合于这种球类的运动目的。

一声爆炸使毫无准备的贝克尔博士大吃一惊；球场边线正中的火药爆响了，比赛开始。

七 球赛的自然记录

美国的全民体育运动叫做“足球”（“Football”），仿佛没有其他足球运动似的，仿佛它就是同“足”或同“球”有关似的。（请看下面。）在美国，那种产生于欧洲的足球比赛有的在健身房里进行（职业运动员），有的在室外进行（业余运动员），但从来没有称为“足球”，而是叫做“Soccer”①，这个字可以说是从“Association”（联合）这个字演化而来的。在美国，所谓的足球无非是橄榄球加上一些修改过的运动规则。

比赛分四场进行，每场十五分钟。比赛场地有一百公尺长，每五公尺划一道线。有两个球门，横杆不是置于两根垂直的木柱的上端，而是放在两根木柱的中间。三根木杆组成一个“H”形的字母，但这不象在理性的大陆②那样表示球门是一种圣物③；相反，球门立于比赛场地之外，它的作用并不重要。

球门前五米处是第一道横线，球门线横过整个场地，比赛场

① “soccer”是美国俚语，也是足球的意思，它有别于“Football”（德文Fußball）。

② 理性的大陆，指欧洲。

③ 圣物，原文Heiligtum，以字母“H”开头。

就从这里开始。哪个球队把球带过对方的球门线，它就得“触地分”，就算赢了。这有些象我们那里踢进球门一样。

一个球队得到一次触地分，就算获得六分，而且有权让他们的一个运动员在离球门二十米的地方射门，对方不得防守；如果球越过横杆，就是好球；可以加一分。

一个队可以先投掷三次，这三次“传递”必须把球向前至少传十步远。如果球被踢过球门，就可以算三分。

八 比赛进程

球时常被带来带去，或者不如说：队员力争带球。因为对方十一名队员追逐着球，不让你带着球越过十步远的地方，更不让你越过球门线。

他们如何挡住球呢？

他们截球的方法是，用戴盔的头猛冲对方带球的队员的腹部，抱住他的脚，拳击他的脸部，或者用类似的“温和”的动作对待他。

这样，用不了四分之一分钟，带球的运动员就摔倒在地上，这时，本队队员和对方队员都压在他身上，成为非常可怕的一堆肉体。裁判员吹哨了，压在一起的一团人逐渐散开。

刚才还是骄傲的带球的运动员，躺在最下面，他或是受了伤，或是昏了过去，或二者兼而有之，通常都起不来了。穿黑衣服的俱乐部仆役急忙奔到场上，为牺牲品做人工呼吸和灌醋，使他清醒过来恢复知觉。有时也有医生带着药箱来到场上。裁判员在运动场上是不能容忍偷懒的，他让人把受了重伤的运动员抬走。

时间就是金钱。那还残存的运动员喝了一些冰镇水清醒一下，继续投入比赛。再过四分之一分钟，有时半分钟，又摔倒一个。

九 如何投球

先投球的队站在球后三步远的地方，组成一个圆圈，弯着上身秘密地进行商讨："四号传给七号，九号传给二号"，如此等等。

然后十个队员迈步走出来，站好一列，摆好阵势；第十一名队员留在后面，通常把球掷给他。因为他是唯一不需要掩护的队员。

对方的十一名队员也弯着身子站在离他们一步远的地方，面对着这十名运动员。他们也同样决心无情地击溃对方每一个持球的队员。

十 纯粹是象征性的球

球代表了接力赛跑时的接力棒。人们可以用另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替代它，只要这个东西也能带过球门线。整个比赛实际上是奔跑，而对方则进行阻挡。这就象古时打仗方阵对方阵。

在这种别具一格的足球比赛中，很少用足踢球，况且用足踢意义不大（请看上面）。

十一 四万五千个不倒翁

伴随着比赛的激烈战斗场面，观众中的激动和狂叫是没有

什么值得奇怪的，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激动每四分之一或半分钟平息一次。

投球的一瞬间，场上的四万五千个观众(坐满的话有八万五千人)，都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裁判员吹哨以后他们又都坐下来。这种不停地坐下来和站起来的人群的景象是非常壮丽而滑稽的。

休息的时候除了演奏音乐以外，还有形形色色毫无趣味的供人消遣的表演，例如一个穿着熊皮衣服的人(熊是密苏里的标志)与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纽约人)的大学生在作角斗表演。

新闻记者席上的记者正在工作。有的在莫尔斯电报机上发报，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进行无线电广播。有人按动荧光屏上的电钮——这时，美国各个报社大楼前都出现了足球比赛的画面。在离比赛场地千哩之遥的圣路易斯、旧金山，人群站在报社前面，看见并听见裁判员判“越位”；他们大喊大叫“说谎”、“欺骗”……

十二　贝克尔博士批判的观察

贝克尔博士满脑子都是欧洲的运动概念，看见“足球”这个名称，看见有球门、有皮制的球，思想给闹糊涂了。他差不多用了三刻钟的功夫去捉摸这项运动的意义。这里，我们把这个意义奉献给本文幸运的读者。

观众都很激动，而贝克尔博士却无动于衷。因此他有时间进行细微的观察，观察结果需在这里公布。

1、美国的足球运动与欧洲的足球运动相比共同点是：都是表现团结、速度和沉着镇定；

2、美国的足球运动与欧洲的足球运动相比优点是：大大发扬了勇敢精神，同时很好地锻炼了上身和两臂；

3、美国的足球运动与欧洲的足球运动相比缺点是：在美国的足球比赛中，身强力壮的运动员同身体瘦弱的运动员对阵有利于前者，后者不能充分发挥熟练的技巧使力量得到平衡。

十三　比赛结果和战利品

当贝克尔博士得出上述结论时，裁判员吹哨宣告比赛结束，比分是二十七比六，纽约大学队获胜。获胜的队员拆了球门的柱子，带回去作为战利品。

在地下铁道、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这时是星期六下午五点正——又开始了有生命危险的战斗。

孙坤荣 译

纱厂童工

一

“一份就够了，”大夫说。

我们曾经请求允许多抄几份病历。

“何必要几份？病案基本上都一样，”他环指着上海结核病院的床位说。发育不全的儿童在咯着血。

“都是女工，她们有同样的病历，同样的诊断书。您何必要几份呢？一份就够了。”

真的，一份就够了：

蔡碧，女，十八岁，浙江人，七年前随父母来上海。十一岁起在纱厂做工。十月前（时年十七岁）初次来月经，三月后来第二次，两次排血极少，又淡又稀。后即停经。病人每日在厂作二十三小时，有时夜班，有时日班，除冬季有一星期假期外。父亲五年前死于带红色粘液的腹泻（或系赤痢）。母亲尚存，迄今健康，惟近患咳嗽，有痰。妹亦患咳嗽。经确诊，家中无人患结核病。

患者主诉：近月来剧咳，有绿痰。发病时恶寒，发烧并昏眩。约两月前有轻微咳嗽，发病后浓痰剧增，近日痰有恶臭。患者又诉，浑身衰弱无力，并盗汗。患者不顾上述病痛，一直上工到入院为止，虽然由于咳嗽基本上不能工作。

关于早期疾患，患者称三年前患过赤痢，一年前患过扁桃腺

肿大。

现状：营养不良，发育不全。阴毛、腋毛俱无。乳房发育与十三岁女童同。指甲透明。脸部及附属部分轻微发绀。

诊断(根据透视)：右肺上叶患青春期结核，有中度空洞。

“有救吗?”我们问医生。

“在中国？没有。”

二

中国的工业确实已经成年了，它的工人却没有。在生理上还没有：它的工人的百分之四十是由儿童构成的。我们从病历中获悉，他们即使年龄上已经过了童年，体格上也还没有摆脱童年。

让我们巡视一下一家大工厂的纺纱车间吧。小女孩们在纺纱机、摇纱机和粗纱锭旁操作着。没有一个孩子看起来超过六岁。但是，我们从病院了解，这是迷惑人的假象。那里二十岁的人显得象十三岁，因此这里模样不超过六岁的、在机器旁边劳动的人，大约已经十一、二岁了。

她们可以用小手对付每一根需要对付的纤维，她们可以插上空锭，拿走满锭，而不必踮起脚来，或者站在小凳上——那些机械跟她们一般高。

这是些英国造的机器。这种技术上的胜利很少受到夸耀，我们在儿童纺纱机上从没有看到什么字样，小机器上甚至没有炫耀制造厂的小金属片；而在每座大机器上往往醒目地刻有“阿萨·里斯，欧尔德汉姆”或别的英国工厂的名称。

“这些小型机器是专门为中国制造的吗?”我们一有机会，就

向一个英国厂方代理人探询。

他慌忙向我们保证，事情并不是这样。“相反，童用机器在兰开夏整个纺织区就使用了几十年了。因为英国禁止童工，这些机器才运销美国，运销新英格兰，并运销南部蓄奴各州。现在才运到殖民地和中国来。”

我们不公正地怀疑英国，于是客气地请求原谅。

三

纺纱车间有两百米长。许多机器都由少女操纵。

儿童只做清扫工。纤维屑和灰尘形成烟雾，不断飞扬，因此需要不断清扫。每个孩子用两把扫帚在地上对着扫，扫成一堆，由另一个孩子装进土箱拿走。扫把有扫地的小孩三倍长，他们把它倒举起来扫，因为传送轮的盖子上面和推动带上面都是纤维屑，必须把它们扫下来，好腾出空地让新的纤维屑铺上去。

打包车间和发电车间的活却由男人们来干。就是在工厂的办公室也看不到一个妇女，连上海的英国工厂也没有；和它本国的联络工作归城里管，由远离中国人的城里写字间来管。

厂门口穿着制服、武装到牙齿的警卫人员也是男职工；他们哨所的警报器恐怕是工厂最现代化的设备了。

纺纱车间的工人都是妇女。有老、有少，还有孕妇。的确，纺纱车间还有不劳动的小孩。他们只是吃奶的婴儿，躺在装经线机或织布机下面的筐子里；到吃奶的时候，就从下面把他们取上来。

让婴儿待在工厂里，对他们肯定是不利的。由于这个缘故，便禁止携带婴儿入厂。这项禁令也许是根据如下的设想：婴儿

第一不能劳动，第二妨碍母亲劳动。

第二个设想已经证明是荒谬的。进厂的婴儿根本不会妨碍机器运转。反之，年轻的母亲加倍小心地照料着卷经线的木轴和梭子，因为不然，一次处罚甚或开除不仅会使她本人、还会使她的孩子饿死。

所以，没有一个老板认真要求遵守禁止婴儿入厂的命令。他由于这点善行，便自认为特别人道，正如他认为雇用童工是对无产者家庭的一桩德政，否则他们全家都得饿饭。

四

上海、武汉的纺织工人，百分之四十是小女孩，百分之四十是妇女，只有百分之二十是男人。工业界精通生意经，懂得利用一种宗教偏见。在中国，有了一个儿子，不但生有意义，死也有意义。因为，一个人在世上活一场，要是没有留下一个男性后代，将来祭祀自己，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女儿则不然，她是完全多余的。在灾区，新生的婴儿给抛掉喂狗。如果可以把女孩卖给人家当丫头，那到底还值点钱啊。于是，人口买卖盛行一时。在英国皇家政府直属殖民地香港最为盛行。殖民地大臣每被质询到"妹仔"买卖问题时，他便回答下议院说：这些小奴婢是专门卖给人家使唤用的。

公开买卖儿童充当雏妓，更是比比皆是。在大城市的花街柳巷，随着华灯初上，出现一些奇形怪状的人群：一个穿蓝裤子的半老徐娘，身旁按身材排列着她的大大小小穿着淡蓝丝绸短褂的女奴。这时，老鸨便向每个过客攀谈，指着她的货物赞不绝口，而那批货物则漠然站在那儿。左边排列着儿童，她们也毫无

表情地接受愿出价钱的雇主检验；要是被他们中间一个选中了，这些小家伙就一本正经地引着她们的客人，匆匆走过后院和后楼梯，踅进香巢。

还有一帮少女收购者在为工业界帮忙。他们购买了一批儿童，给她们一个睡觉的地方，给一碗饭让她们带着去上工。上工之前，一个苦力推着车来了，带着十二个儿童，一边六个坐在他的独轮车上，把她们送到杨树浦的纱厂去。儿童的工资则落进了她们主子的腰包。

大城市的苦力几乎从没出卖过他们的小女儿，因为她们必须跟他们一道赚钱。整天在工厂、码头做工，或者拉黄包车，苦力每月收入 10 枚到 16 枚银元，而按照上海劳工委员会的调查，一对夫妇的最低生活费为 18 元，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家庭的最低生活费为 21.30 元。这样，就不仅是老婆，连儿童也必须一齐做工，才能达到这个悲惨的水平。成人的低工资既是童工盛行的原因，又是它的后果。

五

1919 年在中国，中国工厂主有 889,000 枚纱锭，日本工厂主有 333,000 枚纱锭；今天在上海和武汉，中国纱锭有 2,499,000 枚，日本纱锭有 1,821,000 枚，英国纱锭有 178,000 枚。

抵制日货运动，经常是抵制在中国土地上、用中国棉花纺织出来的货物。只有股本和红利才是日本人的。

六

四百五十万枚纱锭。儿童们把空锭子运来，又把满锭子运走，小心翼翼地不让纤维纠缠起来或者断掉；要是断了，她们就用小手指把它捻在一起。英国造的儿童纺纱机，真了不起，了不起，减轻了她们的劳动。

一些少女骄傲地佩着黄带子，值班人的标志。儿童当起监工来，是相当厉害的，她们以掌权为乐事，苛刻地告发她们年长的工友，一方面为了显显威风，另方面也为了报复一下那个小伙伴，她昨天值班时告发过今天这个值班人。

成人们很懂得充分运用儿童们的这种把戏。不仅是在工厂里。在上海酒吧间和水手俱乐部门前，通宵站着身穿五颜六色号衣的中国儿童。当一个贴广告的或一个拉门的，并不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于是他们就帮助巡警来虐待黄包车夫。要是有位客人离开了酒吧，一群久久巴望这一刹那的人形马匹就拉着他们的车子呼叫着，邀请着，祈求着向他拥来，这正是找一趟活、赚几个铜钱的好时机。不准走上人行道的禁令对这些可怜的苦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巡警在他身上抡着大棒，对他又算得了什么呢？小小的看门人于是兴高采烈地利用这个机会来为巡警效劳了，他们用棍子猛击着黄包车夫的头部，踢他们的肚子，推翻他们的车子，拽住他的车轱辘，要把它们拆掉，直到（真是辱没煞人的场面）穿着工人短衫的中国成人跪在身穿五颜六色号衣的中国儿童面前，开始抖动着双手，一口一声“好来兮”地讨饶。

我们还是来谈谈工厂吧，来瞧瞧这些终身监禁犯吧。“终身”二字在这里比在刑典中有更实际的意义；新生的婴儿躺在织

机下面，小姐姐站在纺纱机旁边，妈妈拿着木轴卷经线，奶奶在缝纱包。宝贝，按照你摆不脱的规律，你也将这样了结你的一生。

在这个纱锭嗡嗡、织机轧轧、空中充满碎屑片、绒毛和粗麻丝的大车间里，你的脸变得苍白起来，你的眼睛昏浊朦胧，你的腿衰弱无力。第一天教给你的技巧，也是你最后一天掌握的技巧，此外，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学习和经验的了。学校和游戏场不是为你这个不准当儿童的儿童而建立，也不是为你那些不准当同学的同学们而开设，更不是为你那些不准当游戏伙伴的游戏伙伴们而存在的。

七

儿童们中午不休息，每天劳动十二到十四小时。纱锭一直转个不停，就是在一帮孩子匆匆跑到锅炉房，为自己和同伴去拿小饭篮时，它也一刻不停地旋转着。她们一边吃着，一边还得注意让曲柄继续转动，让环形车床继续震响，让纱线继续伸展下去。纤维屑和灰尘在筷子上面飞扬，落到饭粒里面去。

上午和中午，儿童还没有成人的那种听天由命的表情，她们快乐地扮着鬼脸，干起活来象在游戏，可是，傍晚再瞧瞧她们吧：小眼睛眯得睁不开了，小腿儿在打颤。孩子们一点也不想玩，只想休息一会儿。休息？工厂决不会白发工钱，让那些大大小小的“拿工钱的”在上工时间去休息。

在上海大纱厂里，十五岁以下的儿童拿 22 分钱（说话时是：二角二分）一天，在缫丝厂拿 6 分钱一天。

八

在上海缫丝厂，工头手里拿着棍子四处走动，以便当场惩罚每一件过失。

妇女们沿着墙坐在铁凳上，对面站着儿童，往往刚满五岁。小家伙们把茧子放在沸水盆里泡软，她们的小手烫坏了，因为她们泡茧子，既没有橡皮手套，也没有汤勺。炽热的蒸汽钻进她们的眼里和肺里，她们在蒸汽里找到丝头，便把茧子递给妇女；她们再把每六根丝搓在一起，并在一架用脚操纵的缫丝车上卷起来。每个小孩为两个妇女供茧，一个妇女同时抽三十只茧——五架缫丝车，每架六根丝。

蒸汽、炎热和汗臭。没有通风设备。那个拿棍子的男子在车间走来走去，防止任何停工现象。

九

儿童们在父母的家庭作坊里，既无限制又无报酬地劳动着。不过这里没有机器、没有拿棍子的陌生男子为她们规定劳动速度。大工业利用童工，就是从这种宗法式的劳动关系开始的。

现在，原始资本主义积累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它那种要命的生产方法本来是可以设法废止的，要是——要不是孙逸仙逝世以后，革命的工会被刽子手的斧头和手枪变成了尸堆的话。

上面的决议呢？咱们且听听！上海童工调查委员会于一九二四年七月九日给工部局（公共租界的议会）的报告中提议，发布一道不准十岁以下儿童进厂做工的禁令。该报告还建议，限

制十四岁以下儿童在一个二十四小时的工作日里劳动十二小时，准许他们十四天有一个休息日，不让他们操作危险的、有碍健康的、没有劳动保护的机器。

上帝知道，这可是一个相当温和的建议。但是，即使这个建议也被整洁的上海洋大人搞垮了。为了决定这项改革是否通过成为法律，得召开一次非常的公民会议，但出席的区域代表约302名，不到通过决议所需要的人数。英国报纸次日在发表了纳税人会议未获举行的消息之后，坦率地加以评论说：大多数纳税人认为不出席是防止对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达成决议的最简单的办法。

一份关于上海社会状况的报告就这样完结了。

刘半九 译

南京和红军

什么？南京是个沉闷的城市？

我可一点也不觉得，相反，它消息灵通，令人兴奋。例如今天，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全副武装的部队从中山路开过了好几小时。

那又怎么样呢？马路本来可以走人(过部队)嘛，这是老规矩，中山不正是一个路名吗？

中山可不仅是一条马路，中山还是孙逸仙在外国用过的战斗的名字，为了纪念他才用作路名的。

为什么一条按照孙逸仙的名字命名的马路就不应当过部队呢？难道孙逸仙是个和平主义者吗？他不是指挥过内战吗？如果他还活着，他难道不会身先士卒地走过这条马路？

当然，在他的马路上过部队，本身无可非议；孙逸仙并非和平主义者，他的确指挥过内战；而且如果他还活着，他甚至会身先士卒地走过这条马路。但是，不会率领这个部队。

不会率领这个部队？可不是十九路军吗？可不是半年以前在上海迎战过日本人、并让日本人止步不前的十九路军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呀。那不正合乎孙逸仙的主张吗？

是的，那正合乎孙逸仙的主张。但是，现在他们正开去攻打红色苏区，正从中山路、孙逸仙的马路开过去。难道这也无所谓吗？孙逸仙说过这样的话，共产党的每个敌人同时也是国民党

的敌人，都应当加以驱逐。他的那篇声明曾经为他招来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仇恨，促使它利用英国武器进行过武装反抗，上面是怎么说来着？"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开始了中国的新生命。因此，让我们今天来庆祝这场革命，然后让我们来仿效俄国人。"

而且中国不仅在政治上想把苏俄当作唯一的榜样（中国正想依仗苏俄的帮助来建国、来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在军事上也想这样办："你们必须以俄国的红军为师！"孙逸仙就这样向接受他检阅的广州政府军号召过。

今天这个部队却要开去攻打中国红军了。一个月以前，它从上海郊区调出来，开到了南京。为了整编的缘故。每个人的身心都得检查一番，当然不是从医学意义上而言。凡是言行可疑、似乎不够格充当愚蠢的反动工具的人，一律不客气地予以开革。这些被开革者的空额再由其他部门的可靠分子来填补。家喻户晓的牌号却保留下来：十九路军。一切都严格按照军事顾问、德国军官的指示弄得服服帖帖，训练有素。三十名德意志帝国—共和国的军官。他们随同鲍尔上校而来，深受蒋介石的信赖。协约国原先害怕德国人会为他们的与生俱来的军火工业缔结太多的军事合同。是不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今天对于列强并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德国人领导中国军队的装备和训练，恰如国际帝国主义所希望的那样。无论如何，英国是满意的，觉得他们工作得比美国军事专家还好；美国也是满意的，觉得他们工作得比法国军事专家还好。

曾经没有装备、没有训练而抵抗过日本人的十九路军，它今天却装备得、训练得那么完善，可以用来攻打中国，攻打苏区了，而那里正在进行和平建设，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封建统治，没有外国人，没有鸦片，没有私人银行，没有童工，没

有儿童贩卖，没有传教士，没有内地关税，没有土匪将军，没有暴徒，没有贿赂。

许多从这里开过去的小伙子们，我们曾经谈过他们在闸北的掩体里的情况，而今我们认不得他们了。他们变得多神气啊！

不，不，南京决不是个沉闷的城市！单是在中山路上，就有那么多可看的。

灰蓝色的亚麻布制服，绑腿，皮带，还有奥地利皇家军队戴过的高帽子；只是没有插上印有F. J. I.字样（弗朗兹·约瑟夫皇帝）的盔徽，插的是印有蓝色太阳（国民党的太阳）的帽花。要不是每人背上晃动着一个凉篷、一柄阳伞、一个遮荫——偌大一个编制物，简直可以把这些纵队看作欧洲军队了。而且，要不是每人腰带上系着一条擦脸毛巾，可以在冷溪水或热茶水里蘸一下擦擦脸的话。长官们拿着手电筒，那么大的手电筒，不如说是元帅的指挥棒。是谁把这些军需品兜售给中国人的呢？手电筒是新式中国军队最触目的标志，正如保温水壶是日本军队的标志。士兵们的稚弱的胸脯上炫耀着一枚奖章，装备和训练业已尽善尽美，现在就开去攻打你的同胞和阶级兄弟吧，尽量多杀一些吧，你又可以获得一枚奖章了。

首都人士乐于送走他们。虽然十九路军搀了水，它毕竟还是十九路军，还有很多参加过沪战的老兵，他们曾经没有南京的命令就抵抗过日本人，而且不愿意执行南京的投降命令。蒋介石嘘了一口气，从他那由他的门徒护卫着的军事学院内部的堡垒里望着；财政部长宋子文嘘了一口气，从他的北极阁的别墅里望着；精于养身之道的先生们嘘了一口气，从国民党的党部望着；列强的代表的代表们（代表本人坐在北京，离政府所在地约有两天火车的行程）嘘了一口气——所有人一无例外地嘘了一口气，

望着这些开走的部队。

他们在下关码头上船了，坐上了系在岸边的古老的柠檬色的扬子江木船。最新式的炮舰则停泊在江心。如果运输船只说明了什么，那么炮舰就更说明了什么。放心吧。61师已经装运完毕，60师和78师正从我们身边向江岸开去，《字林西报》(英国人在中国办的报纸)明天就会赞许地报道，连十九路军的后一部分人马也毫无例外地完成了从南京开往“红”区的壮举。

“红军”、“共产党”这些词，在进行国内审讯和国际干涉时，写起来是不能不加引号的，因为孙逸仙讲得太清楚，共产党的每个敌人都是国民党的敌人。所以，如果指不加引号的共产党，就要说成所谓共产党，说成加引号的共产党。但是，最好是称之为匪。称匪就用不着加引号，加了引号反倒要受罚的。这个专门名词连英国在华报刊也采用了，其实匪和共产党对于他们反正是一样的，他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加引号的共产党和不加引号的共产党究竟应当怎样区别。

中国法庭却只用“从事反动勾当”这个套语，就可以审判共产党人。法官就是这样下判词的，被告公开参与反动勾当，如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银行的统治地位，反对高利贷，反对鸦片等等。

十九路军现在就是开去攻打这样的反动分子。从前已经有很多部队抱着同样的目的溯江而上了。一九三〇年九月，一艘英国的、一艘美国的、三艘日本的和一艘意大利的炮舰曾经联合启航去进攻长沙；当美国、日本(派了三艘舰只)、英国和意大利都想镇压“反动”的时候，所有矛盾很快就冰释瓦解了。英国的“阿菲斯”号、美国的“帕洛斯”号、日本的“热海”号、“二见”号和“久魂”号，以及意大利的“卡洛塔”号的登陆部队，因暴行层出不穷而名声大振，“特别是帕洛斯号的司令官蒂斯代尔，对于这些

为俄国所迷的嗜血的匪众，把他们自己的药给他们开了一剂。”（见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六日《密勒氏评论报》）

尽管给开了这一剂，苏区反而扩大了，当时已有五千多万居民。尽管给开了这一剂？正因为给开了这一剂吧！国民党为了自身的利益，竟然让外国列强开进来打中国，这种事情甚至激怒了苏区外面不关心世事的农民。

再来一次可不行了。南京政府必须拿出自己的本事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阁下亲自指挥十五个师，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开始了对江西省“红军”的“围剿”。六月份，最高元首来帮忙，蒋介石率领了三十万人马。过去从没有为了对付一个省动用过这么大的兵力。

一场没有引号的围剿。村庄被围剿了，留在里面的老小被围剿了，牲口和庄稼被围剿了。唯一围剿不了的是红军。红军是由农民组成的，至多每三个人有一枝枪，每枝枪只有两发子弹；他们这样武装着，同一支配备了256尊欧洲野战炮、12架飞机、机关枪和外国战略专家的军队坚持游击战达六个月之久。国民党的师团终于被驱逐了，恰如普鲁士—奥地利—法国保王党亡命徒的干涉军队在法国战役中被年轻的法国革命军的无套裤党人所驱逐，恰如法—英—美—德—捷—日—白卫军的海陆军队被布尔什维克赶出了俄国一样。这就证明了，只有当两军在战争结局中的阶级利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谈不上阶级利益的时候，技术上的优势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标准。在南京政府的反人民的战争中，阶级利益却不是一样的。

在红军的战利品中有三架飞机，用一块大苫布遮盖着，今天还这样停在那里；没有人能够驾驶它们，打败了的国民党的报纸便不断地加以嘲笑。政府军逃跑后两个月，宣布了“停止征剿”，

拿出来的理由是，满洲被日本人占领，故有必要将民族利害关系集中于外敌。班师后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阁下向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陈述了整个政府军为什么连一个革命的省份都不能征服的理由。“匪区的居民支援那些无法无天的匪众，而政府军想从居民方面获得些许帮助也极其困难。”但是，何应钦部长仍然能够为大会提供一线希望：“匪军兵营中正流行传染病，由于缺乏医药而死者甚多。随着严冬来临，他们的困难日益加剧，因为只有少数人备有冬衣。”

听说“红军”甚至没有冬衣穿，大会是不是面呈喜色，备忘录上面没有写。总之，决议案宣布了，对赤色危险进行一次新围剿，乃是政府的首要任务，而日军占领华北，大会则认为远不及此事重要。

为了实行这个决议，那些曾经自愿参加十九路军去抵抗日军、保卫家园的青年们，现在要开去攻打他们的家园了，攻打他们家园中正在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那些地区了。但是，这些青年即使背着新枪支，穿着灰制服，佩着闪亮的奖章，拿着手电筒，也决不会赢得军令所许诺的胜利的。这个胜利在于什么呢？这个胜利要怎样才能生效呢？要把分配了的田亩重新合并吗，要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封建地主吗，要恢复厘金税吗，要重新实行贿赂吗，要重新种植罂粟吗，要让传教士再来吗，要把新建的学校、印刷厂、图书馆、报纸加以封闭吗？

试问能够凭借武力迫使人民重陷愚昧无知的境地吗？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俄国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在瑞金举行了中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报告指出，四年之内，六个苏区有八百万人学会了读书和写字。英国报纸可笑地、但也不无理由地把这个数字加大了一倍，说是“有十六万人被教会了认字，

可以让他们接触煽动性的印刷品了"。马克思、列宁和孙逸仙的著作已经印了一百万册。在一个城市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由于纸张短缺而脱销，人们便拿着自制的纸张到印刷厂去，从排字版上把这本书复印出来。一个美国人给上海的《晚报》写信说道，"在匪区的所有邻县，印有著名共产党鼓动家马克思、列宁头像的纸币，被视为标准的通货。"

怎么？军队开走了，就没有什么好玩的，南京还得拿出什么来呢？再说，它果真是个沉闷的城市吗？

可我一点也不觉得！请看，所有的街道都在挖土。这决不是什么市政工程，这是一项政治工程，是英国为了南京努力围剿红军所付的报酬。

一九〇一年以来中国人所承担的赔款，近几年来已被列强投放到中国境内了。美国人出于宣传的理由，用庚子赔款把中国人送去上他们的大学。但是，这些学生并没有变成黄色的美国佬，常常成为外国统治的反对者和革命的追随者。

英国没有美国那样傻。英国交出这笔中国钱，只是为了交通的目的，而且是为了以优惠价格将建筑材料从英国运来。我们看见到处在修城门洞，因为这属于"交通"一类；我们看见到处在加固这个附庸政府的都城，我们看见到处堆放着真空管和电缆，一座广播电台建立起来了，英国实业正好借此赚钱；我们看见到处在拆房屋，以便铺建大马路，好让那些护卫王公碉堡剩下来的骏马和骑士们顺利地由此开去攻打人民。

城市的入口越来越紧密了。古老的城墙、城外的双环路和站岗的城门都已修缮一新，虽然飞机一般决不会从堡垒的门洞飞进来，炮舰发射的炮弹也决不会在堡垒的城墙前面茫然停下来。警卫连守在每座拱门下面，不是为了防御现代的炮兵……

准备加以防御的敌人根本没有轰炸机，没有扬子江上的兵舰，没有现代的炮队。准备加以防御的敌人根本不是外敌。它很快就会兵临城下。南京是随时准备逃跑的。

每个人都被挡在城门口，由卫兵仔细地检查说明其出身及职业的身分证和入境证，然后才能进入这座“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城。贫困在城外有它的地盘，在火车站和城门之间。但是，就在这个污秽而悲惨的城市里，也有许多想象不到的事情。

农民和织锦工人的水田和茅屋就在堡垒似的内城的城墙内，或者在秦淮河的坚固的河堤下面。摇摇欲坠的木棚子就是织锦工人的工场，他们的织机用古老的里程碑支撑着。就在十根由织工用脚移动的竹竿中间产生了花样，装有重金纬纱的梭子从左向右穿行着，黑线和金线由孩子们搓到一起。你会以为他们只是漫无目的地移动着手指，只是凭空气劳动，线纱走得那么快，你简直看不见它。孩子们从事这项劳动时，不断地向左右两边点着头，就象一名参加六日自行车赛的比赛者。哪怕来了一位参观的客人，他们也不敢抬起头来张望。四只金丝雀一生下来，就飞落在丝绢上面，接着消失了；又有四只金丝雀和那四只一模一样，也飞落在丝绢上面。它们的出现和消失是在一种污浊而饥饿的气氛中完成的。金线织工的妻子乞求着微末的施舍。织工连一米织锦都不敢出售，因为所有产品早在它们出产以前就被抵押给浙江的纱线商了。到处是乞丐围着你。霍乱和麻疯猖獗一时，无从制止。

形形色色的灾难潜入了城市，不管怎样限制居留，不管怎样保证这座城市的双重防护。双重防护？是的，南京有物质的工事，也有思想的工事，而思想的工事也是一种物质的工事。确实，我简直不懂，怎么可以把南京称作一座沉闷的城市。

思想的堡垒高耸着，那就是孙逸仙的陵墓。连华盛顿的林肯陵墓(这一座肯定是模仿它的)也没有这样华丽，没有这样靡费，为中华民国的这座唯一庞大的建筑物已花掉数百万元。紧挨着的明陵，是有理由紧挨着的。明朝在这里统治中国达三百年之久，而孙逸仙当上了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两个月之后就让位给想当天子的清朝大臣袁世凯了。孙逸仙曾经四次逃离民国，他害怕民国的当权派，正如害怕帝国的当权派一样。他当广州政府总统的时候，他这个国民革命家被豪商和列强认为过于社会化了。他们便动员广州商团去反抗他，麦克唐纳工党内阁执政的英国更给它运送了武器。孙逸仙从他的敌人的反抗中理解到他们的利害关系，他的充满模糊和妥协的学说便变得更其坚决，更其社会化了。

他于一九二五年逝世，就埋葬在这上面。装饰着垫座、花瓶、方尖碑、塔门的宽阔的大理石台阶，要走一公里才能到达顶部建筑，到达巨大的雕像，到达石棺。但是，这座陵墓决非奢侈建筑，它是一座具有实际目的的建筑，那一千万元决非虚掷。思想上的防护就在这里。请看，我们是怎样崇敬孙逸仙呀，我们是怎样按照孙逸仙的精神治国呀。“我们”，就是南京今天的老爷们，孙逸仙认识他们并且斥骂过他们，“这些堕落的革命者，这些假革命，他们这几年来一味追求升官发财，你们是看见了的。这些人污辱了、丑化了革命和革命精神的伟大事业。请你们同这号人绝交吧，忘掉他们吧……”

升官发财的官僚们自己实行了这种绝交，一种流血的绝交①。现在他们当权了。孙逸仙的主义，他们一点也没有实行，

① 指国民党右派一九二七年反共的“清党”运动，他们乘机屠杀了大批同他们合作过的共产党人。

一点也不想去实行。他所反对的外国统治者成了他的继承人的保护者，他所创建的工会变成黄色的行会，帮匪（芝加哥资本主义的派生现象）享受着政府的优待，土匪将军（封建统治的派生现象）就是国中之国的君主，鸦片买卖盛行，军火买卖盛行，童工盛行，厘金税盛行。

孙逸仙夫人忠于他的思想，却必须住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被列强的十四个间谍机关侦察着；她要是跨进中国地界，则不得不担心自称为他的丈夫的党的那个党的暗害。在外国人中间，作为朋友和她站在一起的，只有美国女作家阿格奈斯·斯沫特莱和那遭受各方面迫害的杂志《中国论坛》周围的勇敢的一群人。

开去攻打苏区的部队就是从这条以这个人的名字命名的马路上通过的，这个人临终时曾经给莫斯科的苏联政府写过一封信，那个政府的总领事馆今天是上海黄浦江畔唯一一座空屋子。

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同志们！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工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绊。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

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次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决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孙逸仙"①

他死了，中国警官好几百人便冲进了北京外国使团的禁区，袭击了苏联大使馆，逮捕了使馆人员，抄走了文书档案，并占领了房屋。在上海江岸昂贵的地产中只有一项未被征用，只有一座建筑物孤零零地空在那里，那就是白渡桥边的苏联领事馆。

这就是国民党对于孙逸仙的遗嘱、他的严格的训谕"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所作的回答。

一座空屋子要比一座住着人的屋子更有趣。一个挤满官僚和政客、拥有一座新陵墓和过不完的军队的城市未必是沉闷的。

我一点也不觉得南京沉闷。

刘半九 译

---

① 原文。

初露锋芒

(1942)

写回忆录，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缺少这方面的练习，因此不知道能否写好。每当我叙述一次会面或一个事件时，我不仅是追忆过去，而且也阐明未来。我力不从心地描写了一些我还没有能力描写的事件，通过这些，读者就已经认识我了。我只是写新闻报道的新手。

梅尔策先生和资格最老的警察局官员过去是同学。我们的报社把我这样一个年轻的生手派到新闻交换中心去接替他的工作，对此，交换中心的人颇为不满。在编辑部我仅仅是一名通讯记者。

我一开始就取得了所谓的成就，造成这一事实的环境是不会引起《波希米亚》报其他编辑对我的好感的。我的第一篇报道写的是对一位朋友的采访，当时他躺在病床上，一年前他在一次决斗中杀死了一个大学生，同时自己也受了致命伤。在医院里，他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位杂技演员，他也是远在我干记者这一行以前，从秋千上摔到了观众席上。另外一位病友是一个男孩，在圣诞节晚上，在前市长毕勒斯基的别墅前被他们家的看家狗追逐咬伤。当时，这三件事都在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而成了尽人皆知的事情，我就是把这些事件写成了报道。可是《法兰克福报》转载了这篇报道。

法兰克福的那位无所不知、永远正确的费多尔·马姆罗特，他删剪稿件的剪刀居然对登在一家布拉格报纸上的文章给了点情面，很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马姆罗特的剪刀和荣誉一词同韵，”①《布拉格日报》小品文版的负责人每当《法兰克福报》和他一样把同样的内容删剪了的时候，他总是习惯这样自我欣赏地说。）

这种受到嘉奖的成就偏偏是由一个最年轻的年轻人、一个地方采访记者搞出来的，而且这种嘉奖听起来就象是对别人的指责，否则，转载我们报纸的文章这件事就可以认为是他们的社论提及并称赞我们整个编辑部了。法兰克福最高法官在转载这篇文章时是这样介绍的：“下面这篇写得极好的报道是登在布拉格《波希米亚》报上的……。”

在我看来，我的新职业似乎容易极了。我只需到警察局、交换中心索取新闻，然后加以润色。我越是在语言上多用些闲聊似的词句加以修饰，它们就越发应该被看作是用词造句很讲究的华丽文章。虽然有人把这种新闻报道称为无聊记者写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就象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要比简单粗糙的报道更为人称许，被人采用。

我就是这样工作的。直到一天深夜，我才第一次在现场受到了考验。这天夜里，席特考磨坊起火了。

我飞快地奔赴磨坊。

看来大火要把磨坊的全部建筑物化为废墟和灰烬。有史以来，这个磨坊就是该城的象征。更糟糕的是，其他记者都已赶到现场，正在极其忙碌地工作着。

---

① 德语中Schere（剪刀）和Ehre（荣誉）这两个词，词干元音相同，词尾相同。

维瓦拉大爷坐在路灯下的一辆消防车上，从这里可以看到一切，所有的人也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他奋笔疾书。警察局和消防队的公务员们跑到他那里，给他提供情报，然后又迅速跑开了。他的编辑部的通讯员不断地骑着自行车赶来，维瓦拉大爷把一些稿件交给他们，然后又继续写下去。

可是我呢，我根本不知道该写什么。对于蒸汽消防机组成的车队、水龙头的交叉喷射以及消防队的各项操作我一窍不通。我用力挤过警戒线；我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走完燃烧着的磨坊的整个地段，我想随便通过某种方式，随便在什么地方，随便发现点什么事情可以写下来，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发现。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低三下四地去求人；我走近青铜宝座的阶梯，在这个宝座上维瓦拉大爷主宰着一切。他把身子略微往下朝我一倾，我使劲向上拉长身子，踮起脚尖、伸长耳朵，我要一字不漏地听清他告诉我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可是，他只对我轻轻地说了三个字："着火了！"

我非常失望，顾不得去理会他的傲慢。我请求他给我讲些细节。他指了指熊熊的烈火，意思是说：你还没有看到足够的细节吗？

没有，我没有看到细节。我看到的只是火焰，忙个不停的消防队员以及比消防队员还忙的记者同行们。那个面色苍白，号称"侦探"的记者，活象一条喷水管，在灭火机和喷出的水柱中间钻来钻去，几乎是同时在各处出现。他摆出胜利者的架势，打量着我："喏，您这位能说会道的人，现在该亮亮您的真本事了。"

在一架救火梯旁边，科迪拉交换中心的人碰到一起，互换情报。我悄悄地凑过去，想听到点什么。他们看见我就不说话了，有几个人笑了起来。脸色苍白的"侦探"简直是病态似地笑了起

来。他们可以笑，我只能哭。

我坚定地挤过人群去找消防队长。可是，到了他面前，我才想起，我根本不知道该问他什么。好一个采访记者，居然连自己应该问什么都不知道。

我问了一下失火的原因。

“现在还无法肯定。”

跟我一样。我什么也不能肯定。我的一叠记录纸空空的。眼泪消除不了我的惭愧心情。即使是蒸汽灭火机喷到我的眼睛上，也无法洗刷我的羞耻。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如此无能。算了，别去描写磨坊失火的情景了！再也不要写通讯报道了！

那位有才华的、胜任记者职务的人，高高地站在闪闪发光的青铜凯旋车上，威武庄严地驶进记者行业的荣誉厅，一群头戴钢盔的人前呼后拥；车下有一人，饱受屈辱轻视，悄悄地走开了。他壮志凌云，却一事无成。

我挤过看热闹的人群，挤过在黑夜中影影绰绰的人影，不断地向后退。我只有一个想法，快点离开这里。

可是到哪里去呢？当然不能回编辑部。我什么也没有采访回来，何必还要到那里听那些愤怒的申斥，何必在被解聘之前还要让人家把我痛骂一顿？

当然，就这样把编辑部扔下不管，也不太光明正大。到那里去，承认自己的失败，那才是男子汉大丈夫。

我在大街上慢慢地走着。在新闻交换中心里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我想起了在那里人们得意扬扬地闲谈的一些有趣的传闻，那些关于无能记者的轶事。

一位来自地方报社的记者被派到市郊去采访一次意外事件。他进行了周密详细的调查，可是他没有找到返回编辑部的

路。一个好机灵的记者，哈哈哈！

有一个记者被派去采访著名演员M的婚礼，他回来以后什么也没写。有人问他："关于这次婚礼的报道在哪儿呢？""我没有写。新郎没有来，客人白等了半天，婚礼没有举行，这样我也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哈哈哈哈！

上述嘲讽还算不了什么。席特考磨坊被烧毁，这是当代最大的一次火灾；当时有一个名叫基希的采访记者来到现场，他却连一行字都写不出来。哈哈哈哈哈！

我的名字将要这样载入通讯报道的历史！

"谢天谢地，您总算回来了，"我刚走进楼道，值夜班的编辑就迎面喊道，"我给您留了一栏半的篇幅，您快写吧！我们想在报纸上尽可能多地报道这次火灾。"说罢，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就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一瘸一拐地走进排字车间。

一栏半，这可是一百五十行啊！我连一行都没有。或者可以说我有一行，这就是标题："席特考磨坊的火灾"。标题定好了，可标题下面却是一片空白，有一百五十行之多，显得十分荒凉。

毫无选择的余地，我只得沉落到这一片荒凉的空白中去。我写呀写呀……，我描写火焰，写了又写……。我让它们熊熊燃烧，红光耀眼，火舌四射，劈啪作响，火光冲天……；屋架烧着了，咔嚓一声倒塌了，碎裂了……；面袋烧着了，砰地一声面袋裂开，一时烟雾腾腾……；水柱象匕首一样插进去，象利剑一样砍下来……。可是我写的这些凑在一起也只不过二十来行。

排版人员把我写的从我手中抢走，他叮嘱说："快点！快写下面的！"说罢，就又跑开了。

下面的！往下已经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虽然还有一百三十行的篇幅空着，而且负责排版的、拣字的和夜班编辑都在等

着呢！

我用嘴叼着铅笔，然后又取下铅笔写了一句：市立夜间收容所就在席特考磨坊附近。我的铅笔驱赶着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奔向失火地点。在我的笔下，他们着迷似地向着大火燃烧的地方涌去。我的铅笔帮助他们逐渐接近警察的警戒线，而过去他们见了警察总是习惯地绕一个大弯子，迅速躲开。四周一片黑暗，看不清楚我的铅笔看见的情景，看不清楚拥挤过来的人群都是些什么人。只有当一束火光不是直冲云天，而是向一旁照射过来的时候，才看清这些人的身影。他们好象是从阴曹地府里来的人，实际上他们只是我笔下的人物。他们是些饱经风霜的流浪汉，脸上的皮肤又黑又粗，胡须杂乱，头发蓬松，眼睛直盯着救火的场面。

我的铅笔所描述的要比它的主人观察到的情况多的多。我的铅笔在火光照耀的一瞬间看见了一个警察和一个彪形大汉如何面对面地站着。警察可能认识这位大汉，也许他是个暴力分子，曾经抗拒警察的逮捕逃跑了。或者，也许这个暴力分子没有逃跑，而是在同警察对抗，扬言一定要报仇。现在警察就在附近，他伸手可及。圆锥形火焰很快就会让位于黑暗，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造成危险机会的黑暗。我的铅笔唰唰地写着，有声有色地描绘着这样的情景，直到写满一百五十行，才停了下来。

往常，我写了一篇较长的报道，总是自己到排字房去，表面上是为了在那里更正校样上的错误，实际上是想听听排字工人对我写的东西的评价。

这次，我没有这样做就离开了编辑部。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人们会称赞我在狼狈处境中虚构出来的东西。我虽然写成了“报道”，但丝毫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篇报道

连火灾的经过、发生了哪些意外事件等等基本情况都没有提到。也许还有人死亡或受伤呢。

我请求辞职的决心和我被解雇的可能性一样，依然存在。

第二天早上，我在我们的报纸上看到，我虚构的东西被改得更加离奇了。夜班编辑把我的标题改了。用大号字体极为醒目地刊印的通栏标题是："火灾——无家可归的人进行袭击"。这些大字就象燃烧着的房梁一样，在我面前闪过。

其他记者昨天在救火现场所得到的消息，今天我在他们的报纸上看到了。他们搜集了全部详细情况，当时对我完全保密。尤其是报界称之为"有趣而又无聊"的那一类细节，没有对我透露一字一句：一些报道说，大火是在晚上八点十六分由一个住在附近的屠夫的老婆发现的；另外一些报道说，九点整，一个偶然从这里路过的南波希米亚农民先看到火光。据《民族报》报道，卡罗林恩塔尔郊区的救火队在某某消防队队长带领下乘坐两辆蒸汽消防车首先赶到现场，可是根据《人民共同体》报刊登的消息，又说是索科尔大街的消防人员带着新型的自动化救火梯最早来到失火地点。

只有一点是各报一致的，即各消防站很快先后来到着火地点。多数报纸报道说，大火首先是在一楼谷仓着起来的；可是《布拉格日报》的脸色苍白的"侦探"却报道说，大火先在二楼肆虐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才蔓延到一层的各个房间。

我走进编辑部时，办公室里有几位编辑站在一起。在吃早饭的时候，这个房间成了某种形式的俱乐部。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拼命拥挤，"文艺评论家对我说，"那一定就象布洛伊格尔① 的绘画一样，我以很大的兴趣读了您的报

① 布洛伊格尔，十六、十七世纪荷兰绘画世家，世代多为画家。

道。”

“他也不过是记下了他所见到的情景而已，”迪克许博士说。

也许是为了缓和一下迪克许博士的多少有点轻视的口吻，文艺评论家反驳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进行了很好的观察。

“也仅仅是观察而已。如果是一位诗人，那将会写出怎样的作品啊！一座贫民教堂在火光中举行落成典礼！警察老总和强盗出乎意料地面对面站着！可是这个年轻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手中占有的材料可以写成一出戏。喏，当然喽，这并非他份内之事。”

我兴致勃勃，很想向他透露，我非常明白如何估价这些原始材料，因为这些材料产生于我的幻想。可是，即使我说了，迪克许博士也会重复说，这不是我份内的事，其他人也会同意他的见解。

就在这一天，迪克许博士让我感受到了真实的东西毫无价值；傍晚，我受到了一次伪造的东西确有价值的教训。

晚上，当我到新闻交换中心来的时候，维瓦拉大爷对我说：“我必须向您宣布，您要是再用这种方式进行报道，您将被开除出交换中心。”

“我到底用了哪种方式？”

“用说谎人的方式，”他突然咆哮如雷，“纯粹是无耻的谎言！您等着吧，市立夜间收容所会发表严厉的更正！夜间，谁也不能走出那所房子，因为门都上了锁，而且每个人进去的时候都得把自己的衣服交出来。”

“我并没有写他们是在市立收容所过夜的人，我只是一般地谈到了无家可归的人，我提了一下收容所就在附近，但是并没有说，他们是从那里来的。”

听了我这狡猾的辩解，维瓦拉大爷火气更大了。先前，他曾要求收容所的领导对我的报道予以更正，但得到的回答说，由于文章只是一般地提到收容所，他们不能做任何事情来反对我的报道。维瓦拉大爷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一点也不隐瞒。

"您用谎言拆了我们的台。今天早上总编辑责问我，为什么我对无家可归的人在失火地点进行袭击这件事只字未提。"

"维瓦拉先生，您尽可以对他说，这件事纯属虚构。"

"我用不着您给我出主意。"

我们的同事文策尔·维尔德插话说："如果有人告诉这些只会剪剪贴贴的记者，竞争者是要说谎的，他们会认为这只是遁词。"

维瓦拉大爷证实了这一点，他用两只拳头敲打着桌子。他的总编辑是这样对他说的："真奇怪，别人总能想出非常有趣的谎言，而您只知道那些最无聊的真实情况。"维瓦拉大爷从愤怒的高峰跌入痛苦的深渊，"我干这一行已经三十年了，还得让人这么数落我。"

"就为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骑士胡克·冯·罗森贝格插话道。他这样说只是为了不失礼貌。

"那您说，我当时到底该怎么办？"我反驳说，"我根本没有得到失火的详细情况。维瓦拉先生，我曾请您给我谈一点儿情况，您却回答说：着火了！"对维瓦拉大爷这个轻蔑的回答，大家嘴里不说，心里却不以为然。阿达伯特·贝茨克先生用缓和的口吻善意地劝我，我应该永远按照宗教教义行事："不可说谎，这是十诫之一，您想出了这个弥天大谎，至少也该用电话告诉我们，使我们也能把它刊登出来，免得象傻丫头似的呆站在那里。"

这天晚上，在科迪拉新闻交换中心露面的是朱彼克先生，

“脸色苍白的侦探”没有来，他已被《布拉格日报》解除了职务。

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

每当我起草报告或构思一篇报道的时候，从来没有感觉为难、窘困，即便是我对题目了解不多，也从来没有凭空捏造过一篇报道，更没有危害过同事的地位。

很明显，直接描述真实情况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评论家在讨论一本书、一次演出、一个展览时，谁也不会象我昨天在磨坊火光的照耀下一筹莫展那样，感到职业上无能为力。虽然如此，文化栏的编辑们总把采访记者看得低人一等，就象对待一个由于经常忘事不得不因此而多跑冤枉路的人一样。

几天前，我偶然碰到了留着艺术家发卷的文化副刊版负责人。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他对于我成为采访记者深表遗憾。“我本来设想，您不是这个样子，”他说，“我原想让您成为一位有点名气的人物。”

迪克许博士也对我的职务表示轻视。当然，他一向如此。在他的文学评论中，他只承认慷慨激昂、瞬息万变的，海市蜃楼、虚无缥缈的，放荡不羁、荒谬绝伦的，变幻无常、不合逻辑的或者是违反理性、神秘奥妙的东西才是艺术。他坚决拒绝“很快就过时了的法国学派的缺乏幻想的理性主义和单调的唯物主义”。他认为巴尔扎克、福楼拜，特别是左拉都是这个学派的。当年，迪克许曾对我的蹩脚诗集给予好评和鼓励，我描述的无家可归者这一场面却不能使他满意，他把这个场面看成真人真事了。

可是那些总编辑们，在负责岗位上的记者们，难道他们不应该尊重报道的真实性吗？难道维瓦拉大爷的顶头上司所使用的反定理站得住脚，难道只要谎言有趣，他就可以要求别人撒谎？难道他可以宁要谎言而不要真实，只因真实非常平淡无奇？

这些问题绝对不只是反问，对这些问题是有答案的。

一些发行人，例如数一数二的戈登·贝南特，已经承认，无论是商业性质的还是传播某种思想的报纸，它们都是宁要有利于达到他们目标的谎言，而不要和他们的目标背道而驰的真实。有一个好说俏皮话的人甚至说出这样一句格言："我最喜爱伪造的消息，因为第一，这个伪造的消息是独家占有；第二，可以来一个更正，而这个更正又是独家占有。"

这个论证是错误的，因为遭到如此及时、彻底和有力更正的恰恰是真实。正因如此，一位报纸发行人就很容易接受那个好说俏皮话的人的原则，而这位发行人是不希望做任何更正的。

那么读者呢？让读者知道是凶手的第二颗还是第四颗子弹才射死对方，在奇袭珍珠港时阵亡的日本人不是五千、而是五百，席特考磨坊的火灾不是谷仓先着的火，而是二楼先着的火，这到底有什么重要意义？

付出高昂代价才获得的宝贵的真实和对它的廉价摹仿没有什么区别。不会有读者在我对磨坊失火这起就发生在当地而且是尽人皆知的事件的叙述中觉察到，我讲的都是凭空捏造、毫无事实根据。那末，遇到事实真相不太清楚的事件，或者是发生在外地的事件，哪里还能把幻想和现实区别开来？如果人们听从善良的阿达伯特·贝茨克先生的忠告，把每一次虚构的东西都向他的同事们传播，那就连最后揭发这一虚构的可能性也消失了。

一篇报道应该表现什么，我为自己下了一个定义。报道是一种表达见解的形式，也许甚至是一种艺术形式，虽然仅仅是一种小形式，类似盲人梅托修斯的沿街卖唱或在拘留所里的纹身。

报道的特点是真人真事。能否造成假象，让读者以为某一虚

构的事件确实发生了？不行。如果事情是臆想出来的，那么不管读者是否觉察到，对它的描述都不能成之为报道。长篇小说作家，中短篇小说作家，写奇闻轶事的作家经常宣称，他们描写的事情确有其事，如果读者不相信他们的说法，那非但不会损害作家，反而会提高他的威望。可是要是一个编年史家说谎，那他就算完蛋了。

当然，对素材的处理有两种选择，或者是以事件为基点，写出幻想性的作品（就象昨天磨坊着火时我所做的那样）；或者是尽力查明事情之间的关系和细节，使最后写成的报道至少和幻想出来的报道同样有趣（我本该去发现无家可归者的场面，而不该虚构这一场面）。

对上述第一种办法，我才思敏捷；而对第二种办法，我却笨拙无能，可是我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后者。

噢，我这样选择绝不是出于道德考虑，而是出于但丁式的好奇心！我从小就有这种好奇心，每次到商店或邮局，总是把一大堆值得叙述的事情带回家来。家里人觉得这些事至少有些夸张。这种怀疑使我感到很不高兴，因为我没有必要伪造什么，我到处都看到、听到许多难以置信的事情，然而它们都是真实情况。一些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别人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昨天我第一次虚构了一点事情，可是所有的人都相信了。

难道我该继续欺骗下去吗？绝对不能！

正因为我第一次力求如实报道的时候，我却没有抓住真实，所以我要继续寻求真实。这个决心不是轻易能下的。

王志佑 译

凶手的母亲

(1942)

下午五点钟，人们发现伯格曼夫人在她的住宅里被杀，东西被抢。这立刻引起了对女用人的情人的怀疑（住宅的女看管人在三点钟的时候看见他离开这所住宅）。六点钟时，女用人和弗兰茨·波兰斯基一起被捕，并被押送到公安部门去。

对这种抢劫凶杀案的审讯总要进行几个小时。我没有等审讯结束，就跑到被捕者的家里去。警方人员已经来过了，搜查了弗兰茨·波兰斯基的柜子，并竭力想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一些口供。可是，他母亲得知儿子被捕的消息后，简直呆了，不能回答任何问题。警方人员只好叫她第二天到警察局去。

我敲了敲门，没人答应。波兰斯基太太独自一人坐在她的小房间里，没有注意到我已经走进房间，也没有理会我对她的问候。她目光黯淡，但并没有哭，她为什么要哭呢？她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她只知道，一件可怕的不幸事件发生了，她的唯一的儿子干出了……，这种事不是马上就能弄明白的。我问了她一些事，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波兰斯基太太，请原谅，我是报社的。"

她一阵痉挛，惊呼了一声。她意识到了，她的耻辱将要公之于众。她惊恐万状，重复了一遍"报社的！"三个字。她泣不成声地说了一些话，这些话是她一生的总结，说到最后向我提出了一

个请求："要登在报纸上，我的天啊，我的清白的名字！我的死去的丈夫——他已经死了十八年了，我的丈夫——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和警察局有过什么瓜葛。可我呢，我的上帝，我要和警察局打交道了。我一个穷苦的洗衣妇，二十五年了，我给人家洗衣服，从来没有丢过一块尿布，没有弄错过一双袜子。我总是小心翼翼，不把袖口弄破。现在一下子我要上报了，所有的人都能读到！您可别把这些登到报上，年轻的先生！"

我在责怪自己，为什么当时起了采访这个老太太的念头，她和这次凶杀案毫无牵连，对世事一无所知，现在又完全失去了理智。她苦苦地恳求我："年轻的先生，您可别把它登到报上去，老天爷可怜，您别把这种耻辱加在我和我的死去了的丈夫的头上。我求求您，我求求您，可别登在报上。"

我试图向她说明，这事我无权决定，这种事瞒不住，抢劫凶杀案一定得报道。

"抢劫凶杀"这个词打了她一闷棍。她看到恳求毫无用处，再次两眼发直，直瞪着房间的角落，嘴唇一动不动，自言自语地说："一个抢劫凶杀案。这种事我从来没有想过——可这就是抢劫凶杀，我的弗兰茨是抢劫杀人犯。弗兰茨·波兰斯基，一个家住桥巷四号的洗衣妇安娜·波兰斯基的儿子，他的名字会登在报上，这可是一个凶残的抢劫杀人犯，而我就是这样一个凶残的抢劫杀人犯的妈妈，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整整一辈子勤劳忠厚，没有一个人在我的背后说我坏话，可是现在整个巷子里的人都会对我指手画脚，说长道短。"

我总想用个什么法子安慰一下这个不幸的女人。我的迟钝的表情使她陷入绝境。"波兰斯基太太，没有谁会归罪于您。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规矩的女人。"我这样说着，可是她根本没有

注意听。

"抢劫凶杀，"她喃喃地重复着，"抢劫杀人犯。"

也许直接向她提几个问题可以转移她的注意力。"您的儿子到底和伯格曼太太的女用人认识多久了？您的儿子有多长时间没工作了？"

"抢劫凶杀！抢劫杀人犯！这个弗兰茨·波兰斯基，是……的儿子！"

我无可奈何了。我用几句客套话向她告别，说我本来不愿打扰她，我只是想，如果她能提供一些线索，或许能帮她儿子的忙。

可她一下子又大声喊叫起来了："帮忙！我不愿帮他的忙！他是一个抢劫杀人犯，为了抢走伯格曼太太的首饰，他把她打死了。先生，您知道吗？人们管这个叫什么？人们管这个叫抢劫凶杀，还要登在报上，先生！在这种事情上，没人能帮他的忙。我倒是想帮他的忙，我的弗兰茨，他是我的孩子啊，我的唯一的孩子！——可是我怎么帮他的忙呢？我只是一个穷苦的洗衣妇。我可以去找律师，我会凑够需要用的钱。您可是说过啊，或许我能够帮助我的弗兰茨。可我怎么帮呢？请您告诉我吧！年轻的先生，我求求您！请您告诉我吧！"

我向她解释，导致犯法的某些因素可以减轻问题的严重性，比方说，由于太穷而犯罪，或者也许弗兰茨不太正常，有什么疾病或类似事情，都可以减刑。就是遗传方面的问题在法庭上也会起作用的，譬如说弗兰茨的父亲或是母亲遗传给他一种急躁症。

"遗传？从他父亲那儿或是从他母亲那儿？"

啊，我又做出什么傻事了！我怀疑她对她丈夫的思念，损害

了她的名誉，而名誉是这个不幸女人唯一的财产。“波兰斯基太太，您别误会，我知道，您是一个规矩的女人。”

“从他母亲那儿得来的，这就叫遗传吗？这是遗传！是我遗传给弗兰茨的。”

“波兰斯基太太，我可真没想冒犯您，我只是说……”

“可怜的弗兰茨，这根本不能赖他，是我遗传给他的，是我！”

看来这位母亲现在是想自己承担一切。要是可能，她就以勃尔查① 的面目出现，因为她相信，这样可以帮她儿子的忙。

“是啊，就是这样，我要帮助他。您完全懂得我的意思，可是您不相信，他的杀人本能是从我这儿传去的，我身上有一种杀人本能，已经整整一辈子了。我和谁也没有说过。我常去做忏悔，可是就是忏悔的时候我也没有说过这件事。但对于您，我要说说，好让您把这些事登到报上去。让他们——警察来抓我，让人们议论我吧，这些我都无所谓。我象演戏一样活着，这日子已经够长了。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我要帮助我的孩子！他为什么要因为我受罪——这是遗传，除了遗传没有别的原因了——我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您：我是个杀人犯！”

我真想远远地离开这个地方。现在，她要开始抖落她那些小小的罪过。这些事最多够我写篇采访记：一个歹徒的妈妈，一个善良的洗衣妇，自己承担一些小的罪过，好让人认为她的儿子犯罪是遗传的素质所致，而减轻他的罪责。

“是的，我是个杀人犯，只是我的儿子比我有更多的力气，他

① 鲁珂莉茨亚·勃尔查（1480—1519），出身意大利贵族，为政治家泽萨鄂·勃尔查（1475—1507）之妹，一生中两次丧偶，但为人正派，颇受人尊敬，死后却遭人诽谤，蒙受数百年不白之冤。作者以此比喻书中女主人公，原系无辜却遭非难不幸。

把这件事真的干出来了。”

“是呵，有时候人们的脑袋能想出许多事来。”

“不，不是，不光是我的脑袋想出来。您看这个……”

波兰斯基太太扯下头巾，蓬乱的头发垂到前额和两鬓。她跑到桌子旁，拉开抽屉，拿出一把切菜刀。看她那动作，她现在简直变成了一个年轻女子。

“请您看看这把刀，我曾想用这把刀杀死一个人。这是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从乡下来的女孩子，在玛丽大街财务官马丁家里当女用人。”

“当时您要杀死谁？”

“杀死谁？我一生中第一个爱我的人。在这以前，谁也没有疼爱过我。我们家一共有八个孩子，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一句顺耳的话。后来来了一个人，他对我说，‘小姐，您很漂亮，’他抚摸我，吻我，诱奸了我。”

“但是没有和您结婚，这种事司空见惯。”

“呵，我从来没有想过结婚的事，他是我的尊贵的女主人的弟弟呵！他用甜言蜜语把我弄得服服帖帖，就象把衣服泡在肥皂水里那样。要洗的衣服泡在洗衣盆里，你爱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它，只要用手指揉揉搓搓，脏东西就被洗掉了——话说回来，搓得太猛，也会掉色掉丝的。”

我想，她说的多好呵。我从衣服口袋里取出笔记本，记下了如下的话：“一个洗衣妇的比喻”，“洗衣盆旁的哲学”，可选一句作为两栏宽的文章的标题。

“我到他居住的地方去，有几个星期我觉得很幸福。可是，过不久，他就不要我到他那里去了。”

“就因为这个，你就想把他弄死？”

“噢——哪里！我真是一只蠢鹅，什么事情我都忍受了，我心想，事情就该如此。可是以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才知道事情并不是非如此不可，这些事情是不合情理的。他对我说，我应该穿上那件他送给我的蓝色衬衣，晚上到他那儿去，他要搞一次小小的聚会。我真的去了。在场的有他的两个朋友，他让我坐到他们两人中间。还有一位女士，坐在他旁边——一位‘女士’——没过多一会儿，我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位怎样的女士，她和他真是一对，这种女人！”

我点点头说：“这我能想象出。”

“我们吃了夹香肠涂黄油的小面包，喝了酒。接着，他们关了灯，只开一盏红绸灯罩的台灯，屋里很暗。他那两个酒肉朋友变得很放肆，他们强迫我多喝酒。他对我说，用不着扭扭捏捏，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佬。我当时坐立不安，我这个从农村来的傻瓜，请您原谅我这么说——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我也不想使他太生气了，有许多事情我都容忍了。突然有一个人说：‘女士们把衣服脱掉！’那个女人就立刻动手脱衣服，可是我根本不理睬他们。于是他把我弄到一边，跟我吵了起来。他说，他真得为我害羞，我平常可不是这么扭捏的——我要是闹着不听任他们摆布、玩弄，那我们的关系就完了——难道我不想继续当他亲爱的小安娜而俯首帖耳？无论如何，我要离开这里。”

“您跑开了吗？”

“他把门给插住了，于是我就大口地喝白酒、葡萄酒，给自己增加勇气。那些狗东西扒掉了我的衣服。那个女人是自己脱的。她一下子就把裙子和衬衣脱下。她是想让别人看看，她穿的是用上等材料制成的绣有花边的内衣。我感到有点难堪，我

穿的是粗料子做的长裤子。可是那些好色之徒把我的衣服脱光，只剩袜子才算罢休。袜子我死也不让他们脱掉，——现在我可比那个女人好看多了！”

几分钟以前，我还是和一个哭泣着的洗衣服老太婆在一个充满了肥皂味的小房间里。屋里有一个洗衣盆、一个做饭的炉子，墙上挂着两张圣像。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单身汉的房间，屋里是暗淡的红色灯光，面前站着一个年轻的姑娘，被人强迫脱掉了衣服。

为什么这个老太太一下子回到青年时代？她为什么要讲出过去的罪孽？是不是绝望使她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大家公认她是安分守己的妇女，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处，也未能阻止她成为抢劫杀人犯的母亲？她为什么要夸耀她当年的裸体美？难道这种回忆还使她兴奋陶醉？她为什么要叙述：

“接着，他们把灯全关了。第二天早上，我的两个新的情人用出租车把我送回家去。我呕吐了半天，几乎不省人事。在厨房里我连站也站不住，我发起高烧。我的女主人龇牙咧嘴笑着说：‘自然喽，逛大街，真舒服，真会享受，玩累了还能干活！’她叫我下月一号收拾东西离开。我恨她，她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感到讨厌，她骂我说‘真舒服，真会享受。’哼，只要我想想这种‘享受’，我就要呕吐，就要掉泪！女主人责骂我，就跟她的弟弟昨天夜间一样，我不愿一起跟着干，让他舒服，让他享受，他也是这样骂我的。我心里一下子升起了一个念头，我不知道是不是着了魔了，反正我不能甩开它。晚上，她的弟弟到姐姐那里来吃饭，我已经完全疯了，我拿起菜刀，就是这把切菜刀，向他扑去，向他砍去。”

此刻，她的样子真象鲁珂莉茨亚·勃尔查。她挥动着菜刀，

真可怕。人们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她那杀人的儿子了。当年，她象她儿子这样大的时候，无疑是一个杀人犯。毋庸怀疑，这其中有着遗传症候在作祟。

“我本想砍他的心脏，可是我的刀只砍中他的胳臂，鲜血溅了出来。也许是他躲开了，也许是我的刀刃碰到他上衣口袋里带的皮夹而滑开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把警察找来了吗?”

“他们进行了自卫。全家人向我扑过来，把我按住了。可是我已经晕过去了，他们不得不把我拖到我的床上。第二天我把我的全部东西放到小木箱里，拖着病身子走了。我把菜刀带走，好作个纪念。我把我的情人送给我的那件蓝色衬衣留给他了，也算是交换吧。”

一个爱情故事，就象其他许多类似的故事一样，既没有警察局过问，也没有法庭干预，报纸更没有进行任何披露。现在，这位妇女把她内心深处的东西揭露出来，承认了她瞒了一生的谎言。至于想以此来帮助她的儿子，那是不可能的。

“好吧，年轻的先生，您把这些都记下来吧，尽管登到报上吧！您还得写进去，波兰斯基这个老婆子根本不是个安分守己的女人。”她用食指指点着，逐字逐句地述说：“她是一个凶残的杀人犯。只是她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去实施这些凶杀。可是她的儿子，他有这个力气。这个弗兰茨·波兰斯基根本没罪，您必须写进去，他只是安娜·波兰斯基那个妇人和她的不止一次的凶杀的牺牲品，他的一切都是从她那里继承来的——您就这么写！”

“不止一次的凶杀？这种事您还干了第二回?”

“干了！我的儿子杀了一次人，他是无罪的，有罪的是我。对

这些凶杀我有罪，只是我没有力气，没有时间去凶杀罢了。你看那洗衣盆，我的力气，我的时间，都埋葬在洗衣盆里了。"她敲打着洗衣盆，"这就是我的摇篮，我的床铺，我的棺材，我一直是这么说的。我这一辈子就是守着洗衣盆度过的，我洗丝绸细麻衣料，可这些东西不是我的，我真羡慕穿这些衣料的女人们。我也有过年轻、漂亮的时候。"

她以一种年轻人才有的愤恨敲打着洗衣盆的边缘，一再重复地说着，她也有过年轻漂亮的时候。"不管您是不是相信，我多想穿上这些上等衣服啊！我把拳头攥紧……"现在她痉挛地笑着："……我攥紧拳头又揉又搓，把这些衣服洗干净，洗得干干净净，闪闪发光。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别人。"

当然有时候她也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穿上一双进口的透明袜子和一件高级麻料上衣，但这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她的青春、她的美丽以及她的全部希望都在肥皂水中淹没了。她把这一切都倒掉了。男人们追求她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

"我的情人是个警察，"她叙述着，"呵，这个家伙老吃醋，一次也不允许我跟别人跳舞。可是我怀了孕，他却一再跟我说，他仅仅是临时的。说到结婚，他连想也不能想，我只好打胎。我按照朋友们对我说的话喝丁香烧酒，可是没有用，胎儿打不下来。他又催促我说，我应该和那个波兰斯基睡一次觉，就说这个孩子是他的。"

难道还要让死去的丈夫也卷入这位迷惘的女人毫无目的的自我非难之中来吗？

"别走，年轻的先生，您再呆会儿，现在我给您讲个报纸愿意刊登的凶杀事件。看来，我的警察先生想让我跟波兰斯基走，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孩子推给他。在这以前，他总是耻笑波兰斯基。

波兰斯基是住在我们这条街上的一个很可靠的小伙计，他经常给我送花来。每次看到我总是满脸通红。我根本不想用这种办法去欺骗那个可怜的人。可是我的清白的朋友一再劝说我。后来有一次，我和波兰斯基跳完了舞，就一起到他家去了。我的朋友在后面跟踪我们，一直跟到门口；他要阻止我犹豫变卦。就象上次跟女主人的弟弟熬过了那个叫人恶心的夜晚一样，现在我也是透不过气来，感到无比的憎恨。晚上，我带上刀就去和我的警察先生约会。当时我想了又想，我知道，这一刀不会刺不中他。”

“您真的把他……？”

“我没有能刺死他，他没有来。他已经把我和另外一个男人搞在一起了，对我也就不再承担什么义务了。好一个正人君子！——很长时间，我没有勇气告诉波兰斯基，我已经怀孕。直到肚子大起来，我才把事情说给他听。这个可怜的傻瓜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欢叫着，他要当爸爸了。他说，我们必须马上结婚。这个被人愚弄的家伙使我非常难过。我无论如何要把孩子弄掉，哪怕要了我的命。可是没有一个接生婆愿意干这种事，我已怀孕七个月了。我又喝了烧酒，从桌子上跳下爬上折腾了二十次，跪倒在圣母像前祈祷、忏悔、斋戒、许愿，这一切都没有用。我把肚子用力压在这个洗衣盆的盆帮上，在这个鬼地方，在这当中，也就是我经常站的地方。我使劲洗那些妇女穿的带血衬衣，只有我没见血。于是我拿起这把刀朝我的肚子扎去，为的是见血，为的是让这个孩子完蛋，为的是我和他……”

“您受重伤了吗？”

“他们把我送进医院，我在那里发高烧，躺了十二天。我又苏醒过来的时候，他们抱来我的孩子给我看，这就是小弗兰茨。

当时我没有扎着他，这也好，我觉得他挺可爱。我也很喜欢波兰斯基，他整天坐在我的床边。在这以后，他娶了我。这个可怜的傻瓜只有一个顾虑，他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象他一样也有肺病。我顾虑的是另外一件事：这个孩子会不会从我的血液里什么也没有继承到，要不是扎一刀，我的血液是不会流动的，可是在法庭上我会对那些人说老实话，在审讯的时候，我什么事也不隐瞒，我一定对他们说……”

这时，门打开了。“妈妈，晚上好！”

波兰斯基太太看着她的儿子。他把帽子扔到床上。波兰斯基太太觉得自己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是在法庭上。

她的儿子怎么到她的小房间里来了？她的小房间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知道吗？他们说我抢劫杀人，把我逮起来了，妈妈，对这件事，你怎么看？”他看看那些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抽屉，接着说：“呵，警察局的这些聪明的先生们也到这儿来过了！”

波兰斯基太太瞪大了眼睛看着她的儿子，他从哪儿来？是从绞刑架下来的吗？

“妈妈，你怎么老这么看我？难道你也相信，我把伯克曼那个老太太的脑袋敲碎了？”

我走近他。“对不起，我是记者，他们为什么把您释放了？”

弗兰茨·波兰斯基笑着说：“我差一点儿上了报。妈妈，你说什么？我差一点儿出了名。可惜他们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凶手，他是那个女住宅看管人的儿子。可是，从中午到现在我什么也没吃，妈妈，我饿了。”

波兰斯基太太头发散乱，还站在那里，她的眼睛因回忆往事而露出青春的闪光。

她看着我：一个凶手的母亲向一个报界的人揭露了她一生中的黑暗面。可现在她已不是凶手的母亲，报社的人在这个安分守己的小房间里也没有什么事了。她在他的面前亮了真相，因为她曾希望——她希望什么呢？

“妈妈，我饿了，你没听见？从中午起我一点东西都没吃，你呆呆的看什么？我要吃东西，我还得说几遍？”

波兰斯基太太全身一震；这位老洗衣妇系上头巾，弯着腰走向炉灶：“哎，哎，我这就去。”

我两手空空，离开了这个房间，我连一句话也没有记下来。

王志佑 译

科诺皮什杰的水灾

（1942）

一个星期天，贝内肖夫[1]附近发生水灾的消息在布拉格传开了。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动身到那里去。应该说，贝内肖夫值得一游，因为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把贝内肖夫附近的科诺皮什杰宫看作是他的临时府邸。在那里他焦急不安地等待着迁入维也纳皇宫。可是在维也纳的住宅里有一位顽强不屈的房客，他从来没有想过把房子腾出来，这就是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他的儿子鲁道夫皇储于一八八九年在迈尔灵宫自杀，皇储的堂兄弟弗兰茨·斐迪南成了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其时，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已经六十岁，身患重病，新的继承人作好种种准备，满以为很快就能登基即位。可是一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整整等了四分之一世纪，直到一九一四年，这位等着即位的人在萨拉热窝被杀，传位人弗兰茨·约瑟夫还活着。

我为了报道灾情前往科诺皮什杰，其时，弗兰茨·斐迪南已经等了十七年多。围绕着他个人和他的宫廷已经流传着许多谣言。最近，由于一起神秘的外交事件，这些谣言又增加了新的内

---

① 贝内肖夫，布拉格南部一城市名。

容：一位有名的英国植物遗传学家被召到科诺皮什杰，让他通过两个品种的玫瑰杂交培育出黑玫瑰新品种。试验情况还没有传到公众的耳朵，不幸事件的预言家们[1]和占卜者就写信给《时报》编辑：从英国的历史中，难道人们还不知道，一旦黑玫瑰开花，就意味着要发生一起谋杀事件，从而引起一场战争？更何况黑玫瑰是在一位皇子的宫廷中开放，而整个中欧的未来都掌握在这位皇子的手中？

幸亏这位培育植物界不幸象征的人还能够安慰世人，安慰《时报》的读者：染色体理论是以当时公认为正确的遗传学说为基础的，根据这种理论，用雄性野玫瑰和雌性野玫瑰进行杂交，培育出来的每一百棵幼苗中，有二十五棵象父性，全是白的，有二十五棵和母亲一样是玫瑰红色。在其余的五十棵中，有十五棵黑褐色的，用这十五棵和父亲或母亲再交配，然后再用这种近亲交配中生产出来的颜色最深的十五棵和它们的父母交配。这样，七年后才能培育出一代全黑色的玫瑰来。根据这种说法，那些相信这种征兆的人认为，一九一四年夏天以前，奥地利皇储的命运以及和平的命运是有保障的。

面对着这封信，《时报》的编辑也许就象是布里丹的驴子[2]一样——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普里坦的驴子。一方面，他不好把

---

① 原文 Kassandrarufer，Kassandra（卡珊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能预卜凶吉，曾预示特洛伊要毁灭，但并未引起注意，后人就把卡珊德拉比做预示不幸事件的人。

② 布里丹，十四世纪哲学家，曾任巴黎大学校长。"布里丹的驴"是后人强加在布里丹身上的一个比喻：有一头驴面对着两捆相同的草，不知吃哪捆为好，最后哪捆也没吃而饿死。这里是比喻《时报》编辑面对这封信不知所措。下面"普里坦"与布里丹发音相近，原系产生于十六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个教派，汉译清教。

这类关于交配、繁殖、指导培育黑色杂种等令人难为情的故事呈献给女读者；可是另一方面，这位植物学家的说明是很合适的材料，可以为城市商业区和它们的股票提供为时七年的稳定期。

就象往常一样，在道德和经济之间总是做出有利于经济的判决。现在，人们告诉公众，染色素中暂时还没有谋杀企图，也没有战争意向，谁都不应设想，科诺皮什杰附近的水灾是试验玫瑰花的结果。实际上，和以后发生的灾难相比较，这次水灾很难被称为灾难。可是，大家仍然把它说成是灾难，那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规模罢了。

我乘坐最后一趟火车，于深夜到达出事地点。列车到达后不久，在夫拉辛——贝内肖夫一线，水位就和路堤一样高了，大水冲击着路轨。

我在贝内肖夫调查所有能调查到的情况。根据皇储的电报命令，调集了周围的驻军——军队和宪兵。宪兵的任务是没收那些从皇储的池塘里冲到大街上、被农民拣起来的鱼。皇家工兵团的任务则是迅速筑起一道防洪堤，防止洪水涌入宫殿的地下室。

在“雄狮”旅馆的小客厅里，我把调查结果记录下来。房间里坐着一些人，他们由于绝望而神情沮丧。旅馆主人轻声对我说，呆在角落里的那个男人是被大水淹没的里贝施庄园的庄园主。窗户旁边木然坐着一家人，神色凄惶；他们是在珂鲁皮赤卡村开磨坊的。他们的磨坊没有办理保险，去年被大火烧掉，他们用剩下的最后一点积蓄重建了磨坊，现在大水又把新建的磨坊毁掉了。

亲爱的读者，正因为你生性好疑，你一定会问，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里贝施和珂鲁皮赤卡这两个波希米亚村庄的名

字。实际上，如果当时在“雄狮”旅馆的小客厅里，有谁向我预言，二、三十年以后，我还能记住并写下角落里的那个人就是里贝施村的庄园主，靠窗户的那一家人就是珂鲁皮赤卡村的磨坊主全家，我一定会把这样一个预言家看作是只会胡诌瞎编的人。

我怎么能够预料，盲人梅托修斯的编年史是如何的完整无缺？若干年以后，我还听见他吟唱反映这次水灾的歌曲，其中唱到了里贝施的庄园主和珂鲁皮赤卡没有办理保险业务的磨坊主；每唱到这里，盲人梅托修斯就提高声调，十分凄凉悲哀。

“雄狮”旅馆的主人和房客叙述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大水是夜里袭来的，村民们狼狈逃离，洪水在后面紧紧追赶。水浪冲击着瓦房的屋顶，淹死人畜，冲走木房。无论是已经收入谷仓的粮食还是地里的庄稼全部被毁。

“那宫里的情况怎么样？”我问道。

宫里么？喏，当然，花园也被淹了，池塘的堤岸被冲毁，可是宫殿本身完整无损。主人皇储一直呆在那里。

这时已是深夜，我想上楼回到我的房间里去。前厅里有一个宪兵，满脸怒气，正咕噜咕噜往肚子里灌啤酒。他曾在第十一团训练过我们这些新兵。我想向他问个究竟，他倒先开口了：“您说说看，我们为什么要从穷人手里抢回死鱼，送到宫里去？请您告诉我，皇储要这些死鱼干啥？您是个知书达理的人，肯定清楚。”

我回答不了他的问题。我和从前服役受训时的老师一起喝了一杯啤酒，就去睡觉了。

外面是倾盆大雨，电闪雷鸣，狂风施展出全部威力要把我房间的凉台刮走，暴雨仿佛要把窗玻璃打个粉碎。

我睡不着，干脆整理调查到的各种情况。这些情况和村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没有吃的，没有住的，一贫如洗。可是我

被派到这里来，却不是为了报道这些人的灾难。对于报纸来说，一位皇子的小小烦恼是至关重要的新闻，而几百农民巨大的厄运则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宪兵提的问题真是古怪希奇！皇储真的为什么要这些死鱼？我无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而自寻烦恼。当然，关于皇储下令收回这些鱼的情况，我绝不能报道，同样，我也不能提及投入部队保护酒窖一事。

尽管我是一个年轻的记者，可是我已经不得不对相当多的事情保持沉默；等我成为老记者，我不能报道的事情将会多得相当可观。如果有同行夸口说，在他从事报业生涯中，他的写作从来没有受到过限制，从来没有一个想法被抹掉，那么，这只能证明，他们自己就是在检查允许的范围之内活动，他们的思维方式一点也没有超越过所规定的思想界限。

这次水灾区域大，灾情严重，而我能写的只是一小块，这就是未来皇帝的住地。就是这方面的报道，也得经过检查，特别是在布拉格。在那里，皇储是懂得如何保持他的巨大影响的：政治警察总长，专区头目库姆，科诺皮什杰听取忏悔的长老格伦伯爵，埃毛斯修道院院长阿尔班·沙赫莱特纳和总参谋长阿尔弗莱德·雷德尔中校等都是他的亲信，按照他的意旨推行着天主教的和大奥地利的政策。就是捷克国家社会主义党领袖卡尔·施维哈博士也是为皇储效劳的。当然，这件事当时还是个秘密，但不久就传扬出来，引起一场公开的丑闻。

无论是对那些大有不祥之兆的黑玫瑰，还是一个贩卖艺术品的商人骗卖给皇储的圣格奥尔格[1]浮雕，凡是与皇储有关的

① 格奥尔格，圣徒，相传于四世纪初作为罗马士兵遭受酷刑致死。传说他杀死了一条龙，拯救了国王女儿。在以后的若干世纪中，不少艺术形式对他有所描述。

事，外国报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报纸都作了长篇报道，可是与此相反，颇有影响的"我们刊物之友"却使《波希米亚》的总编辑相信，发表这些是不适当的。当全世界都在谈论皇储和波希米亚女伯爵索菲·肖特克订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几乎连肖特克家族的历史都不能介绍。无论是外国的反应，还是维也纳报纸的报道，我们都不能刊载。

就是我从皇储居住的宫里发回的短得不能再短的报道，也会被大大删减。可是我必须尽我的力量去做。

第二天早上，我在贝内肖夫租了一辆双套马车和一顶大礼帽，以便进宫。不出所料，在铁栅门口站岗的宪兵毕恭毕敬地让这位从马车上走下来、头戴大礼帽、脸上一副高傲表情的先生进了宫门。我走进花园，谁也没有拦我问我。

一所专用的长形房子收藏着关于圣格奥尔格的珍品。多少年来，皇储收买了——只要没有人赠送给他——许多刻画神圣的格奥尔格的艺术作品，诸如哥特风格的木雕，廉价的石膏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油印画，这里既有珍品也有平庸之作。

十分明显，皇储把自己看作是杀死龙的人，可是他把那个似龙怪物又比做谁呢？这位狂躁的猎人射中了上千头各种各样的鹿仍不满足，那么他所渴望的能使他满足的猎物又是什么呢？

奥匈帝国消亡以后，发表了皇储的信件。这些信件的第一句话大多是"请原谅我用铅笔写。"从这些信件中人们可以看出，他的龙是个包罗万象的东西。皇储以愤怒的笔调写了弗兰茨·约瑟夫周围那些反对他的婚姻的宫中亲信，写了那些进行干预的无耻政客和记者。他称那些限制哈布斯堡皇室权势的匈牙利

人为"科舒特①的无赖之徒"，称意大利收复领土党党员为"意大利贱民"，说塞尔维亚人是"奸污母羊的人"，此外，他还咒骂自由工党人士、犹太人、议会和社会主义者。

我隔着窗户向别具一格的格奥尔格礼拜堂里窥视。大水并没有熄灭龙口里喷出的熊熊火焰，神圣的格奥尔格们高高地登在马镫上，也不是因为害怕洪水上涨。我以记者惯用的假设记下一句，只有大水继续上涨，才会把骏马和骑士淹死。相反，白玫瑰花一点也没有受到损害，宽大的木门已经锁上，完全能够抵挡洪水的冲击，暗淡的花朵可以在这里不受干扰地生长、开放。宫殿上面几层楼收藏的珍宝——著名的爱沙尼亚武器，也不必担心会发生什么不测。

我在潮湿的花园里试探着往各处巡视。形状象纹章一样的花坛那面站着两位先生。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位就是皇储，另外一位朝我走来，问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回答说，我是从布拉格来的报社记者。他迅速跑向皇储，又朝我这边跑了回来，态度非常严峻。他严厉地对我说（这种声调是从他主人那里获得的）："宫殿的事情一个字也不许登到报上。请您立刻离开皇储的府邸！"听他说完以后，我就立刻离开了府邸。执行命令的第一部分，那不是我的事。弗兰茨·斐迪南的亲信们会尽心尽力的。

在贝内肖夫邮局里，我通过电话发回我写的简短枯燥的报道。我还没有说完，就在耳机里听到年迈的赫尔曼·卡茨的声音。赫尔曼·卡茨是我们编辑部的编委，同时又是维也纳《新自由报》驻布拉格的通讯记者。他对我说，我必须在当天就水灾对皇储的宫殿造成的影响一事通过电话直接向《新自由报》发整整

① 科舒特（1802—1894），匈牙利国务活动家，民主独立运动领袖。

一版篇幅的新闻，报道要用第一手材料，要和我刚才向布拉格发回的报道有所不同。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赫尔曼·卡茨先生就以一种十分严肃的口吻对我说，贝内迪克特[①]先生询问《波希米亚》报把谁派到科诺皮什杰去了，并一字一句地对我说："请您告诉基希先生，这是我个人的委托。"

从法律上讲，贝内迪克特先生根本不能给我什么委托。莫里茨·贝内迪克特是《新自由报》的发行人，从法律上来看我和《新自由报》毫无关系。实际上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实际上，看莫里茨·贝内迪克特的眼色行事是我们编辑部的职责，否则他就会从另外一家报纸的编辑人员中挑选他的布拉格通讯记者。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失去那些政治情报的来源，而赫尔曼·卡茨作为奥地利唯一的世界性报纸的代表是随时随地都能获得这些情报的。另外，《波希米亚》报的政治观点在赫尔曼·卡茨的报道中经常引用，也能提高《波希米亚》报的威信。

除此之外，莫里茨·贝内迪克特也是影响和权力的象征，虽然他对新闻界的独裁统治已经开始动摇。自由主义和奥地利的集权主义、自由贸易时代都已奄奄一息。维也纳的小资产阶级纠集在反动组织中，工人群众也组织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工会等团体。奥地利各民族对奥地利德国人的霸权提出了挑战。讽刺家卡尔·克劳斯[②]创办的主要是用来反对莫里茨·贝内迪克特的杂志《火炬》已经拥有数千名狂热的同情者。

---

① 莫里茨·贝内迪克特（1849—1920），政治评论家，从一八七二年起任维也纳《新自由报》编辑，一九〇八年以后任该报总编辑。

② 卡尔·克劳斯（1874—1936），奥地利作家，德语文学中最重要的讽刺批评家之一。

莫里茨·贝内迪克特对这些事态的发展一概置若罔闻。他要别人一如既往，把他的报纸当作报界的圣经，把他本人看作主教。有一次，他的一个驻议会记者向他提供了一个消息，同时说明，他曾宣誓保证暂不发表这条消息。莫里茨·贝内迪克特站了起来，象一个教士那样伸开两只胳膊，说道："我宣布解除你的誓约。"

正如该报发行人所希望的那样，一些老订户丝毫没有改变他们对这家报纸的看法，他们对报纸上登的每一个字都确信无疑。有一次，作家阿尔图尔·霍利彻[1]向我讲了一件轶事：他不去经商，也不去上大学，而搞起文学，他的家庭就和他断绝了关系。写给他母亲的信没有拆封就被退了回来。他想和兄弟姊妹接触，反而遭到侮辱，给顶了回来。后来，他写的书和剧本获得成功，情况依然如故。当他突然接到家信，得知家里人请求他原谅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惊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新自由报》在报道参加一次活动的著名人士中提到了他的名字。

在维也纳流传着这样一件事：当音乐家安东·布鲁克纳觐见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时，皇帝问他有何要求，布鲁克纳热泪纵横，高声说道："陛下，您能否在汉斯立克先生那里为我美言一句，让他不要总是这样和我过不去？"

不行，陛下无能为力。在这个问题上皇帝失去了他的权力，虽然爱德华·汉斯立克只不过是《新自由报》的一个音乐评论员！

特奥多尔·赫茨勒[2]不久就要在耶路撒冷城外和德国皇帝

---

① 阿尔图尔·霍利彻，一八六九年生于布达佩斯，一九四一年死于日内瓦，进步作家。

② 特奥多尔·赫茨勒（1860—1904），犹太作家，担任过维也纳《新自由报》驻巴黎通讯记者，他主张犹太人是一个民族，有必要建立犹太国家，是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之一，曾任犹太复国主义世界组织主席。

商讨在巴勒斯坦建立稳固的犹太人家园的规划，从而使世界震惊；特奥多尔·赫茨勒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皇帝的宫廷里和在圣彼得堡沙皇的宫廷里主张解决犹太问题；还是这个特奥多尔·赫茨勒在他的日记中认真地记下了他每次和《新自由报》发行人见面时的情景：这位发行人赏面子，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就感到很幸运；发行人对他的问候仅仅冷淡地表示感谢，他就十分懊丧。

现在，至高无上的权威贝内迪克特亲自委托我这样一个来自小地方的年轻人撰写整整一版的报道。这一版绝不会成为皇储在布拉格的党羽进行报刊检查时的牺牲品，因为不久前，在弗兰茨，斐迪南和莫里茨·贝内迪克特之间曾发生过一场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皇储绝不是胜利者。

在弗兰茨·斐迪南和肖特克女伯爵订婚这件事情中，莫里茨·贝内迪克特看到了将来在继位问题上产生麻烦的根源。只有皇储公开声明，立誓他的妻子和后代放弃继承皇位，奥地利才得以避免重复玛丽亚·特雷西亚式的为继位问题而引起的战争①。当然，这样一种立场是不允许公开表示出来的，可是莫里茨·贝内迪克特可以把具有这种倾向的外国报刊文章和议会中的演说大加摘录。此外，他还邀请著名的法律学家和历史学家撰写"一般性的""与现实无关"的文章，阐述根据哈布斯堡的继位法不能成为奥地利女皇的皇后能不能当女王，对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进行统治，以及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

尽管这是纯学术性的讨论，与时代毫无关系，弗兰茨·斐迪

---

① 玛丽亚·特雷西亚（1717—1780）在继承皇位（1740—1780）时，在奥地利爆发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战争（1740—1748）。

南的机关刊物，维也纳基督教社会党的报纸《帝国邮报》还是以愤怒和威胁的口吻进行了反击。该报的专家们，大多是上层宗教界人士，以一种完全不是教士所应有的愤恨对莫里茨·贝内迪克特进行人身攻击。

皇储当然可以和女伯爵肖特克结婚，可是在举行婚礼之前他不得不宣誓，他放弃让他的夫人取得女皇或女王的称号，放弃让他未来的孩子们继承皇位。莫里茨·贝内迪克特可以把这个誓言看做是他的--个成就。毫无疑问，弗兰茨·斐迪南获得政权之后，会对他进行残酷的报复。

目前，莫里茨·贝内迪克特还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此时此地我还得听他的。

我戴上大礼帽，坐上双驾马车，二次进宫。警卫又让我进去了，和第一次相比较，这更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了，因为现在我作为世界性大报的使者在表情上一定是充满了骄傲。

从树上滴下的雨水落在我的大礼帽上，我一点没有注意。我全神贯注于积累印象。我要写出有独特风格的报道，写出连《新自由报》最老的读者也从未读过的报道。

渔塘里涨满了水，堤岸已经不成其为堤岸；我沿着塘边走去，脚踩湿泥，头脑里却在构思。我在为莫里茨·贝内迪克特构思，他在等我的报道。我在构思反对皇储弗兰茨·斐迪南的文章。

对各式各样的圣格奥尔格，我想找出共同的特征，描写他的青春活力，修长的身躯，没有胡须的面孔，从他的目光里可以看出，他不曾起过杀死怪兽的念头。总而言之，所有这些都应突出地加以刻画，正是这些构成了骑士格奥尔格和那位肥胖的上嘴唇上留着一小撮胡子、热衷于打猎的宫殿主人之间的区别。我恶

意地微笑着决定，描绘描绘那些外形美观的石膏人像，描绘非常漂亮的圣格奥尔格的彩色石印像。

这一次，玫瑰园的大木门敞开着，有人推着两辆装满死鱼的手推车正往里走。

"是里边要用吗？"我问一个管理花园的小工。

"是呀，我们向来用吃剩下的鱼当肥料，有时也用死鱼。象这次这么贵，一下子又这么多，可从来没有见过。"

我心里想：很相称的肥料，给黑玫瑰上的很相称的肥料——从忍饥受饿的人那里抢来的死鱼。当然，就是在维也纳也不允许我把这些说出来。可是在我的报道中，即使没有肥料，黑玫瑰也会开放，在和平与欢乐的万花丛中也会生长这种预示不幸的植物。

我走上了堤岸。堤岸正中已经决口。口子大约三米宽，我只能走到决口的地方。我的脚下，水流湍急，打着漩涡，象是流动的利爪要抓住剩下的石头障碍物，把它冲走。我转过身，正要记下周围的景物，决口那边出现了一个人。那是皇储！

"太放肆了！我已经让人告诉您，我不允许报纸上登载任何关于宫殿的事情！"他大声喊着。

从他的瞳孔里射出威胁的目光。这种威胁照例是要发生作用的，对我却不管用了。我是从更高的方面派到这里来的。

我的回答越过张着大口子的深沟，传向对面："皇帝陛下，决定把什么消息登在《新自由报》上的不是别人，而是……"

他听到《新自由报》这个名字，火冒三丈，满脸通红，他的手指痉挛地抓在一起，好象要把谁掐死似的。

"……决定这种事情的不是别人，而是莫里茨·贝内迪克特先生。"

说完，我就转过身，扔下那位世界帝国的继承人，顺着已经决口的堤岸的残存部分，朝大门走去。

王志佑 译

玛格达勒妮教养院

(1942)

我年轻时写的一篇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试着写的一篇报道，三十年以后，我又回想起了它，这件事情非常离奇。

一九三三年那些离开了沦为纳粹分子战利品的祖国的德国作家，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反法西斯流亡者文化中心，即德国作家保卫协会。每逢星期一，有几百名德国流亡者聚集在促进工业协会的大厦里，听报告或讲座。他们举办展览，展出在纳粹德国被禁止的艺术品，在巴黎的几家大剧院演出被禁止的话剧和小歌剧，创建了有几千册书的"被焚书籍图书馆"和亨利希·海涅奖金，每年一次授予一部在流亡期间写成的处女作。还办了一个名为《作家》的杂志，从表面上看是仿效国家社会主义的帝国作家协会的同名机关刊物，通过邮局把这个杂志寄给还居住在德国的作家。他们中间有些人用假名对这个杂志表示赞同，有些人不用假名对它虚张声势地咒骂一番，但无论如何，都证明了他们确实收到了这个刊物。

这个杂志的编辑部密切注视着纳粹报刊上的文学栏，这项工作没有多少收获，因为在纳粹报刊上任何别的事情都比文学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个转变，似乎在酝酿要大力促进文学的发展：汉堡市宣布设立一项一千马克的奖金，这项奖金将授予最好地反映德国沿海地区的幽默和笑话的短篇小

说。迄今为止，最高奖金为五十或一百马克，为一篇短篇小说发一千马克奖金，这在德国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

几周以后人们读到，得奖小说的题目是《玛格达勒妮教养院》，获奖者是《汉堡旅游报》的幽默作家汉斯·乌特·哈姆。

本来，玛格达勒妮教养院是对失身女子进行教养的地方，很难成为当地幽默和笑话的来源，在纳粹分子眼中更是如此。纳粹分子相信改造营、教养营、集中营这类场所能产生神奇的作用，他们的文化纲领就建立在这种信仰上。教养院教养的虽是失身女子、但毕竟是德国姑娘，这样一个教养院怎么能成为讽刺的对象？

有一次，由于某种机遇，我得以窥视这类教养院的极其滑稽的一面。当然，我并没有因为叙述了所遇到的这些情况而获得奖金。

事情是这样的，我打电话给布拉格失身女子教养院，讯问院长，我是否能参观一下教养院，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

回答是一声惊叫："写篇文章？您是说，写篇文章？"

我向院长说明，她一点儿也没有听错。

"我的天！"对方叹息了一声，"这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您为什么偏偏要写一篇关于我们的文章？"

我请院长放心，我只是想介绍一下教养院的设施和教育工作，完全是一般性的，没有任何其他原因。

"啊，原来是这样！"院长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不过，我不能准许您前来参观，我得问一下主席夫人阁下，明天下午我给您回话。"

第二天下午我听说，后天将召开委员会会议讨论我采访的请求。第三天我得到通知，大大后天上午十一点我可以到教养

院去。

我准时到了教养院门口，正要进去，一个留着皇帝式小胡子的门房堵在门口，用高傲的口吻问我："有通行证吗？"

我回答说，我是约好了来的。

"您是报社的先生吧？"

我正是从报社来的。我的回答使他产生了一种无法掩饰的惊愕："我站在这里是专门接您的，"他说，"女士们也已经在等候您了。"

他所说的女士绝不是那些失身姑娘。等候我的那些女士既不是姑娘，更谈不上什么失身，而是教养院委员会的成员。她们是远在波希米亚亚玛孙战争① 年代就获得贵族称号的家族的后裔。站在我面前的这些女士，身材魁梧、胸部隆起、大手大脚，她们好象还嫌不够大似的，又在头上插上几根直挺挺的鸵鸟毛，即所谓的垂缨。

在这仪表堂堂、举止犹如男子一般的妇女群中站着一个怯懦尴尬的人物，穿着长长的黑色衣服，这是教养院的牧师。从侧面看他似乎很胖，因为在他的肚子上还有一个肚子；可实际上应该说他是比较瘦的，因为他的肩膀和身体都相当狭窄。这个肚子很大，而身体瘦削的牧师对我做了一个类似屈膝礼的动作，算是自我介绍，然后把我介绍给主席夫人阁下，理事会中其他女士和教养院院长，正是这位院长在和我通电话时吃了一惊，后来心里的一块石头象胎儿一样落了地。

我们在一张圆桌旁就座。为了对我表示欢迎，教养院的牧师刚刚坐下又站了起来，把一份内容极为丰富的讲稿放在面前，

---

① 古时亚玛孙族，其女子以勇敢强悍著称。

开始致词。这是专门为我而写的欢迎词："尊敬的编辑先生！让我以我们教养院的名义向您表示，看到一位舆论界的代表认识到了我们基于道德原因而进行的工作的严肃性以及这项工作如何适应天意，我们非常高兴。"（说到这里，那些头插鸵鸟毛的人频频点头，以示赞同。）"至于要在报上刊登一篇关于我们教养院的文章，本委员会在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例会上一致表示同意。尊敬的编辑先生，在参观前，我想就本院的方向和目的向您做一简短介绍。"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也许真的很简短，可是整个演说却很长。这个演说一半是论述透彻的斋戒讲道，一半是开导性的长篇报告。他从试图强奸和诱奸的概念谈起，然后继续对我开导说：犯罪人绝不是什么令人恐惧的丑八怪，他们和世人差不多，身上没有马蹄牛角，没有奇臭怪味①，看不出他是魔鬼的使者。相反，诱奸犯是以和蔼可亲的形象出现，伪善而又阿谀奉承地去接近他的牺牲品，引诱她们上钩。

牧师好象对着教堂里的听众席大声讲道一样，对我高声宣讲，揭露内幕。讲完，他瞪大眼睛看着我；那目光似乎在问：你认为这种事可能吗？

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诱奸犯使用的方法，因此也就没有设想过，他们是头上长角，屁股上拖着魔鬼尾巴，一眼就能认出，他们身上发出恶臭，远远的就能嗅出来。我看见讲话人停下来，目光注视着我，要求我回答，于是我怀疑地摇了摇头，算做回答：这里谈论的诱奸人的阴险，难道也是真的吗？

看来确实是真的，因为周围所有头上插鸵鸟毛的人都点头证实，于是我脸上的怀疑表情也就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① 传说魔鬼出现时有一种臭味随之出现。

牧师感到满意，又继续他的演说："不过，诱奸者的这种和蔼可亲的形象只不过是乔装打扮，是假面具，那些可怜的牺牲者，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姑娘，真是叫人痛心，她们甘心情愿上当受骗，自投罗网……"

听到这里，在座的女士们都感到惊愕，幸亏致词的人只是说她们自投罗网。"……引诱。她们真是不幸，"他失声喊道，"她们是三重的不幸，你们说说看，她们得到的报酬是什么呢？她们得到的仅仅是蔑视，而这种蔑视是完全有道理的。她们想摆脱贫困，而贫困绝非耻辱，她们想逃避使人汗流满面的劳动，而劳动正是圣经上叮嘱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的事情。"

讲到这里，讲话人自己点头加以证实，而那些世袭女贵族也汗流满面，不住点头。

演说者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追求虚荣导致这些姑娘们失身。她们宁愿沉湎于欢乐、淫逸的生活，而不愿当女用人，不愿到工厂当女工，去获得他人的尊重；她们宁愿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不愿问心无愧地穿上简朴的衣服。故此，她们免不了要失望，痛苦的失望，尤其到了晚年！"

我听呆了。谁想过这些？可是，那些插鸵鸟毛的女士们再次一个劲儿地点头，表示赞同，不管我愿意与否，我只得相信这些话。

"失身姑娘应当受到蔑视，但更应受到蔑视的是那些引诱这些女孩子的人。可这指的是谁呢？"

我用目光表示，我不知道这指的是谁。

"这里指的是那些道德败坏的男人，他们仅仅是为了一时的欢乐而玩弄这些姑娘，但从来没有打算要和她们结婚。"

这次是我频频点头，表示完全同意对这类男人的谴责。令

人宽慰的是，我现在听到，这种败坏道德的行径遇到了对手。“我们的教养院挺身而出（演说者提高了声音），它是防御工事（演说者的声音又提高了一些），它是碉堡（演说者的声音提的更高了），它是反对当今世界堕落的堡垒。当然，”讲到这里，演说者的声音从防御工事、碉堡和堡垒的高度降到普通事实的平地上来了——“当然，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责任不在我们身上，而在那些姑娘们自己身上。由于后悔而自愿来到我们教养院的人寥寥无几；其他人，警察局和青年法院不得不用暴力把她们送到这里来。大家听听，用暴力把她们送到拯救她们的地方！有些人自愿到我们教养院来，要求收容，她们说，她们这样做是因为她们有忏悔之心。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她们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在一段时间内不用为吃饭操心发愁，或者是她们病了。有些人到这里来，是因为她们错误地认为，在我们这里警察不会来找麻烦。她们离开我们的教养院之后，又投入了我开始时提到的那些引诱者的怀抱之中，这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我刚才是怎么说的：‘投入怀抱’，我最好还是说落入陷阱，掉进罗网，陷入魔掌。但是，我们永远不能由于这些失败就离开提倡道德风尚的道路，因为上帝饶恕了玛格达拉的女赎罪者①，并把她引上了通往尽善尽美的阶梯。

“上帝做的这些事，我们同样要做，我们的指导思想是祈祷和劳动②。特别应该强调，首先是要‘祈祷’。无论早上、中午、下午、晚上，都要祈祷。我们毫不容情地要我们所教养的人劳动，在劳动时也要祈祷。在我们的赎罪院里没有会引起误解的宽恕，我们以最严厉的手段进行惩罚。因为圣经上写的很清楚，谁

---

① 即指玛利亚·玛格达雷娜，玛格达拉是她的家乡。

② 原文为拉丁文。

爱他的孩子，谁就惩戒他们。我们就是这样，用严厉手段教育她们祈祷、劳动。为了善意的教会目的，我们出售她们劳动的成果。阿门！”

牧师用这几句话结束了他的演讲，他环视四周，头上插鸵鸟毛的人都向他鼓掌。然后，他把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我用尽一切办法使他相信，我对于他所披露的这一切深为感动。

现在，主席夫人阁下讲话，她宣布，我们现在要去参观工作室、宿舍和礼拜堂。“我们专门为尊贵的客人展出了一系列女孩子们手工劳作的成品。”这位尊贵的客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主席夫人阁下表示希望，尊贵的客人将通过这些钩织品、针织品和刺绣等看出教养人员的能力，并且知道如何来颂扬她们。

“当然，当然，”我答应着。

我说完这句结束语之后，欢迎仪式议程全部完毕。我们——委员会的女士们，一位牧师和我构成的小小队伍——穿过长长的楼道。牧师边走边轻声对我说，今天是他第一次对报界发表讲话。他把讲稿交给我，并解释说，全文发表他的讲话，并且注意正确刊印他的名字，是如何的重要。

我们走进工作室，大约有三十个姑娘很懂规矩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拉长声调齐声说了一句虔诚的问候语。我们回答说：“永生，阿门。”

主席夫人阁下开始介绍说：“在这里，您首先看到……”这时范妮·梅尔克认出了我。

“你好，埃贡，”她喊道。

“埃贡来了，”现在四面八方都喊了起来，姑娘们朝我跑过来。莫特玛特咖啡店的手套蓓蒂[1]见到我非常高兴，拥抱我，亲

[1] 这里的“手套”以及下面的“糕饼”、“大炮”、“漂白粉”等都是这些人的绰号。

吻我。大个子糕饼米茨推开蓓蒂，向我伸过手来说："给我支烟，在这儿我们没烟抽。""我的那个当炮兵的小伙子现在干吗呢？"外号叫大炮的莉泽尔大声喊着，"那个混小子全好了吗？"另外一个人又嘱托我说："替我向'巴西利亚'酒吧间的哥们儿问好，告诉他们，最多两星期漂白粉汉西就又和他们在一起了。"

我被这些问候弄得十分尴尬，而委员会的女士们则比我更尴尬。她们是如此惊讶，如果有一个收留这样人的教养院，那她们真想干脆到那里去找个安身之处。还是主席夫人阁下，首先找到了话茬儿，她的语调里充满了格陵兰的寒冷、高立桑卡峰①一样高的怒火以及象大海一样深的蔑视。她转向我说："先生，您不用再往下看了，别的房间也相差无几。"

我就这样被赶了出来。我把所见所闻如实地写了下来。我的报道引起了极大反感，贵族们尤为反感。几家贵族家庭停止订阅我们的报纸。可是这种玩笑使得另外一些人感到满意，柏林出版社把我写的这篇报道收入世界幽默集中。

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后，那篇被德国所有的报纸刊载的汉堡获奖短篇小说的标题使我又想起了那次对布拉格玛格达勒妮教养院的采访。我想汉斯·乌特·哈姆的创作有可能以某种形式受了我所经历的事情的影响，可是我又马上打消了这种想法，因为不管他会从我当年写的文章中得到些什么，但无论如何不是德国北部沿海地区的幽默和笑话。

在汉堡市政府华丽的大厅里，纳粹的评奖委员会授予短篇小说作者证书和一千马克的仪式上，发表了许多美好的贺词，诵读了那篇最优秀的幽默短篇小说，当时掌声热烈，气氛活跃。其

① 高立桑卡峰是喜马拉雅山的山峰之一，在珠穆朗玛峰西南，高7145米。

后，希特勒德国报纸刊登了“这篇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想起弗里茨·罗伊特①、当然还有点粗糙的反映德国北部沿海地区最真实的民间幽默的试作。”

朋友们，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了。这分明是我写的关于布拉格玛格达勒妮教养院的报道。汉斯·乌特·哈姆只是把它搬到了汉堡，改写成德国北部低地方言罢了。他对我的文章只做了一点小小的，当然也是卓有成效的改动，他使那些堕落的天使们向获奖者祝贺时称他为“汉斯”，而不是“埃贡”。

我想就纳粹奖励我的作品这件事，通过我们的杂志《作家》敦促那些留在德国的同行们进行思考。可是党卫军机关刊物《黑色军团》先我一步揭发了这件事。他们得知了那篇幽默小说的底细，暴跳如雷。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黑色军团》的先生们肺都要气炸了。使他们如此激愤的并不是在文学创作上进行剽窃这个事实，而是有人“把一些纯粹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想法卑鄙地塞进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精神和道德风尚之中。”

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们郑重其事地聚集在一起，“嘉奖一个下流文人的作品，而这个无耻文人写的书早就被焚毁了。”每想到这一点，这家报纸就感到羞愧难当，而且对此直言不讳。该报要求立即逮捕我过去写的报道的新作者，“好让汉斯·乌特·哈姆永远知道，穿上埃贡·埃尔文·基希穿破了的靴子，用下德意志方言开始搞犹太人那一套，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次悬奖征文事件之后，为创立纳粹文学的努力又被搁置下来了。

王志佑 译

---

① 弗里茨·罗伊特(1810—1874)，德国作家，多用北德低地方言写作。

记 者 当 兵

(1942)

人们常说，搞新闻工作的，如果不干了，可以去做其他任何工作。一九一四年我离开了新闻工作去当兵，这将把我引向何方？

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我就作为奥匈军队里的一名下士，随同第一批部队开到了侧翼防线。这对我来说，比起那些不急于起程的人更为困难。因为在国内和后方我的上级指挥机关要把我作为历史纪实人员（这是给专门搞宣传的头目起的美妙的代名词）留下来。可是我愿意经历更大的冒险事件，这样我就来到了前线，在敌人面前匍匐、射击、奔跑。我们的敌人首先是塞尔维亚王国。

于是我有了一个新的、虽然只是暂时的职业：当兵，我第一次身临其境去观察那些比报刊上登载的全部新闻还重要的事件。我自己置身于令人难以相信的恐怖之中，而报纸上却不刊登重要事件，光发表一些纯属无聊的东西，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

我们的连队向科伦巴拉的堤岸街发起了一次冲锋。一百五十步远的地方夺去了我们一多半人的生命。我和这些小伙子曾经日夜厮混在一起，我了解他们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感情的波动。我和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可谓生死之交，今天这种友谊算是

到了尽头。

一连后备队把我们替换了下来，我们在大量减员的情况下，又返回原来的阵地。这块阵地已不是最前线，而是我们团的后方了。敌人的炮火还在轰击着这一百五十步宽的玉米地，为了争夺这块地方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给我们送饭的时候，也带来了邮件，其中有我一份报纸。我刚把报纸打开，见习士官弗兰克躺在担架上被抬了过去，他腹部中弹。我走过去对他说："代我向布拉格问好！"他叹息着说："我活不到布拉格了。"

我打开报纸读着："北方战场军事报道……""南方战场……"，社论："反对抢购物资"。

我领着一个巡逻队到左边邻近的连队，问一个正在一旁大便的上等兵，连部在什么地方，他用手给我指了指方向。

几乎在这同时，大地又怒吼了。泥土飞到我的嘴里、眼里。当我又能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见上等兵的躯干横在地上，鲜血从脖子里喷出来。炮弹穿过他的脑袋钻进了地里，这是一发臭弹。

我又回到避弹壕里，四肢还在颤栗。我发现我的裤子已经溅上鲜血。为了忘却这些情景，我很快掏出报纸，去想别的事情。

"在弗拉基米尔·施里希特纳男爵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个鼻烟盒，上面镶着一幅弗拉郭纳尔[1]的下流图画，不言而喻，在昨天拍卖的时候……"——"'兄弟运动'足球队和'德国足球俱乐部'队在上次相遇时，经过激烈争夺踢成平局，因此人们以更为

---

[1] 弗拉郭纳尔(1732—1806)，法国著名画家。

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将在星期天举行的这场比赛，这要比……”

卫生员用简易担架抬过一个伤员，到了我们战壕前，他们放下担架休息。我看了看他的脸，脸色惨白；我摸了摸他的手，手是冰凉的。人们拿走他的装身份证的夹子，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把他抬到李子树下，那里停放着尸体。

在小品文栏里：“月光洒在房顶，屋脊周围闪烁着一片银灰色的微光，把眼前的景致变成了海市蜃楼，就象一个充满渴望的人在做炽烈的白日梦时，在他的灵魂前出现的那种缥缈不定的情景。”

第十二连的一个通讯兵要我们出担架员和士兵，去把十五具尸体和八十五名伤员运走，侧翼防线力量很薄弱，抽不出人来。

“奥地利第二轮分级彩票第六次揭晓日，下列彩票各得二百元……”

过来一个士兵，嘴里流着血，恳求给点水喝。幸好军用水壶中还有一点凉咖啡。他喝了咖啡，摇摇晃晃地走了。我们把他的血从壶嘴上擦掉。

“爪哇食糖，价格稳定，售价为 23.6，白银价格：24.62；在鹿特丹（植物油和动物油）销售量为 6500”——法庭见闻：“二十四岁的科默陶人玛尔塔·普拉纳看来是善良女子之表率……”

死尸的臭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天晓得什么时候工兵才来把这些尸体埋葬掉。

“德累斯顿剧团中的名星保莉妮·乌尔里希在我们这里也是久负盛名。授予她……，这个消息一定会使为她而倾倒的人感到万分高兴。小歌剧《乐师女郎》明天第七十五次公演，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值得纪念庆贺的事件。现在，我们终于发现海

伦妮·温特费尔德小姐(到目前为止她在布累斯劳演出)是一位能填补令人感到痛苦的空白的女低音歌唱家。”

嘶——轰——，一颗炮弹落在临时伤员抢救站旁。嘶——轰——，第二颗炮弹在离我们更近的地方爆炸。嘶——轰——，第三颗炮弹把我们的厕所炸平了。我们等待着第四颗炮弹。

“十字军广场。跟在身穿灰色短衣长裙的金发女郎后面，并为这位女士注意到了的先生迫切希望……”

从左边的玉米地里爬出一个人，我立刻端枪瞄准了他。我认出他是三团的司号员。鲜血浸湿了他的军装。今天凌晨他背部中弹，晕倒在地，直到中午时分才苏醒过来。他没有力气站起来，子弹又在他耳边嗖嗖飞过，他就在地上向前爬了几个小时。他已经用裹腿把伤口包起来。他开始呻吟：“就我一个人，一个人……”抬伤员的重新给他包扎了伤口，把他放到担架上。“就我一个人。”

我们感到很冷。有一个人说：“可惜我没有搞到一件大衣。”这个想法一下子吸引了我们所有的人：但愿有更多的死者，那样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大衣盖在我们身上。

“发生在魏因贝格商业学校里的一桩爱情悲剧。”这是登在本地新闻栏里的一条百十来行的消息，是实地调查报道，写的颇为伤感。主要内容是两个女学生爱同一个教员，因而试图自杀。“爱情悲剧！”如果这叫做悲剧，那么我们在这里无休止地经历的事情又叫做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无休止地经历的事情叫做战争。在报纸上也有关于战争的报道，而且够多的了。可是所有那些报道都是错误的，被歪曲了的。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是一个战地记者，也会提供这样的消息吗？

在我和我过去的职业中间产生了一条鸿沟。现在我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我同时用记者的眼光和士兵的眼光观察事物，对事物获得了清晰的图象。

我从童年时起为自己撰写、印刷的类似“报纸”的东西，就是我的日记。每天我都把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思想以及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速记下来。我常常一写就是几小时。伙伴们讽刺我！“基希，把这些记下吧！”这一句话成了他们的口头禅。即使我不在，士兵们讲笑话发牢骚也好，咒骂威胁也好，也用这句话来加重语气。最后一个裤子扣掉了，唯一的一块肥皂掉到井里，鲜血溅到饭盆里，这些基希都记下来，无一遗漏。我记下了某些我作为记者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我也记下了某些我作为记者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写的事情，因为我会觉得这些事情太微不足道了。我也记下了某些我作为记者不许写、报纸不会登的事情。我的日记什么都写，什么都许可。在一个专业记者和士兵之间、在报纸和日记之间、在报纸所反映的一天和在战壕里所经历的一天之间，该有多大的差别呵！

战地消息简短而且令人宽慰："我们的南方军团加强了德里纳河河口的河岸阵地。"对我们来说，情况却是这样：清晨我们越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夜间又被赶了回来，退守“河岸阵地”。深夜两点，我们开始撤退。从左翼开始，每隔一段时间撤回一个连队。与此同时，中间的部队和右翼加强了火力，不让塞尔维亚人察觉我们的撤退意图而立即对我们进行追击。

三点钟的时候，我们的连队成了左翼。我们向德里纳河撤退。我们在荆棘丛生的灌木林中不停地后撤，还得不停地卧倒，炮弹擦着我们的帽子飞过。我们迷失了方向，至少是我们觉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有一个人喊着："到这边来！"另外一个人喊

着："到右边去！"不一会儿全乱了套，一群一伙的，有的往左跑，有的往右奔。

我们来到一条河边，月光照到河面上，反射出微弱的光亮。这是萨瓦河吗？如果是萨瓦河，那么我们是在德里纳河河口的上游还是下游？有人要把一个火柴盒扔到水里，确定水流方向。"把火柴盒扔下去，这太可惜了！"弟兄们都这么说。"这是个空盒。"即便是一个空的火柴盒，也是一件贵重物品。于是，我们把一张军用明信片扔到河里，它向右漂去，我们向左走。从河边的芦苇中爬出一些士兵，加入我们这一伙。有些人赶过了我们，又有一些人从对面走来，他们断定我们走错了方向。可是，如果刚才我们扔明信片的那条河不是萨瓦河而是德里纳河，那么我们离渡口就越走越远了。可是不多一会儿我们又听说，就象得了救似地听说，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

人们乱作一团。士兵们把枪枝和背包从身上扔掉，脱下皮靴。一艘搭浮桥用的平底船开过来，成百人站在水中，为的是在船靠岸之前就能抢先爬到船上。他们狂呼乱喊，挥舞拳头，要船向他们那边靠去。

另外一些人打算蹚水过河，到达奥地利一侧的河岸。他们成群结队，用胳臂保持着平衡，艰难地涉水前进。我也加入了他们这一伙。肩上扛的枪妨碍我保持平衡，我用枪带把它挂在脖子上。河床上扔着许多背包、面包袋和枪枝，我们就踩着这些东西蹒跚颠踬。我们还没有走完河宽的四分之一，迎面过来一群仓皇失措的人，他们说，不能再往前走了，河水太深，水流能把人冲倒。

突然，大家都喊着相同的一句话："塞尔维亚人已经到了河岸！"真的，子弹越来越密，象雨点一样劈哩啪啦地横扫过来。现

在，子弹不是从我们的头顶嗞嗞地飞过，而是落入水中，而我们正站在河水里。

我们迅速向右边跑回去，因为看样子只在左侧有塞尔维亚人。会游泳的开始游泳，巴特克上尉在我侧前方五步远地方向前游去。我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听见。我想赶上他，可他的头一下子栽入水中，再也没有出来。

在我的周围许多人淹死了，其余的人为了不被淹死而拼命挣扎，他们有的大口地喘着气，有的只有出气的份儿。还有个别的人试图逃脱流水的魔爪，向高处跳起，好象要把自己吊在半空中。可是就在这一刹那，他又沉了下去。有时，河水并不深，有人也倒了下去。旁边的人把手伸向他，把他救起。不会游泳的人抓住会游泳的人，会游泳的人就绝望地试图把他们摆脱掉，他们在一起扭打，最后共同沉入河底。

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纷纷向右移动，虽然人们猜测左边有塞尔维亚的步兵狙击手。但从那里似乎也有脱离危险的可能。为了接运士兵，我们的三条浮桥船向塞尔维亚一侧的河岸驶来。我也被卷入人流，向那边奔去（在几乎齐脖子深的河水中，能走多快就走多快）。一艘浮桥船还没有靠岸，就被站在河水中的人截住。船横着停了下来。大家都从朝着自己的那一侧船帮往船上跳，这时我绕到了船的另一侧，也就是朝着奥地利河岸的一侧，扒住了船帮的边缘。还有一个人和我一样机灵，也扒在船帮上了。

我恳求一个已经在船上的人把我拽上去。我往上爬，他抓住我向上拉，我还是没有上去。船上另外一个人用力想把我旁边的人拽到里边去，也没有拉上去。我对拉我的人说："你先去拽他，然后再来管我。"

他照我说的做了，我旁边的人上了船。

船已经满了，船上的人要求："开船，别再让人上来了！"

我向刚才帮助过我的人喊着，请他现在再来帮助我。他理也不理。还有刚才跟我一起扒船帮的那个人，他能上船本应感谢我，现在也不管我了。

这时，整个船的周围，包括我以为可以独自享用的那一侧，扒了大约六十只失望的手。工兵们喊道："都这样扒着，我们划也不了船。"这是对扒船的人进行攻击的一个信号。人们用枪托打那些扒船的人，打得他们一个个撒了手。他们掉进水里，露一下头，就沉下去了。

想把我从船帮上打下去的是一个小伙子，他的面孔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上衣领子的颜色是也鹦鹉绿，这是番号为91的部队的标志。一绺金发在眼睛上方飘动，一双大眼睛和这金发很相配，浅蓝色的眼珠大大的，人们简直要说，这是一双善良的眼睛。这双眼睛不看我的眼睛，而是死盯着我的绝望地扒在船帮上的手指。

他跪在船上，开始把我的手从船帮的边上弄开。看他那无所谓的样子，好象是在剥核桃。他终于把我的右手弄开了，又弄我的左手，可是就在这一刹那，我的右手又重新抓住了船帮。

看来这样不行。他把帽子往后一推，想了一会儿。然后，他用一只手拽住我左手的小手指，用另外一只手拽住我的右手小手指，想把它们掰开。

他要把我推开，我也不是一声不吭。我先是哀求他，答应永远感谢他，唤起他的战友之情，向他解释说，绝不会因为我而翻船。

这一切都没有能感动他。他已经把我的小手指攥住。"你这

条怕死狗,"我咆哮起来,"我认准了你。我要是到了对岸，就告发你是凶手。"

这话也没有用。我又把小手指从他手中挣脱开。他抬起一只脚,想踹我的手。可是船帮太高,他只能向着我的手指尖踢了一脚。

我顽强地挣扎着，不愿被淹死，使船上的人也都大为恼火。那个满头金发的人喊着："你们帮帮忙，把这个家伙扔到水里去！"

这时,我不愿再连累他们,我松开了手,一下子跌到水里。河水太深,我站不住,也不能游泳。我一动,枪就跟着向上移动,打在我的脖子上。我也无法把挂在脖子上的枪举过头顶，从身上摘下来。我只好踩水,可是沉重的军用皮靴把我拉向河底。

这时船已经掉过头,开始航行。船驶到了相当深的水域,不必再担心有人向它袭击了。船几乎是从我的头顶上开过去的。我用了最后一点力气,纵身跃起,抓住了船尾,把脸贴紧船舷。我不想让别人发现,尤其是不能让那双瞪大了的蓝眼睛看见。

现在,除了子弹的呼哨声,被击中者的呻吟声，从对岸传来的狂喊、呼号、嘶叫声,又增加了新的声音:榴弹炮的沉重的隆隆声。炮弹打入河水之中,打入血泊之中。

一块弹片——也许是几块——飞入船中,"船尾漏啦！""快用帐篷、大衣堵住！快！快！赶快啊！"我听见这些呼喊,可什么也看不见。旁边还行驶着另一艘平底船,一发炮弹正好命中它,这艘船翻了,我不忍再看下去。

我们这艘船快速行驶，水流推着它前进。在渡口以北几百步远的地方,它已经接近了奥地利一侧的河岸。船并没有靠岸,而是在离岸还有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船上的人跳了下去,

连推带拉，相互帮助着，踏过河底烂泥，走上光滑的河岸斜坡。我扒着船帮从船尾向前移动，还没有移动到船头，船就已经空了。

我试着向河岸走去。河水齐下巴深，水流使出它的全部力量，要把我冲倒。我喊救命，也有那么一、两个人回过头来看看；可是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爬过了河岸的斜坡而感到高兴，谁也不肯再走回来。我好象认出了我们连的一个弟兄，我喊道："诺伊迈尔！"我用尽了全身力量喊着："诺伊迈尔！"诺伊迈尔向后问道："谁在喊我？"——"是我，基希。"他走了下来，把他的枪伸向我，我抓住枪，他把我拉上岸去。河岸倾斜光滑，我的鞋底上又沾满了湿泥。我已经精疲力竭，我的手指挨了那个大眼睛的家伙一脚，我的胳膊扒了很长时间的船帮，都还在隐隐作痛。我失去了平衡，向后跌倒，栽入水中。诺伊迈尔跟着跳了下来，把我扶起。他站在我的后面，抓住我的胯部，推着我向前走，推着我走上了河堤。

土地，我的脚终于踩到陆地上了！

一伙狼狈的人群沿着河岸斜坡，踉踉跄跄地向前走着。这一伙人比法尔斯塔夫①的贱民还要狼狈，衣衫还要褴褛：这些士兵有的光着身子，有的裹着帐篷布，有的穿一件衬衣，有的只穿一条裤衩，有的穿着破烂不堪的军装，他们浑身湿透，水珠直往下淌。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恐惧，现在又寒气透骨，冻得牙齿直打颤。

在大路旁我把干粮袋的东西全吃光了。烤面包干在口袋里已经变成了稀粥，其中还搀和着我的香烟丝。装着身份证的小

---

① 法尔斯塔夫，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的滑稽人物。

铝盒在裤兜里已经开了口，小卡片上我的名字变成了一块不能辨认的污迹。管他呢，把我当什么人埋掉，都一样。

我的日记是用复写笔写的，记的东西都已模糊不清，被水冲洗了。复写笔夹在笔记本当中，现在也不能用了，它的笔心都化成水了。

我凝视着日记本里每一页上整整齐齐的紫色的痕迹。没有一个字能辨认得出来。“基希，把这些记下来吧！”这曾是我的社会使命。我记下了任何一个战地记者都不会记的事实。可有谁知道，检查官来了，他把我记的一切都无情地涂掉了，就连那枝复写笔将来也不会做出任何违反检查制度的事情了。

在宪兵队队部里我碰到了诺伊迈尔。他曾冒着被淹死的危险，竭尽全力救我。他坐在那里吸烟。我说：“诺伊迈尔，让我吸一口吧！”他不高兴地拒绝了。

我们的师剩下不到一千人。在几小时之内，在一块小小的土地上，有三千人失踪——或者被打死，或者被淹死。无论是墨西拿的地震①，还是沙皇加冕时观礼台倒塌，比起今夜发生的事情，那只不过是无伤大体的局部性小事罢了。今夜的事情也许是本世纪最大的灾难。

我在考虑，如果允许我向报社发一份电讯稿，我会怎样起草。我不会有战地通讯的作者在同一时刻所有的那种想法：“我们的南方军团加强了德里纳河河口的河岸阵地。”

半年以后我在对俄作战的前线负伤，躺在医院里。一天，我又来到熊房。在这里，小汉娜的秃脑袋的丈夫，人们管他叫“汉卡吹牛大王，”这个盲人梅托修斯给我演唱横渡德里纳河的悲

---

① 墨西拿，意大利西西里岛北部城市，一九〇八年发生地震，几乎全城被毁。

歌。我坐在那里，把背靠在枕头上，听着这首歌的二十节歌词。这二十节歌词是被淹死的士兵临死前狂叫声的回音。

“纯属捏造，”我的兄弟漫不经心地说：“这种事报纸上一个字也没有登过。”

王志佑 译

火 山 爆 发

我坐在汽车的踏板上，把眼前发生的事情速记下来。我的观察物发出的光嘲弄似地照亮了我的纸。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这个观察物。它没有生命，却不停地活动着。它是地质的东西，是无机的矿物，然而它却大喊大叫，大吵大闹，把石块和嘲笑一并抛到我的纸上。

今天下午，我来到这个庞然大物面前。它是两星期前开始从地球的母胎里诞生的。它的身体不断增高，长到一百米、二百米。新生儿冲着天空大声呼号，肚脐冒着火焰，喷射出鲜血和胆汁，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在自己周围堆起一大堆废渣。

一座山峰正在崛起，四周堆满了废渣。这些废渣都是棱角锋利的大石头，一块挨着一块，看去好象是织就的料子，用它做成了一顶大礼帽的帽檐；又好象是被凿成了天堂磨坊的大磨石。这帽檐的料子很厚，这盘磨石也很厚，足足有十二米。

我走近这十二米厚的火山岩石墙；岩石火烫火烫，我不能碰它。于是，我就在岩石墙四周漫步。这岩石墙周长几公里。墙体里铿锵有声，就象铁链碰撞发出的声音。一块块岩石不时地从石墙上掉落下来。火山岩圈象波环一样，逐渐向外扩大，每天扩大十米，边缘始终保持垂直。火山岩所到之处，一切都被吞噬，高大的树木消失了，不留一点痕迹。

先前，在我的想象中，火山岩是稠浆状的东西，象熔化的玻

璃浆一样，形成一条河流。这里看见的却是锋利的深灰色大石块。你根本想不到，这种岩石和墨西哥到处可见的黑曜石有什么血缘关系。火山岩冷却后变成了黑曜石，印第安人用它制作武器、工具、神像和装饰品。用这堵墙里的石头大概什么也做不成。这些石头从永远黑暗的地球怀中被抛到光天化日之下。它们从火山口喷出来，落在火山口的周围。过了几秒钟，火山又喷发一次，喷出了新的流亡者；这些新流亡者想留在离祖国最近的地方，就把先到世的弟兄们往外排挤。就这样，那些岩石一圈一圈地逐次向外扩展，一天扩展十米。

火山四周是一片平川，平川上是玉米地和牧场；平川上散落着一些小山丘，山丘上长满了针叶林，朝火山那面的山脚覆盖了一层十二米厚的火山岩碎石。

我来到一座小山丘前，从背着火山的那一面登上山丘。坡度并不大，但山坡上盖着厚厚的一层灰，我的两条腿从膝盖以下都陷进了灰里。我轻轻地把腿拔出来，肚皮贴着地，抓着被一半埋在土里的树枝慢慢往山顶爬去。

在山顶上，我俯视整个熔岩区。灰色的熔岩一块挨一块，冒着烟，非常缓慢地移动着。那是熔化了的玄武岩的海洋，由半凝固的渣滓组成的荒漠。毫无生机，毫无生气，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这些石头曾在地底下沉睡，从来没有一个骆驼队横越过那地下的荒漠，也从来没有一条海船行驶过那地下的海洋。只有各种理论和科学假设曾谈到过地壳底下的那另一个世界。

我站在山丘上，面对着火山口，差不多与火山口一样高。火山口在地上的（也许该说是地下的？）火光照耀下闪烁。火山口正在发生许多变化，而我看着这耀眼的火光却象看着漆黑的午夜一样，什么也看不清。要说火山口象圆盆一样半埋在山顶上，

那是错的。地球的开口在下面很深的地方，在帕里库丁一个农夫的被埋在地下的玉米地上。

这个农夫是印第安人，名叫迪奥尼西奥·普利多。十四天前，即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他来到这里，突然看见他的地裂开一个口子，往上抬高，从口子里冒出烟来，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他拔腿就跑。

迪奥尼西奥的玉米地连影子也没有了，再也不能种玉米了。火山口喷出的岩浆覆盖了这块玉米地。火山还在继续喷发，一座山峰正在崛起，在不断升高，火山口就象一个大圆盆嵌在山顶上。

每四秒或六秒钟从口子里向天空射出一条冒烟的火柱。喷发顺序大体如下：先是九次比较小的喷发，然后是四次中等强度的喷发，接着两次强烈喷发，最后来一次威力无比的大喷发。有时，一次小的喷发还没有结束，一次较强的喷发就会毫不留情地插足于其中。

今天早上，我经过米却肯州到这里来时，在几英里外我就看见了冒烟的火柱。当然，在白天看到的实际上只是一条烟柱。下午我到了这里，这根似乎由烟和水气组成的柱子象一颗烟雾组成的大菜花，中间的红柱闪闪发亮。等到夜幕降临，景色就完全不同了。

天一黑，一切都变亮了。特别是烟柱，这时它变成了火柱。这火柱红通通的，从火山口中喷射出来，红红的向上腾起，又红红的消失在夜幕中。下午，那火焰只是滚滚翻腾的黑烟的一点陪衬；而现在，红红的火焰主宰了一切，那灰色的烟气只不过象一个鬼影，在火焰内部飘荡。

喷射出的火焰绚丽多彩，变幻无穷。有时，它象一匹野马，

从高山中飞奔出来，一声嘶鸣，划破长空。有时，它似乎又象一尊人物塑像，一只手高高举起，擎着火炬；这塑像霎时间又化为乌有。有时，从魔山中又突然长出一棵椰子树，金色的树干十分粗大，金色的枝叶间挂满了金色的果实；一转眼，未及细看，树干四分五裂，树枝裂为碎片，椰子哗啦啦掉到地上。有时，那火柱象一根真正的柱子，象一根巴洛克①式柱子，雕刻着各种栩栩如生的图案；那柱子直刺苍天，达到一定高度后就自我爆炸，四分五裂。有时，就象放焰火一样，各种火箭、子母炮、天女散花嗤嗤、啪啪地一齐射向高空；这样斑驳灿烂的焰火，就是凡尔赛至高无上的君主做梦也没有看到过。

无论是火柱冲天而起，还是往下降落直至熄灭，火山口都不断地发出一阵阵轰鸣声，象火车头的长鸣，象大炮的怒吼。海上激战炮火连天，化学品爆炸，城市被炸为一片火海，高炉火舌熊熊，这一切我都知道是什么原因。而这里呢？为什么轰轰隆隆发出雷鸣般的声音？为什么岩石、火焰、灰烬被喷到空中，又抛回地面？是谁在那深邃的洞穴中导演？这场活剧还要闹多久？还要闹一天还是一千年？

选择这一带的万丈深谷或者原有火山的通道和喷射口喷射，对沸腾的下界来说，难道不更加方便吗？为什么恰恰选择静谧的帕里库丁，而且正好是印第安人迪奥尼西奥·普利多的土地？

下午，我看见，从火山口中飞出许多石块很快就离开烟柱，向四面八方飞溅，落在地上。一到暮色朦胧的晚上，这些石头都变成了大火球。这些火球飞向猎户星座，此刻它们真好象是这

---

① 巴洛克，十六至十八世纪艺术及建筑风格。

个星座的一部分。一转眼，火球就象流星一样，向先前的火球创造的山头陨落下来。这些星石有的掉回喷射口，有的落到山脊上，从那里再滚下去。山脚好象分成了三百六十度，每一度都从山尖披下一绺金发，这是三百六十条熔化的金子的洪流。整座山变得透明了。

我看着看着，沉浸到了梦幻之中。我再也听不见隆隆的炮声，嗅不到烧灼的气味，感觉不到烫人的灼热。

白天，熔岩的边缘是深灰色和青灰色玄武岩砌成的墙；到了夜晚，这些石头都燃烧了，远望是一片火光。我可以发誓，在这里我看见了大科尼希①：灯火通明的堤岸娱乐场一直延伸到海里，"英国人大街"的街灯闪闪发光，犹如一条横卧的火龙，灯火组成的链条沿着山丘时而向上，时而向下，蜿蜒曲折，最后汇入蒙的卡罗大赌场②装饰着各色彩灯的圆顶。茶楼酒肆、亭台馆榭、商号洋行装饰着霓虹灯广告象宝石一样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彩。这灿烂的光彩照亮了我面前的稿纸。

十四天以前，这魔术舞台上还是一片生机，如今这一切都永远永远的绝迹了。孳生着各种昆虫的草地消失了，田鼠鼹鼠寻欢作乐的玉米地不见了，莺歌燕舞的树林无影无踪了，牛马成群的牧场没有了。然而在周围，在紧挨着喷发区的地方，生命还在延续。

鸟儿在四周啁啾鸣啭。它们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飞到凉爽安静的高空，飞到那不受雷鸣电闪干扰的地方。然而这些羽毛绚丽的鸟儿却贴着满是灰渣的地皮低低飞翔，擦过我的膝盖。它们也许在寻觅原来的巢穴，寻找它们的家庭。在这面貌全非的

---

① 大科尼希，摩纳哥公国地名。

② 蒙的卡罗大赌场，在摩纳哥，西方世界闻名的大赌场。

地方，它们什么也找不到了。

山坡上有一片稀稀落落的小树林，树干上一人高的地方削去了一块块树皮，裸露的木头向外偷看。每当火山的火光反射到这黄色的脸颊上，它就做出各种鬼脸。人们知道这些怪脸只不过是树干上的一些切口，树汁从切口中流出，滴到放在下面的桶里。但眼前，看着这些奇形怪状的脸，心中不免感到可怕。

我不懂火山的心理。刚刚诞生的火山会不会因为变成了猎奇的对象、赚钱的工具、耸人听闻的新闻而感到失望？火山史上，还没有一座火山曾有过这样多的经历。人们把话筒放在它面前，它就得为各大洲广播电台的听众往话筒里嘘气、咳嗽、打雷似地吼叫。人们把照相机对着它，它就为全世界报纸、画报的读者表演正面与侧面的各种脸相。人们把电影摄影机架到它对面，它就为生活在它有意破坏的这个地球上的全体电影观众表演它怎样清嗓子，怎样吐痰，怎样活动。

此外，科学家们也不停地打搅它。他们观察它，诊听它，按它的脉搏，量它的体温。不管它呕吐、出恭多么频繁，每一次都立刻被记载到图表里。而先前，当它还在地球的怀抱里时，它是多么悠闲，无人打搅啊！

在我深一脚浅一脚爬上来的山上，科学家们架起了帐篷。有两个大学生我认识。正如靡非斯托非勒斯[①]兄弟所说的那样，从哈尔茨到希腊，到处都能碰到熟人。

他们给我讲了许多火山婴儿的事。他们说，未经测量已确定婴儿诞生地的深度为三十二公里。根据是，喷出物都属于上新世，属于位于该深度的最年轻的第三纪。那里的温度估计为一千一百度，因为一千一百度时，玄武岩才能熔化为堆积在我

① 靡非斯托非勒斯，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

们面前的渣滓。山脚下的火山岩覆盖着两平方公里的土地，每天向外扩大十米，升高九十公分。岩石中含铁百分之四至五。

谈到山体本身，他们说，新生儿从诞生以来发育良好。昨天它增高了四米半，现在的高度达二百二十米。底脚是直径五百米的圆圈，山顶直径为一百五十米，山坡坡度五十三度。

“山上的‘红旗’呢，我的朋友？”

“你指的是喷出的气体吧？喷出的气焰高度不一，平均一千米。喷出的气体把岩石和灰渣抛到高空，最高时达六百米。最大的石块达四立方米。”

接着，他们对我说，这是一次真正的火山喷发。其实这一点我并没有怀疑过。他们叫我不要以为这只是一次地面隆起；构造地震常常引起地面的隆起，这种隆起如果发生在火山地带也能把火、烟、岩石抛向空中。他们说，在墨西哥，这是自从约鲁罗火山诞生以后崛起的第一座火山。

约鲁罗火山离它的新兄弟不远，坐汽车两小时可到达。一七五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约鲁罗火山问世，洪堡①到墨西哥旅行的一个原因就是想面对面地亲眼看看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山。他看到它时，约鲁罗火山已经度过了四十四个年头。在这段时间里，约鲁罗火山仍在活动；火山熔岩的温度非常高，洪堡曾在一块圆锥形火成岩上点着过雪茄。当地还有目击者活着。他们为洪堡描写火山的诞生提供了很多材料。他当然很愿意象普里尼乌斯②目睹维苏威火山③的喷发和庞贝城的毁灭那样，

---

① 亚历山大·洪堡(1769—1859)，德国科学家兼游记作家。

② 普里尼乌斯(23或24—79)，拉丁语作家。

③ 维苏威火山，位于意大利南部，高1281米，公元七九年大爆发，毁灭了庞贝城。

亲眼看见约鲁罗火山的喷发。

今天，如果洪堡还在世，也能到这里来观察的话，他就会发现，他的关于存在一条火山带的理论得到了证实，他会感到极大的满足。

根据洪堡的理论，"北纬 18.59 度和 19.12 度之间，在地球内部很深处有一条裂缝，东西走向，长达九百公里。火山熔岩在不同时间，从墨西哥湾海岸到太平洋西南部，通过这条裂缝向外喷发。"此刻，就在洪堡提出的界线附近，即北纬 19.21度（西经 102.19 度），帕里库丁火山正在形成。

这新生儿将以"帕里库丁火山"的名字载入地质学和火山史，因为这座火山选择了帕里库丁村作为它的诞生地和永久居留地。这个村子有居民一百八十五人，全部是塔拉斯柯斯部落的印第安人。那位迪奥尼西奥·普利多是这个村的居民之一。他亲眼看见了他那种多年的、安分守己的土地突然向上隆起，他想，他的土地完了，再也不值分文了。

迪奥尼西奥·普利多向我诉苦说："我损失了两法纳格① 玉米。"他向我讲了他看到的"末日"降临时的情景。他自己脱了险，他的两头骡子也跟在他后面飞跑出来。但是，他辛辛苦苦种的、已经可以收获的两法纳格玉米——可收一百一十公升——却被永远埋进了山底。

他发誓说："从那时起我一口饭都没有吃。"这话听起来很不可信，但我不得不相信他。他是对着巴兰嘎里库蒂罗的圣像发誓说这句话的。他知道，圣像就在面前，能听见他说的话，即刻出现在这里，他说谎神就会惩罚他。要是迪奥尼西奥·普利多

---

① 法纳格，印第安人重量单位，合55.5 公升。

发十次誓，说他火山爆发以来没有喝过一滴酒，我是不会相信他的。从他口中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当地很普遍的甘蔗烧酒味。

“我损失了两法纳格玉米，我的地也永远毁了。”

“可您有了一座火山哪！”

“唉，先生，火山有什么用？”

其实，我可以回答迪奥尼西奥，火山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几十年以前，墨西哥共和国曾把一座火山作为勋章赠送给波波卡特贝特将军。将军死后，波波卡特贝特火山公开拍卖，索价二千五百万比索。洛克菲勒想把它买下开采硫矿，却没有买到手。如果洛克菲勒的后代想买，迪奥尼西奥·普利多可以把火山卖给他们。不过，可以肯定，卖了，他也得不到几个钱，至多不过喝几杯甘蔗烧酒。现在，他的土地已开始成了旅游对象，可他也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

在离火山最近的大城市乌鲁阿班，出租汽车生意非常兴隆。货车车主什么货也不运了，专门租给旅游者，把他们送到火山去。车费上涨的速度比火山升高的速度还快。乌鲁阿班离帕里库丁约二十六公里，汽车要穿过没有路的泰本亭森林，整个行程需要六个来小时。到达目的地时，旅客被颠得骨架子都散了。

火山周围的空地上摆满了用木板和干树枝搭起的货摊，出售可口可乐、卷饼和米却肯州的特产果料面包“阿堤”。摊贩都是巴兰嘎里库蒂罗地方圣胡安村的居民。他们并不是一点没有准备就做起生意来的。巴兰嘎里库蒂罗是一个朝圣地。每年九月十九日，成百上千的信徒到这里来参加神奇基督节。当地居民全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政治上他们属西那克维斯塔派，即法西斯。法西斯分子首先在落后地区花去大量经费作宣传。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当地人狂热支持民主党人、前总统拉萨罗·卡

德纳斯[1]。卡德纳斯给了他们土地，法西斯分子给他们的许诺则更多。

当地人说："我们都是穷人，靠种地过活。现钱只有在九月朝圣时才能赚到一点。"他们都十分虔诚，认为火山爆发是上帝的惩罚。因为一个放荡女人勾引了当地许多有妇之夫，罪孽深重。火山一爆发，居民们都跑光了。只有几十个志愿人员留下来守护神奇的基督。过了三天，逃跑的人又回到家里，在火山周围搭起货摊。女人们在货摊里卖东西，男人们陪同游客去攀登火山四周的小山丘，得到一些报酬。他们用木棒把熔岩从岩墙上敲下，撒上一泡尿让石头冷却下来。他们把这样冷却后的石块卖给游客。生意比朝圣日还好得多。

我对他们说："上帝的这种惩罚倒不坏。"

他们不好意思地笑了，显然同意我的话；不过，他们是否真的赞同我的话，我就无法证明了。

赵登荣 译

① 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一九三四至一九四〇年任墨西哥总统。

金字塔采访记

一般说来，和金字塔谈话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谁立志做一名采访金字塔的记者，献身于他的职业，他就不应被困难吓倒。他该想到，金字塔随时都有消息可以奉告，因为有的金字塔内部又发掘出了新的文物，有的金字塔还刚刚被发现。

在竞争对手埃及，不可能有这种新发现。那里，金字塔毫无遮掩地高耸在沙漠上；沙土近在咫尺，但是，金字塔不可能把它的脑袋埋进沙里。况且它也不愿这样做。离开那望不到尽头的地平线，从平面伸向空间，正是它生存的目的。

在墨西哥安纳瓦克高原，情况就不同了。这里既不是平地，又不是沙漠。在人造山的旁边往往耸立着天然的金字塔——小丘或山峰。以前，当一些反对金字塔的人到处搜索金字塔，想把它夷为平地时，这种地理位置拯救了许多人造金字塔的生命。

有些地方，在欧洲毁庙人[1]到来以前，火山就已经为它们做了伪装，把金字塔藏到了火山岩底下。

一

圭圭尔科圆形金字塔的命运正是这样。迄今为止，圭圭尔

① 欧洲毁庙人：指西班牙殖民者。

科圆形金字塔是美洲最古老的建筑。因此它是记者采访的第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位于墨西哥城南面靠近城边的地方，它那由玄武岩和火山岩石块构成的底基很大。

记者向金字塔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多大年纪了？金字塔沉默不语。金字塔管理人在背阴面造了一幢小房子。他坚持说，他的金字塔已经有八千年的历史。地质学家检验了埋着金字塔的火山岩层，他们也说是八千年，和管理人的说法相吻合。

记者仰望着塔顶问道："阿金斯科什么时候把你埋掉的？"

"不是阿金斯科，"山顶上一个嗡声嗡气的声音说道。

阿金斯科是墨西哥城城边的一座大山，是登山爱好者星期天郊游的胜地。登山爱好者告诉报纸，阿金斯科火山有时似乎还在活动。于是，报纸又把阿金斯科山的陈年老账翻了出来，说它已经把首都毁灭过一次。当时，首都在现在的墨西哥城南面。城市完全被毁，剩下的只有把城市埋葬的乱石滩及其肇事者阿金斯科。

现在，受难者本人告诉记者说肇事的"不是阿金斯科"。

不是阿金斯科？那是谁呢？

"是希特利山。"金字塔回答了一句，语调里充满了对希特利山的怨恨。希特利是一座小山，在公路的另一边。它那人造的同伴① 指责说，希特利企图把它淹死在沸腾的熔岩中。

当时，希特利满腔怒火，把许多胆汁喷到它身旁的雄伟建筑上。金字塔周围的火山岩足有十米厚。但是，金字塔位于一座七米高的山丘上，火山只能埋掉金字塔膝盖以下那一部分。

要是当时有居民的话，他们也许能够把他们的祖庙从脚镣

---

① 人造的同伴，指圭圭尔科金字塔。

中解放出来。但是，人已经没有了。他们都被埋在十米厚的岩石底下。有的人也许逃到石头母亲[①]那里，想把身体拱出来。塔顶弥漫着致命的硫气和正在熔化的岩石的烟气。即使有人能钻出塔顶幸存下来，他事后也得饿死、渴死。火山熔岩的海洋蒸腾炎热，救护者无法接近。

过了几百年，也许几千年，火山岩的波圈才逐渐冷却，变成一个个黑色的同心圆。人们就居住在这里。到底过了多少年？金字塔知道。但是，它说了一句希特利山是它的谋杀者后就又沉默了。

二

记者的第二个目标是特奥蒂华坎金字塔，因为按工龄计算，特奥蒂华坎仅次于圭圭尔科，虽然两者的年龄相差几百年。根据玛雅历和西历换算结果推定，从公元二五〇年至七五〇年，特奥蒂华坎曾经是宗教中心。今天，特奥蒂华坎是旅游胜地。它见多识广，热情友好地接待了记者。

太阳金字塔很高。它问记者有什么要求；但它马上补了一句，说它没有什么重大新闻可以奉告，考古学家已经把所有的秘密从它嘴里套走了。

“……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秘密，”金字塔自己作了更正。“他们总能找到一点新的东西，这些东西连我自己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前几个星期他们发掘出了几幅壁画，画着几百个特拉罗斯世界（冥府）的人物肖像，一个个栩栩如生。您肯定知道，特拉

---

① 石头母亲，指金字塔。

罗斯绝对不只是呼风唤雨者，他还是水神。海洋，云彩，水肿，淹死，渴和汗，河流和水井，运河和渡槽，露水和雷雨，鱼和贝壳，船舶和游泳者，水鸟和水生植物，这一切都归他掌管。

一个人死在特拉罗斯手里，那可不是一件坏事。特拉罗斯统治着他自己的天堂，统治着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快活的乐园。在这个乐园里没有脸蛋又红又圆的天使，没有双手合十祈祷的长着翅膀的灵魂，没有长号的吹奏声，没有竖琴的弹奏声。这里是真正的顽童的乐园。您看那画上四个男子汉抓住另一个男子的两手两脚，把他扔到空中。您见过死了的人这样放肆吗？死者最主要的事情是手拿球拍，大笑着纵情欢乐。他摔倒在地上也笑，洗澡也笑，跳到水里也笑；从听众欢乐的表情判断，他们唱的歌肯定十分有趣。

在这冥府中您只能看到一个人不笑，而他却是最可笑的人。他手里拿着死亡之枝，正在跨越地府的门槛。他刚刚被埋葬，还在为自己的死亡抽泣。您好好看看这些壁画，就算您能活我这么大，您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些画。”

说完这几句话，它就准备告辞了。确切一点说是它要打发记者走了。因为金字塔——哪怕是会说话的金字塔——永远也不能离开它的底座。记者却还想听它讲讲自己的身世。他接过金字塔最后那句关于高龄的话题，询问金字塔的生平。

金字塔回答说：“告诉您说吧，一座金字塔或者说一座金字塔的塔身看不到自己身体的多少地方。您会觉得这话自相矛盾。从孩提时代起，我就诅咒我的歪斜的体形。我希望自己是棱形的，希望自己是一座瞭望塔。关于我自己，我知道的都是道听途说的东西。据说，过去我的头上有一座太阳立像，向四周放射出光芒，因为它有一个纯金做的巨大的心脏。这个说法我既

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大量的斑岩确实在我身旁升起过，但是它们升起后在平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头顶以上是空气的王国，是别人管辖的地方。

“不过，我能够观察我对面的月亮金字塔的种种情形。我想，我在金色的太阳光下的样子与蓝色的月光下月亮金字塔的样子大概也差不了多少。早先，当作祭品的人装饰着鲜花登上塔顶，被挖去心脏，姿势优美的从塔顶跌落下去。现在，只有旅游者怀着好奇的心情飞快地攀登我们的石阶。但是当他们参观完毕往下走时，他们都一个个头晕目眩。向导那充满血腥味的叙述使他们非常振奋，在往回走的路上他们还不能平静下来。他们仿佛觉得他们自己也被挖了心，他们那世俗的躯体象翻筋斗似地滚下石阶。但是，请您别写这几句话，这会影响我们的旅游业。关于我们，有许多别的事情可以报道。我们是一座神圣的城市。在这里，死者都变成了神，太阳金字塔这个名字就告诉人们这一点。（奇怪得很，和希腊文一样，‘特奥’这个字的意思是神。）过去，成千上万的人到这里朝拜，有许多祭祀节，有许多宫殿庙宇。这些宫殿庙宇规模宏伟，非常美丽，人们简直难以想象。您从废墟上还能依稀看出它们的规模和美丽。不过，这方面已经写过许多报道，尽人皆知了。”

三

伊达尔戈州的图拉金字塔情形就不同了，介绍它的文章不多，知道它的人也少。如果记者是布拉格人，会把它叫做“新旧金字塔”。据传说，布拉格犹太大寺院完全用土堆成。四年前，传说图拉金字塔也是由泥土堆成的，而且还有种种证据。图拉

金字塔是个天真的记录员，它告诉记者它记下的事情。

它说："我曾经是图拉城的圣地，是托兰州和托尔特克[①]族的圣地。我想，按照你们的历法计算，这大概是六四八年至十一世纪时的事情。我造得很好，许多人向我祈祷。在我身上，每天都摆满许多祭品。我的托尔特克人是些很好很能干的人，他们是建筑师、机械师、天文学家，他们帮助祭师从我的塔顶预示未来的事情。托尔特克人有一点不好，他们龙舌兰酒灌得太多。

"你们的历法一千年时，托尔特克人离开了我，迁往育加丹。在那里的玛雅建筑中发现了托尔特克人技艺的痕迹，而人们还在争论我是否真的存在。"

金字塔诉说了它被遗弃的那些日子。它说："大约在一一七〇年左右，另外一个部族来到我们这座荒芜的城市。他们自称契契梅克人[②]，意思是'从狗国来的人'。他们确实是些真正的狗贩子，野蛮人。他们对我连看也不看一眼。托尔特克人离开后还没有自行凋敝败落的东西，都被这些狗贩子打得粉碎。他们把整个地方洗劫一空，使得我们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这一点金字塔搞错了。在许多手抄本、编年史和传说中都留下了这座金字塔的痕迹。十六世纪的学者们研究了这些痕迹。除了那些研究西班牙入侵前历史的学者以外，皈依基督教的印第安亲王阿尔瓦·伊特里·索齐特尔曾经写过介绍图拉的书，诸如宫廷生活、政府、人民、街道和手工业，书中都有所记载。这些记载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一场轩然大波。

原来，十七世纪的学者们说，图拉根本不存在，从来没有存在过，根本不可能存在。尽管人们找了很长时间，这个城市从来

---

① 托尔特克，古印第安人部族。

② 契契梅克，古印第安人部族。

没有找到过，相反却从墨西哥地下发掘出了许多没有去找的城市。人们越来越相信，象维吉尔[①]史诗中的最遥远的图勒[②]或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③]的太阳国一样，图拉只是传说中的地方。图拉这个字的意思正好是太阳国。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图拉就是特奥蒂华坎。特奥蒂华坎虽然雄伟壮观，各种手抄古籍中却没有提到过。另一些人则主张图拉是乔鲁拉的同义词，还有人认为托尔特克城就是今天的图勒村，这个村位于著名的米特拉金字塔附近。

历史学家阿尔瓦·伊特里·索齐特尔被人们从学者的庙堂赶到了诗人居住的地方。有人指责他出于盲目的民族感情把图拉的传说当成历史的真实；过去欧洲历史学家也曾经把特洛亚传说当成历史真实，而这个传说只是荷马的想象。施利曼[④]发掘出了特洛亚城以后，再没有人作这种比较了。但是，一八八五年在伊达尔戈州的图拉·得·阿连德城附近发掘出了金字塔后，否定图拉确有其城的论调并没有沉寂下去。

发掘金字塔的人名叫德西雷·夏尔内。墨西哥人不喜欢他，对他有怀疑。此人在法国干涉前曾身负拿破仑三世的秘密使命在墨西哥四处游历。过了二十年他又回到墨西哥，在法籍美国百万富翁洛里雅的资助下进行发掘工作。为了纪念他的主子，他把拉坎多尼恩印第安人地区的一座废墟命名为“洛里雅”，而这个地方本来叫做雅赫特利，早就为人所知。发掘图拉·得·阿连德时，夏尔内是想寻找金银财宝，因此他在发掘时完全象个

① 维吉尔（公元前70年—公元前19年），古罗马作家。

② 最遥远的图勒，古希腊罗马人对欧洲最北部地方的称呼。

③ 康帕内拉（1568—1639），意大利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④ 施利曼（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

外行，毫无顾忌。结果损坏的东西比找到的还多。他在发掘工作中没有征求墨西哥学者的意见，这可能增强了他们否认图拉城存在的态度。

到一九四〇年，墨西哥考古学家才提出下述理论，认为图拉这个都城确实存在过，就是今天伊达尔戈州的小城图拉·得·阿连德。在人类学协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冲突，而且传到了公众耳里。于是政府同意拨款进行发掘。记者从首都出发，乘火车赶赴图拉。要是正点到达，行程需一个半小时。

记者在街头漫步，穿过市场，走进教堂。他瞪大眼睛，象X光透视机那样观察一切；关于图拉，到一九四〇年为止，图拉居民和访问图拉的游客都没有记者知道得多。尽管如此，在这二千人口的小城里，他仍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城市的位置也好，雕刻过的石头也好，周围的塑像也好，都不能使人想到这个图拉就是那个图拉。考古区远离道路，远离每一座住宅。

记者由农家孩子陪同，登上小城出口处后面的高地，穿过一小块一小块龙舌兰地，跨过长满仙人掌的干裂的土包，来到连仙人掌也不长的地方。这时，他突然发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座砌得整整齐齐的高大的金字塔，就在一秒钟前他还没发现它，接着他又看到第二座。起初，他没有注意到那第二座金字塔，以为那只不过是一座普通的长满丛林的小山丘呢。

那座尚未发掘的金字塔是献给太阳的；另一座已经裸露在我们面前，是献给月神的。月亮金字塔本身就雄辩地说明，发掘工作是非常值得的，它为学者们持续了几百年之久的争论作了结论。在金字塔中发掘出许多珍贵文物。要不是当时全世界正忙于打仗，面临被毁灭的危险因而奋起反抗的话，这些珍宝一定会使全世界惊叹不已。那些石头宝贝在金字塔前摆成弓形。习

惯于欧美思维方式的记者脑际闪过一个问题：这些石雕是不是伪造的？雕像完整无缺，十分可疑。你看这些雕纹是多么清晰！你看这女像柱几乎有五米高！无论是脸颊、身体还是服装，好象是今天的雕刻家按照埃及的模特儿雕出来的。大石碑上印第安人羽毛饰品的戴法也和其他浮雕上的戴法完全不同。

记者很快赶走他的疑虑。伪造？谁来伪造？为什么要伪造？这些艺术珍品在一座偏僻的小山上，没有人看管保护。即使有人把它们装上汽车运走也不会有人来阻挠。有谁会来伪造一个摆着一排排石头座位的运动场？有谁会建造两座巨大的金字塔，把它们埋入地下，让后人再把它们发掘出来？

金字塔叫记者先注意它的墙头饰。"您仔细看了那些豹、蝴蝶、蛇嘴里的骷髅了吗？在我那个时代，这是最时髦的东西。现在，谁也不会去戴这些东西了，而且压根儿就不造金字塔了。您参观过别的金字塔吧？您实说，哪一座造得最好？……啊哈，您太恭维我了，我现在只不过是一座废墟罢了。大夫草率地给我切除阑尾，使我留下了伤痕。他猜想我肚子里有一座金钟，就把我的肚子切开了。"

金字塔和记者一问一答地谈着话；塔顶平台上探出一张典型的印第安人的脸。难道阿尔瓦·伊特里·索齐特尔也和金字塔一样，从土里钻了出来，在被流放被诅咒四百年以后，要来重新享受科学上的荣誉？

四

记者该到索齐卡尔科去了。先前，他从首都出发，往北走八十公里，到图拉采访。现在他折回来，经过首都，再往南走八十

公里，去采访索齐卡尔科金字塔。难道没有再近一点的金字塔？

再近一点的金字塔有的。其中乔鲁拉和蛇金字塔两座的重要性仅次于太阳和月亮金字塔。但采访金字塔的记者必须按照编年史的顺序旅行采访。

科尔特斯①时代以前，墨西哥根本没有纪年，没有石器时代、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等各种时期的概念。历史和文化史都以出土地点划分和命名。多少能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一个区域内部各种文化的顺序。在墨西哥可以按照这个顺序周游从远古到今天的各个时代。采访金字塔的记者走的就是这一条路线。在罗马，旅游者常常感到奇怪，他后看到的大剧场比他先看到的彼得大教堂更破败凋落。金字塔采访记者不想让他的读者在墨西哥也遇到这种情况。

图拉之后是索齐卡尔科金字塔，两座金字塔的年龄差不多一样大。索齐卡尔科金字塔告诉记者，它本来没有宗教意义，只是形状象金字塔而已。古人出于战略考虑，建造了这座金字塔，作为防御敌人的一座堡垒。

这座金字塔虽然是防御敌人的，却装饰着许多雕刻。墨西哥高原上没有一座金字塔有这么多的雕刻。这些雕刻非常粗犷，雕的是火山爆发，火舌熊熊，火焰直冲天空。雕刻的风格就象它们表现的燃烧的熔岩一样狂暴；这些熔岩被吐火的神山喷出，劈头盖脸地向人们倾泻下来。

金字塔讲了一段故事："一个德国人让我出了名。这个人名叫爱德华·塞勒尔，是个教授，从柏林来。我也让他成了名。他

---

① 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

本来是个语言学家，到墨西哥研究华斯特卡语的方言。他是偶然认识我的。当时一位墨西哥考古学家要到这里考察，请塞勒尔同行。塞勒尔出于礼貌接受了邀请。塞勒尔对我进行了报道，但是谁也不相信他，连插图也不信。到上世纪末，各国人士才开始向我涌来。现在我这里已安静多了，虽然我底下的奎尔纳瓦卡城在夏天是游客最多的一座城市。”

五

特拿育卡位于首都西北。这里的蛇金字塔说起话来总用“我们”，使记者十分惊讶。

它说：“您想知道我们的特点吗？以前西班牙殖民者的队伍从我们身旁经过，仔细观察我们，军人贝尔纳尔·迪亚斯在他的书里提到过我们。可是人们没有再找到我们。后来，先是虔诚的信徒找我们，继而科学家找我们，找了足足四百年没有找到。而我们几乎就在首都。直到一九二五年我们才被发现。”

记者问为什么以前找不到。

“神安排的事情无法解释。神命令大自然给我们的卫兵伪装。我们以前有八百个卫兵……”

记者数了数，现在是一百三十八个卫兵，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象一堵墙一样围在金字塔四周。这是石英石响蛇组成的整整一个家族。

“诸神衰败① 以后，这些卫兵一直在这里站岗，和以前一样默默站着，一言不发。不能让人对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注意。这

① 诸神衰败，西班牙人入侵，基督教取代了印第安人的多神教。

样，我们就在这里独居，不为世人所知，直到一九二五年我们被发现，重新获得生活的目的。”

记者问原先金字塔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从外面看好象是一座金字塔，其实我们不只是一座金字塔，我们是八座。每隔五十二年，我们中的一座就为所有金字塔为之服务的目的效劳：扔标枪、敬鬼神。从我们顶上向敌人投下标枪。投枪台是精心设计的，从这里投下标枪准保能打中往上爬的敌人，而不会伤着其他各层里自己的弟兄。敬鬼神是我们的祭坛每天都做的事情。

“一座金字塔到了五十二岁，它的生活就有了另外的目的。这个目的比扔标枪敬鬼神重要得多。当时人们相信，只要诸神不延长，世界只存在五十二年。在人间谁也不知道这个期限会不会被延长。只有到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小时，我们塔顶上的蛇祭坛才会给人们一个信号。午夜，我们周围一片漆黑，世界上的所有灯火都已熄灭。祭坛前祭师敲打着石头。人们屏声息气紧张地等着。如果诸神宽宥慈悲，撞击的石头就会冒出火花。人们突然看见了火，纵情欢呼起来。好了，世界将继续存在下去！为了感谢诸神，他们在旧时代的旧金字塔旁又造起一座新时代的新金字塔。这样，我们的建造时间用了八个五十二年，整整四百年。按照你们的时间概念换算，这四百年是在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

六

记者手里拿着蜡烛，走进乔鲁拉金字塔的体内。考古学家发掘了五公里长的甬道。这些甬道十分狭窄，纵横交错，毫无规

则，象从前的弥诺陶洛斯①迷宫那样把人引入迷途。

乔鲁拉也是一组金字塔群。在特拿育卡添造金字塔是受人尊敬的事情，而在乔鲁拉却成了敌对的行为。每个占领乔鲁拉的部族都在被战胜的金字塔头上加上一座新的金字塔。这还不够，他们还用石头填塞金字塔的内室，破坏祭坛，毁坏雕像，用泥土覆盖壁画，把走廊搞得凌乱不堪，不成体系。

教会也是金字塔的敌人，而且破坏最彻底。教会在这组神庙顶上建造了它自己的庙宇。在最高的金字塔的塔顶平台上耸立着我们的救世主的庙宇，它骄傲地俯视着周围。大自然使金字塔的表面野草丛生，谁也想不到这座教堂之丘是人的杰作。乔鲁拉金字塔几乎有两座齐奥普斯金字塔那么大，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从外头看，乔鲁拉金字塔已不复存在。但是到里头一看，乔鲁拉金字塔依然存在。记者正沿着发掘出来的画着壁画的甬道向深处前进呢。

记者向前走着，他手里的烛光不时地照亮壁画上的蝗虫和飞蛾。记者注意到蜡烛快点完了，担心回来的路上不够用。他害怕死在下面，以后被人发现是一具骷髅。但是他的好奇心战胜了这种惧怕的心理。他走进一个小房间，房间中央放着一个四方形大土墩。他拿着蜡烛转了几圈，才看清上面有一个人，个子很高，脸色苍白，白胡子垂在胸前。

陌生人开口说了话："您别害怕，我会陪您出去的。这个土墩原先是个祭坛，人们用鲜花、飞蝗和蝴蝶祭祀。用人当祭品是犯罪行为。"

"您住在这里？"记者没话找话说。

---

① 弥诺陶洛斯，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牛怪物，被关在弥诺斯王的迷宫中。

“我在这里很久了。有一段时间我曾经离开这里，后来又回到这里。”

“请问您为什么离开这里？”

“您要知道智者的路就得问。我本是图拉的祭师，教我的信徒种玉米，种水果，做陶器，编筐织布。我的同事不喜欢这些技艺。旧派祭师反对我，说我教的技艺都是女人干的，一点尚武的味儿也没有；新派祭师说用这些东西当祭品是亵渎神明。诸神的祭师喊道：‘他不给我们人肉，只给我们蝴蝶！’教会的牧师喊道：‘他不给我们金钱，只给我们蝗虫！’”

“他们害您了吗？”

“我搬回了乔鲁拉，留在这里。过了二十年，我由学生和朋友陪伴来到海边。在维拉克鲁斯我上了船，驶向远方。但是我答应回来。”

七

记者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过一本叫做《世界之窗》①的书，里面有许多插图。记者今天还依稀记得里面有一幅墨西哥神庙的画，他用色笔在画上涂上颜色。画上有许多印第安人到处乱跑。除此以外，画上的东西他就不懂了。画上有一架梯子，可不是普通楼房里的梯子，它直接通到太阳里面。画上有许多房子，这些房子不能用积木搭起来。有一幢房子样子象郊区的煤气站，一根橡皮管从那里伸出来，通到厨房里。画上还有一所游泳学校，不过孩子拿不准是否真的是游泳学校。未来的记者再三问

① 十七、十八世纪颇受欢迎的一本带插图的语言教科书。

他爸爸，爸爸被问烦了，嘟哝了一句："就算是游泳学校吧。"

现在，如果记者能找到画里那座金字塔的话，他可以亲自去问它。但是他知道，他可能找不到它。他长大以后读了许多别的书，也读过许多墨西哥的书。这些书一致记载着首都的特奥卡利金字塔彻底毁了，比任何一座金字塔都破坏得厉害；书里说连一块石头、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在它的旧址上建立了新教的教堂。

西班牙人这么恨特奥卡利，这么彻底的毁坏它，那是有原因的。这座国王的金字塔被称为金字塔之王。墨西哥人在这里组织力量，抵抗白色救世主；在这座金字塔上，基督徒被当作祭品奉献给当地的神灵。

当时，被打败的科尔德斯一蹶不振，只能从远处看着他的同胞反绑着双手被带上金字塔顶。海涅曾在诗歌中对金字塔作过如下的描绘：

他们登上维茨里普茨里的庙宇，
这红色琉璃瓦砌成的神祇之堡。
这庙宇使我们肃然起敬，
想起埃及、巴比伦和阿西利亚①
人工建造的庞然大物。
英国人亨利·马丁
曾经把这些庞然大物描绘。
这红色的神祇之堡
也有一座又宽又高的阶梯，

---

① 阿西利亚，亚洲的文明古国，在今伊拉克一带。

几千墨西哥人在上下晃动，
犹如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
这宽阔的红色阶梯，
象一条蛟龙通向平台，
通向高耸云端的塔顶，
通向巨大的庙宇之顶。

记者在教堂里搜寻这个“巨大的建筑物”的痕迹。他希望至少能找到一块有印第安人标记的石头。他一无所获，十分失望，准备往回走。

这时，好象从地底传来一个声音。“你要找我吗？我在这儿呢。”在哪里？

“你沿着教堂的正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走去，再折向北面，第一条街口就是。”

记者顺从地沿着这条路线走去。到了阿根廷街和危地马拉街的十字路口一条稀疏的篱笆边，他停了下来向四周张望，又抬头向高处仰望。

“你得往下看。”

果然，在木头篱笆的那面有一个建筑工地；不对，这不是建筑工地，而是拆建工地，比街面低好几米。这是发掘出来的部分金字塔塔基。残垣断壁和四十五度的石角簇立在那里，象下巴上折断的牙齿。浮雕只留下了残片，各个时代的文物成了废墟。还能看见一些羽蛇的头，一座刻着羽蛇的石雕。

记者感谢金字塔给他指引了通到这里的路。

“你是欧洲人，所以我告诉你路径，你们以前给我们带来的罪孽此刻正在你们自己那里重演。你们的建筑和人民正在遭受

蹂躏破坏，比我当时所受的苦难还可怕；虽然你们的科尔德斯仅仅是我们的科尔德斯可笑又可怜的化身。现在该轮到我们向欧洲派记者，去采访你们的废墟了。”

赵登荣 译

银矿见闻

难道我是置身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抑或在儒尔·凡尔纳①虚构的地下王国？还是在观看宇宙马戏团的水戏？我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无法理解；我开始去理解时，这一切反而变得更加不可思议。

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湖，一个很大的湖。湖上桥梁纵横交错，从湖这边伸向湖对岸。表面看来，它们除了互相交叉，似乎并没有别的什么用处。平静的水面上冒着一朵朵水花，泡沫四起，浪花飞溅；水花排列得整整齐齐，十分匀称，如同装饰品点缀着湖面。每朵水花上都有一个圆笼在打转，里面似乎有猴子或鹦鹉在跳跃嬉戏。

四周的湖岸十分陡峭，没有边缘，象火山湖。几乎垂直的陡坡上点缀着小茅屋；岸边，冒气的烟囱高高耸立，比位于最高处的房子还高。

现在我是在雷亚尔·蒙德公司的氰化处理工厂里。我只知道，矿石经过我所走的路线被送到这里；这些矿石肯定赋予我觉得毫无意义的地方以一定的意义。

到工厂参观前我先在城里散了一会儿步。巴胡卡地区的自然资源影响了各大洲许多国家的命运，然而巴胡卡本身却是一

① 儒尔·凡尔纳（1828—1905），法国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说作家。

座贫穷的城市，不能与墨西哥其他城市相比。市内没有宫殿，没有林荫大道，没有公园，没有干净的饮用水。街道石头路面铺得很坏。市区周围，矿山的废水污染了空气。唯有城市的环境非常优美，房屋都盖在河谷两边的山坡上。可是到眼前一看，这优美的环境却是一片贫困的景象。

我登上罗莱托矿的采矿塔，向四周眺望，想把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理出个头绪来。我认出了贝内菲西奥的别墅，那废弃了的选矿场，在这工场里，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骡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转个不停，把银矿石碾碎，掺进水银。人们小心地装好银子，毫不怜惜地冲掉水银。周围的耕地喝饱了水银，现在地里的水银含量恐怕比银矿还高。可有谁来管这个呢！

从矿塔上我向一幢古老的大楼望去。雷亚尔·蒙德矿工工会在这幢大楼里安顿它的客人——新来的工程师和前来视察的官员。离大楼不远的地方是马厩，人们把整座整座的森林砍倒后，用马把木头拉到巴胡卡支撑坑道。那边是公司的办公大楼。再过去是劳工合作社。城市的边缘是辅助设施——矿山的修理车间和工具采购处。矿山购进机器、炸药、化学产品和木材。

属于辅助设施的还有一个“废品厂”。这里陈列着各种生了锈的破旧工具和机器，向我们展示了一部采矿史：鸭嘴锄、斧子、手钻、胸钻、六角钻、电钻、碎石机、捣碎机、球磨机，等等，等等。这些工具和机器体现了粉碎工艺的不同发展时期；工艺是大大发展了，现代化了，但究其实质还是同一工艺而已。

一幢遗弃不用的别墅是上世纪在这里干活的康沃尔① 矿工用的祈祷室，对面是现在在这里干活的美国人用的互济会② 堂。

① 康沃尔，英国地名，矿区。

② 互济会，以互济、友爱为宗旨的秘密结社。

雷亚尔·蒙德公司后面是一座山丘，山顶是耶稣教徒和互济会会员的墓地。栎树和针叶树掺杂其间，使山峰宛如一顶绿色的王冠。工程师和工长照旧全是外国人。他们来自厄尔士山脉①，来自萨克森②和波希米亚③的矿山，来自库腾贝尔格、普日布拉姆、津瓦尔德、约翰希姆斯塔尔和弗赖贝尔格，来自胡司宗④和路德宗⑤异教徒的地区，所以在宗教审判时一再提到他们的名字。

西面，已经在邻州地界，苏尔特佩斯广场的市井旁耸立着一尊矿工塑像。这座塑像建于一七三三年，无疑是西半球最早的无产者的雕像。这位老矿工是个年轻人，挽着袖子，穿着印第安人从来不穿的高筒靴，肩上扛着锤子，左手紧握长长的凿子。他鼻子宽大，头发卷曲。我看到这位老矿工就想起一位青年时的伙伴，他是克拉德诺人，被希特勒秘密警察绞死了。每次我从苏尔特佩斯经过，我都要用波希米亚矿工的问候语向这位矿工致意。

我极目远眺，其他各矿的采矿塔尽收眼底：这里是维塔·维茨开纳矿，洪堡曾报道过这个矿山，对这个矿山大加称颂，致使伦敦市的股票大涨；那边是大普利斯玛矿，正是在这里，巴托罗梅奥·德·梅迪纳做了巴蒂奥工艺的最初几次实验；再过去是圣格特鲁迪斯矿，该矿一八七九年破了产，以三千比索卖给了新主人，而在此后的十三年中，新矿主赢利二千五百万比索。

---

① 厄尔士山脉，位于德国和捷克交界处。

② 萨克森，德国地区名。

③ 波希米亚，捷克地区名。

④ 胡司宗，捷克宗教改革家胡司(1369—1415)创立的教派。

⑤ 路德宗，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483—1546)创立的教派。

我从矿塔下到地面，进入矿井。我飞快地向地心跌落下去，比重力加速度还快。从斗车出来后，我头戴安全帽，顺着坑道向前走去。我一边走，一边想起海因利希·海涅在《哈尔茨山游记》中关于银矿的描写。我没有看见什么田园景色，没有听见七弦琴的乐声的回响。坑道里没有餐桌，看不见忠诚的矿工陪着和蔼可亲的公爵在桌旁大吃大喝。我也没有遇见善良的灶王爷神像。我想，就是海涅来到这里，也不会有什么柔情，去思念矿工的女儿吧。

矿坑的壁龛里设有祭坛，点着灯，装饰着纸花。壁龛有小礼拜堂那么大。在这矿井里，只有这祭坛或许还能使那些浪漫的人产生浪漫的想法。圣像旁点着供奉的蜡烛；人们相信，只要坑道口的蜡烛不灭，在掌子面作业的奉献蜡烛的人就不会有什么不测，他一定会安全返回地面。

到矿井去的路上，一个女店家向我诉苦，说蜡烛生意比过去差远了。“如今，唉，这些男人不大相信圣母了，他们更相信工会。”卖蜡烛的女人似乎想说，男人们这样做是太不聪明了。诚然，工会可以在劳动保护、缩短工时、争取预防矿肺的防毒面罩等方面出力；但是，难道工会是万能的吗？在工会与公司的实验科的谈判中，公司聘请了精通业务的律师和劳工法专家，并且还采取了其他手段，工会难道还不是一样无能为力？

我头上戴着安全帽，肚子上拴着矿灯，手里拿着铅笔，在地下四百米深的迷宫中摸索前进。我在这古老的矿井中搜寻新的东西。奇奇米卡人和托尔蒂卡人① 在这里挖银矿时，肯定没有

① 奇奇米卡和托尔蒂卡，古印第安人部族。

空气压缩机的隆隆响声。在科尔特斯[①]年代，炸药也没有在这里轰轰爆炸过。在雷格拉[②]伯爵统治的日子里，还不可能象现在，每五十五秒钟就开出一列斗车，倾起车身，一下子倒出五吨半矿石，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好象地球被炸裂了，碎石废渣发出巨大的声响掉进宇宙的深渊。

五十伏电压的电线挂得低低的，擦着脑袋，非常危险。弗赖贝尔格人洪堡来到矿井时，这里还没有电线，没有电信号灯。矿井也还没有深入到地球腹部半公里。那时，也还没有神秘的传送带。这传送带无人牵拉，由电力推动，在山中向前飞驰，到火车站卸下矿石，从转轴上回转头，再去装新的矿石。

传送带把卸下的大块矿石飞快地向前输运，送去粉碎。我在传送带旁边平衡着身子向前走着，那些矿石旅客不时地向我抛扔石头。石块啪啪打在我的安全帽上，在我眼前冒出一星星火花。

传送带的终点站是碎石机和球磨机。在这里石雨不下了，到处都是泥浆。机动球磨机，安装球磨机的地板，输入矿石的管道，通向上面平台的梯子，全都蒙着一层粘糊糊的泥浆。特别是在这里工作的工人全都成了泥人。这里的情景可以用一句话来描写：泥人在泥地上的泥机器旁工作。

在这些钢铁做的、穿着泥衣的庞然大物的肚子里不停地发出隆隆的响声。里面的矿石你撞我，我撞你，碎裂成更小的小块。这些矿石原先是一块完整的巨石，象一堵巨大的岩石墙，在山底沉睡了几百万年，不到一小时以前才把它打碎，运了出来。粉碎机狂暴地吼叫着，震动着，对自己的工作毫不满足。第一台

---

① 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

② 雷格拉，西班牙殖民者。

机器把嚼碎了的产品吐进第二台机器的喉咙，第二台机器继续咀嚼，又传给第三台、第四台。最后矿石被磨成了粉末，变成了黄色的泥浆。

我呆呆地看着“银剧”的最后两个场景——传送带上的矿石和地上的泥浆。我承认我都看呆了。我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一切是完全新的还是非常古老的。为了得到银子，自古以来，难道不是都这样做的吗？尽管过去没有这样的马达，这样的机器，这样大的规模，但是工序是一样的：先是粉碎矿石，然后加水磨细，使它变成泥浆。

我今天在“福丢那·莱佛尔”矿第四或第五层楼看到的事情，五十年以前是在比现在高六十米的地方进行，而当海涅去银矿的时候，则发生在我头上一百二十米的地方。那时，这里的情形与哈尔茨山的银矿一模一样。比起过去来，生产手段现代化了，劳动条件更差了，利润增加了；这一切只不过是量和规模方面的变化，地下的情形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只有这个中国湖是新的，湖上桥梁纵横交错，湖上匀称地冒着水花。

水花的匀称布局帮助我解开了谜。这肯定是一个有实际用处的人工湖，由若干大蓄水池组成。外面装有木栅栏的轮子好象是中心，那些桥梁仿佛是一条条切线。轮子转动产生了水花。原先我还以为这些轮子是鸟笼或猴子笼呢。

有一个蓄水池的中央没有转动的轮子，而是耸立着一所房子。那是一所用木头和玻璃建造的房子。于是，我向这所房子走去。氰化处理工厂的领导机构就设在这里。这里既是办公楼，又是指挥中心。厂长给我讲了矿石如何从矿井中运出，怎样忍

受各种苦难，最后又怎样从矿石的躯壳中摄走银色的灵魂。

在隆隆地震个不停的球磨机中，氰化处理过程已经开始。我听见矿石在球磨机里咔咔地碎裂，看见泥浆的洪流淹没了一切。我现在知道了，在那些机器内部，锰、钢、铁球、机械推动的杵和转动的铁锤在不停地敲打矿石，而且还有化学品在为此助兴。

湖岸边耸立着二十个金属圆塔，每个直径七米，高二十米。这些圆塔把那打得遍体鳞伤的浆状矿石收进塔身。世界各地的矿山都把这种巨大的圆塔叫做“巴胡卡罐”。我怀着敬意看着已流传到世界各国的“巴胡卡罐”的鼻祖。另一座墨西哥银城帕拉尔是“帕拉尔泵”的教父。冶矿学中，墨西哥的说法比比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用“帕蒂奥”、“阿拉斯特拉”和“卡左”来命名工艺方法。

工程师伸出胳膊指点着，讲起这个水国是怎么回事。这个湖每天吞下三千七百吨矿石，从中提炼出银子。从一吨矿石中才能分离出半克银子！为了得到这点银子，要花费多少劳动力，经过多少道工序，使用多少种机器和辅助材料啊！尽管这样，雷亚尔·蒙德—巴胡卡公司（墨西哥）所属的美国盐湖城的美利坚冶炼公司从每天倒进湖里的矿石中获取了巨额利润。

那些铁制的浮罐是湖的一部分，和湖一样深。这些浮罐用途各不相同。第一组浮罐中泡沫四溅，看上去好象一个大脑；那些泡沫从这里游进第二组浮罐，停留五十小时，被氰化钾腐蚀吸收。用这种办法分离出了银子。银子又是怎样从溶液中分离出来的呢？在过滤池中，真空泵把象水一样稀的溶液吸出，通过一千一百一十七页滤页，所有非液状的东西都被滤页挡住。接着和进锌粉，锌粉和氰化钾化合；锌和氰化钾很难与银化合。最后剩下银和金。银矿中的金子含量微不足道。但是，每天从过滤

带上得到的这一点点金子完全抵销了矿山的全部费用，银子的收入就成了纯利。

氰化处理后我们得到的金子和银子还是混合在一起的象粪便似的黑块，并没有诱人的魅力。这些黑块再次通过过滤器，把最后的一点水分滤干。剩下的固体放进熔化炉里，加入硼砂和锌，一起“烧烤”，直到烤熟为止。金融界的胃口还不能享用这金银烤肉。幸好，附近就有冶炼厂，用硝石和电解法终于把黄色的金子和白色的银子分开了。

我面前的湖没有笑容，丝毫没有请人游泳的意思。用席勒的话来说，这个湖十分狂暴，要求得到供品。工程师解释了这个湖为什么这么狂暴。原来，不输入空气，氰化钾本身并没有那样大的力量，能把金子和银子从泥浆中分离出来。于是安装了翼状气泵和空气压缩机，通过管道把压缩空气打进水池。

这个湖要求得到供品。在十分炎热的日子里，有时会有饥渴难耐的飞鸟向湖面降落。它们看见有这么多水！鸟嘴一碰到水，飞鸟立刻死亡，掉进湖里。它们被氰化钾毒死了。从此，在飞鸟中似乎传开了，这个湖的湖水是有毒的，鸟儿就很少到湖里来喝水了。只是在不久前，一只很可能是外地来的迷了路的鸽子经过七号池，还不到一分钟，它就掉进池里死了。

我问为什么到处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必须系救生圈的规定，到处挂着急救须知。

工程师回答说，必须这样做，省得发生什么事故时，有人提出指责。不过，还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故。他接着说：“您看，这里还有一个药房，只是摆摆样子罢了。药房里有三种解毒药：硫酸铁，氢氧化钾，氧化镁。其实都是空盒子，真是活见鬼！不知哪个家伙把药给了谁，把空盒子放回了药房。”

雷亚尔·蒙德公司有职工六千人。其中只有几百人在氰化处理厂工作，干些搅拌和清洁等活计。化工所需的人力大大少于机械，效率反而更高。雷亚尔·蒙德公司开工以来的四百年中，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把矿石中的金子和银子一点不剩地提炼出来。可以说，进入水池的矿石中没有丢失一个银原子。

将来会怎么样呢？

用不了多少年，雷亚尔·蒙德矿就将开采殆尽。

赵登荣 译

斗　鸡

一个斗鸡场能容纳一百人至三百人，一个斗牛场能容纳几千人。所有村落，哪怕是很小很小的小村子，都有一个斗鸡场；斗牛场则只在城市里才有。在城市，斗鸡是被禁止的，因为斗鸡是一种幸运的游戏——赌博。在乡村，斗鸡是允许的，在那里，斗鸡这种赌博给农民带来的只是不幸。

说句公道话，城里也有斗鸡打赌的。各种晨报常常报道消息，说警察局除了抓进十几个赌徒外，还抓了几只斗鸡。别的几种禁止的赌博被发现的危险小多了。掷骰子不象斗鸡那样会由于公鸡的啼叫声引起邻居和警察的注意，转轮赌博的赌球不会使羽毛四处飞扬，赌牌不流血；哪怕正在赌博时，警察冲了进来，也什么都能否认。斗鸡赌博就不同了，绒毛落在房子里的桌子上，是确凿无疑的罪证。然而，人们仍然甘冒被抓获的风险。斗鸡自有一种特有的乐趣，绝非没有生命的赌具所能比。要是谁发明一种不流血的、没有羽毛的、不出声的斗鸡，就一定会在墨西哥城市的夜生活中大为走运。

在乡村，"喔喔"的啼叫并不是快要死亡的公鸡的呼救声，也不是给赌博大煞风景。在这里，无论是悠闲自得的普通公鸡，还是为人取乐而斗得粉身碎骨的斗鸡，都从早到晚叫个不停。

路标指示着去斗鸡场的方向，为的是外乡人能找到它。从外面看，所有斗鸡场都象一个仓库。唯独门旁挂着一块牌子，告

诉人们进这个仓库是要花钱的。妇女半价。在首都郊区的乡村里，参加斗鸡的男子对妇女的殷勤程度不能和城里相比，付半价的妇女只能坐二等位子。

到了里面，仓库失去了农家风味，颇象游艺场上的拳击场或摔跤场。圆形观众席两层楼高，造得相当粗糙，分底座和楼座，放着椅子和长凳。

赛场边放着一个钱柜，一台普通秤，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男人。公鸡入场前先在秤上称一称重量，确定重量级。甲公鸡比乙公鸡稍轻一点，那也无关紧要，并不象跑马那样，还要挂上一个相应的压载物。

斗鸡场里画着民间故事，是霍加思的作品。看不到一丝一毫现代的东西。整个建筑没有用一点钢筋水泥。没有新闻摄影师、电影摄影师满地乱转，也看不见新闻记者。这项体育活动不需要做广告；不做广告，斗鸡场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充满了紧张气氛。

长条凳后面放着柜台，出售煎饼和夹肉卷饼。有的卷饼夹的是鸡肉，不过这可不是下午刚刚斗死的鸡的肉。斗败就立刻屠宰，这是斗牛场的规矩：早晨，各报都报道了那里的牛的生平，登载了照片；下午，这条斗牛的双角上戳着一张斗牛士神像，它的力量和勇敢使三千观众神魂颠倒。牛在斗牛场上受了致命的撞击，当场就被等着买伤牛的人打上印记，被屠夫屠宰切割，卖给了观众。卖肉时按重量计价，好象这头牛不过是一块无名牛肉。

一个男人胳膊下夹着一只鸡走进赛场，把鸡放在秤盘上。好象为它祝福似的，他用手在公鸡上面做成一个拱形，不让它飞走。其实它也飞不远，它的翅膀已经修剪过。在这里，"修剪翅

膀”并不是唯一的不是比喻的比喻。公鸡的鸡冠也被割掉。不割掉鸡冠，斗鸡就会互相啄撕鸡冠，鲜血就会从眼睛上流下，使斗鸡的无名怒火失去目标。

尾巴也许是公鸡引以自豪的东西，争斗时却有点碍手碍脚。于是，尾巴的羽毛也被拔去了，只留下一根羽毛当作方向舵。这样半裸着身子，斗鸡比普通鸡显得小多了。咔嚓一声，距也被割去了。这距本是对现代武器技术一无所知的畜牲的拙劣武器，它不过是一块角膜，割除时并没有流血；但是，公鸡的反抗告诉我们手术引起了疼痛。别反抗了，公鸡，你看，你一会儿就会得到补偿，一会儿就给你安装人工做的假距。人们从一个小口袋中取出两把小小的钢刀，裁判员作了仔细的检查。他看看这两把小钢刀是否一样，是否符合“斗鸡规则”。这个斗鸡规则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第一版还是在新西班牙王国只有一个印刷厂时印刷的呢。公鸡没有读过规则，肯定以为它会得到两把小刀，它有两条腿嘛！然而人们只给它安上一把刀子，绑在脚踝上；早晨，太阳伯伯诱使公鸡发出第一声啼叫时，脚踝上还长着距呢。

装上了钢距，公鸡可以自由地散一会步。公鸡踢踢腿，它的神态就象一个身佩腰刀、刚被宣布不适合当军官的士官生那样，每走一步都担心腰刀和腿会互相卷到一起去。

这当儿，斗鸡场上的人倒先“斗”起来了。与这场激烈的“人斗”相比，公鸡的生死搏斗不过是一场温和的余兴而已。

一群人疯了似地冲进赛场，绕着场地跑着，边跑边喊；越跑越快，越喊越响。这是十五个中人。他们穿着颜色很浅的衣服，头上戴的不是礼帽，而是城里人戴的帽子，每顶帽子上插着号码。好一副模样！要不是在斗鸡场上，还会以为他们是夜总会

的拉客，妓院的老鸨，集市上大声叫卖的商人，废品市场上的买主呢！

十五人中有一人身患脊髓结核。他拄着两根拐杖，在场地上转着圈子，比谁跑得都快。另一个人脸色红红的，留着上须，染得黑黑的，红脸衬着黑须，使他显得更为激动。三、四个人穿得漂漂亮亮，结着五光十色的领带，分头上抹了发油。他们拿到甲方的赌注后，专门找女士们应赌。他们当中有一人是白净皮肤的混血儿，长得异常高大，胖得不成样子，严重平足；尽管有这么多缺陷，他跑的速度比起脊髓结核患者并不逊色多少。

几乎每个观众都跃跃欲试，都想比一比，赌一赌，用不着谁去鼓动他们的情绪。中人们个个希望观众在他那里缔约打赌，他抽取赌金的百分之三。这里没有集中管理的赌博办公室，统一收取赌金，支付赢利；观众各自互相打赌。甲方报出赌注的数额，中人再去找一个同意这个条件的乙方。

中人们一边跑，一边用手指忽而指指这个，忽而指指那个，又指指自己。在澳大利亚城市行乞的黑人逃奴也做这样的动作。只是那些黑人逃奴一无所有，无价可出；而斗鸡场上的中人们都有价可报，如“西尔瓦三十对五十”。这句话的意思是，谁为西尔瓦先生的鸡押三十比索，这只鸡斗赢时，他就能得到五十比索。

钞票在空中飞舞，手势随着点头此起彼伏。手势等于现金。看得见的钱和看不见的钱在空中传递着，传到中人的手里。他们什么也不记，只是点了点脑袋，这脑袋就是他们的账本，他们的登记簿，他们的计算机。

中人们越来越忙碌，越来越热心。愿意打赌的人已经在他的手心里了，现在要做的是抓住那些犹豫不决的人，甚至动员那

些压根儿不想打赌的人。他跳来跳去，报着价，催促着，扯着大嗓门喊叫着，使那些喔喔啼叫的公鸡连自己的啼叫声都听不见了。

坐在头几排的是些举足轻重的男人，一个个都拿着装有钞票的口袋。他们是牧场主和粮商，斗鸡场的老主顾。他们是众矢之的，是大家争夺的对象，人人围着他们献殷勤。有人低声悄语地给他们出主意，有人大声地对他们吼叫。这样闹了好一阵子，只听得扩音器响了起来，才使人们如梦初醒，想起几乎忘却的主题：斗鸡。扩音器里说："瓜蒂特兰村的西尔瓦先生和圣·巴托罗镇的埃切伽莱先生的公鸡现在入场。两位鸡主先生各押三百比索。"

一声唿哨，表示斗鸡就要开始，交易所的竞争该收场了。但是，尽管扩音器里不耐烦地喊着"中人们，遵守秩序！""中人们，安静！"斗鸡的序曲已经响起，都不能一下子打断那金融之仗。大概有规定，中人们此刻必须离开赛场，可是并没有规定速度。中人们慢慢地向场外退去，且退且战，喊着"谁对？谁要？"企图再捞几笔生意。最后一个退出的是脊髓结核病患者，他象撑竿跳高运动员那样，撑着拐杖跳过赛场的栏杆，嘴里拼命喊着："西尔瓦四十对五十！谁对？"

代表瓜蒂特兰村出场的是西尔瓦先生的绿公鸡，代表圣·巴托罗镇的是埃切伽莱先生的花白红鸡。

现在，这两位长着羽毛又剪去羽毛的斗士是全场的宠儿，场里的每个人都把他的一部分财产押在它们身上。但它们出场时，人们并没用热烈的掌声和充满紧张气氛的喊叫向它们表示欢迎。人们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它们一眼，既没有人投去希望的一瞥，或报以恐惧的目光，也没有人用审查的眼光打量它们。从他

们的眼神看，他们似乎只是随着兴之所至，把赌注押在这只鸡或那只鸡上，就象在蒙的卡洛赌场里，人们在红与黑、奇数与偶数之间任意选择一样。他们与其说是看鸡押宝，毋宁说是看行情涨落押宝。小心谨慎的人把宝押在老将身上，胆子大一点的人宁愿选择不知名的新手，新手获胜的可能性固然小一些，但也可能会给人带来更大的利益。

理论上，这些鸡行家很了解他们的老将，在公鸡还是鸡蛋时，甚至还没有鸡蛋时，他们就了解它了。他们了解它故世的父亲，知道儿子享受过什么教育。在那些以饲养和训练斗鸡闻名的牧场里，从小就给斗鸡吃刺激性的饲料，注射兴奋剂。在那里，让小斗鸡在横杆上做体操，训练它在横杆倒挂或旋转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那里，给小斗鸡的身体作按摩，放松它的肌肉和筋。在那里，让它和陪斗鸡相斗，这些陪斗鸡的距和喙尖上有意套上类似拳击手套那样的东西。这样，未来的斗鸡总能击败所有对手，从这时起，它踌躇满志，自鸣得意，自以为不可战胜。但是，难道它未来的对手不也有类似的血统，享受同样的教育吗？

两只斗鸡暂时都还蜷伏在主人的怀抱里。它们躺在那里，绝不是象小时候躺在母亲卵翼下让母亲保护那样，让主人抚爱保护。况且，鸡的主人也没有一丝一毫兴趣，让公鸡在心中萌发这种温文尔雅的情感。情形正好相反。鸡的主人是想让对方——抱着一只陌生斗鸡的陌生男子——接近自己的斗鸡，对方的斗鸡正拼命地向前伸脖子。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这个激怒斗鸡的男人叫逗鸡人。这个词是从对那些挑逗男人、自己却不想卷进去的女人的称呼引伸来的。那斗鸡很想向挑衅的对方冲过去，却被主人的手抓着，挣脱不开。斗鸡被激怒了，它暂

且压住怒气，等机会向对手发泄。

斗鸡是否真的被加热到愤怒的沸点？反正，主人又拔下它一把绒毛，拧了它一下屁股，戳了一下它的脊背，把它在空中晃了几下，最后在脊骨上打了它一下，祝它在为这种美事儿的争斗中得到上帝的喜爱和保佑。

打过脊骨，“仪式”就算完结，可以开始相斗了。鸡的主人用斗鸡界的行话叫“放鸡人”，他们抱着各自的公鸡向对方走去，让两只就要互相厮杀的公鸡互识尊颜。两只公鸡的反应一如人愿，眼睛里向对方射去残杀的凶光。不错，很好！

它们被放到了地上，但主人的手还抓住屁股不放。两只公鸡只能向对方伸出脖子，它们象跑马场的马冲到终点线时那样，拉长了身体，超出了极限，构成一条中间断开的水平线。

现在，那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中人们持续了十五分钟的、象行乞僧似的吼叫声戛然而止。在赛场两边的两个斗士终于被放鸡人放开了。

两只鸡不是慢慢地走近，而是一下子就向对方冲击，从对方头上飞了过去，冲了一次又一次。一只鸡落了地，另一只就从背后袭击过来。被袭击的那只飞快地一闪，转过身来，没有等人看清楚，两只鸡已经你咬我，我咬你，你抓我，我抓你，扭成了一团。

两个同一种类、同一性别的成员流着血，互相厮打着，折磨着，直到最后一口气……“同一性别”，原来如此！这是两只雄鸡——两个情敌——的争斗！公鸡啊，难道不是有足够的母鸡让你拥抱吗？难道你不能让别人享受那最多不过持续半分钟的爱情吗？难道你没有注意到，人在滥用你的情欲？正是人戳你，拧你，撕你，晃你，把你激怒，让你把怒火向你的同伴发泄，你的同伴也同样被人有意折磨得怒不可遏。为什么你要杀别人，而

自己也愿意被杀呢？可现在，你们两厢情愿，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场厮杀时而在地上进行，时而在空中进行；冲、撞、抓、打，十八般武艺件件用上。喙嘴象擂鼓似地向敌人的肋部、头部和眼睛啄去，钢刀呼啸着，向敌人攻击，剪剩的半截翅膀紧紧抱着对手不放。

两个斗士怒火满腔，跳向空中。它们忘记了或者没有考虑到，它们的翅膀已经被修剪过，它们以为还能飞呢。信仰为人添翼。它们果然从地面垂直升起，一只鸡踩着另一只跳了上去，它们你攀我，我攀你，叠在一起。

这样互相叠在一起的两只斗鸡象一只双头鹰，分不开也解不开；象一只画在城徽上用魔术变活了的双头鸟，两个头愤怒地对峙着，两个喙互相啄着，两双腿互相踢着，两把钢刀撞击着，羽毛和绒毛在空中飞舞。长在一起的孪生兄弟围着一条并不存在的轴线打转。你看，轴线真的出来了。这条轴线是红的，好象从一个小水潭中往上升起。实际上，这条流动的线条是从上而下，流进一摊鲜血的中央，这摊鲜血还在不断扩大。

这条线的上端，一只风信鸡在旋风和暴风雪中打转。突然，掉下一只眼睛来。接着，这双头怪鸟啪地一声掉进血坑，鲜血四溅。但是，这怪鸟还不愿被当作肉鸡了却残生。双头鸟又分解为两只斗鸡，它们比腾入空中以前互相仇恨得更加厉害。它们中了邪似地向前猛冲，用喙和刀向仇人攻击，又砍又刺，又捅又打，又扭又抓，如拳击，似击剑，象摔跤。直到其中的一只四脚朝天——实际上当然只有两只——躺在地上，厮斗这才告一段落。

斗鸡并没有断气，只是半死地仰躺着。主人轻轻地把它捧起来，慈母般地把它带到比赛场地的另一边。好心温柔的主子

一边走，一边掀开斗鸡的翅膀给它搧风，看看心脏或肺脏是否挨过刀。他象医生诊视病人那样，察看斗鸡的脑袋。他把两条鸡腿轻轻地卷曲到鸡肚底下，省得自己被鸡腿上的小钢刀碰伤。

斗鸡从下午一直斗到晚上，共进行十三场比赛。天黑后，赛场上点起了汽灯。比一场，休息一次。每次休息，养鸡人都采取奇特的方法，使斗鸡重新兴奋，恢复斗志。他掰开公鸡的嘴巴，用手指伸进喉咙的深处。接着他把鸡头放进自己的嘴巴，用嘴唇夹着，拉拉斗鸡的脖子。他拍拍斗鸡的两侧，让它放松肌肉。他吸吮干净伤口的血污，用牙齿和手指把伤口理好压紧。最后，他一口咬住斗鸡的屁股，又嚼又咬。他是不是从屁股里吹进智利胡椒？他搞的是什么名堂，只有天晓得。

用这种方法治疗以后，斗鸡又入场了，又向敌人进攻了。只要它还有一点力气，它就决不后退。有时，一方会企图逃跑，沿着边线后退；如果说这时它还有眼神的话，那么它的眼神里充满了临死时的恐惧。这时，追捕者和逃跑者加在一起，也只有三只眼睛了。

等到一方终于躺在地上起不来时，胜利者并不以胜利者自居。它不象人在胜利时那样，发出胜利的欢呼，自豪地绕场一周。它满身血污，安静地站在临死的高卢人① 旁；它侧过身子，好象不想看它建树的丰功伟业。只是当牺牲者抽搐地动一下，它才转过身，给它补上一刀。这样，斗败者就完全断了气。

正当斗鸡激烈厮杀时，观众们海阔天空地聊着，吃着煎饼，喝着龙舌兰汁。他们只是偶尔向赛场瞥一眼，看看他们的赌注会有怎样的前景。

---

① 高卢人，古罗马时期居住在今法国、比利时和上意大利一带的日耳曼民族。

斗兽时，观众大喊大叫，为斗兽们加油鼓劲。斗鸡时，却没有人为斗鸡当拉拉队。其实，为鸡加油助兴不见得就比给牛、马、狗助兴更为荒唐。不过，有谁会对着一个骰子、一个转轮赌博的赌球、一张赌牌或一个彩轮喊叫，表达他的愿望、他的赞同或他的反对呢？公鸡只是赌博的工具而已。

以往，情形大概并非一直如此。如同牛、马一样，公鸡和母鸡也是从西班牙传到墨西哥的。西班牙公鸡比当地的吐绶鸡漂亮得多，灵活得多，也骄傲得多。公鸡传进了墨西哥，斗鸡赌博也就一起传了进来。印第安人相信，这些斗鸡是穿着羽衣的神圣的斗士，它们的争斗是由一个更高的神来决定胜负的。白人主子自己不也是相信神的判决，经常在斗鸡中输掉几千人耕耘的种植园吗？

伊图里伽拉伊总督①整天整天坐在特拉尔班的斗鸡场里，在这里发布命令，统治整个新西班牙。他在处理问题时是宽大为怀，还是严厉残暴，就要看他是赢了还是输了。一八〇八年夏的一天，他的一个下僚拿着《马德里日报》冲进斗鸡场，报告西班牙发生了革命，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国王退位。总督一边说："我们统治的末日来临了"，一边把赌注押在最靠近他的鸡上。好在都是些优秀斗鸡，其中有四只是驿使刚刚带到的真正的马来亚猛禽。

圣安纳将军②进行独裁统治时，共和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在斗鸡场。他嚼着口香糖，几天几夜的坐在斗鸡场里。跟本土同

---

① 伊图里伽拉伊(1742—1815)，一八〇三至一八〇八年任新西班牙总督。

② 圣安纳(1797—1876)，一八三三至一八三六年，一八四一至一八四四年，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任墨西哥总统，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五年对墨西哥进行独裁统治。

胞们或跟美国人打仗，对他来说，只是斗鸡场中的一些插曲。他最得宠的斗士是西印度群岛产的弯嘴阿西尔鸡。他只要入场前看一看它们闪着仇恨之光的眼睛就知道，哪只鸡会斗赢。

今天，不再从外地进口斗鸡了，本地鸡也一样斗。一俟一方斗败将死，表示比赛已经有了结果，它的好心的、几乎是温情脉脉的主人就在它脖子上狠踩一脚，好让它更快地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时中人们再次冲进赛场，从赌输的人那里收进整卷整卷的钞票，向赌赢的人支付整卷整卷的钞票。

赵登荣 译

输 油 管

一

从墨西哥湾到首都去的路上，有一条管道为行人作伴。遇到城镇，管子就隐身不见了；过了城镇，管子又出现在我们面前。遇到公路和运河，管道就完全裸露在阳光下。这条管道在地图上并没有标记。

墨西哥石油在成为墨西哥人民的全民财产以前，为三家国际康采恩的十四家子公司所瓜分。这三家国际康采恩是德特丁的"壳牌石油公司"，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和哈里·辛克莱的"加利福尼亚辛克莱·皮尔斯石油公司"。

十四家子公司中有一家叫"阿吉拉公司"，又名"墨西哥大鹰石油公司"，它掌握墨西哥石油产量的百分之六十。现在，在该公司从前在首都的办公楼办公的是"墨西哥石油公司"。办公楼的大厅里放着卡德纳斯① 的胸像；因为正是他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宣布，把石油收回到本国手中。

于此，社会史上一场独特的斗争结束了。这场斗争的一方是一个国家，另一方是三家强大的国际石油垄断企业。

这场斗争起始于工资冲突。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

① 卡德纳斯(1895—1970)，一九三四至一九四〇年任墨西哥总统。

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八十八点九六，而工资只提高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一个墨西哥石油工人平均每天得四点八六比索，这个数目还不到美国国内同一公司工人工资的四分之一。而美国工人的采油量却低于墨西哥工人，墨西哥油田的喷油量比美国的大得多。

工人要求签订集体合同，实行四十小时工作周制，增加工资，保障休假权，改善劳动条件。这些要求遭到拒绝，他们就罢了工。公司呼吁国家调解法院出面调停，要求工人复工。法院要求罢工工人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等待裁决。法院驳回了工人的部分要求，但规定各公司要改善劳动条件。这一条如果真的付诸实施，要耗资二千六百万比索。这是一笔很大的款项，但另一方面又只是美元利润的一个零头。

对这个裁决，诸公司提出了上诉。谁读一读这份上诉书，谁就会觉得好象来到了伦敦的司法区：这里，在有四百年历史的古老的建筑物前生长着四百岁的栗子树，它象四百岁的老人那样安详；这份上诉书简直可说是一位年逾古稀、受人尊敬的皇家律师所写，他对法律条文和案例了如指掌，而对社会学、劳工法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却一窍不通。他写了几句法律上的套语以后，就论起石油大亨们非常关注的题目：劳动自由。他举例说，如果雇主被迫雇用本国人做外国专家的助手，劳动自由安在？如果以企业主利润的多少作为工资谈判的基础，平等与公正何有？法律面前，不论贫富，难道不应该使用同一尺度？

墨西哥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石油公司决定抵制这一裁决。于是政府宣布没收石油公司；同时告诉全国人民这一措施可能引起的后果，动员人民抵抗可能发生的各种干涉。维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首先向人民发出了呼吁。在国际工会运动中，

几乎没有人可与隆巴多·托莱达诺相比。他既是工人领袖、哲学教授、前州长，又是歌德专家、植物学家、考古学家。他在大学讲课变成了群众集会，谁都要来听讲。他到处受人欢迎，具有无上的权威。在那次关于石油的讲演中，他分析了石油资本家为了分裂墨西哥的公众舆论可能进行的各种宣传活动，可能散布的各种谎言，从而在背叛和行贿活动发生之前就揭露了背叛和行贿活动。

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本人也向人民发出了呼吁。他首先回答了石油公司提出的所谓忘恩负义的指责。石油公司指责道：我们用我们的资本建设了墨西哥最大的工业，难道没收就是对我们的感谢？卡德纳斯在电台响亮地回答："你们的资本？你们的资本是属于我们全民族的油矿的财富，是你们非法获取的财富！你们的资本就是你们享有的种种特权，你们在税收和关税方面享有的种种优惠！你们的资本给你们带来了几十亿利润，而你们只把很小一部分投进了你们的工厂！难道还要我们来感谢你们吗？"

卡德纳斯用同样尖锐的语言指责本国的那些罪人，他们由于懦弱、无知或自私而经不起实力雄厚的企业家的诱惑。

卡德纳斯说，墨西哥财富的源泉变成了墨西哥贫困的根源。在整个石油产区，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有自来水、医院、学校、娱乐场或体育场。连一个煤气站也没有，石油公司宁可让几百万立方米的煤气白白烧掉。有谁会看不见石油产区明显的两极分化呢？一方面是外国人的豪华舒适的住宅；另一方面是墨西哥人的肮脏简陋的窝棚。一方面是冷气设备，种种医疗措施，保护外国人不受热带病毒的侵袭；另一方面是对墨西哥人的漠不关心，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最起码的保健措施。我国人民得到的工资低

得糊不了口，恶劣的劳动条件在摧残着他们的身心。

每个生产中心都有工厂巡警处，保护外国人往往是违法的私利。不管是否由政府授权或批准，这些武装组织都根据他们的主子——石油公司的利益和委托行事。他们滥用职权，谋杀暗害，无法无天。

总统简要地揭露了石油公司对墨西哥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他只是简要地讲了讲，因为要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就得讲二十世纪以来的墨西哥历史。

自从波菲利奥·迪亚斯①授予特胡德佩斯铁路公司的英国工程师惠特曼·皮尔逊（其继任为洛德·考德雷）和美国石油商爱德华·多亨利开采墨西哥石油的权利以来，墨西哥就成了大不列颠和美国激烈竞争的战场。每次暴动，不是美利坚合众国就是联合王国或者两家一起火上浇油。美元和英镑总是马上就来帮忙。

如果反对反动势力的进步运动与石油大王们的利益不谋而合，也会得到石油大王们的支持。例如，英国的皮尔逊石油公司得到了在特胡德佩斯地区的石油开采权，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觉得它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于是该公司就帮助自由派的弗朗西斯科·马德罗②去推翻持续了四十年的波菲利奥·迪亚斯独裁统治。当然，这并不妨碍美国大使莱恩·威尔逊不久采取相反的态度。威尔逊在华盛顿攻击马德罗，攻击他对石油产品采取近乎没收的高税政策；威尔逊支持反动分子维多利亚奥·韦尔

---

① 波菲利奥·迪亚斯（1830—1915），一八七七至一八八〇，一八八四至一九一一年任墨西哥总统。

② 弗朗西斯科·马德罗（1873—1913），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任墨西哥总统。

塔①发动政变，默许他把深得民心的马德罗总统和皮诺·苏亚雷斯副总统枪杀在监狱里(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莱恩·威尔逊在这一天的表现，墨西哥并没有忘记。

卡德纳斯用没收的办法结束了随着石油浪涛涌进来的干涉的篇章。他说："墨西哥曾经慷慨大方地把它的自然财富交到外国公司的手里。但是他们却不愿接受我们最高法院的裁决。他们以为，他们的权力比墨西哥的尊严和独立还强大。于是我们决定收回石油公司，答应由国家付给石油公司一笔赔偿费。"

石油霸主们绝不愿和和平平地撤走。他们让人破坏工厂，使它无法生产，以迫使墨西哥恳求旧主人回来，无条件地向他们屈服。他们不让一个熟悉工厂情况的人留下，向墨西哥官员提供在美国的、薪俸更高的职位。那些公司的高级心腹人员只要宣布不在新人领导下工作，他们的名字就继续列在老主人的工资名册上，继续拿原来的工资。在墨西哥，至今还有这样的高级职员，不劳而获地领着原先的经理或总工程师的薪金。合同、名册、帐本、计划、化学公式、技术资料、工资册和文件报表等等，不是烧毁就是带走了。

当时，国际新闻界非但不对破坏者表示义愤，反而对阻挠破坏的人发火。石油公司拒绝工人的要求被誉为功德。一个美国经济界领袖说："工人不应享受过多的福利，不能给墨西哥工人建造妻妾满堂的后宫，不能给他们买比赛用的马匹，不能拨款让他们去作环球旅行。"愤怒的读者必定会以为，墨西哥石油工人曾要求建造后宫、购置赛马、作环球旅行。事实上他们要求的只是一张在墨西哥国内休假的车票，修建运动场，给他们的老婆孩

① 维多利亚奥·韦尔塔(1854—1916)，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任墨西哥总统。

子(即便是不合法的婚姻)提供必要的医疗条件。

早在冲突期间，石油公司就把它们的黄金储备从墨西哥银行中提走了；企业国有化后，国际金融市场把比索的价值压低到原价的百分之四十五。

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①发出了一个几乎是最后通牒式的照会，要求把墨西哥石油问题提交国际仲裁法院裁决，否则就要……北加罗莱纳州参议员莱诺兹在华盛顿国会里讲话，要求墨西哥把巴亚·加利福尼亚州割让给美国，作为赔偿。几个曾经用墨西哥石油喂饱了美国总统哈定②的人，主张对墨西哥进行武力报复。华尔街发表了一份《贸易新闻》的墨西哥特号。特号汇集了许多图表、照片和经济学论文，企图说明墨西哥对美国国防构成了威胁，墨西哥人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

在圣路易·波托西州，有一派势力在准备推翻卡德纳斯总统。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是萨图尼诺·赛蒂洛将军。他从国外得到武器弹药；有几种武器如坦克和堑壕加农炮，他比墨西哥政府军还多。他的参谋长是德国纳粹分子、上校恩斯特·冯·默尔克男爵。他在墨西哥市郊的科育坎镇有一幢严密守卫的别墅，办公室里挂着希特勒像和卐字旗。他就在这间办公室里领导着赛蒂洛反叛的战略准备工作。

另一类型的一个德国人却给男爵的活动插了一杠，他就是我的已故朋友阿尔弗雷多·米勒－福特米勒。他是汉诺威人。一天，他和一个负责流亡工作的官员来到默尔克别墅，他自己也被当作是搞流亡工作的官员。默尔克男爵立刻出示一个材料的原件，他要利用这个材料在墨西哥进步人士中招摇撞骗，证

① 科德尔·赫尔(1871—1955)，一九三三至一九四四年任美国国务卿。

② 哈定(1865—1923)，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任美国总统。

明他不是一个纳粹分子。这是古斯塔夫·诺斯克①致恩斯特·冯·默尔克男爵的一份电报，感谢"阁下在组织自由军团中立下的功勋"。大家知道，正是这支自由军团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把德意志共和国交给了反动派。

默尔克男爵对阿尔弗雷多·米勒说："诺斯克是社会民主党人，您知道吗？"米勒当然知道。默尔克男爵又解释说，他现在的上司萨图尼诺·赛蒂洛不是法西斯分子，不是纳粹。"他只是对卡德纳斯做的某些事情有不同意见。"

阿尔弗雷多说："比如没收石油公司，对吧？"

默尔克男爵重复了一遍阿尔弗雷多的话："譬如没收石油公司。"他顿了一会儿，补了一句："我想是的。"

后来，阿尔弗雷多得到一封信，证明默尔克男爵与德国大使一起在为赛蒂洛工作。

阿尔弗雷多公布了这封信，默尔克男爵离开了墨西哥。他为之制定计划的叛乱爆发时，他已经不在墨西哥。卡德纳斯来到叛乱区，镇压了这次反叛。

于是，对墨西哥石油的一场国际封锁开始了。墨西哥几乎要被自己的石油的洪流淹没。日本却表示愿意买墨西哥石油，愿意为墨西哥人铺设一条横贯全国的输油管，从大西洋岸的油井铺到太平洋岸停泊日本油船的码头。意大利愿意为墨西哥建造油轮。纳粹德国通过一批美国投机商向墨西哥表示，它愿意以一千四百万比索买下墨西哥全部石油生产权，向墨西哥提供计算机、缝纫机和机床。拉线搭桥的人也许来自中立国家；在不妨碍谈判成功的情况下，他们要让世界看看，布尔什维克的墨

---

① 古斯塔夫·诺斯克（1868—1946），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任德国军政部长，镇压过当时的德国革命运动。

西哥在和纳粹打交道!

“布尔什维克化的墨西哥!”“墨西哥——共产国际的新址!”这是当时政治上对墨西哥攻击的基调。各种机构、报纸舆论对来自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各国的反法西斯流亡者进行了种种诽谤诬蔑。有的人被说成曾经欢呼俄国对贫穷的芬兰的袭击，有的人(包括本书作者)被指责为格别乌①的间谍。沉默了许久的托洛茨基分子也活跃起来了，他们每天揭露“一个斯大林分子抵达墨西哥”。

这时，卡德纳斯总统的任期将满。反对没收石油公司的阿尔马桑将军参加竞选。他的竞选纲领说：“如果现任政府不能最终解决石油冲突，我不得不继续进行这方面的谈判的话，我将尽一切努力，使谈判达成友好的、公正的协议。这个协议将以公正、平等为基础，既考虑到墨西哥的独立，又不违背国际法准则，既符合我们的民族利益和该工业部门工人的利益，又不损害各石油公司的正当权益。”

当选为总统的不是阿尔马桑，而是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②。

其间，各公司还在为赔偿费讨价还价。根据纳税计算，企业的价值被估为五千万美元，赔偿费就确定为五千万美元。各石油公司强烈抗议这个估价，甚至公开承认他们更改了帐本，欺骗了税务局，犯了偷税漏税罪。他们说，他们在纳税时报的收入比实际收入低得多，这种情况在墨西哥比比皆是。他们要求支付现金四亿五千万，以后再付一亿二千万。

---

① 格别乌(GPU)，苏联保安机构，前身为契卡。

② 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1897—1955)，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六年任墨西哥总统。

正在讨价还价期间，一九三九年德英开战，一九四一年德美宣战。

这时，人们需要被封锁的石油，需要墨西哥这个盟友。冲突平息了。墨西哥忙于修复各种采油设备。

《石油新闻》预言，墨西哥没有能力恢复并组织生产与运输，它既没有足够的资本，也没有足够完好的机器和运输工具。墨西哥唯一的油轮“圣·里卡多号”还在美国阿拉巴马的旱船坞修理。

工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使这不值钱的预言破了产。过去外国人做到的，他们做到了，墨西哥自己开采出了石油；过去外国人没有做的，他们也做了，他们购买制造了以前没有的各种机器设备，因为当时外国人对发展当地工业没有一丝一毫兴趣。

以前，墨西哥原油及其衍生物都运往国外提纯，主要是运到荷属印尼的巴厘巴班和库拉索①这两个石油中心，然后一部分运回墨西哥。为什么要绕这个大弯？原来，原油需要提纯去杂，才能符合国际分类和国际价格议定书提出的要求。墨西哥自己没有这类设备，能把自己的石油提纯到所要求的程度。

当时，在国内生产的唯一成品是沥青和煤气油。今天呢？今天，墨西哥已能生产汽车甚至飞机用的高辛烷汽油，工业上用的白色汽油，炉子用的煤油，做蜡烛的石蜡，机器用的润滑油。

国内运输靠输油管。输油管一直通到阿茨卡波查尔科的炼油厂。阿茨卡波查尔科位于首都的北缘。在科尔特斯②统治时期以前，这里曾经是奴隶市场；后来，这里是金匠聚居的地方，西

---

① 库拉索，在西印度群岛。

② 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

班牙士兵把他们从莫克特苏马① 宝藏分到的一份宝贝拿到这里冶炼；再后来，这里是贫民区。现在，这里铺设了输油管，建立了炼油厂，越来越形成为首都特区的一个新工业中心。

二

我在墨西哥共和国石油工业工会一位干部的陪同下，驱车前往阿茨卡波查尔科。途中，他深表歉意地对我说，他虽然是坦皮科② 人，却不会讲英语。

坦皮科和英语有什么相干呢？

"在坦皮科，到处说英语。一个墨西哥人，不管到帝国饭店还是到英格拉特拉旅馆，到布里斯托尔饭馆还是到格里尔宫，还是到其他高级一些的饭店，都极少迷路。四十年前，我父亲开始在坦皮科工作时，他得到的工资是美元，我母亲就用美元买东西。一个墨西哥人，无论是政治家、将军还是投机商，到世界闻名的坦皮科联盟区夜总会去胡闹时，他毫不掩饰地用刚刚在财务科领到的美元或英镑付帐。"

我很感兴趣地问，联盟区的夜总会现在是不是还在。

他回答说还在。今天坦皮科已经是一座十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和港口。"不过，那里已经没有苏格兰威士忌和外国女郎，更没有英镑和美元多得不知怎么花的英美客人在这里出入。"

坦皮科的日常生活原本十分简陋落后。直到石油冲突开始时，石油公司才为工人子弟建立了学校。人们一再请求股份公

---

① 莫克特苏马(1466—1520)，墨西哥阿茨特肯王国的统治者，一五一九年被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俘虏。

② 坦皮科，面临墨西哥湾一城市名。

司为成年人开设英语课或技术进修课，但这类课程始终没有开设过。

这位工会干部说："以前，我们虽然有工会，但是这些工会没有联合起来，组成工会联合会。每个油田，每个炼油厂，每个运输队都有自己的工会。工会只在与企业领导交涉时代表他们的会员。那时共有三十一个这样的工人组织。今天中央工会的三十一个分会就相当于这三十一个工人组织。国有化后的头几年，工人的处境相当困难。现在，到处建起了工人新村，盖起了医院，尤其是治疗沼热病和肺结核的医院。我们花了五十万比索造了渡槽，把饮用水从唐柯尔引到马德罗城。我们排干了许多沼泽，建造了堤坝，盖了许多学校。"

工会干部用鼻子嗅了嗅，熄灭了香烟。"这里的气味和我们老家的一样。"他嗅到了石油味。

我们驶进了一座大门，门上写着"墨西哥石油公司"几个大字。我们穿过一座公园，里面种着树，树干好象铁棍一样，树根周围是一汪圆形的梨色水坑。在办公楼里，他们问我想看什么。我说想看输油管。他们说，还从来没有人要求看输油管。况且也没有什么可看。一根管子，一个入口，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

一个官员拍拍额角，说："我们把铺设输油管的工程师介绍给你。他带你参观，给你讲解。"

说着过来一个十分谦虚的男人。他立刻说，他并没有铺设这条输油管。他当时受雇于一家外国承包公司——马丁环形公司。该公司接受了把输油管从图克斯斑延伸到墨西哥城的任务。

工程师说："我只负责建设油泵站。管道经过的地区不平坦，更不是向下倾斜。要是那样的话，就不用油泵了。这一地区向上升高，坡度还不小。输油管的起点在维拉克鲁斯州的波萨·

里萨。波萨·里萨濒临大西洋，海拔仅三十米。那里受海湾旋风的影响，经常发大水，铺设管道十分困难。过了沿海平原的泛滥区，我们的油管沿着普埃布拉山攀登而上。我们造了七个油泵站，把油打上去。最高的那个油泵站离首都最近。这就是多哥山峰顶油泵站。这里，油泵把原油打上去二百米，到了海拔二千八百米的高度。而墨西哥城海拔只有二千二百四十七米，因此，从这里起就不再需要油泵了。原油依靠自己的重力流到了这里。”

讲到这里，我的老师停了下来，指着一个池子说："这就是管口，伟大的墨西哥输油管的终点。每天流到这里的原油达三千万立方米。我们的炼油厂二十四小时内加工一万九千桶。您想想，以前运送这些原油需要多少油罐车皮和油罐汽车啊！"

我向管口的池子看去。在阳光照耀下，池面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要是我一个人经过这里，几乎不会注意到这个污池。两三个大管子伸进池子里，池边有一所泵房。池子四面二百步远的地方耸立着四个闪闪发光的铝制储油罐。小池子上的四根管子把原油送进这四个庞然大物，通过它们再送到炼油厂的各加工点。

我顺着原油流进炼油厂的路线往回走。在加勒比海边，我看见过正在建设的炼油厂；在别的地方看见过已经竣工投产的炼油厂。别的地方，储油罐的罐顶都是银色的。这里却有两个罐与众不同，一个罐顶鲜红，一个罐顶是天蓝色的。我看见有两条管道穿过整个炼油厂区，管道上各安一个龙头，一个鲜红，一个天蓝。我想这两个罐大概与这两条管道有关。

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工程师回答道："这是泡沫灭火装置。这两个颜色鲜艳的罐里装着泡沫灭火剂。这两条管子与所有储

油罐和提炼塔相连。哪里起火，就把哪里的火扑灭。”

工程师解释道，从这两条管子流出两种不同的液体，到了着火的地方互相混合，产生泡沫；泡沫迅速罩住正在蔓延的火灶，使它与氧气隔绝，把火熄灭。

此外还设立了消防站，备有泵、砂箱、灭火器、锄头以及除水以外的各种灭火剂。向油火里浇水等于火上加油。炼油厂里禁止吸烟，这大概是全国唯一真正实行烟禁的所在。

原油不分昼夜地用电力从储油罐输进提炼塔。即使有一天电力累得精疲力竭，提炼塔也不会得到休息的机会；那时备用的蒸汽机就会转动起来，取电力而代之。

我顺着输送原油的管道行进，第一站是加热装置。这是一个火室，里面管道纵横交错。原油通过这管道的迷宫，被加热了。

我和加热后的原油一起来到提炼塔脚下，这是一座金属圆塔。我留在外面，预热后的原油进了塔，往上攀登。油塔里的情形就象人的社会生活。混杂的一群拥了进来，统一体逐渐分化，越向上越困难。各层之间用筛板隔开，层次越高，筛眼越小，攀登就越发困难。塔内一共分十五层。每一层都有一部分耗尽了精力，无力继续登高，泄愤似地再发作一阵，很快败下阵来。

停留在半路的各个部分被一一运走，授予不同的名称。最下面的是废渣，只能用来烧火取暖，铺设沥青路面。只有那些登上塔顶的弟兄才能到更高的高空飞翔，到更远的远方驰骋。这时，正好有一架飞机好象要向它的动力的诞生地致意似的掠过炼油厂。

这时的油不再是原油了，而是汽油和煤油。这种油被输进专门的炼油塔中，用活性土、硫和化学剂进一步进行加工提纯。

而在过去，这是在外国进行的。

我和油一起来到运销科。这是个陆地港口，除了船，各种运输工具应有尽有。到处是油罐汽车，油罐车皮，蒸汽汽车，火车头；铁轨伸向四面八方。油罐车皮通过铁路和电车轨道驶向远方的工厂。汽车把油运到各个加油站，运到首都特区的各个小工厂。煤气罐装上汽车，四十罐一车，驶出工厂，送到各家用户手里。

在炼油厂里参观时，有管子和工程师给我当向导，我"怠慢"了那位工会干部。这时我又转向他问道："以前没有煤气，是不是？"

他大声笑了一声说："怎么没有煤气？在坦皮科，煤气不仅夜里烧，白天也烧。煤气的火光甚至照亮了大海，鱼都迷不了路。"

接着他讲了这是怎么回事。"三十年代，炼油厂里采用了裂化蒸馏法，产生了大量煤气。当时各村镇要求把煤气给他们烧饭。但是，公司没有分发煤气的装置与器具，也没有兴趣去筹措。他们宁可在每个炼油厂竖起一根大管子，把煤气白白烧掉。煤气象一个巨大的红色火炬，照耀着维拉克鲁斯州的天空，照耀着墨西哥湾的海水。人民却一点好处也没有得到。国有化后，情况就不同了。波萨・里萨的煤气用管子通到汤比科，压缩加工后用罐车送到这里，由煤气装罐机装到煤气罐里。这里供应的煤气占煤气消耗量的百分之四十。"

我们又经过一座炼油塔。向导告诉我，这是最大的一座。我心里萌发了登塔远眺的愿望。我一半参观一半游玩似地踏上梯子，沿着塔的外墙拾级而上；塔身内部，原油正在变成各种各样原料呢！我从低下原油和沥青的地方一直攀登到煤油和汽油的

高度，而我并没有象油那样变得轻一些，更没有变成气体。除了涂在塔身外壁的铝以外，内部的变化我一点也没有看见。我终于登上了塔顶。在塔顶，我心底忽然冒出一个想法：原来，这天才的发明只不过是一架普通的梯子，攀登这架梯子，胳膊并不觉疼痛，手掌也没有磨出老茧。

我站在塔顶平台上，看见了特拿育卡的蛇金字塔，看见了印第安人灵验的圣母瓜达卢佩教堂，输油管从教堂旁通过。我看见总督和其他人的别墅，这些别墅既是堡垒、教堂、修道院，又是农庄、住宅。我把目光移回我脚下的工业城，看见那些冒烟的工厂和正在建设的工厂。这些工厂都围绕着供给它们血液的炼油厂。

我向下看去，寻找那把原油，同时也就把工作送到这里来的输油管的管口。我终于在四个储油罐中间找到了它。从这四个油罐构成的四方块中喷涌出黑糊糊的东西。本来应该象一个凯旋公园的地方，看去却好象是一个病兽屠宰场。

赵璧荣 译

附 录

报告文学——一个危险的文学体裁①

具有社会意识的作家承担着双重任务，即斗争的任务和艺术的任务，但他如果只限于从事他的艺术或者他的斗争，那末这双重任务将会由于单打一而一无所成，两方面都会没有效果和价值可言。我们之所以不得不掌握并发展资产阶级艺术的遗产，倒不是为了形式上的效果，也不是希望在流行美学的法庭面前乞怜讨好，我们才不得不摒弃真正陈腐的、真正带蛊惑性的、真正鄙俗的一切，摒弃真正沉闷的唯理主义或者僵硬的唯物主义。

为了表达我们的认识，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寻找一种能够满足绝对美学的所有理想规律的形式。我们应当这样做，我们也正在这样做。但是，那些非难我们的人，也在这样做吗？他们没有。如果在一部文学史中指出，他们的高尚的文学是怎样荒唐满纸，不离窠臼，追求名利和玩弄女性的欲望、也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是怎样刺激着他们小说的主人公，从而刺激着作者本人，这一切又是怎样以一种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倾向

① 本文即作者一九三五年在巴黎保卫文化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报告文学的报告摘录。

为基础——那倒是一桩深得人心的德政。

然而，不仅有“高尚的文学”，而且，不单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初期，还将有一些特殊的文学形式，面向劳碌奔波、读书不多、智力不发达的读者层，不过这些文学形式所具备的性格必须同它们在今天六分之五的世界所具备的性格截然相反。请允许我引报告文学为例，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资产阶级美学家们对它嗤之以鼻，其实是他们自己世界里的文人们把它弄糟的，连他们也瞧不起它。

采访员从来被贬斥为报纸最低级的撰稿人，直到约翰·里德和拉里沙·赖斯纳（和他们齐名的还有俄国的特烈基雅可夫和柯尔卓夫、德国的霍利切尔、美国的斯皮瓦克、法国的隆德赫斯等人）① 的作品告诉我们，事实报道也可以写得自成一格，而且写得扣人心弦。谁要是没有从他们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也可以从批评界的护法僧侣们的敌对态度认识到这一点。

批评界的护法僧侣们的这种态度，不仅反对新事物，而且首先反对危险事物。请允许我举个例子：大约三个月以前，我到过锡兰；我在船上读过一些关于这个国土的书刊，这些书刊一部分是官方的导游册子和旅游局的宣传品，一部分是文学性的游记之类。把这些书刊同现实对照一下，我简直感到毛骨悚然。我听到的是这样一个岛屿，从十月份到元月份，上面有三万多个儿童死于疟疾和营养不良；是这样一个岛屿，上面有百分之八十的儿童由于营养不良而上不成学，上成了学也得每天挨白人的鞭

---

① 约翰·里德（1887—1920），美国记者，著有《震撼世界的十天》等。塞·米·特烈基雅可夫（1892—1939），苏联作家兼记者。米·埃·柯尔卓夫（1898—1942），苏联作家兼记者。阿·霍利切尔（1869—1941），德国作家，报告文学家。阿·隆德赫斯（1884—1932），法国记者，著有《捞珍珠的人》。

挝；是这样一个岛屿，那里的土著怎样也找不着职业，因为人们宁愿从印度大陆输入组织不起来的工人；是这样一个岛屿，那里的人们在咬啮树叶和草根；是这样一个岛屿，那里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被悲惨、饥饿的死亡盯视着。

而这些旅游笔墨又写的些什么呢？里面歌颂着珍珠形岛屿的旖旎风光、海洋的碎浪、丛林里对于永恒的探求、古堡的废墟以及光怪陆离的灿烂文化，但一个字也没有涉及可怕的日常生活。

如果我们要责备这些文章的作者，他们不但会振振有词：他们并没有撒谎，所有这些已逝的宫殿美，所有这些尚存的自然美，都是实际存在的，而且他们还会抗议，我们居然向他们规定主题，胆敢限制他们的自由。然后，他们还会进一步反攻，说：他们正是艺术家，而我们不过是“陈腐的”、“带蛊惑性的”、“无想象力的”以及天晓得还有什么帽子。

当然，一个有社会感的人也很可能把锡兰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简单地记载下来，把那些惨状罗列一下，从而真有点老一套。同样，他还免不了在这些不幸事件面前大呼小叫，从而陷入了蛊惑者的嫌疑。同样，他还免不了试图让这些累积起来的事实自己来说话，从而显得毫无想象力。

真正的作家、也就是写真实的作家必须避开所有这些歧途，他不能丧失他的艺术家的沉思，他应当挑选色彩和配景把这可怕的模特儿作为艺术品、作为控诉性的艺术品来塑造，他必须使过去和未来同当前发生联系——这就是合乎逻辑的想象，这就避免了陈腐和蛊惑。而且，尽管他有一切艺术手段，他还必须提供真实，仅仅提供真实，因为正是由于要求科学的经得起检验的真实，采访员的工作才变得如此危险，不仅对于世界上的食利者

危险，对于他本人也危险，比一个无须乎担心被否认的诗人的劳动更危险。

精确地描述真实，而又不丧失作品的神韵和形式，是很难的；报告文学就是要揭露劳动和生活方式的真相——在当前这段时期，这经常是些粗陋而又单调的模特儿。

真实是艺术最贵重的原料，精确是它最好的处理方式。在自由被压抑而暴政肆虐的国土上，再笨的人也看得出来，文学方面流行着多情善感的晦涩风格，对于血和土地之类的神秘的迷恋，因为那里任何生活问题都没有人敢碰。

但是，我们却认为，人和生活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的文学应当为他们、为他们的存在和意识服务！

刘半九 译